

大外交家

Zhou · Enlai, a Great Diplomat

王俊彦 / 著

台湾·中央出版社

周恩來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和/或www.B00K00.com)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 / 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的商标。



一见难忘

（代前言）

〔美〕 约翰·塞维斯

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没有谁会忘记他。他精神饱满，富于魅力，长相漂亮，这是原因之一。他给人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他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1941年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是延安中共派去的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威望已经日益升高，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是与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对手。我个人呢，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官员，一名三等秘书，即是外交工作最低级的官员。30年以后的1971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担任中国总理的人再次见面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所不同的，仅仅是他那往后梳的黑发变得花白了，以前喜欢悠然自得地靠在安乐椅上的身躯，现在显得带些老态了。

1941年的那次会晤以后，直到1945年4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加深了那令人难忘的首次见面的印象。在中国西北延安共产党总部所在地，谈话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这样的，因为通过相互讨论，可以消除



分歧，可以衡量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从而制定对策，以适应将来出现的新局面。他们对待当时在那里的少数外国人也是如此。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在中国战时的政治局势中，以及难以捉摸的中国未来，是个相当重要因素。

比如说，到底美国准备支持蒋介石以及他的国民政府到多大的程度呢？因此同美国人对话，显然是周恩来为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他对此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代，我注意到他会见过许多美国客人，其中有地位高的，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通晓中国国情的专家，也有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然而无知不使他感到惊奇，对于琐碎或不相干的问题，也不会置之不理。真的，不管情况多么使他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显得厌倦、烦恼或疲乏。

那个年代（后来在北京也是如此），是白天或夜晚，时间似乎无关重要。在延安过的是俭朴和不拘礼仪的生活。许多人住在山边的窑洞里，周恩来路过我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鲍瑞德上校同住的一个简陋的窑洞时，会停下交谈几句。有时我过河那边党的总部周恩来的窑洞去看望他，长征时代和毕生革命伴侣的周夫人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留我吃顿便饭。

官方也没有什么硬性规定，限制谈话的时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令人惊异的是，到了晚年在北京，他还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而其实作为政府的首脑，政务繁忙，负担之重，是足够压垮比较平常的人的。

基辛格在1971年10月为安排尼克松访华，第二次到北京返国那天，即在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和妻子突然被邀去同他会晤，真是出乎意料，似乎这一天我们本来最不该占用周恩来的时间的，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中间没有间断过。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还是被打断过一次。在谈话进行中，一位年轻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进来，轻轻走到周的椅子旁边，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吞下药片，然后又接着谈下去，思路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在重庆和延安的那些日子里，同他谈话，每次都是思想智慧的交锋，愉快得很。他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不会使人提心吊胆，幽默而不挖苦人或说话带刺，他能非常之迅速地领会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表达上遇到困难时表示不耐烦，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要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思想活跃，意志坚定，受过严格训练，头脑



井井有条。当然，他在设法使我们趋向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事物的看法，他自己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温和的措词，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对世界事物的了解及深入掌握的事实和细节。人们需要的是说服（或者受到教育），而不能压服他们，或者因为意见不同就摈弃他们。

这从来是个有取有舍，相互谅解的问题。他是坦率的，直言不讳的，他也希望对方如此。意见分歧并不使他感到为难（可能他料到分歧是少不了的），但是如果不能把分歧的理由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会感到他是失望的。

因此，在周恩来看来，我们是在探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进一步认识 and 了解。而他自己呢，是通过在华的美国人，在探索对美国的了解。但是这样交换意见是不对等的，也不平衡：周讲话更加明确，更加敏捷，他是共产党的权威发言人；而我们呢，仅仅是遥远的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人微言轻的代表，华盛顿的想法如何，我们仅仅知道一点点滴而已。

这时历史捉弄了我们。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策制定者没有领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向我们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领导可能认为从在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级别太低，同华盛顿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远——至少是在美国新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到任



后不久就同蒋介石取得了默契时是如此。

1945年1月，美国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周恩来表现精明，知道问题关系重大。他提出要到华盛顿去，以便同罗斯福总统进行讨论，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取可靠消息，看看到底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美国将采取什么立场。赫尔利大使阻挠了这个意图。历史学家巴巴拉·杜厄曼讲的意见可能是对的，她认为事情到了这步，已为时过晚，能否改变历史的进程，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非得世界上这位能言善辩最英明的外交家登台作一次精湛的表演不可。

我们知道，事与愿违。令人奇怪的是罗斯福同斯大林两人对中国所持不切实际的看法却不谋而合。其结果就是雅尔塔协议的缔结。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把美国拴死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从而使美中不愉快的关系冻结了27年之久。

周恩来逝世前总算看到了这个政策颠倒过来了，而且他多少年来一直寻求的中美关系缓和已开始产生作用。但是由于美国拖拖拉拉没有实现由尼克松总统四年之前签署的上海公报，致使他未能看到成果呈现在大家眼前，实在是令人遗憾的。

[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1909年出生于我国四川省成都，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中国名字叫谢伟思，著名汉学家。童年在中国度



过。在美国念完大学后，于 1933 年又回到中国，任职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后调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1945 年奉召回美国。约翰·塞维斯 1974 年出版《在中国失去良机》一书，费正清教授称之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中国革命的第一流文献”。本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刊登在 1976 年 1 月 13 日美国《洛杉矶时报》上。]

第一章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周恩来是最合适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人选

1949 年 9 月下旬的北京，秋高气爽，歌声阵阵，欢声笑语弥漫在古老都城的上空。

随着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年 51 岁的周恩来凭着他出类拔萃的经验和才能，凭着他无与伦比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成为当之无愧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

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新中国外交部长人选，在授命他组建新中国外交部时明确指示：新中国外交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另建队伍。

周恩来顿感肩头有千斤重担，他比谁都明白，中国共产党人还缺少真正



意义上的外交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虽然有些对外斗争经验，但是，过去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人，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现在我们是代表新中国，一切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都是跪在地下办外交，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杜鲁门向中国放出试探性气球

周恩来完全明白，新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他的主要对手是杜鲁门、艾奇逊、杜勒斯。事实上，围绕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中美之间早就开始了错综复杂的较量：

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当日成立了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还不明朗，就决定放一个试探气球，把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一种尝试，便让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电指示，正式批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以扩大美国对



中共政权的影响，不使中共政权落入苏联人的控制之中。

瓦尔德接到司徒雷登转发的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电，感到很头疼，明白这是个棘手的任务，会自讨无趣，但一来上命难违，二来想到自己被杜鲁门、艾奇逊看中，即将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就打起精神，拜见沈阳市长，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沈阳与美国发生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受到军管会主任陈云的严厉批评，并向中央做了报告。

周恩来接到陈云的报告，马上呈报毛泽东。

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一户农家的石磨旁，毛泽东借题批评杜鲁门说：“这个市长，完全丧失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屈肘抱在胸前说：“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果断地做出决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电很快经毛泽东签发，从西柏坡发往沈阳，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



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

美国外交官仍摆帝国主义的威风，不服从中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便与毛泽东商量对策。毛泽东深知这是美国当局在试探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便对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什么事？”

周恩来对此完全赞成，又请示毛泽东还有何意见。毛泽东若有所思，起身告诉周恩来：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们有权禁止他们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东北局领导人发出明确指示：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作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



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周恩来的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美国总统杜鲁门得到消息火冒三丈，但是美国当时与中共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干生气无处下手。国务卿艾奇逊头脑比较冷静，他已经和毛泽东、周恩来斗过几个回合，尝过一点儿苦头，就请他的总统暂息雷霆之怒，建议召集美国外交智囊，认真研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方策。

杜鲁门只得同意艾奇逊的意见，召集智囊商议，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大部分人认为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要在中国东北抗衡苏联，就要让瓦尔德留下来，特别加强情报工作，获取中国和苏联对美政策的核心情报，并命令美国情报机关予以配合。

瓦尔德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专人前来传达的美国最高当局的指示，立刻调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加紧活动搜集情报。

这时，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也在多次讨论对美、对苏的外交关系问题，这无疑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他们主张要尽可能地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既然打算与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也就不想将美国人全赶出中国大陆，只是考虑到苏



联的强烈要求，才在东北采取挤走美国人的方针，但这并不等于准备在关内其他地区也这样做。

就在这时，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破获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三个美国潜伏特务的详细报告，发现缴获的发报机与封存的美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型号完全相同。毛泽东说：“看样子，美国的阴谋还不小呢，这些帝国主义，本性难改。”

美国间谍事件给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带来巨大冲击，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不光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对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还要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杜鲁门在沈阳吃了闭门羹，又指示司徒雷登设法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挑拨中共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

科瓦廖夫怀疑中国先斩后奏

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见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便想借此探索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

毛泽东认为同美国人接触是个重要外交活动，有必要同斯大林打个招呼，就让周恩来与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气。



1949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北平会见科瓦廖夫，客气地予以询问。

科瓦廖夫认为周恩来此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是在投石问路，他判断周恩来可能先斩后奏，但已接到斯大林关于不要过多干涉的指示，不好再横加干预，大度地说这是你们的内政，但同时又用外交用语表达了苏方的担心：

“你们中央领导怎样看待美国要挽救蒋介石、肢解中国的企图？如何处理与美国接触和准备给蒋介石最后的打击这两者的关系？在和蒋介石作战的情况下，会从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什么？”

周恩来机敏过人，对科瓦廖夫的用心一清二楚，他极有风度地把两手一摊，将话题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

科瓦廖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莫斯科发电报告，斯大林接受以往干涉过多适得其反的教训，决定赞同新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某些交往。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使馆部分馆员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留在了南京。为了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中央决定派黄华到南京从事外事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地与黄华做了一次



长谈，详细交代了有关与美国建立联系的原则。周恩来告诉他，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已通过其他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新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因此，中央决定我方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根据中央指示黄华即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与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在1949年5月13日至7月30日多次接触。

双方谈的最多的是中美建交问题。司徒雷登首先表示，美国已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而愿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这时，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的消息在南京广泛传播，成为各国驻南京外交官的热门话题，美国人还有意散布黄华带有周恩来亲笔信的消息，以提高美国人的身价。为防止美国外交官混淆视听，黄华主动召集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严肃地宣布了中共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并讲明了对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即只把他们作为外国侨民对待。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6月6日，黄华再次会晤司徒雷登，讲明中美建立新关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首先要中断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经过一番考虑后辩解说 美国驻华大使留在南京不去广州就说明了对国民党的态度。目前，国共两党各占中国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行事，美国尚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过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今天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它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美国才能予以承认。希望本此精神探索双方建立新关系的线索。

黄华把司徒雷登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认为这是司徒雷登委婉地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和担负国际义务。这表明杜鲁门政府要价甚高，暂且不去理它。

司徒雷登等了两天不见黄华传回反馈的信息，自然明白症结所在，6月8日，司徒雷登派他的秘书傅泾波会见黄华，小心翼翼地要黄华转告周恩来，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目前对与新中国的关系难以做出正式表示，他需要回国去作努力，他想了解中共最高层人士的意见，问能否向周恩来转达这一要求？

杜鲁门不准司徒雷登北上“屈服朝圣”

黄华表示可以转达，傅泾波又进而表示，司徒雷登遵照国务卿艾奇逊来电的指示，他打算回国前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想获知中共领导人的



意见。

黄华将此事急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认为让司徒雷登以非官方人士身份来北平利大于弊，遂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并暗示此行有可能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晤。同时也郑重说明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提出，决非我方邀请，不能丝毫含糊，给予宣传借口。司徒雷登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准许其乘美机来北平。如他借口不乘飞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当时，美国企图影响中苏关系，司徒雷登让罗隆基和陈铭枢转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 50 亿美元，接近印度 15 年所得的贷款。

司徒雷登正在准备北上之际，却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否定电。

原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艾奇逊等认为司徒雷登此时北上是想向中共“屈服朝圣”，借瓦尔德事件大做文章，要司徒雷登发表支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和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谈话。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美国方面的态度变化，告诉周恩来迅速做出明确反应：

“既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了其在沈阳总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事情，司徒



雷登之流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人民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于是，新华社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

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安排，《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对外“一边倒”的政策，宣称“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宣布现在只有拜苏联为先生，倒向苏联一边。艾奇逊则在7月1日发电指示司徒雷登，“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艾奇逊要求他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告诉他如果现在去北平会引起国内各方猜疑。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宣告夭折。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接触又一次失之交臂。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失望，带着遗憾，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



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仅1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就相继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

针对美国既不撤走前驻华外交官员、又不承认新中国的两面态度，周恩来指示北京军管会收回美国兵营的地产权，征用了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和其他建筑。

为赖在中国不走，美国挖空心思找借口一面宣布撤回在中国的官员，一面造谣说中国留难美侨。

针对美国的两面态度，周恩来1950年2月15日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美国在撤侨问题上玩弄的阴谋：



中国政府不但不会阻止前美国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与此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前美国领事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情况,中国愿所有的美国官方人员能够尽快离开中国。

3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其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来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会见周恩来或其他领导人,以私人身份商谈中美关系中的“摩擦”问题。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王炳南出面通知柯乐博:“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你只能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出现。”

柯乐博并不死心,再次要求会见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周恩来降低接见官员的职务等级,改由中国外交部美澳司科长凌青接见柯乐博。

柯乐博主动表示,他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但声称改善中美关系,进行通商贸易是可能的。

凌青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回答道:“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

这样,美国政府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在美苏之间做出明显的抉择,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指望,便将在中国的800多名美国官员先后撤走。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之中。



第二章 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麻烦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乘火车到达冰雪覆盖的莫斯科。

周恩来为何匆忙赶赴莫斯科？

原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碰到了难题。

毛泽东是1949年12月16日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中苏首脑会谈的，但是两人谈得不太顺畅。

原因是多方面的。斯大林虽衷心欢迎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仍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担心毛泽东会不会是另一个铁托，对新中国让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也不太放心，加之两位伟人性格不同，因此谈起来就有点儿费劲儿，比如斯大林客气地问：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巧妙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不懂这极富哲理又幽默的语言，毛泽东便不想亲自跟苏联人谈，就提出要求：“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有两个理由：一是周恩来有外交才能，与外国人打



交道更在行，二是斯大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自己不是总理，也不是外交部长，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就要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认为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非他和毛泽东不可，惊讶地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周恩来）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情了。”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要不要请周恩来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两人都闷闷不乐，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发了脾气，除 12 月 21 日参加斯大林寿辰的庆祝活动外，毛泽东访苏的情况没有在报纸上做任何报导，英国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苏联领导人有些着急了，又经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多方疏通，发了个毛泽东访苏情况的答记者问，在世界上震动很大。斯大林了解中共的意图后，才让步同意请周恩来急赴莫斯科。

于是，毛泽东 1950 年 1 月 2 日晚高兴地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这样，周恩来赴苏便成为中苏关系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

1月20日，周恩来一到达莫斯科，就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中国代表团及各国驻苏使节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称：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外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问将有重大的意义。

斯大林初次领教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周恩来1月22日陪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磋商中苏双方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双方商定由周恩来、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刚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在东北问题上放出试探气球：要中国承诺除了苏



联人之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东北，不许他们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

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周恩来当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还有蒙古人，这算不算是第三国居民？”

斯大林顿时被问得目瞪口呆，他尝到了周恩来的厉害，赶紧解释说苏联的本意是禁止帝国主义国家的人窜入中国东北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大局为重，转移话题谈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侃侃而谈：

“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便让苏联外交官搞了个草案交给周恩来看，周恩来看了连连摇头，认为没有反映中方的意见，要大力修改，苏联官员不以为然，想看看周恩来有多大本领，请周恩来搞一个草案看，成心要看周恩来的笑话。

周恩来早知其意，也不多言，向毛泽东汇报后连干两天，把中国的草案交给了苏方官员。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周恩来起草的文件这样好，斯大林也对周恩来的才能大加称赞，没有做大的修改便予以通过。他们哪



里知道，周恩来认为这一条约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必须万分谨慎，他不仅亲自熬夜起草，而且吸收众人的智慧反复修改，认为准确之后才交给苏联官员。

斯大林这才恍然大悟，明白毛泽东为何坚持非把周恩来请来不可，周恩来果然外交艺术超群，不可等闲视之。

毛泽东不领斯大林的情

不久，斯大林又发现周恩来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提出建议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问题，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蒙古原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报酬”，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硬要蒙古独立，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蒙古独立。斯大林心里有鬼，他一听周恩来的话就紧张起来，急忙出面阻止说：

“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要发什么声明？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问题？”

周恩来知道斯大林疑心忒重，为防止他误会，耐心地解释说：



“中国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这才放心了，他见周恩来挑起了中苏谈判的重担，毛泽东轻松了许多，非常羡慕，就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毛泽东，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双方还应该做些什么，由师哲在一旁翻译，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回答感到非常意外，只听毛泽东说：“周恩来今天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嘛。”

斯大林赶快说明自己的意图：“我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和要求。”

毛泽东不紧不慢、不冷不热地回答：“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再也没有给毛泽东来过电话，两人不久就发生了矛盾。

原来，为打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蒙古问题上对中苏的攻击，中苏蒙三国决定分别发表声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国的声明，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周恩来看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心里非常高



兴。

周恩来怎么也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让莫洛托夫把毛泽东和他找去，严厉指责中国没有按照三国协议发表官方声明，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他始终一言不发，面沉似水，遂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赶快做了些解释，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沉闷气氛。

斯大林发现事情不妙，赶快采取补救措施，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是毛泽东毫不领情，甚至取消了邀请斯大林前往中国大使馆作客的安排，周恩来主动讲一些中苏友好的事情，才使毛泽东的脸色好看了一点儿。

在半小时后举行的晚宴上，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使宴会极其沉闷无趣。

斯大林见事态严重，为了打破僵局，他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但被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斯大林极为生气，遂使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急忙出面斡旋，才没有造成不欢而散的严重局面。对于周恩来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有如下回忆：

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



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伐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

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通过这件事，斯大林这才明白自己对中国文化和毛泽东及周恩来都不太了解，开始更尊重毛泽东和周恩来。

斯大林举杯感谢周恩来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举世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周恩来风度翩翩地致祝酒词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在热烈的掌声中，斯大林精神焕发，起立致词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



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话道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声，毛泽东豪情满怀，举杯敬祝斯大林身体健康，祝愿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频频举杯，祝福毛泽东和周恩来身体健康，宴会至深夜才尽欢而散。

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破例率领苏联领导人出席，盛况空前。

毛泽东和周恩来把斯大林等人请进大厅里面的小主宾室里，大部分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

人们都渴望亲眼一睹斯大林和毛泽东及周恩来的风采，争先恐后涌来，欢呼跳跃，势不可挡，这下可吓坏了工作人员，急忙出面阻拦，但却毫无作用，眼看间壁和玻璃门就要被挤碎，周恩来急中生智，急忙让服务员打开玻璃门，将大小两厅合为一厅，中苏两国官员和外国使节为能亲自看到激动人心的历史性场面而热情欢呼，拼命鼓掌。

周恩来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人走上前来，与斯大林亲切握手，热情问候，一个接一个向斯大林敬酒。

斯大林和周恩来谈笑风生，不断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慷慨地告诉周恩来：“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对周恩来说：“一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一共两万斤，也是飞机送来的，现在又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党的深情厚意，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宴会厅里充满了友谊的欢笑声。

在一片欢笑声中，周恩来总理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没有拿讲稿，但是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然讲得与原稿一字不差，洋洋洒洒，充满激情，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向毛泽东敬酒后，举杯走到周恩来面前，充满尊敬之情地敬酒：“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斯大林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地举行会谈。

苏联的盛大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准备回国事宜，周恩来亲自分发了赠给苏方人员的礼物，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每人一份，一个不少，很多苏方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动身回国。

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访苏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周恩来外交的辉煌开端，娴熟的外交艺术受到毛泽东和中外外交家的高度赞扬，但是周恩来绝口不提自己，而大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伟大意义：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第三章 抗美援朝

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打疼了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3月15日气急败坏地发表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先对新中国百般恐吓,然后又摆出一副“中国人的老朋友”的姿态,甜言蜜语拉拢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只能在亚洲以及亚洲之外,给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朋友带来严重的困难,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美国人是愿意和中国通商的,但中国必须不抱敌意,要一如我们的祖先过去所为。”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艾奇逊的这篇奇文,完全明白了美国帝国主义的阴险用心,便在3月18日以外交部长名义,驳斥艾奇逊的造谣污蔑: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3月15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亚洲问题的冗长演说。艾奇逊近来不断地发表演说谈话，其目的是欺骗一部分对于美国侵略政策还缺少经验的人们。但是人们只要拿事实来对证一下，就可以看出艾奇逊的话是颠倒的。”

周恩来充满民族自豪感宣称：

“艾奇逊对中国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求美国的援助呢？美国是多么想‘援助’你们啊。但是中国人已经从亲身的经验中懂得了美国的所谓‘援助’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自从中国人摆脱了美国的援助，中国人就好起来了，就真正地独立起来了。这个教训，对于全世界人民都是有益的，对于已经或正在被美国帝国主义选择为侵略对象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有益的。”

为了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达了“三管齐下”的命令：支持南朝鲜军队威胁朝鲜，调动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且增加驻扎菲律宾的美国军队，配合其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政策，妄图把我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金日成看到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也想早日实现朝鲜统一，便于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访问苏联，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斯大林同意了他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就不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告加



以实施。

1950年6月25日，受命参加进攻的朝鲜人民军7个师部队随着反击南朝鲜军队挑衅的一声枪响，大举越过三八线，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发表公开声明，命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动用所有能够动用的武器，装备李承晚部队。麦克阿瑟指挥美国驻扎在远东的海空军部队掩护和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并且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玩弄阴谋诡计，利用苏联代表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之机，操纵安理会非法决定采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还冒险强行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纠集英国、法国等15个国家派出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气势汹汹，妄图一口吞下朝鲜。

6月28日，毛泽东主席面对美军入侵朝鲜和台湾的严峻形势庄严指出：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同一天，周恩来就美国总统杜鲁门27日发表的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针锋相对地谴责说：

“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



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

6月30日，周恩来接见原定派往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柴军武，通知他的工作有变化，因为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做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

不久，柴军武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他上任前又得到周恩来的特别指示：

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



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极其富有战斗力的朝鲜人民军奋勇作战，南朝鲜军队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汉城失守，到8月中旬，美伪军竟然被赶到釜山一隅进行顽抗。朝鲜同志和苏联顾问以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事情没有那么乐观，急忙告诉朝鲜同志，目前是最危险的时期，务必防止敌军偷袭。

8月23日，周恩来从总参作战局了解到美军有可能实施仁川登陆，立刻对此高度重视，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关键性的问题，马上报告毛泽东，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

毛泽东和周恩来果断地做出决定：第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第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第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8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防会议，作出明确的指示：朝鲜战争已经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朝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美李<承晚>军赶下海去，很快解放朝鲜半岛是不可能了。根据



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如果实现，在洛东江前线的朝鲜人民军势必要向后撤，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现在看来，最后歼灭入侵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

事情不幸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言中，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早就暗中准备在自然条件险恶的仁川港实施两栖登陆。经过充分准备，于9月15日纠集“联合国军”军舰300艘、飞机500架，掩护4万多地面部队偷袭得手，从南北两面夹击朝鲜人民军主力。

周恩来忧心如焚，9月20日紧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指出“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建议“集中兵力”，马上“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

对周恩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建议，金日成虽然回电表示同意，但是行动迟缓，结果被美国侵略者将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截断在南朝鲜，并迅速攻克汉城向北进犯，从而使朝鲜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朝鲜人民军遭到沉重打击，由撤退变为溃退，美伪军猖狂进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矛头直指鸭绿江。

周恩来深知唇亡则齿寒，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武装进



攻的威胁，于9月30日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10月1日，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在朝鲜战局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向中国发来紧急求援电报：“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接到朝鲜的求援电报，周恩来夜不能寐，他认为朝鲜战局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朝鲜人民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为挽狂澜于即倒，他设身处地为朝鲜人民排难解忧。

在中南海的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飞笔疾书，向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电，请他转告金日成：

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8个师既已被割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8个师分为两部分：以4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4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以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北撤，愈快愈好”。

金日成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到周恩来的指教，如久旱遇甘霖，用



周恩来的妙计，保存了人民军的大量骨干。

为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直接作战，周恩来又做出巨大的外交努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地请他立即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报告，并转告美国和英国政府：

美军如果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前天收到大使阁下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否则，中国很快将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这里，周恩来也暗示具有妥协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却无视中国的再三警告，命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

周恩来力排畏美言论

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力排畏美言论，主张尽快出兵。10月6日，他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



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这时候真是遇难求知己，危急显真情，毛泽东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反复与周恩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研究，终于一致同意出兵朝鲜。

毛泽东10月8日将周恩来起草的电报发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称：

“我们决定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惨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10月9日，毛泽东刚下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命令，周恩来就匆匆赶来送上斯大林的紧急电报：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毛泽东顿时脸色突变，生气地说：“斯大林怎么搞的？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下了出动命令，才说空军没有准备好……”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哪儿是没有准备好？他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怕我们打不过美国人，担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冒苏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



受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 10 月 12 日到达莫斯科。得知斯大林正在黑海之滨休养，又立即飞往克里米亚会见斯大林。

周恩来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然后特别强调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由于中国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刻投入战斗……因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暂缓向朝鲜出兵。

斯大林以自责的语气解释说，请原谅，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周恩来忧心忡忡说，我们尚在其次，主要是朝鲜同志困难更大。

斯大林点点头说，现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门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可以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周恩来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制定出取胜的措施和对策。”



斯大林杀个回马枪：“周恩来同志，你此次来莫斯科，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在关键时刻，周恩来以低调但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尴尬地解释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帮助朝鲜同志的办法，但是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斯大林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了会谈情况，然后返回莫斯科，刚住下，就收到北京来电，他匆匆而阅：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



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1950年10月13日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振奋之情油然而生，深夜紧急约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请求他立即把毛泽东来电的内容转告斯大林，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苏联方面商量两件事：其一是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采取租借办法，二是苏联能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军在朝鲜作战的同时，再向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地派出掩护空军。

使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斯大林很快给他复电，同意采取信用贷款方式给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准备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正准备束装回国，莫洛托夫突然来访，抱歉地说刚才接到斯大林来电，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不进入朝鲜境内掩



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大吃一惊，对斯大林自食前言极不满意，但是不得不面对现实，将军火一事办妥后就返回北京，因为形势急迫，没有商谈军火的价格问题。

指导伍修权智斗联合国

周恩来是不折不扣的抗美援朝的后方总指挥，他又好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场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导等等，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

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运筹帷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9日黄昏，采取瞒天过海巧计，兵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跨过鸭绿江，把美国侵略者打了个晕头转向，然后乘胜实施战役展开，苦战13昼夜，歼敌15000余人，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从11月24日开始，美国集中22万大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中朝军队开始进行第二次战役，与此相配合，美国开展外交诱骗活动，指示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台



湾问题的讨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特派伍修权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

11月28日，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演说，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又对中国代表团在成功湖的特殊斗争做出新的部署。

12月3日，周恩来致电伍修权、乔冠华：

美军在朝鲜东西两线均惨败，现在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目前，你们应集中力量，准备在政治局委员会的发言，以便在本周采取攻势，给美帝代表一个反击。“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谈朝鲜和台湾问题”，

要注意“凡遇以朝鲜停战谈判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做报告；凡言台湾问题目前不能解决者，你们应抓住这点，证明美帝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并反问美帝可以在侵朝同时侵台，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台同时不能志愿援朝？”

周恩来还指示伍修权和乔冠华：你们同时应该声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不得到中国代表同意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而产生的决议和办法，都将是无效的和非法的。



为了配合中国代表团的的活动，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要求美国撤出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武装，拒绝参加讨论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

周恩来欣喜地看到，在中国代表控诉美国的侵略行为时，第二次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中朝军队并肩作战，收复了平壤和朝鲜北部广大地区，已使朝鲜战局得到根本好转。为了争取喘息时间，杜鲁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

毛泽东和周恩来明察秋毫，识破了美国人玩弄的把戏，立即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周恩来12月12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走出一步外交妙棋，说明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够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态度。

潘尼迦称赞中国的外交艺术果然出手不凡，将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因此乐于给中国朋友帮忙。

周恩来又把好戏唱到联合国，13日将他与潘尼迦的谈话内容电告在纽约的伍修权和乔冠华，与他们研究对美国挖空心思搞的相当棘手的13国提案的处置办法。



伍修权和乔冠华正在为此苦苦寻求对策,奋战一夜终于搞出一个相当满意的实施方案。

正在此时,中国代表团接到北京来电,乔冠华看罢喜上眉梢,连声称赞:“总理真神人也!”

伍修权急忙接过北京来电,边看边赞不绝口,周恩来的见解果然高出一筹: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看它是在继续战争,扩大战争,还是在想结束战争。各国代表如果真想和平调处朝鲜战争,就应该像苏联代表那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他。

中国代表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联合国频频出击,把美国代表打得狼狈不堪,美国当局就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立即停火”。

伍修权和乔冠华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揭露,向北京汇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请求指示。周恩来认为其发言稿基本可用,但是应加上这样一段话:

“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故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国统治集团却



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施行武装侵略台湾，轰炸中国本土，并扩大在东亚的侵略。”

周恩来又电授对付奥斯汀的方策：

“奥斯汀先生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束手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为所欲为地驱入战争的深渊。”

16日，周恩来又指示伍修权和乔冠华，在联合国着重说明中国亟愿努力使朝鲜战事早日得到结束，但只有在中国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商谈，才能实现真正停战。赖伊搞的虚伪停战，是中国绝对不能同意的，也请真正希望和平的代表先生们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要善于在这种地方区别真假，分清是非。

周恩来12月22日乘胜追击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国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在周恩来的巧妙指挥下，中国在北京、朝鲜、纽约频频发动外交攻势，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加剧敌视中国的行动，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



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为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周恩来 12 月 28 日签发政务院命令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

1951 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就接到战报，中朝大军胜利攻占汉城，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美国又玩弄阴谋诡计，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的“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该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致电周恩来要求进行接触。

周恩来 1 月 17 日复电表明中国政府不同意“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只便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而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特别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称：

“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谈判时，可能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周恩来提出在中国召开七国会议，参加国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谈判解决朝鲜战争问题。

周恩来考虑到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显示中国立场的和解性，他



特意向印度驻华大使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可以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可以在七国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且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第二步，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商定。”

这时，美国一方面纠集 20 万侵略军向中朝汉江以南阵地发动进攻，一方面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中朝人民在被迫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同时，与美国在联合国展开更复杂的斗争。

1951 年 2 月 2 日，周恩来就美国的霸道行径发表严正的声明称：

“这就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最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美国的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美国侵略者在第四次战役中被歼灭 7、8 万人，麦克阿瑟叫嚣要把侵略朝鲜的战争扩大到中国，引起周恩来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抗议，英国和法国也向美国提出非正式抗议，美国总统杜鲁门只得将麦克阿瑟撤职，任命李奇微接替。

李奇微指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发起猛烈攻势，中朝人民被迫进行第五次战役，迫使美伪军后退 50 至 70 公里，被歼灭 4.6 万余人。



周恩来在朝鲜前线捷报鼓舞下，精神更为振奋，忙中偷闲给在杭州西湖养病的妻子邓颖超复信：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等你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

几天后，周恩来又满含深情地写道：“你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瑾答应给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别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

周恩来在信中风趣地说：“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板门店谈判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受美国政府的指派，5月31日拜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进



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重要情况，立即把金日成秘密请到北京进行协商。

毛泽东点燃香烟，提出他深思熟虑的意见：“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周恩来认为中朝联军虽然经五次战役歼灭敌人22万余人，其中美军11.5万人，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金日成还想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毛泽东和周恩来理解金日成的心情，劝他作两手准备，才取得一致意见。

金日成又提出请彭德怀率领中朝代表团与敌人再作较量，周恩来认为彭德怀是我方统帅，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提出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担此重任，还特派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乔冠华在后面坐镇指挥，毛泽东、金日成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见整装待发的李克农、乔冠华，传授谈判妙计，他双手抱肩风趣地说：“最后送你们12个字：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李克农久经沙场，对这12个字指示感到字字有千斤之重，他希望周恩



来详细讲解这个高深韬略的奥秘，就极感兴趣地问：“总理，你的意思……”

周恩来侧过头来，向他的两大外交高徒解释说：“‘行于所当行’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坚决做，义无反顾；‘止于所不可不止’，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恩来就此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见毛泽东轻轻点头，于是进一步详细地解释道：

“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总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高丽王朝的古都开城正式开始。

为表示中朝方面的诚意，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方在新闻记者采访、军事分界线和监察等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美国代表却误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他们拒绝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中国仍会继续让步，又公然提出“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论”，无理要求在离战线很远的我方实际控制区域内建立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攫取朝鲜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做出部署，指示我方谈判代表，



严厉驳斥美国人的谬论说：

“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的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

周恩来摸透了美国谈判代表的处境，把美国人的谈判老底揭露得淋漓尽致：“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会完全陷于被动。”

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锦囊妙计，中朝谈判代表理直气壮，处处主动，1951年7月26日迫使对方同意达成程序方面的五项协议。

美国侵略者不甘心失败，8月23日派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上空，扫射我代表团住所，周恩来指示中断谈判，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歼敌近15万人，迫使李奇微承认“本方约束不严，误袭中立区，表示遗憾”，愿对袭击中立区事件承担责任，但是又玩弄花招，提出将谈判地点由开城移到板门店。

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敌人故意捣乱，主张坚决顶回，周恩来准确地把握火候，认为谈判地点无关大局，同意在板门店恢复谈判。



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便宜，就在发动狂轰滥炸的“绞杀战”的同时，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罪恶的细菌战。

周恩来立刻把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气得毛泽东拍案而起：“卑鄙！无耻！杜鲁门被打得无法招架，竟然乞灵于这些害虫！”

周恩来立即提出建议：“主席，我们应该立即做出反应！”

周恩来与苏联、朝鲜密切协商，先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再由他代表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凡属侵入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空军人员，一经俘获，即行作为战争罪犯处理。所有因侵犯我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并滥施轰炸扫射、虐杀中国人民而招致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完全责任。”

周恩来施展巧妙的外交艺术，请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又多方邀请奥地利、意大利等 11 国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很快公布调查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美国的滔天罪行，使美国遭到严厉谴责，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只得将李奇微撤职，任命战争狂人克拉克接替。

为就抗美援朝和制定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与苏联进行协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访问苏联。



一见面，斯大林就极其热情地对中国大加称赞：“你们在朝鲜打得很不错，谈得也好，顶住了美国的巨大压力，全世界人民都称赞你们，你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向斯大林介绍两年来的反侵略战争，接着详细地介绍美国阻挠战俘问题的谈判说：“美方的阴谋是企图以扣留我方 10 万战俘的无理要求，来拖延和破坏谈判。美方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对我方被俘人员大肆屠杀，进行所谓‘甄别’，企图强迫他们充当李承晚、蒋介石的炮灰。美方的无理主张，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而巨济岛等地我方被俘人员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抗，更揭穿了美国侵略者的欺骗宣传。因此，美方代表理屈词穷，只能连续逃会，片面停会三天，充分表明了美方阴谋的彻底破产。”

周恩来形象地介绍美国谈判代表在朝鲜和平谈判中的无耻狡辩、抵赖，常常吹口哨、打瞌睡，一狼狈不堪就逃离会场。

斯大林一挥烟斗愤怒地谴责：“这是耍赖！”

莫洛托夫大发感慨：“世界外交史上也少见！”

周恩来侃侃而谈：“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美国侵略者可谓极尽欺骗之能事，一贯进行歪曲、欺骗宣传，例如明明是美方代表在会内提出了要侵占北朝鲜一万两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在会外却



矢口否认 明明是美机轰炸了中立区和会址区我方代表团的住所附近地方，美方却说炸弹是我方自己丢的；明明是美方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美方却说是我方人员‘自相残杀’，但是，由于我方坚决揭露的结果，美方不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无耻面目。”

斯大林听得津津有味，对中国大加称赞，突然问道：“周恩来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当然可以，斯大林同志。”

“我想问，美国为什么不愿和谈，尽早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们认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利用侵略战争来增加他们的军火生产的利润。他们在1950年度获得空前巨大的224亿美元的血腥利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的平均利润一倍多。他们深恐朝鲜和平的实现，将严重地影响他们的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的计划……美国侵略者的另一个目的，是妄图利用谈判进行讹诈，以便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斯大林手举烟斗大声称赞：“分析得非常正确！”

莫洛托夫击节赞叹：“我完全赞同周恩来同志的估计和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判断！”

斯大林询问当前的朝鲜战争形势，周恩来如数家珍：



“经过两年的军事斗争和一年的谈判斗争，朝中两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美国侵略者则被更严重地削弱了，就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分析心悦诚服，询问今后的谈判方针，周恩来回答道：

“根据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力争和，不怕拖，随时准备打。打对我有利，和对我更有利。在谈判中该争的要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但在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虚张声势时不能让，不起作用时不能让。让步必须能够扭转局势，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衷心称赞毛泽东、周恩来堪称当代一流的外交家，谈判艺术业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乐于帮助中国同志战胜美国人，询问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苏联帮助。周恩来轻轻抿一口浓茶，然后缓缓而谈：

“要应付美方的军事进攻和进行必要的反击，中朝军队都还有些困难，如武器装备、军需供给和掌握制空权等问题，仍需苏联方面提供大量的援助……如果我们能掌握制空权，那美帝国主义就更没有办法了，失败得更惨。”



斯大林深受鼓舞，眉飞色舞地强调美国没有本领打世界大战，它的英国、法国朋友更不行，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陆军，然后谈到苏联援助朝鲜战争问题说：

“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关于军事援助，我们同意帮助中国装备 60 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 1 比 9 是不行的，应该是 20 比 9，必须压倒敌人。”

斯大林又提出苏联参加亚洲区域联合组织问题，周恩来不愧是世界一流外交家，他认为苏联不是亚洲国家，无权参加，就巧妙地避开这个问题回答道：

“我们现在对联合国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甚好，可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以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

在中朝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杜鲁门可耻下台，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甚至对中国沿海地区发动进攻。

对美国新任总统的猖狂叫嚣，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惊慌失措，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却稳坐钓鱼船，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虽然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不会一硬到底，他们指示在朝鲜指导停战谈判的乔冠华研究，可否再给美国人一个台阶下，由我方提出恢复停战谈判。



乔冠华果然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厚望，他建议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乔老爷’果然不白坐轿，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找苏联。”因为美国内外交困，非从朝鲜脱身不可，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

果然不出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料，艾森豪威尔为摆脱困境，指示美国侵朝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利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的停战前双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日内瓦决议，1953年2月22日向中朝方面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

签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

恰在此时，斯大林于3月5日因脑溢血逝世，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吊唁，并就朝鲜停战问题与苏联领导人进行协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领袖非毛泽东莫属，他估计毛泽东肯定会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然而在3月9日的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上，未看到毛泽东的踪影，却看到周恩来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并排走在斯大林灵柩的正后面，更感到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地位，对他自然更加刮目相看，认真对待。

周恩来发现苏联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第一把



手马林科夫压不住台，各种力量都想拉拢德高望重的周恩来。他以大局为重，规劝苏联领导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也抓住有利时机与苏联领导人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圆满完成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托。

周恩来回到北京，提出分两步解决战俘问题的方案：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愿意回归的战俘，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经过有关方面的活动，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够得到尊重。

周恩来的合理建议得到各国普遍欢迎，美国却以存在实际困难拼命反对，周恩来指示谈判代表团再作非原则的让步，终于在6月8日双方达成关于战俘问题的最后协议，但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在6月18日把2.7万名被俘人员名为“就地释放”，实为强行扣留。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之后于6月21日致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志愿军从7月13日开始，对南朝鲜军队展开猛烈攻势，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国军队，以分化瓦解敌军，很快取得巨大胜利，毙、伤、俘敌共计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美国当局鉴于继续打下去处境更加不利，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与中朝方面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

第四章 出席日内瓦会议

莫洛托夫沾周恩来的光也出尽风头

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头疼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起初强烈反对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来感到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离不开中国，同时，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又明确规定让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不等于外交上承认中国，这才勉强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对马歇尔称赞周恩来为世界级大外交家，杜勒斯很不服气；对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之中与中国打个平手愤愤不平，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杜勒斯感到恼火的是两人到达日内瓦的情况大不相同。杜勒斯到日内瓦的时候欢迎的人不算少，但是西方记者的报导却极为平淡；与此形成极其鲜明对照的是周恩来到达日内瓦时的盛况。

周恩来率领新中国第一个高规格外交代表团一出现在欧洲名城日内瓦，



立刻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各国外交官和记者都想一睹周恩来的丰采。只见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夹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神采奕奕地走下舷梯。

周恩来端庄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立刻引起众人的注意，成为西方记者争先报导的中心人物。

各国舆论都把周恩来到达日内瓦视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认为由于有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参加，日内瓦会议才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杜勒斯对周恩来极不服气

杜勒斯全力搜集周恩来和新中国代表团的情报，美国外交官汇报说中国外交官缺乏外交斗争经验，身穿一色单调的黑色中山装，竟然被瑞士人以为是传教士而纷纷驻足脱帽致敬时，他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

美国外交官添油加醋讨好杜勒斯说：“这样的乡巴佬，怎么是堂堂美国国务卿的对手？”

杜勒斯厉声训斥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一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杜勒斯这句“周恩来不是乡巴佬”的话，不愧出自一个著名外交家之



口，算是说对了，周恩来不仅是著名的外交家，而且是有充分的准备而来

从1954年2月开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阅读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文件、电报、资料 and 情报，研究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经常约李克农商谈代表团人员组成，商定从朝鲜调回乔冠华、黄华等人，组织模拟会议，搞回答记者提问和翻译练兵；主持拟定有关文件；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

3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将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交会议讨论。首先说明日内瓦会议的缘起：

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交部长会议上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

周恩来主张中国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和扩军备战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



3月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很快把朝鲜外相南日请到北京，商谈两国的共同谈判策略。

周恩来又向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去电，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

为争取主动，周恩来向越南提出要搞一条比较固定的分界线，他特别强调其重要性说：

“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还向越南建议，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

周恩来特意把胡志明请到北京，3月29日与其详细商谈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



4 月上旬，周恩来再次飞往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周恩来还积极做亚洲国家的工作，创造开好日内瓦会议的国际舆论，4 月 19 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周恩来请印度通过外交途径告诉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

在做好准备之后，周恩来召开中国代表团全体会议。他看到中国代表团人才济济，心情格外振奋，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



习的精神。”

4月19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便请示道：“明天，我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道：“指示那倒没有，但我要为你送行。”

毛泽东热情地约周恩来同登瀛台涵元殿楼，请周恩来饮其特别爱喝的龙井茶：“我没有准备酒，就到瀛台以茶代酒，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周恩来一再表示感谢，坚持就在电话里送行，毛泽东只得答应，周恩来适时把话转入正题：“主席，你对日内瓦会议问题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嘱咐说：“没有什么指示了，我想请你到瀛台来，是让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忙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周恩来感谢不尽：“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对此显然非常满意，道出肺腑之言：“当然了，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都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



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但是也一定要张弛有致，劳逸结合。”

周恩来答应尽力而为，毛泽东知人善任，郑重地授权：“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批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授权你全权负责，没有大事，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一定等批复。”

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十分感谢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毛泽东对形势的精确分析更使他折服：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的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极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见夜幕已深，十分关切地要毛泽东早些休息：

“主席说得好，我们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国内国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4月20日飞抵莫斯科，又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胡志明和莫洛托夫再次协商共同对敌方案，然后于24日抵达日内瓦，稍加安顿又返回机场迎接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亲切握手，热烈拥抱，然后并肩行，亲热地边走边谈，引起西方记者的强烈关注，纷纷爬上机场通道的栏杆、窗口，大声地呼喊：“周恩来，周恩来！”

莫洛托夫原来以为西方记者在欢迎自己，后来才闹明白人家的目标是周恩来，便仔细打量这位中国朋友。只见周恩来果然仪表端庄，风度翩翩，便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儿，站下来，略谈几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

周恩来含笑表示同意，两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并肩步入候机厅。西方记者纷纷拍下这些历史性镜头，认为这是中苏共同对抗美国的生动写照。

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认为是对他的巨大挑战，决心要与周恩来、莫洛托夫决战一场。



首次使美国在战后外交舞台上处于尴尬境地

1954年4月26日下午3时05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在瑞士国际联盟大厦理事会会议厅隆重开幕。

美国立刻与中苏在朝鲜问题上展开第一场激烈的较量。

杜勒斯自以为占有绝对优势，参加日内瓦会议的20个成员中，双方力量对比为4比16，美国率领英国、法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南越和土耳其等15个成员国对付中国、苏联、朝鲜、越南，自觉绰绰有余。

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但是突然提出要把发言推迟到次日，故意要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与周恩来争个高低胜负。

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成为人们最感到兴趣的焦点。

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雪花飞舞，杜勒斯把一股冷气带进热气腾腾的会议之中，人们不由得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杜勒斯身上，也为周恩来捏一把汗。

周恩来是初次见到杜勒斯，自然仔细打量这位赫赫有名的外交官。

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以不可一世之态向中国发动猛烈进攻，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把发动和进行朝



鲜战争的责任一古脑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而且不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那辆大型福特牌轿车，匆匆绝尘而去。

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不由轻轻摇头：“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然后健步走上讲台。美国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硬着头皮准备挨骂，但是他听到的却是周恩来那语调平和又富有哲理性的发言：“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这样，周恩来和杜勒斯的发言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和美国成了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对手，周恩来和杜勒斯便成为两大对立阵营的主帅。

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与苏联和朝鲜外交官密切合作，采取分化西方阵营的方策，让莫洛托夫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到苏联的别墅赴宴，利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做艾登的工作，坦率的谈话使得中英外长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彼此肃然起敬，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周恩来认为，莫洛托夫是世界闻名的外交家，具有几十年外交斗争经



验，非常尊重他，处处向他学习。

莫洛托夫个子不高，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戴一副夹鼻眼镜，对中国态度友好，对周恩来极其敬佩，考虑到中国同志外交斗争经验不足，也经常应邀介绍经验：

“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我们应该有毫不含糊的立场，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

周恩来完全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又结合日内瓦会议的斗争实际，提出他深思熟虑的见解：

“中国、苏联、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如果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成效。”

周恩来首先与苏联、朝鲜、越南代表研究对付杜勒斯的方策。

莫洛托夫说杜勒斯人称“雷管”，因为他刚做过癌症手术，在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雷”与“镭”同音，人们便把杜勒斯称作危险的“雷管”，这就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外交家，披上一层阴森的色彩。周恩来笑称杜勒斯是个危险人物，既威胁别人自己也岌岌可危。

一天，莫洛托夫自己主动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一进门就朝周恩来嚷道：“你们可不够朋友，这么好的事都不告诉我！”



周恩来以为中国代表团出了什么差错，忙问对中国有什么意见，莫洛托夫将满头银发一摇“质问”道：“搞对象的电影为什么不给我看？”

周恩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请莫洛托夫坐下笑道：“莫老要看《梁祝》？我们专门给苏联代表团放个专场！”

莫洛托夫摸着小胡子得意地笑了：“我就爱看搞对象的电影嘛！”

周恩来对苏联代表团特别照顾，特派两个最好的俄文翻译作现场服务，翻译两个男女主角的对白，莫洛托夫很好地理解了剧情，对周恩来大发感慨：“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标准：看见了自己心爱的和仰慕的情人，竟然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不亲吻，不拥抱，真是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杜勒斯也让史密斯了解周恩来，寻找对付周恩来的办法。史密斯便去找与周恩来较有交情的莫洛托夫，兜个圈子说：“我对阁下十分敬佩，都说你是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人称‘不’先生，毫不妥协。”

莫洛托夫大笑不止，幽默地以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连连摇头：“我算什么？周恩来才叫难以对付呢！”

史密斯这才进入主题：“我向阁下讨教，怎样同周恩来打交道？”

莫洛托夫答道：“周恩来为人正直，可以私下接触。”

史密斯回来给杜勒斯一说，就遭到杜勒斯的训斥，骂史密斯上了周恩来



和莫洛托夫的当，下令严禁美国人与周恩来和中国人握手；周恩来主动与杜勒斯接触，杜勒斯吓得扭头逃跑。

在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当面“将”杜勒斯的“军”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的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周恩来一下打乱了杜勒斯的阵脚，杜勒斯慌忙之中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语无伦次地强调必须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对此，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联合国已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根本无此资格。杜勒斯哑口无言。

几个回合斗下来，杜勒斯自知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加之得癌症后体力不支，便采取脱身之计，于1954年5月3日动身回国，在华盛顿进行遥控。

杜勒斯一走，周恩来就与莫洛托夫研究与史密斯接触的方策，要从史密斯身上打开僵局：“莫老，我想争取史密斯！”

莫洛托夫大吃一惊：“这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

周恩来不以为然：“我认为，美国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嘛，不能放弃作史密斯工作的机会。”

莫洛托夫受到启发，手拍额头似有所悟：“对，我想起来了，他对美国现行政策是有些不满。”



莫洛托夫讲起史密斯原来是艾森豪威尔手下大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立过功劳，他对美国侵略朝鲜不满，曾私下对莫洛托夫发牢骚说：“美国现行政策是不明智的！”

于是，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约定，中苏代表团都不对史密斯做过分的事情，对他以礼相待；史密斯也很快发现中国和苏联外交官对他彬彬有礼，认为周恩来远比杜勒斯高明，他对中国的态度就不太僵硬了。

杜勒斯走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看到日内瓦会议形势对美国不利，史密斯更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于是指示杜勒斯命令史密斯在6月15日的会议上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美国的阴谋逃不脱周恩来的眼睛，他与苏联和朝鲜代表紧急磋商，立刻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但是遭到西方诸国的强烈反对，连莫洛托夫也泄气了，周恩来情知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到了最后关头，严厉地说：

“美国代表用来拒绝莫洛托夫建议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朝鲜停战协定只能约束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而日内瓦会议是在新的更广大的基础上召开，它必须有自己的协议。”

西方国家拼命反对，使形势更加危急，周恩来在紧急关头提出建议：“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它就是：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



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美国代表策动西方国家代表拼命反对，周恩来说：“如果连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与和解的作法，将为国际会议留下极其不良的影响。”

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支持中国的提案，会议主席艾登毅然奋起“造反”，以会议主席身份宣布支持周恩来的方案，美国代表史密斯极力反对：“我不了解周恩来外交部长建议的范围和真正的问题所在，不能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中国的建议。”

会场上一阵骚乱，艾登提出折衷性建议，莫洛托夫对此表示不满，提议把美国代表的破坏性发言记进会议记录，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公布。

周恩来完全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又做进一步发挥说：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议。我要求，我刚才所做的这一发言



也作为本会议的记录的一部分。”

在美国的压力下，南朝鲜和澳大利亚代表反对周恩来的建议，但是苏联和比利时代表赞成中国的建议，周恩来巧妙掌握时机，再次发言说：

“对于有些代表所说的话，是否可解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排斥在将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之外？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将来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位先生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剥夺了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地位。”

艾登被折服了，以会议主席身份提议：日内瓦会议不通过任何已经提出的文件作为会议的集体协议，但是，这些文件和发言一起将成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希望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的日子及早到来。

人们惊奇地发现，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创造了奇迹，使美国二战之后首次在国际上陷入尴尬境地，大大提高了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人们称赞周恩来没有争取到朝鲜问题的协议，却争取到了人心，而人心才是最宝贵的。

这时，周恩来收到邓颖超托中国信使捎来的压制成标本的海棠花。他非常爱惜这来自中南海的礼物，因为这上面寄托着妻子的无限深情，一下子拉短了日内瓦与北京的距离，他战斗起来更有精神了。

几天之后，周恩来又收到邓颖超托信使捎来的装在袋中的一片红叶，邓



颖超在袋上深情地写道：

“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

周恩来小心地翻开红叶的衬纸，只见衬纸上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想念。”

周恩来特意托卫士成元功等人采集花山别墅院内的鲜花回赠邓颖超作为纪念。6月14日，中国信使又捎回邓颖超采集并制成标本的芍药、蝴蝶花，周恩来倍加珍惜。

当日深夜，周恩来在百忙中给邓颖超复信：

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来日内瓦整整7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陈浩、成元功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4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周恩来让工作人员上街买一块瑞士手表送给邓颖超，他提出的条件是一不要太小，二不要金表，三要有夜光的，四是最好选自动的。此后，邓颖超终身佩此手表。



周恩来稍稍动了一下小指头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阴谋得逞，又在印支问题上如法炮制，苏联和越南都有点动摇了，急忙与周恩来协商对策。

周恩来主张充分利用奠边府战役胜利后的有利形势，主动释放法国重伤员，以分化西方阵营，集中力量打击美国。他在5月12日的会议上，矛头直指罪魁祸首：

“美国人自己既然在朝鲜接受停战，为什么又不容许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接受停战呢？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他们正在拉拢印度支那的三个所谓国民政府，要直接训练所谓国民军队。这种政策，既侵犯了印度支那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是在排挤法国，以便最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

周恩来客观地分析越南形势，认为越盟仍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比较有利而可行的方案是争取以北纬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

征得苏联和越南同意之后，周恩来5月27日提出一个新的折衷方案，其核心是确定印支三国同时完全停火和区域调整原则，实施方法可以根据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

这是周恩来根据越南的具体情况提出的第一个重要建议，很快推动日内



瓦会议于5月29日达成了开会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将越南问题交给双方军事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杜勒斯对会议取得的进展大发雷霆，美国代表团又极力破坏，遂使日内瓦会议陷入新的僵局，会议进入最紧张的阶段。

那时，法国的拉尼埃政府顽固地追随美国，在谈判中故意采取拖延方策，周恩来采取统一战线和各个击破的策略，揭露拉尼埃政府的顽固态度。

法国外长皮杜尔是个小个子，留着个小平头，一天到晚不离酒瓶子，走路摇摇晃晃，看去迷迷糊糊。中国代表团人员私下称他“木须肉，白菜汤先生”，因为法语里“先生”的发音是“莫须有”，听着像“木须肉”；“主席”的法语发音是“布列切汤”，听着像“白菜汤”。

当时，皮杜尔跟杜勒斯最紧，周恩来就集中炮火打击法国发动侵略越南的罪行，宣传法国奠边府战役的惨重失败，引起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法国主和派也趁机猛烈抨击，遂使拉尼埃政府于6月12日倒台，西方舆论说，周恩来只动了一下小指头儿，就把拉尼埃推下了台。

杜勒斯大惊，气急败坏地指使美国代表团，利用法国政局的混乱情况于6月14日中断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洞悉其奸，支持那天的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抢先提出关于国际保证与监督的新方案，美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



给讨论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挫败美国代表团的破坏阴谋，6月15日晚上，中苏越代表团商量对策。

周恩来在分析会议形势后，提出解决印支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建议：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军在高棉和寮国，应当承认过去在高棉和寮国有越南志愿军在那里作战，但是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苏越代表拍案叫绝。三国代表决定分头行动。周恩来分别会见英国和法国代表艾登和孟戴斯—弗郎斯，指出日内瓦会议的真正危险是美国的干涉，劝说英国和法国不要跟着美国跑到底，又告诉范文同，孟戴斯—佛郎斯政府是今天法国资产阶级主和派可能建立的较好政府，我们要争取它，支持英国和法国对抗美国。

周恩来首先会见法国新总理，揭露杜勒斯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真正面目说：“美国已经在尽力破坏日内瓦会议。现在，各国外长都回日内瓦来了，而杜勒斯不来，我们对这种态度是不能满意的。杜勒斯现在到了巴黎，却不来日内瓦，我们对此感到奇怪。美国人不遵守协议，反说别人不遵守协议。其实，世界上最不遵守协议的就是美国人。”

为与越南领导人更好地统一意见，周恩来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之



后，7月3日前往柳州，与胡志明、武元甲等人进行深入的3天8次会谈，作了关于日内瓦会议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与老朋友胡志明再次相见，分外亲热，胡志明急切地询问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问题的进展情况，周恩来精辟地分析说：

“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他超过朝鲜问题国际化的程度。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所以朝鲜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

周恩来特别强调，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

周恩来与越南领导人达成如下谈判底盘：

在越南，准备在16度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

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

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



周恩来7月6日回到北京。

第二天，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战友相见，相互问候，笑声不断。

周恩来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说明两个月来的日内瓦会议取得了若干成就。周恩来信心十足地预言，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可能性是大了，是可能达成协议的。

7月9日，周恩来满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北京，10日到达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等人介绍中印、中缅、中越会谈情况，交换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美国正在极力拉拢法国主战派，对孟戴斯—弗朗斯施加压力，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因而我们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简单明了的条件，以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苏联领导人对此完全赞成。

7月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给拖而不决的日内瓦会议带来一阵清风，他在机场的讲话立刻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即将在外交家们的重新参加下进入重要阶段。我相信，在有关各方具有谋求和平的和解精神之下，



日内瓦会议是可以迅速完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大任务的。”

当晚，周恩来不顾旅途劳顿，分别拜访莫洛托夫、范文同，说明中苏越三国党中央已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那就是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我们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

第二天，周恩来、莫洛托夫、范文同召开三国代表会议，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

“为了使孟戴斯·弗朗斯在回巴黎同杜勒斯会谈前有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稳妥把握，便于他坚持原有立场，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美国的过分要求，在越南16度线划分集结区的方案，在他口气有松动时就应提出，原提老挝集结区的方案，亦应表示缩小。”

对此，三国代表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便约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听取法国的意见。孟戴斯·弗朗斯又打起了小算盘，仍然坚持以越南18度划界，声称法国从越南撤出的是经济、政治、人口都很重要的地区……

周恩来耐心地劝说道：目前法越双方都应该再做些努力，互相让步，以求得达成协议 又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当地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从这些面积很大的地区撤退，需要很大的力量，进行解释也需要时



间，法方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和越方的困难。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的立场上后退一步，越南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

周恩来说到这里，对杜勒斯能到巴黎与英国和法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会谈，却不来日内瓦参加会议表示气愤。

接着，周恩来向法国总理指出，法国与越南共同点较多，互做妥协就可以取得圆满解决。

孟戴斯·弗朗斯双眼瞪着周恩来久久不放，他深深地被周恩来的人品所感动，更佩服周恩来的外交艺术，马上表示愿意考虑中国的意见。

周恩来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报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及与胡志明会谈的情况。艾登通报了他和丘吉尔首相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希望艾登在中苏与美国之间作出公正的评价，希望英国不要像美国那样缺乏和解精神。

在周恩来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英国和法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发展，双双造了杜勒斯的反，遇到问题争着与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商量，疏远了美国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为了抵挡周恩来的猛烈攻势，急忙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力图把柬埔寨和老挝也拉进去，破坏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直接讲明利害关系



说：

“今天，我想和你谈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有关所谓东南亚防御同盟的问题。自从杜勒斯与英国和法国举行巴黎会谈之后，各方面消息很多，宣传得很厉害。是不是美国要对恢复印支和平达成协议进行破坏？现在传说要把印支三国搞进这一同盟。如果如此，那么和平就没有意思，而是为了准备新的战争。因此，我想直接问一问阁下，因为从阁下这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周恩来在对艾登做工作之后，又会见法国总理，讲明中国对于此事的严正态度，还对美国提出警告，最后美国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杜勒斯怎肯善罢甘休，又玩弄新阴谋，声称美国不准备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周恩来急忙与在日内瓦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商量对策，梅农出主意说：

“美国不参加集体机构，就无法使唤这个集体机构。如果美国违背日内瓦协定，那么，参加集体机构的国家即可进行协商，那么美国就无权参加协商；它如果要求参加，集体机构还需要考虑。”

美国果然欺软怕硬，经过幕后交涉，美国最后同意做些让步，避免承担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罪名。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正在休息室与客人聊天，美国代表团代



理团长史密斯面带微笑走近周恩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主动搭话道：

“日内瓦会议就要结束了，能够在这里与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

周恩来正要请史密斯坐下讲话，却见史密斯突然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

周恩来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好聪明的史密斯！你杜勒斯不许美国人与中国人握手，好，我遵守，但是摇胳膊不是握手，总是可以的吧？

经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密切合作，日内瓦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但在签字的时候，又出现了有趣的插曲。

原来，印支三国代表对法国侵略者有气，商量好成心与孟戴斯·弗朗斯过不去，非要拖到7月21日清晨才签字，从而使孟戴斯·弗朗斯要在20日达成协议的许愿不能实现，迫使他下台。

这一手煞是厉害，可把孟戴斯·弗朗斯吓坏了，急忙去找印支三国代表最信任的周恩来帮忙解围，不巧周恩来不在，他又去请莫洛托夫。直折腾到东方发白，印支三国代表才签字，法国人虚惊一场。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日内瓦会议终于在1954年7月21日下午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在各国代表发言之后，周恩来发言说：



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令人感到可气的是，美国迫于形势的压力，虽然表示同意日内瓦协议，但是拒绝在这个协议上签字，仅发表声明说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

周恩来针锋相对指责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模棱两可呢？”

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以五大国外交部长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但是他首次出击就大获成功，被誉为世界级大外交家。

莫洛托夫通过日内瓦会议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交情，分别的时候，两人紧紧握手，莫洛托夫久久盯着周恩来，好像在研究周恩来怎么会具有这样高超的外交艺术，怎么会有这样高的威信与声望，良久才依依惜别。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周恩来充满敬佩之情，专门前来致谢说：

“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阁下，在日内瓦会议中给予我作为会议主席的巨大帮助。周先生在会议中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没有您的努力，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我们早已散会回家了。我们英国还极其重视此次英中两国已建立的关系，希望今后两国抱着同样的信心维持这一联系。”



艾登刚走，孟戴斯·弗朗斯又满面春风登门致谢，他一进门就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幽默地问：“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您看我是否应该辞职？”

周恩来一听就乐了：“主要的事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孟戴斯—弗朗斯爽朗地答应道：“您和我们总统的意见一样，他今早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不要辞职。等我在法国议会里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时候，我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让我辞职。”

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依依不舍地离开日内瓦，登机前特意发表举世瞩目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已经完成了它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任务，对于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首先是巩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和平协商获得解决的。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



第五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堪称中国和世界外交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接见应邀来北京谈判中国和印度关于中国西藏问题和印度关系问题的印度代表团的时候，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这就是周恩来提出的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虽然在1953年提出，但是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有之且已行之有效的思想。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第五条就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



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其后,本此原则,中国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国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样,周恩来认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机逐渐成熟,具体而言有了两个条件:一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国际问题中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他提出在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形势下,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首先向印度代表团提出,也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两面性,他们在对华关系上一方面主张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一方面又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仍然要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驻扎印度军队,在拉萨、亚东、江孜等地派出政治代表、商业代表,建立贸易站,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和驿站,继续占领中国部分领土。

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公开出面干涉中国解放西藏:1950年10月21日、28日,印度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惊异与遗憾”,



并“认为这是可悲叹的”，诬蔑我“侵略”西藏，竟然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调动藏军前往昌都前线阻止解放军进藏，又派人在前线设立电台收集情报，阻止西藏代表进北京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印度副外长还会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提出交涉。

中国政府反对印度政府损人利己，但是作法较为慎重，注意采取适当的步骤。

10月28日和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预，“那只是再次表示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周恩来指示申健明确告诉印度方面 中国的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是不能叫作侵略的，正如印度的军队进入联合省或者孟买是不能叫作侵略一样。

印度政府11月1日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调整西藏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自治的合法要求”。周恩来16日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复照印度政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不仅是维护中国独立的重大步骤，也是制止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重大步骤；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应该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解决。

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办的国庆招



待会，共同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双方开始以货贸易。印度当年发生粮荒时，中国慷慨地6次共供应粮食达66.65万吨，颇得印度人民的好感，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双方关系较好。

3月21日，周恩来在宴请第三届全印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爱德华之后，专门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西藏问题说：

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

周恩来严肃地提出警告说：“从前的摄政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解放是有影响的。”

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印度政府却于1952年2月向中国交来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提出一些非分要求，周恩来6月14日接见潘尼



迦的时候说：

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上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但要解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需要时间和步骤，因而，中国政府建议：将印度过去驻在拉萨的代表团改变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这是可以首先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同时，根据对等的原则，中国要求在印度孟买设立总领事馆。

周恩来的严正态度，使印度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6月23日，印度驻华代办高尔会见周恩来，代表印度政府表示同意中国总理关于两国在对方国家设立总领事馆的建议。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只按国际惯例准予避难。

印度在阻挠中国解放西藏未果之后，不断地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又在三个问题上向中国提出非分要求。

1953年8月向中国提出印度驻在西藏亚东和江孜地区的武装部队要换防，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答复印度方面说，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退这些武装部队，作为解决中印



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一个步骤，这是中国政府欢迎的。对于换防，中国政府不便同意。

与此同时印度提出其驻锡金首都甘托克的政治代表要来西藏“视察”驿站，中国外交部官员奉周恩来之命答称：中国同意印度驻甘托克的政治代表来西藏，但由于驿站问题尚待解决，这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决不是旧例的沿用。

在此前后，中国边防检查站发现，印度前往西藏阿里地区经商的商队携带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便将其封存起来，印度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外交部请示周恩来后答复称：按照我国法令，这些收发报机本应没收，但为照顾中印关系，中国边防站将其封存，在印度商队离境时发还。

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 1953 年 9 月 2 日致电周恩来，建议两国政府早日就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 10 月 15 日复信尼赫鲁，重申中印在西藏应建立新的关系的主张，同意解决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表团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议中印两国政府 12 月在北京谈判解决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

尼赫鲁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派出以赖嘉文为团长、高尔为副团长的代表团 1953 年 12 月 31 日到达北京，受到中国代表团团长章汉夫等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当天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两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首先对印度代表团来华表示欢迎,然后向刚从新德里来的印度代表团副团长问道:“高尔先生有没有听到关于美巴军事协定的任何新消息?”

高尔回答道:“我听了尼赫鲁总理 12 月 23 日在印度议会中的讲演,此后,我就离开了新德里,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印方团长、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我今天听说巴基斯坦报纸传说印度、中国和苏联之间有秘密同盟。”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驳斥这种无稽之谈说:“是呀,我们今天就在此进行这样的谈判。”

高尔介绍旅途见闻说:“我在香港时,曾避免答复香港记者向我提出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会歪曲我的谈话的。”

赖嘉文大发感慨说:“除了美国记者之外,香港记者可算是最危险的了。”

高尔介绍新德里外交界的情况说:“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印度议会中听尼赫鲁的讲演。听他的讲演比读他的讲话稿更能体会到他话中的力量。他说印度为此事而愤怒,他的措词极其强硬。”

周恩来慢慢将话转入正题:“我读了尼赫鲁讲演的一部分,就是大使交给我们的那部分。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 月最后一天开始了,我



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印度方面的代表是赖嘉文大使、高尔先生和葛巴拉查理先生，我这一了解对吗？”

赖嘉文代表印度方面回答：“对。”

周恩来介绍中国方面人员说：中国方面的代表为章汉夫副部长、陈家康司长和中央驻西藏政治代表、外事帮办杨公素先生。周恩来又彬彬有礼地询问高尔和葛巴拉查理有何意见之后，正式发表意见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会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解决，一定是顺利的。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成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如此，尼赫鲁总理、印度政府和人民也一定如此相信。”

赖嘉文如实道出印度参加这次谈判的目的：“我们两国间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分歧，我们急于解决中印之间的任何分歧，所以我们进行这次谈判。”

周恩来高屋建瓴地指出：“像中印两大国之间，特别是接壤的两大国之间，一定会有些问题，只要根据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在周恩来和尼赫鲁指导下，为了解决中印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53年底至1954年4月，中印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谈判，4月29日达成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序言之中明确载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这一原则规定设立商务代理处，指定某些地方为贸易市场，对两国香客朝圣事宜以及双方商人、香客出入和往来过境事宜，都做了对等的平等互利的规定。与此同时，两国就协定进行的换文，规定印度政府要撤退其驻在中国西藏地方亚东和江孜的全部武装卫队，并且将其在西藏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印度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从而得以废除。

4月29日，周恩来和尼赫鲁互致贺电，都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大力宣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极大成功。

5月12日，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继续进行一般辩论时发言说：“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又向西方人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月14日，他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对症下药说：“中国同它的亚洲邻邦都愿和平共处。最近，中国与印度签订的关于在中国西藏的通商协定，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在它的序言中，中印两国申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也提出首先撤退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

艾登对此极为赞成，对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赞叹不已，梅农建议尼赫鲁总理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赫鲁完全同意。

5月23日下午3时，梅农拜访周恩来，转达尼赫鲁总理对周总理的访问邀请，周恩来表示感谢，回答说：我还不知道这里的会要开多久，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尼赫鲁总理曾经说，朝鲜必须统一，但是统一不能由一方强加于另一方。

其后，周恩来7次会见梅农，接受了印度政府的访问邀请。

首次访问印度

6月25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各界群众约5000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尼赫鲁身穿高领的白色外衣，胸前纽扣上戴着红色的大玫瑰花，走上前



来热烈欢迎周恩来。他初次见到周恩来，只见中国总理身着黑色高领中国式制服，头戴鸭舌帽，风度翩翩，仪表非凡，不由得暗自赞叹，面带笑容地与周恩来亲切握手，让摄影记者尽情拍照。欢迎的群众给周恩来带上金盏花和白色的金香木花环，高呼欢迎口号的人群纷纷投下鲜花和花瓣，场面十分动人。

周恩来在机场热情地发表谈话说：“我愿中印两国友谊一天比一天发展，愿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天比一天紧密，愿世界和平一天比一天巩固。”

然后，中国代表团驱车前往印度圣雄甘地火葬处，在纪念碑的台阶下，周恩来脱下皮鞋，穿着黑色袜子走到平坦的纪念碑石板前面，恭恭敬敬地献上4个花圈，默立一分钟，在甘地墓外种植了一棵阿育王树以作纪念。

其后，周恩来前往印度总统府拜会总统普拉沙德，拜会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友好的会谈。周恩来详细介绍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并就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的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告诉尼赫鲁，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已经取得两个协议，现在已交双方司令部军事代表讨论，并要求他们在三周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尼赫鲁急忙询问美国人的态度，周恩来以实相告：在通过关于印度支那



和平的两个协议的时候，美国代表持保留态度。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就是反对和阻挠搞任何协议，这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中的方针。

尼赫鲁关切地请教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周恩来坦诚地说明，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老挝、柬埔寨的政策都是如此。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为了在亚洲建立和平区域，中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印两国在《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则，能够运用到亚洲的所有国家。这是很有利的，亚洲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彼此信任。

尼赫鲁提出发表中印联合声明，周恩来欣然赞同，请尼赫鲁负责起草，印方表示同意。

当晚，尼赫鲁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周恩来大力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外来势力可以随便决定亚洲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亚洲已不再是昨天的亚洲了，他热情地称赞说：

“中国和印度之间有着两千年的传统的友谊，由于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了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的外交关系，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友谊在近几年来已有新的发展。”

尼赫鲁对此极为赞成：“每个国家都有自由奉行它自己的政策并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并与别人合作，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



的智慧。”又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来说是好的，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如果这些原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承认，那么战争恐惧就会消失，而两国之间的合作精神就会得到发展。”

周恩来特别乐意接近印度人民，就游览德里，视察难民区，人们争相向中国总理抛玫瑰花瓣，戴花环，一个难民称：

“周恩来先生，你是中国的伟人和彗星，我们欢迎你飞到这里来访问。我们希望和你的国家合作以建立人类真正的兄弟关系。”

6月26日，中印总理继续进行深入的会谈，就更加密切中印关系和侨民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望一眼尼赫鲁胸前戴的红色大玫瑰花，热情洋溢地顺着这位知识渊博的印度总理的思路说：

在中印两国关系上，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应该建立互信的关系。中印的政治制度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我们两国的东方文化又有共同的特点。我们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都使我们之间容易互相了解。因此，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印两国不但可以建立信心，而且可以互相建立信心，这对亚洲



各国会有很大影响，使它们相信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尼赫鲁对此非常赞成，但是他受西方宣传的影响很深，对中国抱有不少偏见，就向周恩来直接提出革命输出问题。周恩来认为这个问题在亚洲具有普遍性，就抓住机会做工作：

我们应该努力来消除亚洲各国毫无根据的恐惧。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人民赞成一种制度，反对也是无效的。如果人民不赞成一种制度，勉强强加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共信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为此，在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我们可以提一下五项原则，因为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常常提及有好处，可以说明这些原则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适用。

尼赫鲁被周恩来这番充满辩证法的谈话折服了，想到与中国共同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他自己和印度可能带来的好处，便满面笑容道：“如果这些原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承认，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就可以消失，而合作的精神就可以发展。”

6月27日，中印总理再次进行会谈，周恩来指出，为了推动亚洲首先是东南亚的和平，第一步就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接着，周恩来在印度总统府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请记者们喝橘子汁和柠檬汁，说他在日内瓦期间，从来没有亲自举行过记者招待会。



他首先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办法。朝鲜的停战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了一步，如果印度支那的战争能够停止，印度支那的和平能够恢复，国际紧张局势将能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印度记者首先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请问总理阁下，听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您首先创造的吧？”

周恩来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大力宣传刚诞生不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微笑着回答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时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的亚非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枷锁，取得了民族独立，像中国、印度、缅甸、印尼等等国家，它们迫切要求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代替旧的国际关系，改变那种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状况，巩固已经取得的独立地位，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因此，在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前言中写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应该说是中印两国共同创造的。”

一个西方记者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你们特别是您怎么想出来的？”

周恩来笑笑从另一个角度回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和历



史的要求，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我想起码来自三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是17世纪以后出现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思想，与资产阶级独立国家的思想几乎同时提出。第二个渊源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第三个渊源是新中国建国时提出的，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说到这里，用手一指身旁的尼赫鲁，热情洋溢地说：

“这里也有尼赫鲁总理的远见卓识，我们共同看到，只有在现在，朝鲜战争已经停战，印度支那战争也将停止，中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独立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我们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力量，将分散在国家关系中的这五项原则，加以汇集和大力倡导，一定会成为具有巨大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国际指导原则。”

一个印度记者极感兴趣地提出：“国家有大有小，如何和平共处呢？”

周恩来微微一笑回答说：“我们认为，根据最近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序言上规定的五项原则，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



一个西方记者挑衅性地提出中国输出革命问题,一下子使记者招待会的气氛紧张起来。

周恩来环视会场一周,郑重宣告:“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对那一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周恩来的这个记者招待会轰动世界,他的结束语“谢谢诸位记者,因为花了你们一点宝贵的时间”更被传为美谈。

周恩来乘飞机前往亚格拉参观印度著名的泰姬·玛哈尔陵,他站在陵墓的巨大通道的阳台上,按照印度人的礼节合掌答谢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深情厚意,然后到地下参观努而·贾汗皇后的寝陵,接受了这个大建筑物的大理石小模型。

当晚7时,周恩来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前往印度故宫“红堡”,出席新德里各界人民在枢密院殿外的草坪上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它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特别强调指出:

“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生活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



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

当天下午，周恩来一行离开新德里，尼赫鲁到机场送行。周恩来登机之前深情地说，中印总理的会谈是在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中举行的，因此已有了肯定的成就，他相信这种成就不仅会加强中印友谊，并且会有助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还特别称赞尼赫鲁起到的积极作用。

有个记者问尼赫鲁是否要去中国。

尼赫鲁望周恩来一眼，说他当然希望访问中国，又诙谐地补充说：“我将占卜一下，拣个黄道吉日。”

首次访问缅甸

6月2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缅甸首都仰光，受到缅甸总理吴努和5000余人的热烈欢迎，人们纷纷把玫瑰花瓣抛向中国贵宾。

周恩来拜谒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墓并敬献花圈，特意参观缅甸佛教胜地大金塔。周恩来深知这是全世界最大和最著名的宝塔，又是缅甸佛教的象征，便脱鞋参拜这个世界佛教徒朝拜的圣地，深得佛教徒的敬重。



周恩来与吴努进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日内瓦会议和中印总理会谈情况，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愿意与缅甸友好相处。

周恩来发现吴努受帝国主义的挑拨，对于新中国有些误解，说话吞吞吐吐，举止谨小慎微，就特别体谅小国的处境，处处谦虚谨慎，以平等协商的态度与吴努交谈。

吴努见世界闻名的外交家周恩来如此善解人意，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就打消了顾虑说：

“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没法与中国全国相比。缅甸政府一直对中国存有疑虑，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再说我们的心腹之患是缅甸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支持缅甸共产党，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讲的某些话只是友好的埋怨。”

周恩来见吴努讲出肺腑之言，感到缅甸虽然承认中国并且同我国建交，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尚待解决，美、蒋又从中挑拨离间，使得缅甸对我国存在许多疑虑，要搞好中缅关系就得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情况，就首先感谢缅甸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称赞缅甸拒绝美国援助，反对美国在缅甸建立军事基地，受到亚洲各国的普遍赞扬。

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有些事情属于传说，有些问题出于误会，中



缅两国应建立信任。我们愿意看到缅甸独立，有权自由选择大多数人民赞成的社会制度，并愿与缅甸友好合作，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在基本精神方面，我们之间的意见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们两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目前又同样面临建设独立而富强的国家的艰巨任务，需要相互同情和支持。”

吴努听了周恩来的诚恳话语，感到非常亲切，他说：“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嘛。”

周恩来说：“对，我可以直率地告诉吴努总理，新中国奉行和平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呢。”

周恩来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了他人着想，因而在第二次会谈时，针对缅甸政府最担心的问题表态道：

“我们的立国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对于别国的共产党，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今后中缅两国若发生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彼此都注意了，就不会发生使对方误会的事情。”

为了发展中缅友好关系，周恩来主动提出中国愿意与缅甸签订类似中印友好协定的外交文件。鉴于签订这样的协定需要时间，他采取灵活战术，



提议签署以和平共处作为主要内容的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还特别说明：

“中缅两国之间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都马上解决，有些传说还可能是误会，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所以这次联合声明对有些问题就不必提及，可留待以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解决。”

吴努没有想到一个大国总理竟然能够说出这样通情达理的话语，再次口吐肺腑之言：“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大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对于中国持有的恐惧的相当大部分。”

中缅两国总理29日在仰光发表联合公报，宣告同意中印两国所协议的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该声明还指出：

“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任所代替。”

于是，由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和中缅的联合声明中确立下来，并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提倡，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推而广之，很快传遍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六章 舍生忘死赴万隆

“文仗如武仗”

万隆，山明水秀的印度尼西亚山城，因为在此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而享誉全世界，因此亚非会议亦称万隆会议。

不折不扣地说，周恩来才是万隆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他的大智大勇，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世界级外交家的美誉，迅速传遍全世界。

亚非国家从1953年3月就开始酝酿召开亚非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4月底首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建议。1954年12月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决定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且由印度尼西亚总理发电邀请中国参加。

中国对于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和支持，周恩来1955年2月10日愉快地复电印尼总理接受邀请。

当时，美国正伙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海陆封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也梦想反攻大陆。

美国害怕亚非国家团结起来打乱它的战略部署，在亚非会议上成为声讨的对象，因而千方百计破坏亚非会议，特别对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怀有恐惧心理，就动用外交和特务系统



进行破坏。

1955年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的准备之际，我国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定了“1号”行动计划，要暗杀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特别担心周恩来的万隆之行有闪失，与中央政治局同志考虑周恩来这次不去出席，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动情地说：

“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我们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深切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深思熟虑地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刚才所说的，去，固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地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我愿为此做出牺牲和奉献。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则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



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的诚意和热心，又不能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冒着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见周恩来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处变不惊，毅然要求仍然参加亚非会议，再说如果周恩来不去，亚非会议很难开好，那样对亚非和世界形势很不利，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就同意周恩来前往万隆，但特别嘱咐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对毛泽东这样关心和理解他感到无限欣慰，向毛泽东汇报他设想的行程安排说：

这得兵分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等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他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4月3日，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拜见周恩来，转达总理吴努的邀请，希望周恩来能在4月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磋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但是，周恩来3月12日住院作了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3月28日刚出院，医生不允许坐长途汽车，因此周恩来极其抱歉地回答说：“在4月15



日之前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到动手术之后 4 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 5 天，因此最快也要到 4 月 14 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到缅甸之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 7 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

12 日，周恩来又接见印尼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送交他致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复信。复信表示周恩来接受印尼总理提出的关于在亚非会议结束后访问印尼的邀请，还风度翩翩地告诉印尼大使：“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的印度飞机‘空中霸王号’也是从仰光直飞雅加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亚非国家间的接触，造成了极好的机会。在亚非会议上，我们希望在科伦坡 5 国的倡议下，对和平友好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根据科伦坡 5 国总理的意见，特别是印尼、缅甸、印度总理的意见，为建立集体和平和扩大和平范围而努力。”

4 月 5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赞成周恩来的意见，认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意义重大。中国参加亚非



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中国主张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关于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问题，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见解，认为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周恩来偕同陈毅副总理一行4月7日驱车西郊机场，刚要登机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轻蔑地一笑，迅速作出周到的处置，然后与陈毅一行飞往重庆，



再转往昆明。

在昆明，他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奉周恩来指示，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说：

中国记者11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到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中国很关心这件事情，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保证。

艾惕思表示，他将尽快把这一情况转告香港当局。

10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这一严重情况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做了通报。

这件事惊动了邓颖超，她很不放心，急忙给丈夫写信：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心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会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



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必须取得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

为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驻香港的台湾特务机关收买了后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让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该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因为事前应邀前往缅甸与印度、缅甸、埃及总理会晤，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周恩来在昆明得到飞机出事的报告，立即从昆明指示北京，迅速查明情况，如果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

周恩来极为悲痛，代表团成员、云南省领导人都劝他不要再去万隆，但是周恩来却更加坚定了出席亚非会议的决心，他毅然决然回答道：“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

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谏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的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



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一行4月14日7时许在缅甸空军护卫下，乘坐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昆明，10时30分安抵仰光，被缅甸总理吴努迎进总统府，热情招待。

吴努总理满面春风发出邀请：“今天是缅甸泼水节，也就是缅甸的新年，我邀请周总理阁下和陈毅副总理阁下参加我们的泼水节。”

周恩来爽快地答应道：“好啊，我早就听说过你们的泼水节甚是隆重、热闹，就仿佛是中国的春节，是广大群众欢度的节日。”

周恩来和陈毅换上缅甸的白色宽大衫裤，扎上白头巾，随同吴努和奈温前往彩棚。

刚开始，缅甸朋友对中国领导人有些拘谨，只用小碗泼或用树枝沾水撒。周恩来见状，就带头用盆向吴努和奈温将军身上泼水，顿时使气氛热烈起来，都不分彼此痛快地泼，不一会儿就一个个全身湿淋淋的，白衫裤被染成了五颜六色。

吴努笑指周恩来开玩笑道：“阁下简直像个天仙了！”

周恩来幽默地回答：“不，你我都像妖魔，和平的妖魔，反帝反殖的妖魔！”

周恩来与缅甸人民同乐，给缅甸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4月15日，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从仰光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外交部，对飞机遇难事件的善后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3人的家属表示慰问；第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作法，对飞机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第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在外交部长陈毅陪同下，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就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周恩来首先谈起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关系问题，压制着对台湾当局搞无耻谋杀的强烈愤恨之情说：

“中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内战的继续，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允许外来干涉，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是蒋介石集团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

年轻而颇有风度的吴努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又自告愿意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牵线搭桥，周恩来首先表示感谢，然后耐心地对中国的严正立场详加说



明：

“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也准备按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这一切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 100 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

在中缅两国总理友好会谈之际，缅甸官员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萨·穆·纳伊姆汗将到仰光，周恩来和吴努立即赶往机场欢迎，几个风云人物相见，彼此尊重，友好相处。

周恩来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非常重视，首先约见尼赫鲁商谈善后措施，提出中国政府的主张说：

“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

中国政府认为，在此事件的处理上，美国政府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周恩来请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这个意见转告英国政府，尼赫鲁点头答应。

当时，尼赫鲁、吴努、纳赛尔等人对发生“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忧心忡忡，又气愤又灰心，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存有畏惧心理，对能否开好亚非会议信心不足，周恩来 15 日晚与他们举行非正式会议，以大无畏精神鼓舞士气道：

“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为了和平事业做出牺牲是必要的、值得的，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越捣乱、破坏，便说明他们越害怕亚非会议。他们越害怕，我们就越要开，而且把它开好。”

4 月 16 日上午自仰光飞往雅加达途中，因为飞机遇到雷雨天气，周恩来一行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因毛泽东事前指示中国外交部作了新加坡的工作，所以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的热情接待。

麦克唐纳将周恩来和陈毅请到机场贵宾室，亲自送点心、饮料招待，两小时后把中国代表团一行送上飞机。

4 月 16 日下午，冲破西方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欢迎的



印尼外长苏纳约、中国大使馆人员和印尼人民及华侨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印尼人民把周恩来当做英雄热烈欢迎，都争相一睹在台湾特务暗杀下大难不死的中国总理的风采，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为周恩来祝福的欢呼。

为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印尼警方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周恩来一行平安到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得知北京将举行悼念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人员大会，他立即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发出唁电。

4月16日清晨，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市民潮水般的欢呼声中来到机场，乘飞机赶往万隆。

拨正亚非会议的方向

花团锦簇的美丽山城万隆，位于西爪哇岛南部，周围火山群峰环绕，虽然地近赤道，却因地势较高而凉爽宜人，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为印尼著名的游览和避暑胜地。

为了破坏亚非会议，美国特别派出70多人的“记者团”到印尼活动，其中有些就是从台北抽调来的职业特务。使亚非会议的气氛极其紧张。

为了反击美国的猖狂进攻，周恩来一到万隆，就在机场大讲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说明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亚非



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且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当天下午，周恩来应邀前往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别墅，与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非正式会议。亚非国家的精英人物彼此都久闻大名，但是一直无缘相见，今天会集一堂，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也满足了他们的心头所愿，因此都兴奋异常，很快就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取得一致协议。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15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29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齐集一堂，亚非历史新的一页揭开了。

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他头戴圆顶穆斯林黑帽，身穿白色西服，昂首登上讲台，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慷慨致词：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有色人种会议，是世界史的新起点……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必须予以铲除！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



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周恩来既为苏加诺的精采演说感到欢欣鼓舞，又敏感地发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破坏活动。

杜勒斯看到亚非会议的 29 个与会国中，就有 22 个国家接收美国援助，就极力拉拢它的盟国，特别利用经济援助为诱饵，宣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新的援助计划，拨款 35.3 亿美元，加快发展从南朝鲜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广大孤型地带，公开把与会的不少国家划入他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指使伊拉克、菲律宾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新式殖民主义”，鼓吹对中苏采取“防御措施”，给会议投下了阴影，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周恩来仔细倾听各国代表的发言，他发现有些代表上帝国主义恶意挑拨的当，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企图以反苏反共的口号，使亚非会议陷入思想意识的论争，不能获得任何成就而结束。

周恩来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其他人都无力扭转会议的危险方向，中国代表团应该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而根据大会排定的发言顺序，中国代表团在 19 日下午休会之前才能发言，看来为时太晚，便当机立断，与陈毅



商量把乔冠华、陈家康、黄华等人请来。

周恩来说明，针对有人攻击共产主义、企图把会议引导到意识形态的无休止争论中去的情况，应该搞一个补充发言，粉碎敌人破坏会议的阴谋，把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为了节省时间，我来口授，秘书同志记录，然后再请你们几个笔杆子斟酌、推敲、修改。”

于是，经过周恩来滔滔不绝的口授，一篇绝妙的讲话稿应运而生。

4月19日下午，万隆突降豪雨，雨大风狂，雷鸣电闪。一些美国“记者”煽风点火说，这是亚非会议破产的先兆，更使人惊恐不安，不约而同地把开好亚非会议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

各国代表纷纷争看周恩来的书面发言，觉得中国总理的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

“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休会后正当人们对亚非会议的前途焦虑不安的时候，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周恩来身穿灰色制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



他首先说明他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愿意补充说几句话，然后镇定自若地发表掷地有声的讲话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这句话真是语破天惊，使会场上的空气陡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片肃静，人们急切地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周恩来是个语言大师，他巧妙地以发问的语气提出特别发人深省的问题，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将亚非会议引上正路：

“在我们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和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的原因。”

周恩来知道与会代表都很关心中美关系，于是提出几个中国本可以向会



议提出的问题：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担心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他极有说服力地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面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恩来热情地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作客，欢迎他们做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



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这样坦白诚恳的话语，打动了亚非国家代表的心，他们觉得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靠近了，纷纷报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 18 分钟的演说非比寻常，驱散了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空的乌云，拨正了亚非会议的航向。

求同存异，共创万隆精神

国代表团收到一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写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告密信，揭发了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3 月初组织了 28 人的敢死队，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及印尼币 20 万盾，事成后，每人再给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者加给 40 万盾。

“他们还要搞暗杀，”陈毅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代表团的全体人员都要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从 4 月 20 日开始，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阶段。

4 月 21 日，万隆又是阴云密布，预示着将有暴风雨来临。



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又在下午的全体大会上大讲要让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呼吁“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国的当地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一下破坏了好不容易改善的会议气氛，尼赫鲁反对讨论这个问题，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非常生气，但是，他看到某些美国“记者”的得意神情，马上发觉了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没有与锡兰总理辩论，只发表简单的声明：他不能同意锡兰总理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他要求保留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并支持尼赫鲁的意见。

散会之后，周恩来请坐在他身旁的锡兰（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留下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平心静气地批驳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并严厉地警告他，无端攻击苏联和中国不会有好结果。科特拉瓦拉自知理亏，说他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和平共处，愿意和解。

当天晚上，周恩来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陪同他去访问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进行友好的交谈，两人交上了朋友。

在大会上，周恩来大讲与锡兰总理有共同点，支持锡兰总理关于让殖民地附属国在10年内独立的主张。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使锡兰总理感动得热泪盈眶，改变了与中国为敌的态度。

在4月22日的小组会议上，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提出和平共处问题



的不同表达方式。对此，周恩来指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思想意识、不同国家制度以及过去和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为了和平与合作，解决急迫的国际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在座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使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周恩来根据各国代表的反应表示 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形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其他类似的条约都是中国所不赞成的；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

周恩来的主张得到强烈共鸣，又提出意见说，在座的所有国家代表不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的主张得到大部分人的赞成，从而制定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在接着举行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联合吴努，对美国和西方势力企图用共产主义问题搅乱亚非会议的阴谋，展开说理攻势：

“亚非国家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任何人如果



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总之，我希望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能够响应吴努总理的呼吁，和谐地讨论同我们共同有关的问题并求得共同的协议。”

吴努、纳赛尔等人热烈响应周恩来的呼吁，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表示赞成，从而使美国的阴谋再次宣告失败。

美驻印度尼西亚官员和“记者”又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遂使亚非会议形势再次紧张起来。

4月23日上午9时，周恩来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他发现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不少人议论周恩来要与科特拉瓦拉展开一场论战，会有一场好戏上演。

缅甸总理吴努真诚地发出呼吁：“我们的会议已经沿着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迈进了积极的一步，不要让这种努力在最后阶段中被分歧的见解所摧毁。”

吴努话音刚落，科特拉瓦拉就登上讲台，人们一下紧张起来不知道此人又要放什么炮。

科特拉瓦拉的话又使人们大吃一惊，说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他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引起一场争论的意思，更没有意思要把会议引向失败。



人们这才长出一口气，发出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大步走上讲台，发表讲话：“在听了缅甸总理和锡兰总理刚才的发言后，我想声明几句昨天锡兰总理做了发言之后，我宁愿在会后问明他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我很感谢缅甸作为发起国之一今天在会上所做的呼吁。我也感谢锡兰总理今天在会上声明说，他的目的是求得会议的成功。”

各国代表对周恩来不但不与科特拉瓦拉争论，反而肯定他发言中某些积极的东西，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与其交上了朋友，从而给那些企图把亚非会议引导到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当头一棒。

4月23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针对西方势力散布的悲观论调，面对美国故意制造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做出力挽狂澜的发言：

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29个亚非国家一致呼吁和平，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

在当天的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发言提议发表和平宣言，说明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



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日本代表感到他们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重视，其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自然高兴万分。

4月23日下午1时30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他的别墅举办午宴，招待中国和印度等7国代表团团长。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首先热情洋溢地致词说，欢迎诸位尊贵的客人出席宴会，这次约会不仅是请诸位品尝印尼的饭菜，主要是想借这次机会，商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各位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都很关心，也很担心，现在先请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阁下先讲一讲。

周恩来高兴地借此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说：

“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早在二次大战期间的许多国际协议都加以肯定，而且，战后台湾已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甚至美国杜鲁门总统在白皮书中也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是内战，并发表正式声明，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打算干涉台湾问题。这一切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像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时一样，不仅不会在世界上造成紧张局势，而且在完成中国完全统一后，还会有利于世界和平。”

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传中国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正义主张，赢



得了与会各国的理解和同情。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中国特别友好，他提议周总理发表一个声明，以扩大新中国外交的影响，周恩来欣然同意，当即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虽只是八国午宴，但是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的代表一个人不漏，记者们也如获珍宝，认为这短短的69字声明似有千斤之重，立即把这个特大新闻发往全世界。这个重要新闻震动了万隆，震动了全世界，更震动了华盛顿。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必将对美国外交产生巨大压力，急忙召集国务卿杜勒斯等人认真研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后，立刻赶回别墅出席招待阿比西尼亚、利比亚、黄金海岸、土耳其、伊拉克代表团长的宴会。虽然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影响较深，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但周恩来完全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友好地谈历史、文学、风俗人情和这些国家的长处，诚心交朋友，取得良好的效果。



当晚，周恩来在别墅宴请印度、缅甸、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朗、苏丹、利比亚等9国代表团长，畅谈亚非人民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称赞长城、金字塔世界闻名，谈论中国、印度、埃及的古老文化，宾主在愉快的交谈中增进了友情。

4月24日，在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各方意见尖锐对立，连午饭都没有吃，只喝杯咖啡、吃些点心充饥，一些国家坚持要在公报中使用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等含沙射影的提法，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

周恩来多方调解各方矛盾，想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巧妙措词：“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确认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

周恩来总理建议再次召开亚非会议，各国代表一致赞同，接着大会通过了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它体现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合作以及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这就是著名的“万隆精神”。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致词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



的……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

当晚9时30分，大会主席宣布亚非会议胜利闭幕！

世界舆论称赞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对亚非会议的巨大贡献，堪称中国外交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就连对周恩来最不服气的美国记者，到最后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发生巨大变化：

“周恩来能够选择最适当的时机发表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辩论几乎已经陷于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解纷排难、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七章 苏伊士运河风暴

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

万隆会议之后，民族独立运动汹涌澎湃，中苏与美国在中东的斗争也更趋激烈，苏伊士运河战争就是这一错综复杂斗争的极其生动的反映。

苏伊士运河地扼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乃东西方的交通咽喉。自1859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数十万埃及民工费时10年凿成后，这条运河一直为英、法殖民主义者霸占。比埃及国民总收入还多的运河过境费，绝大部分被英、法占有。

收回运河主权理所当然成为埃及人民多年来的深切愿望，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要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争夺势力范围的考虑出发，也对埃及的要求表示支持。因而，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集中了各种矛盾。

纳赛尔于1954年出任埃及总理之后，就代表埃及人民利益，宣称要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英、法殖民主义者大为不满，暗中支持以色列于1955年2月向埃及的加沙地带发动突然袭击，倚仗优势装备摧毁埃及驻军司令部，使埃及军民遭到重大伤亡。

为抵抗以色列侵略，收复被侵占领土，纳赛尔派人向英、法、美接洽购买军火。



英国首相艾登以英国绅士的高雅风度接见埃及使者，声称不能破坏英国既不向阿拉伯人也不向以色列人供应大量武器的诺言，彬彬有礼地将其拒之门外。

纳赛尔派人去见法国总理摩勒，法国早因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法武装斗争而对埃及不满，声称法国同意供给埃及武器，不过，埃及必须按照法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修改埃及的北非政策。

纳赛尔转而想从美国购买武器，却不知美国早有在埃及取代英法独霸苏伊士运河的打算。

从1953年杜勒斯访问开罗以后，美国就企图以某种方式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制度搬到中东去，因而在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后，杜勒斯就向纳赛尔提出成立与西方结盟的“中东防御组织”，被纳赛尔严辞拒绝。杜勒斯对纳赛尔怀恨在心，拉土耳其、伊拉克于1955年初签定防务条约，走出了建立巴格达军事条约的第一步，引起苏联和埃及的忧虑和愤怒，起而反对美国“似乎是把北约组织的楔子打进阿拉伯这棵团结之树”。

杜勒斯见纳赛尔派人联系购买美国武器，哼哼唧唧告诉埃及使者：如果纳赛尔想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倒也不难，但必须加入包括整个中东在内的某种集体安全的安排。



就在纳赛尔被美、英、法碰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之时，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召开，纳赛尔率领埃及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亚非会议上，纳赛尔有幸结识中国总理周恩来，深深被周恩来的崇高品德和无与伦比的外交风度折服，两人合作得很好：纳赛尔提议选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亚非会议主席，周恩来带头支持。两人密切配合，为亚非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隆会议期间，纳赛尔与周恩来多次深入交谈。周恩来称赞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战争政策，因而他多次表示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当要求。

纳赛尔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亲可信的朋友，他向周恩来提出为反击以色列侵略，请求中国援助军火。

周恩来坦率地告诉纳赛尔，新中国因刚成立不久，暂时无法满足埃及的军火要求，建议埃及向苏联购买。

岂料赫鲁晓夫野心勃勃，早就想插足中东，与美国在中东一争高低。得到埃及想购买苏联军火的消息，赫鲁晓夫喜出望外，当即指示苏联驻埃及大使拜会埃及总统纳赛尔，答应向埃及提供大量现代化武器，埃及可用棉花付款。



当下，苏联和埃及商定，由捷克斯洛伐克出面做4亿美元的“棉花换武器”的巨额贸易。以色列参谋长达扬得此消息大惊，他估计苏联可能供应埃及新式坦克300辆、装甲运兵车200辆、米格—15战斗机200架、轰炸机50架、自行火炮100门，还可能供应一批军舰和大量弹药。

达扬忙向美国求援。杜勒斯认为“苏联终于第一次跳进了中东政治的污泥浊水，同埃及手挽手干起来了”。为应付苏联首次插手中东，杜勒斯急忙派遣要员前往开罗，“劝说”纳赛尔放弃从苏联购买武器的打算。对此，纳赛尔置之不理；杜勒斯好生气恼，调动各种力量向埃及施加压力。

为对抗美国的压力，纳赛尔提出埃及与中国建交问题，但又不想马上断绝同台湾的关系。

周恩来十分重视埃及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决定先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互相设立商务代表处，实现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和中国外贸部长互访，签定中埃贸易协定和文化协定，再发展政治关系。随着埃及与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在1956年5月撤回埃及驻台湾“大使馆”，同中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

杜勒斯接到蒋介石的有关中埃建交的函电，正想找机会整治纳赛尔，未料想纳赛尔主动找上门来，请求美国向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提供贷款。



原来，作为摆脱埃及贫困、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纳赛尔提出在尼罗河上修筑一道新水坝，使埃及有足够的水供灌溉和发电之用，让埃及国民收入增加 1 / 4，人们把这个巨型水力工程称作“埃及的新金字塔”计划。

这个巨型工程需要 10 亿美元投资，埃及无力投资，纳赛尔便向美、英和世界银行提出贷款请求。

杜勒斯和艾登认为“这是西方插手埃及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都许诺提供贷款，但却提出苛刻的条件：要监督埃及财政、不许购买苏联武器、让埃及带头与以色列媾和。

纳赛尔认为美、英欺人太甚，有碍埃及民族尊严，实难接受，转而向苏联寻求借款。

杜勒斯见纳赛尔不乖乖就范，反而向美国的宿敌苏联求贷非常恼火，因为埃及的做法对菲律宾、巴基斯坦等美国当时的盟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对美国产生离心倾向，认为在国际上“保持中立倒可以两头讨好”。

如何对付纳赛尔，美国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出价高于苏联，另一种是停止向埃及等“脚踏两只船”的国家提供一切援助。

杜勒斯反对这两种作法，他认为“一个冷战高潮来到了，在这场经济竞争的游戏里，必须向俄国人摊牌”，他以特有的逻辑驳斥反对意见说：



“试图出价高过俄国，只不过是使俄国人可以在全世界到处提出援助建议，以取得廉价的宣传上的胜利，而使美国的资源枯竭。停止援助同样也是缺乏远见的，因为这可能迫使穷国依靠俄国，并

且意味着美国给予别国援助，其动机是为了购买友谊。”

美国政府内部激烈争论的结果，杜勒斯接受了第二种意见，他坚信苏联不可能实现它在美苏经济宣传中所做出的一切提议，因而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保证说：“我的赌注押在我的这个信念上，即认为这样做，可以暴露苏联对外经济主张的虚假性，而大多数国家将会接受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有时必须以坚定来代替容忍，我们可以用美国的威信来冒风险，这将导致相应规模的反应，我指望美国的力量和手腕足以对付由此而产生的中东演变和冷战政治。”

见艾森豪威尔仍犹豫不决，杜勒斯俨然以一副教皇架式，像宣讲《登山宝训》一样说服美国总统：“我在外交大海里航行的经验使我确信，如果我开始一个新的独立的航行，就会遇到顺风之风！”

艾森豪威尔见杜勒斯边说边翻着随身携带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发现这本书被杜勒斯翻得很旧了，书里划满了杠杠，便相信了他的有口臭的国务卿的话。

杜勒斯在1956年7月19日接见埃及驻美大使侯赛因时，粗暴地宣布收



回美国的承诺，撤销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侯赛因大吃一惊，请求杜勒斯不要以这种粗暴方式宣布，应给埃及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但杜勒斯神气地抽着雪茄烟，根本不予置理。

杜勒斯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此事，立刻引起大哗，美国报纸形象地报道说：“等到杜勒斯和侯赛因举行 50 分钟的会谈之后，宣布美国撤销其帮助筹集阿斯旺水坝资金的提议的时候，其影响真是令人震颤。这盘棋以极其出人意外的转折而达到了高潮。”

纳赛尔面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挺直腰杆，以宏亮的声音宣告：“这是对埃及政权的进攻，未免欺人太甚！你们去气死吧，你们永远不能对埃及发号施令。”

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参加过亚非会议的纳赛尔，认为应以中国和广大亚非国家为靠山，做出惊世之举，就暗中召来亲信尤尼斯上校，命他调集人马随时听候调遣。1956 年 7 月 26 日下午，25 万酷爱自由与独立的埃及人民冒着当空的烈日，在亚历山大城解放广场集会，埃及总统纳赛尔阔步登上讲台，激昂慷慨发表声震寰宇的演说称：

“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的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今天运



河归还埃及，我们不再需要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乞求钱了。”

纳赛尔愤怒地谴责英法殖民主义者霸占苏伊士运河，剥削埃及人民，大发横财，使运河区成了埃及的“国中之国”。接着响亮地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并说将用运河的过境收入来支付阿斯旺水坝的造价。

纳赛尔的决定使25万在亚历山大城解放广场集会的埃及人民雀跃欢呼，欢声如雷，掌声如潮。随着电波传往四方，埃及各地顿时沸腾起来，埃及人民的热烈情绪达到最高峰。

纳赛尔一声令下，尤尼斯上校率领早已准备好的几支人马冲进苏伊士运河公司办事处，宣布运河由埃及接管。

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决定刹时间传遍全球，英、法恼怒异常；美国等国家极为震惊；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则欢欣鼓舞，大力支持。

消息传到北京，中国万众欢腾，周恩来总理8月4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

“中国完全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埃及政府已经保证了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如果英、法对此还有所怀疑，那就应该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任何武力干涉的行动一定会遭到亚非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时候，美英法三国发表联合声明，硬把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与国有



化问题混淆在一起，企图以此为借口，维持它们新老殖民主义的特权，剥夺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8月14日发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

“这种借口是完全站不住的。埃及政府早已一再声明，保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自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来，运河的航行自由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些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运河的航行自由遭到威胁的论调。”

西方国家把苏伊士运河看成他们在中东显示威力和影响的标志，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标志丧失，整个殖民主义的堤坝就有被冲垮的危险。

英国首相艾登尤为惊恐，忙与法国总理摩勒商洽，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出兵埃及，但深感兵单力孤，就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拉美国入伙，共同出兵中东。

英法两国首脑做梦也没有想到，其盟国总统对苏伊士运河冲突另有打算，不肯入伙。艾登、摩勒邀请杜勒斯赴伦敦共商对策，杜勒斯却只派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前往伦敦听取英法意见。后来墨菲估计中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才请杜勒斯赶快前往伦敦。

杜勒斯在1956年8月16日至23日举行的伦敦会议上抛出了“杜勒斯计划”，强调苏伊士运河具有“国际性质”，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机



构，对其不能实行国有化，提议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拥有“治外法权”，他主张把苏伊士运河交国际共管，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迫使埃及交出运河主权，又排斥英法势力，由美国取而代之。

纳赛尔一眼看穿了“杜勒斯计划”貌似公允实则包藏祸心的狼子野心，断然拒绝说：

“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共管，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杜勒斯还不死心，抛开美国一再声明只做与苏伊士问题“无利害关系的调停人”的假面具，又提出一个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方案，由美国等 18 个国家接管运河。

杜勒斯这个损人利己的方案既遭到英法等国的抵制，更遭到埃及的斥责，纳赛尔质问杜勒斯说：“难道在独立和不独立之间能够折衷解决吗？”

英法也看出美国居心不良，企图在中东取代英法的殖民地位，就一面在外交上对埃及软硬兼施，诱压纳赛尔就范，一面暗中调集兵力，制定了入侵埃及的“火枪手计划”。

英国首相艾登哀叹英法两个老殖民帝国实力有限，对执行“火枪手计划”没有信心。法国总理摩勒老奸巨滑，提出勾结以色列，三者联合进



攻埃及。艾登欣然同意，以色列更求之不得，三方一拍即合。英法要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再由英法对以色列、埃及发出停止冲突的最后通牒，企图借以色列之手夺回苏伊士运河，而以色列却要英法大举进攻埃及，三方为此争吵不休。

为在时机成熟时独霸埃及，美国采取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作法，杜勒斯命美国国务院官员召见英法驻美大使，告称：

“任何对苏伊士运河的袭击都将给盟国的事业带来灾难。美国的判断是，这种袭击只有成功地推翻了纳赛尔，才会有实际的政治影响。美国毫不怀疑英国人和法国人能够用军事力量占领运河，但并不相信这样做就能推翻纳赛尔。”

英法两国气势汹汹地发出种种威胁，引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

中国坚决支持埃及反击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威胁，9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时，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80%的人支持埃及……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



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美国、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瑞典和伊朗组成的苏伊士运河委员会）代表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毛泽东极为纳赛尔的安危担心，他周到地请埃及驻华大使转告埃及总统说：

“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态度与英法不太相同，手段极为狡猾，毛泽东透彻地帮纳赛尔分析说：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



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不久，毛泽东又充满兄弟情谊地请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转告纳赛尔说：

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9日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郑重宣告：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

中国提出严重警告

英、法帝国主义者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于1956年10月29日17时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不几天便占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从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得港。埃及军民奋



起抗击。

中国对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立即做出强烈反应，11月3日中国政府向英、法、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11月10日，“中国埃及友好协会”在北京的首都剧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致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埃及人民的支持电，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周总理还亲自致电纳赛尔总统称：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英勇反抗英法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工具以色列的侵略并坚决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埃及人民致敬，并向你们保证，我们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

周恩来的支援电说：“英法帝国主义梦想用腐朽的‘炮舰政策’，恢复他们对埃及的统治。美帝国主义正在纵容和利用英法的侵略，企图从中渔利，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它们的这些阴谋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表达对兄弟的埃及人民的战斗情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它们的侵略，从埃及领土上立即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埃及的



主权和领土不容许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犯。中国政府 and 人民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政府决定以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支援埃及，以响应贵国政府最近的呼吁。我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你和全体埃及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英、法勾结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后不到两小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白宫召开紧急会议，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共商对策，决定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并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决心遵守1950年美、英、法三国宣言，维持中东现在的边界状况，控制武器流入中东，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行动，制止侵略。

艾森豪威尔马上向艾登和摩勒发去私函，敦促英法两国不要再对埃及行使武力，给联合国一个对苏伊士运河危机采取行动的机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以色列和埃及停止战斗，要求以色列撤退到休战协定规定的界线，还要求联合国会员行动克制，不要进行干预。对此，英法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美国的提案。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要求以色列和英法撤军，也在联合国提出类似议案，亦被英、法运用否决权否决。

为捞取政治资本，1956年11月1日，杜勒斯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在联合



国大会上摆出情绪激动的姿态发表讲话说：

“我怀疑，历来未必有任何代表能像我今天夜里这样，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美国觉得自己不能同意（英、法、以色列）这三个国家的行动，虽然我们同它们有着密切关系、深厚的友谊，钦佩和尊敬他们，而其中有两个国家还是我们最老的、最受信任的和最可靠的盟国。”

艾森豪威尔认为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若取得胜利，将会破坏美国独霸中东的战略计划，而英法失败，才会跟随美国的指挥棒转，于是他命令杜勒斯在联合国以“公正”面孔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六点方案：

（一）有关战争的各方同意立即停火，并停止运送军队和武器进入该地区；

（二）1949年阿以休战协定的各方，将一切武装部队撤至休战规定的界线，并停止袭击活动；

（三）一切联合国成员国不再把军事物资输入战区；

（四）在停火后，采取步骤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五）由秘书长报告决议遵守情况；

（六）联合国大会继续举行紧急会议，直至决议得到遵守为止。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提案以64票对5票获得通过，但英法两国仍



软磨硬抗。

这时候，苏联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但却迟迟不采取实际行动。

后来，看到中国坚决支援埃及反侵略，又看到美国不断向英、法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苏联态度才突然转趋积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11月5日向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摩勒、以色列总理古里安分别提交了措辞强硬的照会，表示苏联对英、法、以侵略埃及决不能置之不理，“决心用武力粉碎侵略者，恢复中东的和平”，并暗示要用现代化武器攻击英、法和以色列。

苏联见英、法、以色列对其强硬照会没有屈服的表示，便决定联合美国向英、法施加强大压力，于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送一个照会，建议与美国联合一致，强行制止在埃及的战争。

美国从自己要取代英法称霸中东的战略出发，当然不希望苏联在中东扩大影响，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这个建议是“不可想象的”，立即寻找理由拒绝称：

“在目前情况下，（向埃及）引进新的军队将违反联合国宪章。反对这种作法，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应有的责任。”

为准确地向苏联表明美国的强硬立场，艾森豪威尔让杜勒斯专门向美国



驻苏联大使波伦发出指示,让他向苏联官员强调美国将用武力反对苏联在埃及进行任何干预的尝试,“这决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此时,英国首相艾登认为英国发动对埃及的战争给英国带来严重后果,“有可能使英国整个经济遭到毁灭,英国形势极其危险”。

1956年9月,英国的美元储备下降5700万美元,10月下降8400万美元,11月的石油恐慌使英国流失2.79亿美元,占伦敦美元储备总数的15%。

英国的经济困境弄得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伦晕头转向,他本来是英国首相艾登发动侵略埃及战争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但当艾登要求为侵略埃及的战争增加军费时,麦克米伦愁眉苦脸地连声叹气说:

“除非经济情况能有所缓和,我将不再能对女王陛下的财政部负责了。”

艾登面临骑虎难下之势,硬着头皮询问英国的经济困境怎样才能缓和,麦克米伦无可奈何说:“情况能否缓和,取决于能否停止战争。”

艾登仍在绝境中寻找出路:“怎样才能筹到一大笔军费,解决英军的燃眉之急?”

麦克米伦苦笑着说:“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一笔美元嘛!”



艾登知道此路大概走不通，但此时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提取大量美元的要求，打算用这笔美元购进英镑，以稳定英镑的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也是世界四大金融机构之一，规定在其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暂时失调问题时，可以用卖给外汇的方式对成员国提供3—5年的短期贷款，向其提供技术援助，磋商解决国际金融货币问题，帮助成员国走出困境。

艾登和麦克米伦满以为根据这一规定，可以找到一条摆脱因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而造成的困境之路，没曾想美国一口拒绝，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坚决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因而汉弗莱告诉专程来华盛顿求助的英国首相使者麦克米伦：只有在英国答应立即在埃及停火，才会给予财政援助。麦克米伦受到英国的最大盟国如此对待，悻悻拂袖而去。

美国见英、法仍不按其意旨办事，就又设法卡英法的石油供应。苏伊士运河事件前，欧洲所需石油的73%，来自中东（其中一半通过苏伊士运河）；中东战争爆发后，欧洲国家只能从中东获得所需石油的7%。由于石油短缺，英法只得实施石油配给制度，而且冬天即将到来，英法人民



更加惊恐不安，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加之美国成百万地挤兑英镑，迫使英国的黄金储备在一周之内锐减一亿英镑，直搞得英国元气大伤，政府内部矛盾迭起，人民反战示威一浪高过一浪。艾登见其首相宝座岌岌可危，联合国又通过了亚非集团要求英国武装部队立即撤退的提案，英国最可靠的盟国——美国也投了赞成票，艾登万般无奈，才通知法国总理摩勒，英国只得同意停战。

摩勒如五雷轰顶，涕泪横流，哀求艾登让英军再坚持数小时，以便设法占领苏伊士城，取得有利地位再从长计议停战问题。

英国首相艾登此时的殖民主义者威风早已消失殆尽，唉声叹气讲出自身难保的危险处境：“实在是万般无奈，我现在已进退维谷，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之下，我已众叛亲离，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法国总理摩勒见事已如此，只得同意宣布停战，英法侵略军狼狈撤出埃及，艾登和摩勒也因发动这场“既无必要又不切实的战争”被轰下台去。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出现了二次大战后外交史上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美苏三大国站在一边反对英法侵略埃及，可谓冷战中的奇特现象，这才使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般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也才使英法联军由节节取胜转变为丢脸的大失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实在令人惊叹！



对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态度，许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怎么会去反对其盟国英国、法国呢？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做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周恩来深刻地分析其中的奥秘说：

“中近东紧张局势的发展过程，充分地表现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特别是美国同英法的矛盾的尖锐化……在同英法争夺中近东的殖民利益的斗争中，美国对英法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联合国中，美国支持了亚非集团要求英法停止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和撤退侵略军队的提案，但是，难道美国真正主张维护埃及的主权和独立吗？不是的……美国的目的是为了排挤英法对以色列的控制，并且利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继续维持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侵犯埃及的主权和扩大它自己在中近东地区的殖民势力。”

第八章 反对美国侵略中东

艾森豪威尔没有周恩来的智慧

苏联、中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坚决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等智囊人物重新审查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致认为朝鲜战争使美国遭受沉重打击，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断下降，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日益发展，欧洲经济迅速恢复，都对美国提出严重挑战。

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和杜勒斯提出实行美其名曰“新面貌”的外交战略，改变了一家独干的作法，而加强与外国政府的全面合作：

在欧洲，美国加强与西欧盟国的合作，号召建立强大的西欧，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联合英国、法国等国对付苏联。在亚洲，先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共同防御互助条约》，同蒋介石集团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还同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插手老挝、柬埔寨内政，企图控制印度支那。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

在军事上，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改而推行“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核武器为威慑工具，把核武器作为主要打击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二次大战后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遭到惨败，力量大为削弱，再也无法维持在中东的



殖民统治而不得不撤出埃及等地区，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真空地带”，苏联正在设法填补这个“真空地带”，中国在中东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为抵制苏联和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实现美国称霸中东和世界的目标，以战胜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1957年元旦，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新选出的美国参众两院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领袖，要求他们支持他提出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篇新宣言，他郑重其事地说：

“我们是决心要维持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到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

经杜勒斯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7年1月5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关于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咨文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军事援助与合作计划”，可以用“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艾森豪威尔为利用这一计划控制中东，特意强调说：美国可以答应向其提出要求的任何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可以使用武装部队，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的武装侵略，以巩固和保障求援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又因系杜勒斯积极帮助抛出和推行，亦称“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或“填补力量真空主义”，它最先应用在中东，后来被杜勒斯推广到全世界。

艾森豪威尔满以为他的计划在国会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因而1月5日兴致勃勃地去国会山做特别咨文演说，但这个咨文却受到美国议员们的冷遇。艾森豪威尔忙让国务卿杜勒斯去说服美国议员。1957年1月7日，杜勒斯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对美国议员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东就将丢失给共产党人。如果失去中东，那将是苏联共产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胜利，因为如果苏联得以进入中东地区，他们事实上就可以不必通过战争而取得西欧！”

然而，美国政界对艾森豪威尔主义仍疑虑重重，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无法与强大的苏联和中国抗衡，而且这个政策提出得太晚了”。

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对手艾德莱·史蒂文森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者杜勒斯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幽默，更缺乏周恩来的智慧。他说：“应该添补的第一个真空，不是中东而是美国国务院！”

艾森豪威尔讽刺杜鲁门、史蒂文森是长中国和苏联的威风而灭美国的志气，他针锋相对地吹捧他的国务卿说：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杰出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总是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绩。”

经过在国会山进行9个星期的激烈争吵，艾森豪威尔主义终于被美国国会通过成为法律，这股祸水立即冲向中东，在中东掀起更激烈的争斗。

中国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迅速做出反应。1957年2月初，周恩来访问锡兰时，在科伦坡答记者问时说：

“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为了使接受援助的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的。”

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在我们出国访问的期间，中近东一直是国际局势的焦点。紧接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被击退以后，美国政府就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公开主张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近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使中近东局势重新趋于紧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谈一下。

“美国的目只是为了夺取和代替英法在中近东的殖民地位。艾森豪威尔主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政府这次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又是用反



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口号做烟幕。其实，所谓苏联或者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近东形成威胁的话，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才是中近东形势紧张的罪魁祸首和根源：

“事实上，目前威胁着中近东各国的正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集中地表现了美国政府进行扩张和侵略的惯技，那就是，以反共、反苏为借口，以制造紧张局势为手段，来达到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排挤英法殖民利益和扩大自己殖民势力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约旦上空战云密布

仿佛是要给周恩来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论断提供证据，杜勒斯首先把黑手伸进约旦。

当时，22岁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中东政策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性格坚强，执政方针灵活，因而使约旦在风云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中，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安定的局面。侯赛因被看作是对解决中东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和苏联都对他刻意拉拢。

美国见侯赛因因为人倔强，不对美国言听计从。为贯彻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想从他身上开刀，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下手的借口：



经美国费尽心机地挑拨，约旦“左翼分子”与侯赛因国王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立即像一只穷凶极恶的老狼扑向善良软弱的小羊，花言巧语说什么美国认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是极其重要的”，发表声明宣称“不准共产主义赤化约旦”，还命令美国第六舰队的舰只立即从法国的里维埃拉起航驶向东地中海，又宣布美国部队准备在几天之内空降约旦。

一时间，约旦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劫难就要来临。为保护约旦国民免于生灵涂炭，侯赛因只得再次推行灵活措施，压制受苏联支持的约旦“激进左翼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然后给杜勒斯灌迷魂汤说：“美国的干预立即在约旦产生了效果，约旦危机没有进一步发展，美国给中东政治加入了一种新因素，艾森豪威尔主义很快生效了。”

杜勒斯大喜，他认为美国成功地稳定约旦局势是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的首战成功，马上向约旦提供3000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侯赛因国王对美援照收不误，对外又公然宣称约旦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没有关系。杜勒斯对侯赛因玩的这套把戏心里有数，暗想你侯赛因在大事上听话就行，说些自圆其说的话则不必深究。

美国在约旦得手后，又把矛头对准不服从美国支配的叙利亚政府。

艾森豪威尔派总统特使洛伊·享德森前往土耳其，同土耳其领导人曼德



列斯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斗篷和匕首”的政变计划，企图在1957年8月发动政变推翻叙利亚政府。其阴谋被及时揭露后，美国指使土耳其共把以“哈塔伊机动部队”著称的部队调到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同时命美国第六舰队驶入东地中海，不断对叙利亚采取挑衅行动，还准备对其进行武装干涉，这就使叙利亚形势严重尖锐化，出现了类似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前面临的恶劣形势。

中国对美国威胁叙利亚做出强硬反应，在1957年9月15日为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郑重宣称：

“正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却在中近东地区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粗暴地干涉叙利亚的内政。美国这种挑衅行动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这种不安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愤慨和严厉谴责。”

苏联则在9月10日就致函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严重警告土耳其统治集团，武装进犯叙利亚将导致极为有害的后果，苏联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说：

“当发生反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爆发中近东战争时，毫无疑问，土耳其只会由于参与类似的侵略而遭受损害，而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损害。”

曼德列斯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继续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进行军事威胁。对此，苏联政府特意发表声明，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严重警告称，“苏联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打击侵略和惩罚和平破坏者的行动”。

三天后，苏联再次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警告，如果叙利亚遭到侵犯，苏联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自身安全的利益出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援助侵略的受害者。

美国制造“黎巴嫩事件”

在中国、苏联等国的强烈警告下，美国未敢对叙利亚轻举妄动，又转而制造了黎巴嫩事件。

美国特意选择黎巴嫩开刀，是因为黎巴嫩总统夏蒙投靠美国，同美国签订了执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协定，放弃了中立政策，却引起黎巴嫩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又发展为几乎遍及黎巴嫩全国的人民起义，使美英在地中海东岸重要战略地区的地位受到挑战，美英海军很快集结在黎巴嫩沿岸。1957年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借口是应黎巴嫩总统夏蒙的请求而出兵。



黎巴嫩议长谢哈布坚决谴责夏蒙的卖国行为，严厉指责美国入侵黎巴嫩，他在分发给联合国会员国的信中郑重声明：

“美国军队借口保卫美国人生命、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与主权而在黎巴嫩领土登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黎巴嫩独立与主权的侵犯。”

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就以极快的速度，发表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的声明称：

“美国这种侵略行动，不仅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狂妄挑衅，而且严重威胁着西亚和世界和平……黎巴嫩、伊拉克和一切阿拉伯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六亿中国人民将同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国如果不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它的侵略部队，必将自食其果。”

赫鲁晓夫立即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印度总理尼赫鲁，主张在三天内举行苏、美、英、法和印度参加的五国紧急首脑会议，讨论美英军队尽快撤出黎巴嫩和约旦问题。

赫鲁晓夫这一提议在华盛顿引起一片慌乱，美国害怕在最高级首脑会议上成为审判对象，“几乎肯定会走向灾难之路”，美国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胆战心惊地著文称：“艾森豪威尔先生和赫鲁晓夫此刻公开碰面将是一个可怕的场面。”



美国一个记者更形象地在《纽约时报》上写出美国发动侵略黎巴嫩战争的尴尬局面：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同意出席这次糟糕而难受的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就不恰当的课题举行的不恰当的会议。”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跳出来为他的“难兄”解围，7月22日提出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以便美英随时动用否决权摆脱窘境。

对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并不领情，反倒责备麦克米伦使美国陷入“为难境地”，“处于心理上的守势地位”。经麦克米伦反复解释，赫鲁晓夫又反复催逼，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经24小时的紧张磋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才拍板决定：“如果普遍要求举行这种会议的话，那就不妨召开一次吧！”

赫鲁晓夫见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马上于7月23日提出7月28日召开五国最高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回答赫鲁晓夫称：“我们觉得太早了！”

周恩来总理1958年7月31日在出席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为庆祝中柬两国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告：

“现在，美英两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以及对伊拉克和阿联的武力威胁，已经遭到了亚非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正义谴责。如果美、英政府不顾世界的公正舆论，坚决不放弃它们在西亚



扩大侵略的冒险计划，拒绝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侵略军队，并且对于苏联所倡议的旨在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五国首脑会议继续抱着阻挠和拖延的态度，那就充分地暴露它们是蓄意要把西亚和世界拖入一次严重的战争灾难，而这是亚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所绝不能容许的！”

在中苏和全世界人民强烈谴责的压力之下，美国只得同意8月13日召开联合国特别紧急会议。会上，苏联代表团提出要求美英干涉者撤出黎巴嫩和约旦的议案，美国竭力从中阻挠破坏，双方斗争激烈。周恩来在会外予以配合，8月17日在印尼驻华大使维约普位诺托为庆祝印尼独立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以特有的外交风度施加影响说：

“现在美国和英国在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上，一方面阴谋转移目标，规避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联合国替它们在中近东的侵略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绝不容许这种阴谋得逞。”

恰在此时，伊拉克发生更沉重打击殖民主义的事件：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的卡赛姆将军“乘着一股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在一起的浪潮”，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把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和他的亲西方的首相努里·赛义德在巴格达处死，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中东形势。

美国认为伊拉克事件“严重威胁”着它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调动兵



力准备对其进行武装干涉，使中东局势更为紧张。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7月16日发表声明指出，“现在，由于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胜利动摇了殖民主义在中东的统治，恼怒而又惊慌的美国政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对黎巴嫩的武装干涉，并且企图侵入约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

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给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对中国和伊拉克两国已互相承认表示高兴，愿意采取实际步骤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反对美国武装威胁伊拉克。

毛泽东主席9月5日在中国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纵谈国际形势，以幽默的语言讲美国侵略中东问题说：

“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9月8日，毛泽东又把台湾、黎巴嫩比作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两条绞索，以独具特色的形象语言说：

“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



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末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在 10 月被迫同意从中东撤军。

第九章 胞波情深

向缅甸伸出友好之手

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年轻的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就考虑建立中缅睦邻关系问题，很快得到缅甸领导人的响应。

1949 年 12 月 16 日，缅甸外交部长伊·蒙电告周恩来，缅甸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建立外交关系、互换使节。两天之后，周恩来就友好地复电称：

“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当时，中国与缅甸建交的最大障碍是清理缅甸与国民党政府的原有外交关系问题，而这又是新中国展开外交的前提条件，周恩来指示中国外交部



将这一点明确地告诉缅甸政府，条件不成熟的话，中国可以耐心等待。

缅甸方面对此完全理解，缅甸新外交部长藻昆卓 1950 年 1 月 18 日明确答复周恩来外交部长说：

“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

1950 年 4 月 29 日，原缅甸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吴辟来到北京，以临时代办身份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指示副外长章汉夫明确提出，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于中国的一切财产必须解决。

吴辟代表缅甸政府作出明确的回答：除了前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因而在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将随即撤销对前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的任何承认，其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缅甸承认的政府。

缅甸方面还特别表示，愿意解除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妥善解决中缅边境居民之间的冲突，保障在缅甸的华侨的利益。

周恩来认为缅甸政府的态度友好，便于 1950 年 6 月 8 日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为与缅甸政



府协商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说明新中国对于处理中缅关系的友好态度,消除缅甸政府由于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的挑拨离间而对中国存有的疑虑,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在访问印度之后,主动提出访问缅甸,缅甸政府当即发出邀请,6月28日,周恩来抵达缅甸首都仰光,对缅甸进行正式访问,与缅甸总统巴宇、总理吴努就两国之间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重要会谈。

周恩来初次见到吴努,不由得将这位缅甸总理打量一番,只见此人长得很英俊,中等匀称的身材,圆脸上时常挂着微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和蔼可亲,举止稳重潇洒,给周恩来留下良好的印象。

吴努对周恩来提出 缅甸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和克钦族军人越过中缅边境到云南接受中国的军事训练,这使缅甸政府感到忧虑,希望中国采取步骤,避免上述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此事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尽管此事错综复杂,还是以极其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解释说,有些事情属于传说,有些问题是出于误会。中缅两国应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愿意看到缅甸独立,有权选择大多数人民赞成的社会制度,并愿与缅甸友好合作,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



周恩来说，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我们热烈希望我们周围的国家强盛起来，并和他们和平相处。因为这是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邻邦让外国干涉者来建立军事基地。缅甸同印度和印尼都不赞成美国在东南亚组织侵略集团，反对建立军事基地，这就说明我们有友好合作的基础。经过更多的接触之后，相信缅甸会了解中国虽然大，人口多，但是容易相处。

周恩来称赞缅甸独立后，不愿成为外国干涉者的军事基地。不愿接受有条件的援助，对此，我们感到钦佩。

周恩来提议中国和缅甸两国应当有一个带政治性的协定，如果缅甸方面同意，中方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性质的协定，以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平共处。但是，签订协定需要时间，因此，在此之前可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作为开端。

周恩来提议，如果缅甸方面同意，联合声明可以包括中印协定中载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吴努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周恩来的意见完全赞成，与周恩来密切合作，6月29日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从而与周恩来、尼赫鲁一起，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都为各自的国家赢得了声誉。

周恩来此次访问缅甸收效可观，大大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达到了



增进两国相互了解，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目的。

两国领导人“走亲戚”

1954年12月1日至16日，吴努总理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12月1日晚，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与吴努亲切会见。

吴努极感兴趣地问，如果中国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是亲自去，还是另派代表去？

周恩来稍加思考说，这将决定于发起国是否邀请各国总理参加。

吴努特别表示诚意说，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的总理是一定会参加的，其他的国家如何，还不能肯定，不过希望周总理亲自参加。

周恩来友好地表示，亚非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次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吴努非常关心，周恩来深知这是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中国正在着手处理，便以实相告：“我们正在同印度尼西亚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两星期后可有结果，最后签字要在雅加达举行，有几条原则是已经同意了：第一，根据自愿原则，侨民必须决定究竟保留原国籍，或是取得侨居国籍。第二，根据父亲的血统来



确定 18 岁以下侨民的身份。侨民满 18 岁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我们不反对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但是要避免他们被蒋介石集团利用。”

吴努对台湾问题非常关心，希望中国解放台湾的时候不发生战争，并提出了关于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他的方案，他愿意到美国去一趟，不仅同华盛顿的领袖谈，而且与美国人民谈，还可以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在科伦坡会议上发表联合宣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发出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非常耐心地听了吴努的建议，首先对吴努总理表示感谢，然后严肃地阐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说，中国是反对战争的，力求避免战争，争取和平，但不能牺牲我们的主权和利益乞求和平，否则就会像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候的情况一样。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关心台湾局势，是怕台湾问题扩大成大战的导火线。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是，吴努总理的方案在原则上和事实上均难做到。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就原则上说，中国人民不仅在 5 年前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最近还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如何能再来一次投票？这在法理上是没有前例的。就事实而言，美蒋会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会说，共产党在大陆存在一天，公民投票就会受到共产党的钳



制。这种方案还会引起麻烦。美国可能说暂不管大陆，先在台湾进行公民投票，以图把台湾分割出去。台湾既然已经归还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法理上也没有理由像对待地位未确定的土地那样，举行公民投票。

周恩来郑重地指出，不是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办法，例如中立国可以主张美国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让中国自己解决内政问题，台湾是可以和平解放的，像北京等地那样。如果能够和平解放，当然就不会去考虑诉诸武力了，又何必诉诸战争？

吴努频频点头说完全明白了中国的意图，改口说：“刚才提到向蒋介石的呼吁，是一时疏忽”，表示拟回国后将在公开演说中传达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愿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见解。他将提到与周恩来总理讨论过和平问题，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问题。他将讲明，周总理认为，如果美军撤出台湾，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国民党人，将会像北京和平解放的时候一样得到照顾。台湾问题如果得到和平解决，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

周恩来微微一笑：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和平共处。如果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我们不仅可以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还可以和平友好相处。



当时，吴努在外交上很活跃，他受英国首相艾登的委托，想给美国人作件好事。

吴努满脸堆笑对周恩来说，根据人道主义的理由，我像小弟弟一样向大哥哥提出一个谦恭的呼吁，希望中国释放被关押在美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果能够取得成效，我将到美国去促进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严肃地讲明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一，中国政府和人民是讲道理的，他们办事根据十分充足的证据和十分合理的主张。第二，中国人民是不能允许任何方面的威胁的，他们在威胁面前从不低头。第三，中国人民是讲交情的，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们更好。我们决不因为美国叫嚣，英国帮腔，联合国通过决议就改变对美国 11 名间谍的判处；也不能因为同样的原因，不释放另外 4 名可以释放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是不受战争威胁的。

周恩来外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然他拒绝办某些事情，但是被拒绝者却心悦诚服，反而对他本人和中国崇敬有加。

事后，吴努主动向毛泽东大发感慨说，过去，我们缅甸人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什么的，怕的是把我们说成是“英美的走狗”。现在我们互相见面，进行了讨论，有了了解，就不怕了，就有话直说了，比如我请求周总理释放美国飞行人员，这有干涉内政之嫌，但我与周总理有了很好的了



解，并没有引起他的误会，这使我非常高兴。

吴努迫切要求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与陈毅等人反复商量，都认为中缅边界问题虽然非常复杂，但是如果不予解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就不能打消，加上帝国主义的恶意挑拨宣传，难免使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有一些惶惑不安，因为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都存在边界问题，都希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尽快予以解决，因而应该本着积极而稳妥的方针，提出中国的建议。

周恩来认为，中缅两国人民有着 2000 余年的悠久交往历史，有着 2000 余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两侧的居民属于同一民族，但对边界的划分却有不同的态度，加之英国帝国主义在统治缅甸时期故意制造中缅边界纠纷，近几年帝国主义又经常利用这一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因此，中缅边界问题必须慎重处理。

1948 年缅甸独立之后，缅甸有些人声称要“继承英国的遗产”，周恩来对此很不赞成，因此在他 1954 年 6 月第一次访问缅甸的时候，吴努提出中缅联合公报要反映边界问题，承认英国人所确定的边界，周恩来当时就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合理解决。

因此，1954 年的中缅联合公报只这样表达：“在适当的时机内，通过



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边界问题。

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到达仰光，吴努总理热情地到机场欢迎，巴宇总统设宴盛情招待，双方就亚非会议的召开进行友好协商，因而在亚非会议期间，中缅两国代表团相互配合，共同为创造万隆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回国途中，中国代表团经过仰光，吴努总理又盛情招待，两国总理相约为共同发展中缅关系而努力。

1955年9月28日至10月6日，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奈温中将率领缅甸军事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

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都对奈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46岁的缅甸实权人物身材不高，粗壮结实，显得精悍而英俊，又爱穿中国式服装，使中国人感到更为亲切。奈温统领着缅甸军队和警察，对缅甸政局具有巨大影响力。

周恩来对奈温的高规格而周到热情的招待，给奈温留下良好的印象，使奈温对新中国及其领导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为日后中缅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扫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障碍

其后，周恩来和陈毅组织外交部干部，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恰在中缅双方都进行积极准备的时候，发生了1955年11月的“黄果园事件”：中缅边防前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周恩来对此不幸事件非常重视，立即采取得力措施，经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性。

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1956年10月24日应邀访华来到北京。周恩来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吴努，然后与吴努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主要讨论中缅边界问题。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相当复杂，主要问题是英国帝国主义造成的1941年线的处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主权的收回，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局面的处理及北段未定界的划法。

当时，中缅双方在消除英国帝国主义侵略遗迹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改变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而缅甸方面却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造成的既定事实。

周恩来与吴努等人进行了极其耐心的谈判。在10月27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要真正友好、永远友好，我们要使边界问题一劳永逸



地得到解决，并且使确定的边界永远维持下去。这就既要照顾双方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双方的民族问题。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要有法律根据。我们以这样的原则来对待中缅边界问题，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同亚洲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我们愿意从缅甸开始来解决我们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使它在亚洲起一个示范作用。

吴努等人觉得周恩来的意见合情合理，愿意进一步深入探讨。在 11 月 1 日的中缅会谈中，缅甸代表团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和内阁的外交小组人员，认为周恩来的意见合理，表示满意；而克钦族的吴赞塔信等 3 位领袖不太同意，声称还要回去与地方领袖商量。

缅甸另一些人感到没有这个必要，双方争执起来，周恩来出面调解道：少数民族很自然会看到本身的利益，我们还没有和少数民族的领袖接触，我想我们的困难不会比你们少。从两方面的困难出发，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可以再等一等，经过解释再解决。

11 月 3 日，双方再次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吴赞塔信和缅甸两位克钦族领袖回去解释的时候，注意把双方的情况都要解释清楚，时间不可拖得太长，12 月他到缅甸的时候，可与吴巴瑞总理及诸位再继续商谈，缅甸方面人员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为打开僵局，周恩来与外交部人员反复商量，制定了分两步走的方案。



诚如周恩来所料，中缅双方一讨论边界问题，缅甸方面就振振有辞地搬出英国人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周恩来为避免伤害对方的民族自尊心，绝不流露火气，第一步先提出一个和缓气氛的方案，中方从有争议的1941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进入。

吴努认为中国方面这个对等的建议合情合理，乐意接受，遂使中缅边界谈判出现了和解的局面。周恩来又本着互让互谅的精神，提出一个有取有予公正合理的连锁方案。

吴努主席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一个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周恩来总理和吴努主席代表中缅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布了特别令人注目的消息：

目前，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起，中国军队将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3个地方。这项撤军工作将在1956年底完成。双方相信，这次会谈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有利于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吴努又极其客气地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协助缅甸建设新工厂。周恩来满腔热情地回答道：

“我们愿意尽力之所及来帮助：我们派去的技术人员是缅甸工厂的雇



员，薪金应该与缅甸同样的技术人员相同。他们应该无保留地贡献最好的技术和经验，时间尽可能短，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要求任何特权。”

1956年12月10日，周恩来再次访问缅甸，一到首都仰光，就得到仰光潘阳贵地农民遭受火灾的消息，当即决定捐款4万缅元予以救济。

在此次访问中，周恩来除了与缅甸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外，主要是深入讨论中缅边界问题。

缅甸联邦总理吴巴瑞像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般，与他极其信任的周恩来总理敞开心扉，侃侃而谈：

“中缅之间的重大问题有三：一是撤军问题，二是边界问题，三是华侨问题。现在第一个问题已解决，第二个问题正在解决，第三个问题也应该解决。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能解决，就没有什么其他能妨碍中缅友好关系的问题了。各方关心的边界问题不宜久拖，同意以中国向吴努提的建议作为基础着手解决。”

周恩来以诚相待，就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和中国政府的立场进行系统的阐述，坦率地说明解决这个问题时，中国也面临一些困难，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颇费周折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



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

吴巴瑞对此表示赞成，又婉转地说缅甸领导人忧虑的是像缅甸这样独立不久的小国，非常害怕大国侵略。

周恩来善解人意，耐心地谈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自觉地提出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党的八大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是为了不仅使我们这一代，而且使我们的后代也都不犯大国主义的错误。我们说了就算数的！”

吴巴瑞对周恩来这样表态很满意，高兴地说：“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对小国是一种鼓舞，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实行，可以解除小国的忧虑。”

12月11日，吴努陪同周恩来来到昂山英雄墓，只见这个陵园绿草如茵，鲜花飘香，周恩来称赞仰光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城市。缅甸的许多民族英雄，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昂山将军早年就组织“我缅人党”，进行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后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昂山将军又积极从事反英斗争，不幸于1947年7月19日遇难身亡。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昂山将军墓前敬献花圈，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厚怀念之情。



12日，周恩来一行在吴努主席陪同下，乘专机离开仰光前往缅甸北部的古都曼德勒，乘船在美丽的伊洛瓦底江上顺流而下，参观了实皆的著名宝塔。只见这些塔形状各异，有的似钟，有的像帆船，塔的壁龛里有许多玉石雕刻的佛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周恩来称赞缅甸人民具有无穷的创造力。

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八莫，在那里做短暂停留，八莫人民听说周恩来到了，全城一万人几乎全部出动欢迎中国贵宾，又举办茶会招待。周恩来激动地致辞说：

“八莫离中国云南省不远，自古就是中缅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我确信，这个城市将在增进中缅两国关系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同一天，周恩来一行离开八莫飞抵克钦邦首府密支那，与克钦族群众密切接触，与他们交朋友。邦长吴赞塔信举办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致答词的时候有意做克钦族首领的工作说：

“以吴赞塔信为首的克钦族领袖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加深了两国间的友谊和了解。希望有更多的克钦朋友去中国访问，他们将受到亲戚一样的热情的招待。”

周恩来兴趣盎然地观看克钦人的舞蹈表演，吴赞塔信看周恩来对舞蹈那么有兴趣，就热情地邀请周恩来加入他们的舞蹈行列。周恩来欣然接受邀



请，加入克钦舞蹈者人群跳起舞来，一时引起轰动。

14日，中国代表团乘飞机从密支那到达掸邦首府东枝，受到先期抵达的缅甸总理吴巴瑞和副总理兼掸邦邦长藻昆卓的欢迎，然后驱车前往风景秀丽的英莱湖，观看因达族人民精彩的划船比赛。

当晚，藻昆卓在坎色扎学院举行盛大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欢迎宴会，对周恩来亲如家人，周恩来好客地发出邀请，欢迎掸族人民经常到中国做客，希望两国之间像亲戚一般的关系将在后代人们中得到保持和发展。

周恩来认为，增进两国边民的友好关系对建立中缅睦邻邦交至关重要，因而15日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应邀从东枝来到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以丰盛的晚餐和丰富多采的文艺晚会招待。

16日上午，周恩来和吴巴瑞一起出席在芒市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周恩来对他们极其尊重，惊叹中缅两国的民族是如此亲近，以致难分彼此，鼓励他们为建立两国睦邻关系发挥巨大作用。

下午，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周恩来神采奕奕发表讲话说：

“举行这样的边民联欢大会，让中缅两国边民之间建立更广泛和密切的直接接触，对于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只要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信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彼此以诚相见，我



们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就会日益增进,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逐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当晚,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在芒市为招待中缅两国政府领导人举行盛大宴会,周恩来结合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深为两国边民的深情厚意所感动,大发感慨说:

“我们两国的确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把我们的友谊分开。”

出席宴会的中国和缅甸人员都被周恩来这几句颇带感情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吴巴瑞总理无限钦佩地说:

“同周恩来共事是最愉快的,尽管他的意见占上风,但却使人心悦诚服。”

排除挑拨离间

西方势力害怕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产生世界性影响,急忙跳出来进行破坏。周恩来发现这一问题,便于1957年2月17日接见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请缅甸领导人放心,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边界问题,不让别人有挑拨的机会。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两国友好,我们亚非各国更应该友好相处,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



吴拉茂把吴巴瑞总理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周恩来,原来是缅甸方面划还片马、古浪、岗房三地方案的地图。

为核实缅甸提出的方案和地图,周恩来在外交部有关人员帮助下,查阅了汉朝以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记载和地图,调查了19世纪以来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结合国际法和中国的外交政策,把中国关于中缅边界谈判的方案修改得既公平合理,又切实可行,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

周恩来1957年3月29日邀请吴努到昆明做客,进行友好会谈,决定建立两国政府联合边界委员会,执行划界和签订新边界条约的任务。

30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我们这个方案主要是采用了尹明德专家的意见。这个决定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肯定。

4月1日,周恩来根据丰富的外交谈判经验,特意致函吴努,走出重要的一步棋,他致函吴努称:

“我现在用书面的方式,把我们过去两天谈过的一个重要问题叙述如下: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缅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中缅两国政府同意在两国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签定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双方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吴努的热烈响应,为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努回国后与缅甸领导人仔细梳理商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国所能够表示的最好态度,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尽快办理,中国一旦改变主意就时不再来了,因此,吴努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命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6月7日交给周恩来,催促尽快办理。

周恩来对缅甸领导人的心理非常理解,认为边界问题极其复杂,牵涉到各个方面,需要妥善处理,就两手抱在胸前耐心地解释说:

“我国政府不会变更处理中缅边境问题的方针,至于中国方面的正式复信,需要在人大开会批准了政府的方针后才能回复。因为根据宪法,必须报告人民。这样的边境大变动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了解这仅仅是地图上的变动,但是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了解,请大使将此情况转告吴努总理。”

中缅边界谈判的顺利进展举世注目,西方势力利用英国统治缅甸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长期制造的纠纷,挑拨中缅关系,恶毒地制造紧张局势,特别在历史资料问题上做文章。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做《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对此做了极其精辟的分析:



“中国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

“同时，更要注意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或互相友好的国家……经过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将得到全面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7月26日，周恩来愉快地致函吴努：《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已在中国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因此我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中缅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有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西方势力为进行破坏，挑动缅甸少数人打着“革命”的旗号，要求脱离缅甸联邦，在中国与缅甸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搞得缅甸领导人很紧张，吴努总理急忙派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来北京与周恩来协商对策。

周恩来听了拍案而起，断然指出：这不是革命，而是颠覆，其后面一定有外国在搞鬼。显然，帝国主义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在中缅之间搞这样一个“独立国”，破坏中缅友好，我们两国都应该警惕。



吴敏登请教对付方策，周恩来强调民族团结很重要，必须谨慎处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两国领导人早已确定，但考虑到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和未预料到的情况以及双方的困难，提议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可按吴努总理在昆明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继续处理边界问题，我们先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继续勘察。我们两国可先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犯。

吴敏登敬服地感谢周恩来所采取的眼光远大而又体谅的态度，但是又提出一些法律依据，强调要考虑英国造成的历史情况。

周恩来考虑到吴敏登的话在缅甸有一定的代表性，就压下火气，不温不火地从揭露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解释道：

“你今天提出的一些法律依据，这是过去的历史，只能供作参考，而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因为那些条约是过去英国签订的。另一部分材料到现在还起法律作用，这主要是并且特别是关于边界问题的，这是要考虑的，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一部分，但是重要的是根据新的情况，根据两国的友好关系。”

吴敏登不解地问：“你所说的新情况是什么？”

周恩来堂堂正正讲出举世瞩目的事实：“新的情况就是两国都已独立，应根据五项原则，互相表示友好。缅甸有些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1941



年线对中国是不公道、不合理的。”

周恩来告诉吴敏登，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诚意，已经做了两件事：撤出了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还准备承认1941年线。至于勐卯三角地，永租的存在与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称的。

吴敏登回国之后向缅甸总理吴努做了汇报，吴努就先派副总理吴觉迎访问北京，又让吴巴瑞也随后赶来，周恩来热情地予以接待，还陪他们到杭州访问，在风景秀丽的孤山放鹤亭散步，到平湖秋月眺望西湖景色，然后前往上海，陪同缅甸贵宾游览上海市区，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万家灯火、气象万千的上海全景，参观上海少年宫和江南电影制片厂。

吴巴瑞和吴觉迎访华期间，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友好会谈。

周恩来首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起，强调中缅两国与印度共同倡导的这些原则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中缅两国政府遵循这些原则，使许多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从而显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充沛生命力。

这个话题果然提高了缅甸领导人的民族自信心，周恩来接着适时讲起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国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中缅两国政府对此都不负直接责任。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他建议先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士山口边界线，从而为解决中



缅甸全部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缅甸领导人对此极为赞成，又提议进行经济合作。这是周恩来考虑已久的问题，就首先从中国的贫困讲起：

“亚洲国家在经济上都还很落后，中国就是这些落后国家中间的一个。因此，我们要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在建设中，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因为一个国家总是有某些东西是缺少的。”

吴巴瑞欣然表示赞同，认为这对谁都有好处。

周恩来觉得与吴巴瑞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谈兴更浓了：

“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这才是真正的共处。这样，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就会被打破。我们要求反独占，反特权，要求平等互利，互相合作。”

在频繁的接触中，缅甸领导人感到周恩来虽然是共产党首脑，却是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吴努就任总理后遇到如何处理与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非常头疼，就指示缅甸驻华大使向周恩来请教。

周恩来虽然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但吴努既然向自己请教，就说明人家对自己极为信任，于是设身处地为吴努着想，坦率地劝告道：

缅甸需要经过一个和平、民主的阶段，这是缅甸的发展规律，缅甸如



能实现和平、民主，对它是有利的。希望大家促进此事。对缅共，要区别两件事，一件是请人家放弃武装斗争而进行和平民主斗争；一件是叫人家投降。叫人家投降，人家是不干的。对于一个有政治信仰和立场的人或团体来说，他们可以改变斗争方式，但是要他们投降、缴械，等于是说他们的信仰错了，要他们放弃，这样他们是不干的。

周恩来最后真诚地提出他作为朋友的忠告：我们希望缅甸能够取得和平，这样也能够显示吴努总理的领导更成功。

从其后中缅关系的发展情况看，缅甸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恩来的劝告，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较快的发展。

《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传福音

对中缅两国应该签订什么样的边界条约，周恩来颇下了一番工夫，决心搞出独特的而又使中缅双方都满意的条约，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终于拿出了成熟的意见：

“要用新条约代替 1894 年和 1897 年的旧条约，使新条约成为一个完整的条约。新条约是时代的产物，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国的想法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界所制造的纠纷，而今中缅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扫而光，对原来某些不合理的边



界线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法，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就在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接近黎明的时候，缅甸一些人受了帝国主义的恶意挑拨，跑到缅甸新任总理奈温面前拨弄是非，竟说中缅条约序言应该遵循西方的固有体例，不应该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发挥新论，还鼓动缅甸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兴风作浪，肆意破坏，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西方记者幸灾乐祸，不断放出悲观论调。

周恩来明察秋毫，当即于1960年1月12日致信奈温总理，说明奈温将军如能在近期访华，将向奈温说明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更为成熟的想法，并且就如何消除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原则性的会谈。

奈温将军一度犹豫不决，生怕缅甸吃亏上当，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的人品和风度，想到周恩来的为人，便认为中国的想法符合历史事实和事务发展规律，也体现了新中国的外交气派，应当予以尊重。

于是，奈温总理力排众议，接受周恩来的邀请，于1960年1月24日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老朋友再次见面分外热情，周恩来邀请奈温同坐一辆车，奈温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特别友好的表现，便欣然接受。

在轿车开往国宾馆的途中，周恩来抓紧时间做奈温的工作说：

“中缅两国有漫长的边界，两国人民来往频繁，应该成为和平共处的范



例。中缅边界问题谈判已久，接近解决，它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边界不同。相信这次奈温总理来访可以先达成原则性协议，但是对具体问题，如研究、勘察、起草协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问题可留待两国将来成立的联合委员会解决。”

奈温出于对周恩来的崇高敬意，对他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

当晚，周恩来设宴款待奈温，像老朋友一样祝酒欢谈；第二天陪同缅甸贵宾观看中国舞剧《鱼美人》，又与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奈温将军步上舞台赠送花篮，宛如家人一般。

周恩来将整个身心投入谈判，根据友好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征求奈温和缅甸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

对这个公平合理的方案，奈温总理乐意接受。

1月28日，可谓中缅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周恩来和奈温分别签署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周恩来与奈温热烈握手，共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音的大事顺利得以解决。



“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第一号‘胞波’”

为进一步发展中缅关系，周恩来与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1960年4月15日再次访问缅甸。

仰光市民倾城而出欢迎他们最敬重的外国领导人。只见周恩来身穿妥帖合体的薄呢中山装，神采奕奕，满面春风，令人觉得亲如家人，便衷心地发出铺天盖地的欢呼声：

“中国，周恩来！周恩来，中国！”

中国代表团到达缅甸的当天，正赶上缅甸的盛大节日——泼水节，缅甸政府邀请中国贵宾与民同乐，周恩来欣然答应。

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陈毅头上缠裹着白色布巾，上身穿镶着彩边的对襟单衣，布盘钮扣，下穿古色古香的长裙子，双脚拖着卡脚拇指的缅甸拖鞋，出现在泼水的人们之中。

缅甸人民一阵惊喜，纷纷挥动蘸着水的树枝，将象征着吉祥、幸福的水珠，泼向周恩来和中国贵宾，欢快地发出“瑞苗”、“胞波”的欢呼之声。

周恩来和陈毅很快地投入这充满缅甸风味的活动之中，也把水泼向缅甸民众，浑身湿淋淋的，感到极其痛快。

周恩来与奈温会谈时，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国民党的柳元麟部队在与



老挝相邻的缅甸边境修筑了一个很大的飞机场，器材从台湾和曼谷运来，足见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们。

奈温极感兴趣地问：他们的指挥部设在哪里？

周恩来以实相告：设在缅老边境，缅甸境内的江拉。今后美蒋在中缅边界上还会制造新的事件。因此，我们把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看作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祸害，如果他们进入中国境内，我们就消灭他们！

奈温对此完全赞成，表示缅甸方面也要尽量设法消灭他们。

周恩来见双方对此意见一致，脸上现出欣慰的笑容，又向缅甸领导人提供另外的情况：“1960年二三月间，中国发现有一些飞机作高空飞行，穿过缅甸，进入西藏，再向南飞回曼谷，有的则经中国飞回。”

奈温对此甚感不安，急忙询问：“这是谁的飞机？”周恩来以确凿的证据回答道：“这些都是美蒋飞机。美国在泰国有空军基地。现在我们双方都已经弄清楚，这不是中国或缅甸的飞机。因此，我们在各自的境内可以采取措​​施将其强迫降落或击落。如果我们两国互通情报，这些事情就不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奈温说这样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将予以配合。

周恩来亲自督促中缅协议事项的落实问题，1960年6月13日，在听取准备去仰光参加中缅边境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中方代表的汇报后，特别作



出重要指示：

首次去开联委会，要重视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表明我们期望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来证明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有生命力的。同缅方讨论问题，要坚持平等协商精神，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

周恩来对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感到欢欣鼓舞，8月26日致信缅甸总理吴努，请缅甸领导人吴努、奈温和吴巴瑞于9月底前来中国访问，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对缅甸政府准备在签订边界条约时，向居住在中缅边界上的中国居民赠送大米和食盐表示感谢；表示愿意在1961年1月4日亲自到仰光去交换边界条约的批准书，并参加缅甸国独立节的庆典。

应周恩来的盛情相邀，吴努和奈温分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1960年国庆节前来华“走亲戚”，周恩来举办盛大欢迎宴会，像招待亲人般地招待缅甸贵宾。

10月1日，在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11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中缅两国举行隆重的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郑重签字，互祝和平友谊边界的建立，称赞这是中国与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

2日，首都各界10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缅边界条



约胜利签订，周恩来和陈毅陪同缅甸贵宾出席，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例。

周恩来的精辟讲话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应邀参加缅甸驻华大使举办的招待会，频频举杯祝贺吴努总理、奈温总参谋长访问中国取得成功，他很同意陈毅把中缅友谊比作《秋菊》：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

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1961年1月2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率领400余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缅甸，缅甸政府特别通知全国放假一天，吴努总理、奈温总参谋长和10万人倾城而出欢迎中国贵宾。

当晚7时，中国代表团在总统府参加吴努总理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国宴。按照宗教习惯，大家吃了一顿纯素菜做的咖哩饭，周恩来应邀发表讲演：

我率领的新中国最大规模的40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缅甸，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去年率领的300多人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都非同一般，互相派出规模如此盛大、代表性如此广泛、内容如此丰富多采的代表团友好往



来，这不仅在中缅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盛况。

周恩来亲自朗诵外交部长陈毅写的颂扬中缅友谊的诗：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

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

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

4日下午，周恩来出席隆重的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看到中缅两国人民对此条约如此珍爱，就更体会到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为表彰周恩来对建立中缅友好关系的巨大贡献，缅甸总统吴温貌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勋章授给周恩来，将缅甸最高英雄荣誉勋章授给陈毅。外电认为，把两枚最高荣誉勋章同时授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缅甸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国代表团离开缅甸前，周恩来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告别宴会，他请来宾观赏“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小演员的精彩表演立刻迷住了亚非国家的驻缅甸大使，他们惊叹中国小演员竟然能够演出几乎所有亚非国家的歌



舞。

吴努深为感动地说：“周恩来阁下真是既有高度理智，又有丰富感情。”

吴巴瑞也完全赞成：“周总理——他的风度、礼貌、殷勤和对我国富利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证明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第一号‘胞波’。”

第十章 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尼赫鲁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

1956年6月18日，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到中南海西花厅拜会周恩来，热情地发出邀请道：

“总理阁下，尼赫鲁总理来电指示我，非正式地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毛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如果能够实现，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请大力玉成。”

周恩来认为这是印度领导人和人民对中国友好的表现，便含笑表示感谢，说明这个问题在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谈过，毛主席当时说，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他是一定要到印度去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将来中国访问，印尼朋友也问起毛主席能否访问印尼，毛主席说愿意去。因



此，这在原则上已经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时间上和条件上的可能性问题，这需要同毛主席商量。

为给毛主席访问印度打基础，周恩来1956年11月28日开始对印度这个古老的邻邦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尼赫鲁总理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首先前往总统府拜见印度总统普拉沙德，转达毛泽东的亲切的问候，普拉沙德再次邀请毛泽东访印，周恩来答应予以转达，然后前往印度国会人民院和联邦院发表演说称：

你们的国家曾经是人类智慧的渊源之地，后又有200年沉沦为外国的殖民地。稍后一点，中国也受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正因为如此，两个伟大的民族的创造力受到了压抑。现在，在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独立的中国和印度的面前，都摆着建设国家的重大任务。我们都希望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摆脱现在的落后状态，并且对世界做出同我们两国的历史、幅员、人口相称的贡献！

周恩来动人而恳切的话语，亲切而潇洒的风度打动了印度议员的心，报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应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美国合众社记者首先就中美关系提出问题，周恩来风度翩翩回答道：



中国一直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已经特别邀请你们美国记者来中国访问。被中国判刑的美国人总是有机会在服刑期满之前就被释放的，如果他们表现良好的话。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到目前为止，被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被释放或遣返回国。

当天晚上，周恩来应邀出席印度国防学院为欢迎他而举办的宴会，他非常愿意与印度军界人士接触，精辟地阐明他对战后军队建设问题的见解：

武装部队有两种，一种是压迫和威吓人民的武装部队，另外一种是为保护人民的武装部队。前一种是侵略部队，后一种是人民的部队。开始的时候，侵略部队看来比较强，人民部队看来比较弱，但是在斗争过程中，侵略部队注定要失败，而人民部队则成为不可战胜的。

周恩来还以印度军人熟悉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一句名言——如果武装部队同人民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成为人民的武装部队，这种部队就是不可战胜的——来宣传反侵略思想，获得了许多印度高级将领的赞同，日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2月2日下午，周恩来一行到达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的故乡——印度西海岸的最大城市孟买，出席市政机关举行的招待会，周恩来作为与柯棣华并肩抗日的战友深情地致词说：

“我们都记得，在我们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曾经得



到来自印度的医疗队的兄弟的帮助，其中就有孟买的儿子柯棣华医师，他为中国人民献出了生命。单是这件事就使中国

人民在心里铭记着柯棣华的名字和伟大的孟买！孟买是一个赢得中国人民尊敬的城市！”

周恩来在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美国和英国记者居心不良，私下密谋就台湾海峡形势和中美关系提出带挑衅性问题，企图引诱周恩来在发表重要谈话中出差错，他们好

尽管他们的问题提得极其尖锐，但周恩来回答得轻松而巧妙，使整个招待会生动活泼，步调不乱，英美记者私下感叹：“果然名不虚传，周恩来到底比咱们强啊！”

印度高级法院的法官有幸目睹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精彩场面，获得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连声称赞：“从未见过有如此智慧的政治家，诚恳谦虚，问什么答什么！”

谴责印度扩张主义者挑动西藏叛乱

那时，印度扩张主义者不甘心失去在西藏的特权，害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印度人民产生影响，就在美国的策动下，伸手干涉西藏问题。



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时候,达赖和班禅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方面蓄意羁留达赖,周恩来发现苗头之后于11月29日接见达赖,就他提出的汉藏干部关系、西康改革、西藏改革和在国外藏人等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周恩来仁至义尽地劝说道:

“西康地区的武装冲突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当时解放军部队被包围了。目前存在的悬案,中央正在设法解决,过去处理不善的,都应该陆续求得合理解决。昌都和西藏地区进行改革,一定要根据西藏领导人的意愿来进行。这件事,去年毛主席就说过。”

周恩来有意堵住达赖与印度扩张主义者勾结之路说:“印度政府对中国是友好的,同中国一道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些都是很好的。”

周恩来又接见班禅,作出妥善安排,还针对印度的不轨行为,与印度政府进行严肃交涉,才使达赖于1957年1月离开印度回国。

其后,周恩来不断教育达赖不要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当。1957年8月3日,他与阿沛·阿旺晋美谈话,请其转告达赖说:

“必须请达赖认清帝国主义的阴谋还会不断地搞,印度一些人和西藏逃亡出去的反动分子也不会死心。希望有了这一次事件的经验,达赖能提高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请转告达赖,这段话是爱护他的。”



周恩来仍然不太放心，又特别要达赖划清爱国与卖国的界限。接着说：

“总起来说，中印关系是好的，可以和平共处，但究竟是两个国家，所以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西藏和印度的来往都应当经过中央，经过外交部，要划个界限。”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印度某些势力的挑拨支持下，西藏某些上层分子从1958年2月开始制造叛乱活动，印度宣传机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终于酿成1959年3月19日的武装叛乱。

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周恩来等命令对拉萨叛乱武装进行反击，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等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的平叛活动。

3月31日，西藏叛乱分子挟持达赖匆忙逃入印度，印度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兴风作浪，印度总理尼赫鲁频繁地在印度议会发表攻击中国镇压叛乱的讲话，接见叛乱头子，亲自给达赖安排住处，为达赖打气，叫嚷西藏“独立”。

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庄严地宣告西藏“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表示遗憾。



5月6日，周恩来接见奥地利人民之声报驻北京记者佛莱，驳斥印度扩张主义者对西藏历史的恶意歪曲，他神色庄重地说：

“现在有人说，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印度人是雅利安人种，而西藏人是黄色人种，他们和中国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同属于黄种人；从宗教关系上说，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而不是印度，佛教在印度很衰弱，兴盛的是印度教，如果以佛教徒的人数讲，中国的佛教徒比印度的佛教徒要多得多；从政治关系而言，这种说法更不符合历史。因为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因此，连英国殖民主义者也不敢说西藏是印度的一部分，而印度政府在1954年的印巴协定中已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佛莱，他更信服周恩来的结论：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印度都应该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希望印度的开明人士能够纠正歪曲历史的现象，不要放出冷战的语言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5月6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等11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时候，揭露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企图继承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妄图挑动西藏“独立”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回答中国今后怎样做的提问时



说：

“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将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同印度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

兄弟国家的朋友一了解情况，就对尼赫鲁愤愤不平：“这家伙，比帝国主义还坏，应该狠狠收拾他！”

周恩来连连摇头：“我们对尼赫鲁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

印度扩张主义者对周恩来的宽宏大量产生错觉，以为中国害怕民族主义国家，变本加厉地在1959年8月25日侵入我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处开会研究对策，与陈毅、罗瑞卿等人协商之后，据理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迫使印度政府承认马及墩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将入侵印军撤出朗久，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南。



9月8日，周恩来给尼赫鲁复信，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中国西藏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依据，建议印度方面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对此，尼赫鲁置若罔闻，连续发表强词夺理的谈话，把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的责任推给中国，他21日指示印度军队在空喀山口向中国巡逻队发起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即空喀山口事件。

11月3日，周恩来到杭州与毛泽东协商对策。周恩来联系赫鲁晓夫的报告，讲起和平共处有三种：一是列宁的和平共处，二是麦科米伦的和平共处，三是杜勒斯的保护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尼赫鲁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必须认真对待。

毛泽东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他深思熟虑的见解：

“为避免纠纷，我建议考虑在整个边界线双方各退20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你尼赫鲁说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到极点了。”

周恩来赞成道：“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

毛泽东说：“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新德里，我有一个盘



子，就要和平。由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明天回去就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12月17日，周恩来给尼赫鲁写信，20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提议中印两国总理“如果年前能够会晤顶好，这样对于消除两国紧张对立的状态有好处”。

周恩来运用娴熟的外交艺术，通过国际舆论推动中印边界争端的早日解决。1960年1月18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因里希·劳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时候，有这样的有趣对话：

“总理阁下，中国能否让印度一下？你们不能老吵下去。”

“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周恩来首先强调问题的是非，“假若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了他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针。”

海因里希副总理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但颇带忧虑之色：“尼赫鲁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周恩来对客人的好意表示感谢，微微一笑极其自信地解释道：

“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我们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和缓一下，收缩一下。



海因里希折服了，回国后称赞周恩来不愧是世界著名外交家，满脑子扩张主义的尼赫鲁怎么是周恩来的对手？与周恩来作对，只能自取其辱。

周恩来“原话奉还”

为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0年4月19日到印度访问，尼赫鲁到机场欢迎，周恩来与他热烈握手问好。尼赫鲁大概是心里有愧，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次会谈中充分听取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便施展特有的辩才，说什么中印边界长期以来是和平的，“边界是确切的，现在发生困难是由于中国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引起的”。

最了解尼赫鲁的思想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谈话，进一步做战术侦察，然后从达赖身上寻找突破口：

“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的活动远远超出进行宗教活动的范围，他基本上要求西藏独立，向联合国提出控告，这完全出在印度领土上，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震惊，使我们感到痛心，因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梅农狡辩说西藏问题被中国夸大了，胡说四五年来“中国入侵了印度，双方存在巨大的误解”。



周恩来遗憾地表示不同意西藏问题被夸大的说法,指出说中国侵入印度不是事实:

“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印度政府要我们承认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 未经任何中国中央政府承认的西姆拉条约。我们不承认这条线, 但是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 就是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

在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周恩来与尼赫鲁进行第二次会谈。

尼赫鲁手扶白色甘地帽, 傲慢地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极其恼火, 但是仍然风趣地问道: “麦克马洪是谁?”

尼赫鲁当然听得出中国总理话中强烈的讽刺意味, 他也清楚那是什么货色, 讲出来就等于打自己的嘴巴, 只好摆出政治家的架子笑而不答, 周恩来则以有利的地位, 从侧面尖锐地提出问题道: “为何在结束了殖民统治的时代, 一个前英帝国主义的将军, 还能对两个主权国家的议事日程指手划脚, 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中印边界问题因为历史问题而复杂化, 但中印两国有对付英帝国主义的经历, 应该很自然地对边界问题持有相同的观点。与此相反, 印度却要中国接受英帝国主义片面扩张出去的边界, 就太遗憾了!”

尼赫鲁是一位善辩家, 连笑几声欲擒故纵地说:

“我深知周总理是一位杰出人物, 是我见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但



你却说印度的独立政府正在从对中国的侵略中寻求获得一种利益,这使我深感意外和苦恼。英国占领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传统所决定的。英国出版社出的我的书即是证明。”

周恩来感到惊讶,堂堂印度总理根据英国出版的《尼赫鲁自传》的说法要求划分边界。周恩来直截了当向尼赫鲁建议,现在需要澄清的主要问题是中印边界究竟是划定了还是没有划定?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愿意采取现实的态度来求得解决,并且提出五点建议,但是尼赫鲁在会内坚持顽固立场,在会外故意散布流言蜚语:“只要周恩来当权,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就不会改善!”

周恩来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双方部队后撤,但是他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尼赫鲁的应有反响,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只同意由双方官员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

为使印度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印会谈的真实情况,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周恩来离开印度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首先散发书面讲话,简要地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建议将好不容易找出的6个共同点肯定下来,便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消除双方的距离与分歧。

此时此刻在新德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气氛相当紧张,周恩来开



始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场的 150 名记者纷纷举手提问。印度记者一向以敢于提出尖锐问题而著称，他们成心使周恩来难堪，首先由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拉加凡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印度，你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已经全文发表了，但是尼赫鲁总理给你的信，中国报纸却没有发表。讲到言论自由，你是不是准备让中国报纸全文发表这些信？”

在场的各国记者都认为这个印度记者提的问题角度刁钻，起码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中印分歧方面，中国人心虚理亏，不敢发表尼赫鲁的信；二是给人以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印象，使周恩来一开始就在气势上占据下风。

印度记者认为拉加凡的提问好比锐利的枪尖剑锋，会一下子把周恩来打得无法招架，都将目光投向周恩来，只见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这位先生可能没有读过中国报纸，中国报纸早就把尼赫鲁总理给我的信和我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全文发表了。”

周恩来轻轻一击，就剥夺了拉加凡的提问资格：一个连中国报纸都没有看过的人，竟然向中国总理提这样缺乏常识的问题，岂不惹人耻笑？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嘲笑声，拉加凡羞得低下了头。

就是拉加凡本人也承认，周恩来对他是很客气的，特别是“可能”二字大有讲究：从客气方面来说，究竟读过中国报纸没有，周恩来只是猜



测，由拉加凡自己去说，给他一个台阶下；从不客气方面来说，读过中国报纸还这么提问，就有别有用心之嫌了！

接着，印度《政治家报》记者钱德拉提问道：“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阻碍你回到边界一两年以前的情况？因为行动是在一两年前采取的。”

钱德拉一张口就包藏祸心，隐含着印度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诬蔑，硬说中国边防部队在“一两年以前”采取了越过中印边界的行动，周恩来没有动火怒斥钱德拉造谣诬蔑，而是平静地侃侃而谈：“在中国这方面，这一两年同过去一样，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行动改变边界现状。”

在场的各国记者啧啧称赞，认为周恩来用“原话奉还”方式回答，不但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以事实来回答对方的诬蔑，显示了世界一流外交家的气魄和风度，而且以“在中国方面”这样看似平淡实则有力的措词，强烈地暗示确实有人在采取扩张主义改变中印边界形状，但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印度政府！

钱德拉被驳得哑口无言，《印度教徒报》记者兰加斯华米比较客观地提问说：“在谈判当中，两国总理认为哪一段分歧最大？”

周恩来怀着对积极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指着挂出的地图说明有关情况：“东段和西段都有争议。中段比较小。在东段，我们的地图所画的边界线南边，在印度地图上划入印度的这块地区，是久经中国行政



管辖的地区。印度在独立之后逐渐向前推进到它目前在地图上画出来的这条线。印度政府要求我们承认这条线；有时候，印度政府甚至公开说这是麦克马洪线。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条线，因为这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划出来的，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这条线。”

周恩来讲完东段争议，又指着西段地图介绍说：“在西段，中国的地图关于边界线的画法和印度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历来中国地图关于这一段边界的画法虽然小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印度地图却变动了许多次……在中段，也有争议，但那是属于个别地方的问题。”

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态度是那么诚恳，材料是那么翔实，受到各国记者的普遍好评。北美新闻联盟和妇女新闻社女记者谢巴德又掀起高潮：“你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但并不因此约束美国要承认红色中国？”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谢巴德的自相矛盾之处：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对中国不友好，但是她却要求中国总理邀请美国总统来华进行友好访问，便揭穿她的破绽反问道：

“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



印地文《新世界报》记者萨克森纳又提问说：“除了边界问题外，两国总理曾否提出了一些麻烦的问题，如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政治避难问题，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

周恩来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达赖及其追随者发动叛乱、叛国外逃的原因、性质和经过，特别指出达赖正利用印度政府提供的政治避难权进行反华活动，含蓄地批评印度政府说：

“印度政府曾多次对中国政府说，将不让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进行任何反对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达赖及其追随者在印度国内和国外进行的反对中国的活动，已有不少次。这是我们感到遗憾的……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中印两国所共同倡议的五项原则。”

周恩来在含蓄地批评印度政府的同时，巧妙地把萨克森纳提出的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强调“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都“违背了中印两国所共同倡议的五项原则”，从而给外国干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使不怀好意的记者无法抗议，无从辩解。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麦克法尔加又发起新一轮冲锋：

“达赖喇嘛来到印度时，中国政府的声明说他是他的随从者劫持下被迫来到印度的。由于这种想法，当你们成立新的西藏政府的时候，给达赖



保留一席的位置，但在你刚才回答问题时，你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进行着某些反对中国的活动，好像达赖在印度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人，因此我要问：一、什么使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二，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告诉中国人民，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三，西藏自治区领袖的职位是否还给达赖保留着？”

周恩来用达赖 1959 年 3 月 11 日、12 日、16 日亲笔写给当时的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在信中说西藏叛乱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进行危害他的活动，制造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并说他自己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并正在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教育。周恩来说明事实道：

“达赖在离开拉萨以前，当时写给中国当局的三封信，证明他是被他周围的人劫持的。这三封信，达赖到印度后也承认了。中国人民对达赖是留有余地的，不仅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并且还保留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但达赖周围的人，却使达赖越走越远，拖他背叛祖国，顽固地阻挠他回到祖国的怀抱。至于现在达赖的自由意志究竟有多少，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周恩来实事求是地用达赖的亲笔信为论据回答问题，当然就有极强的说



服力和感召力。

印度扩张主义者见西方记者一个个败下阵去,就再次让印度记者最后冲杀:

“西方记者纷纷揭露中国对印度的侵略,总理阁下有何高见?”

周恩来彬彬有礼地驳斥道:“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对于中国周围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我们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两国边界的一时纠纷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周恩来环视全场一周,面带微笑表示他的强烈愿望:“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在促进中印两国友好方面继续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为了伟大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我,或者其他入,还会再来新德里的。”

周恩来以他卓越的外交艺术,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人心,以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原来抱有敌意的记者,连印度《自由报》也不能不载文承认:“周恩来在这方面表现的耐心和礼貌,使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惊异。”

然而,对周恩来和中国的友好与合理建议,尼赫鲁置之不理,周恩来只得遗憾地离开新德里,他私下对一位朋友道:“我一点儿也无法使尼赫鲁松动,我想他已下定决心了!”



军事和外交双套安排

果如周恩来所料，尼赫鲁下了推行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的决心，不许中印官员会议取得进展，到1962年悄悄地在边界一侧的中国领土上新建了43个据点和24个哨所，不断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为防止事态恶化，周恩来多次建议重开中印边界会谈，印度方面却毫不讲理地提出先决条件，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在东段撤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实际上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1962年9月17日，周恩来得到报告，60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克节朗河2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但印度军官却命令印度士兵举着步枪和机枪对准中国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哨兵轰走，因而发生边境冲突，两名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

面对复杂的中印边界形势，周恩来果断地做出军事和外交双套安排，毛泽东大加称赞，指示“照办”。

在紧迫的形势下，周恩来10月2日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又自我批评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



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脸带愠色，“喔”了一声，望着中南海菊香书屋外绿油油的菠菜，红红的辣椒，皱着眉头抽口香烟缓缓吐出道：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成了 950 万、930 万，我无法向六亿人民交代。”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周恩来对此早有考虑，忧心忡忡地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印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联驻印度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这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 40 架图—12 运输机。”

毛泽东流露出对赫鲁晓夫鄙夷的神情：“古有明训，生意不成礼仪在，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仪喽！”

周恩来拿出一张《真理报》指着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以讥讽的口气说赫鲁晓夫竟然向最坚决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中国大讲谈判的好



处，简直与西方别有用心的观察家一个腔调。毛泽东又问起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态度，周恩来说美国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给尼赫鲁打气说：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

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已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声称这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而印度反华是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大发感慨：“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喽！”

毛泽东虽然感到形势紧迫，但认为如何对付尼赫鲁这个在世界上颇有名气、背后又有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对手，必须谨慎从事，他叮嘱周恩来道：“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10月5日，周恩来接到总参报告：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



日报道，印度在加紧备战，在今后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印度军队“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

周恩来感到战事紧迫，当即批示：印军“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以同时歼灭其若干据点”，命令总参谋长罗瑞卿加速部署。

8日，周恩来接到前线沉寂的报告，认为这是印军全力以赴准备发动全线进攻的征候，马上到毛泽东那里汇报，研究对付措施。为警告苏联不要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又在西花厅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让他转告苏联政府：

“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他们利用苏制米格直升飞机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

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事前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联没有任何要求。”

赫鲁晓夫不敢小瞧中国的警告，他劝尼赫鲁小心从事，但尼赫鲁头脑发热，以为中国软弱可欺，1962年10月20日命令印军拉其普特联队的先头



部队抢占了塔格拉山脊，首先开枪挑起冲突，中国边防军被迫还击，玩火者遭到应有的惩罚。

尼赫鲁遭到沉重打击，不能不想到中国的严厉警告，但确实不摸中国的虚实，就请赫鲁晓夫暗中帮忙。

赫鲁晓夫想到自己明目张胆支持尼赫鲁反华，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早已失去调解人的资格，一时也没有办法，后来想到金日成与周恩来、尼赫鲁都有交情，便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

去见金日成，想通过金日成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来摸中国的虚实。金日成邀请周恩来访问朝鲜，问起有关情况，周恩来在平壤牡丹峰宾馆主动介绍事情的真相说：

“为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61年我和陈老总去印度和尼赫鲁进行过多次会谈，证明印度人没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回来后我们就建议，为了避免双方人员冲突，各自从当时的巡逻线上撤退 20 公里搞一个缓冲区。其后，我们主动撤了，但印度方面没有撤，这样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问题。”

金日成对中国为改善中印关系的作法给予高度评价，问起近况，周恩来向老朋友和盘如实讲出真情：

“今年，台湾海峡局势有些紧张，中苏关系不好的消息传出后，印度



就配合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印边界上闹事……开始他们没有打枪,后来他就打枪逼我们退,我们不退,我们向印度提出过数次抗议,他不听。我们忍无可忍,采取了自卫措施,这样就有了伤亡。”

金日成对中印边界局势恶化影响亚洲和平表示忧虑,又说尼赫鲁对此也非常关切。周恩来鄙夷地一笑,不紧不慢地揭露尼赫鲁的虚伪面目道:“从地形条件上说,发生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是不利的。印度人要进入中国哨所,需要爬上山来。从9月下半月起,那个地区已经大雪封山,他们就用苏联造的安—12飞机运东西给印度军队。要打,是很好打的。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

周恩来严厉谴责赫鲁晓夫用军事装备支援印度进攻中国,又以东方外交家特有的温文尔雅的自信风度讲明中国的原则态度:

“在这一地区,印度人是没办法前进的,以后印军就在东段进攻。他们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我们的方针是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也不超过,我们打算和他们谈判。”

金日成了解了事实真相,就告知赫鲁晓夫中国愿意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尼赫鲁通过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情况,更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软弱可欺,10月12日公然叫嚷要动手了!



“打出 30 年的和平”

周恩来认为形势到了关键时刻，连日协助毛泽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策略。周恩来和陈毅介绍外交斗争情况后，毛泽东特别欣赏周恩来发表的极有见地的意见，霍然站起作出决策：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 30 年的和平！”

周恩来深受鼓舞，夜以继日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巧妙的兵力部署，在印度扩张主义者 1962 年 10 月 20 日凌晨对我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周恩来下令进行自卫反击。

10 月 22 日，亲自坐镇指挥的周恩来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取得的巨大胜利的消息，从北京打电话报告在泉城济南视察的毛泽东：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建立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七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指示暂时不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 20 里。

周恩来认为这是高明之举，24 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三项建议，呼吁各自后撤 20 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



行两国总理会谈。

11月3日，锡兰驻华大使拜会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战况，周恩来如实相告：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两年来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已被清除，其中一部分是被我打退的，另一部分是印度自己撤退的。

中国虽然打了胜仗，却以平等友好的态度致函尼赫鲁，诚心诚意地强调这次边境冲突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为了迅速地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奉劝尼赫鲁接受中国政府10月24日提出的公平合理的三项建议。

但是，周恩来不断得到准确情报，获悉印度政府正在进行战争动员，继续向中印边界增兵，就在9日出席柬埔寨驻华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出警告说：

“看来，印度方面拟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能在武力面前屈服，但是我们主张以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使周恩来气愤的是尼赫鲁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下，粗暴地拒绝了周恩来的三项建议，从11月14日开始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歼灭印军王牌第七旅，尼赫鲁急忙向美苏两国求



救。肯尼迪派美国航母气势汹汹开往孟加拉湾，赫鲁晓夫紧急向印度调运军事装备，尼赫鲁才又稳住神儿，叫嚷要不惜以一切代价打败中国。

周恩来立刻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协商应付之策。毛泽东掸掉手中已吸一半的香烟的烟灰，朗声笑道：“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周恩来面带倦容报告严重的敌情：“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两个师部、9个旅，武装挑衅也是愈演愈烈了。”

周恩来与毛泽东谈到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叛卖行径，毛泽东连声冷笑道：“老朋友的情面一点儿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恩来说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开到孟加拉湾，中国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还要防止肯尼迪在中国背后插上一刀，毛泽东认为必须认真对付，周恩来颇有感慨：

“尼赫鲁刚伸出手来，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的！”

毛泽东提起赫鲁晓夫就生气：“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吗？”

周恩来揭穿尼赫鲁的老底：“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才壮起来了！”



毛泽东霍然站起：“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恩来讲到印度已争取到不明真相的39个国家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毛泽东朗声大笑道：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周恩来乐观地作出推断：“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最高统帅毛泽东受到最讲实际的周恩来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哲学家的思维得到充分发挥：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声令下，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周恩来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送捷报：“07”和“08”高地相继收复，印度军队全线崩溃，美国航母真的成了“纸老虎”，一改气势汹汹之态而匆忙溜掉。



绿旗示好轰动全球

毛泽东 11 月 17 日在轻快的笑声中询问周恩来：“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虽然极其劳累，但打胜仗后的语调极为轻快：“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 5000 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大加称赞：“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毛泽东就善后方策征求意见，周恩来早有良策：“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可以吗？”

毛泽东兴致勃勃邀请周恩来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两人真可谓不谋而合：“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剑眉一挑，欣然赞同：“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甬路边的石凳上坐下，点上一支香烟吸一口，轻声笑道：“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于是，周恩来 11 月 19 日晚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的时候，发出惊人之言，在世界外交史和军事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



我们看作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约束地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

作为战败国的代办，班纳吉原想即使中国不提出苛刻的条件，也会遭受一顿臭骂，没有想到堂堂中国总理周恩来竟然说出这么一番高姿态的话来，周恩来下面的话更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

“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我已答应去德里，我已去过德里4次，再去时将是第5次了。”

周恩来看印度政府仍然没有响应他的呼吁，就代表中国政府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自即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同时，再次呼吁印度政府举行谈判。

中国政府的声明发表之后，周恩来指示中国前线部队在严密监视印军行动的同时，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详细造册登记，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许多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中国打败了入侵的扩张主义者，自己付出了



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缴获一些战利品来补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不强迫印度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就算是宽宏大量的，中国却让敌手打着绿旗前来认领中方战利品，这倒是世界战争史和外交史上的奇闻！

随着岁月的推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明之举逐渐被人们理解，这是中国具有和平诚意的集中体现，因为世人皆知，打白旗意味着投降，举绿旗则意味着和平。这场战争虽然是印军入侵中国领土挑起的，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两国还是应该友好相处，让对方打绿旗领回被缴物资，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也表明中国无侵略之心的诚意。由此向世界昭示，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边防部队于1963年2月28日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主动撤退计划，不但实现前线停火，而且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

周恩来还周到地发出指示，将已经死亡的印军官兵按照印度的风俗礼仪火化，对负伤的印军俘虏妥善治疗，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发给路费、日用品和衣服，组织被俘的印军高级军官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让他们亲自体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酷爱和平的热诚愿望。

这样做，不少人想不通，周恩来就有针对性地启发中国官兵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领会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从全局和长远观点考虑中印关系，以中印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反击入侵、绿旗示好的壮举立刻轰动全球，周恩来在有利的形势下的高姿态外交，他的高瞻远瞩、一切从大局出发的战略眼光，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印度扩张主义者才不敢再次挑起大规模边界争端，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友好关系得以慢慢恢复。

有的西方记者还算公允地评价道：周恩来对中印关系倾尽了巨大的努力，既竭尽全力发展友好关系，又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他的外交艺术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十一章 巴基斯坦：全天候的朋友

“中国相信你们的善意”

1950年1月5日，巴基斯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21日，中巴正式建交。

当时中巴关系存有重大障碍，因为巴同美国结盟，是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追随美国阻挠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台湾问题上受美国蒙蔽。

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周恩来从1953年12月开始，对巴美谈判军事协定、参加军事集团表



示异议，指出这是直接关系中国的安危问题。

巴总理巴里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1954年2月13日指示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到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周恩来总理，说明巴与美国签署军事协定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绝对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

周恩来欢迎罗查对此做出澄清，也坦诚地指出，巴美军事协定严重损害巴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加深了国际紧张局势。

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巴总理对中国横加攻击，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以德服人，巴里当面认错，这是中巴总理第一次进行私下接触。

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巴参加军事条约和与美签订军事协定，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政府感到不安，但为了友好，我们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

巴里对周恩来的话表示深为理解，摸着大胡子说，巴基斯坦人民曾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宰割，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与美国签订军事协定不是针对中国的。还拍着胸脯保证，他这些话可以公诸于众。

两天后，周恩来4月23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特别提及此事说：

“前天中午我曾去拜访巴基斯坦总理。他对我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这样，



我们就取得了互相的谅解。巴基斯坦总理还保证说，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美国发动世界大战，巴基斯坦将不参加，正如在朝鲜战争中巴基斯坦和印度并未参加一样。我很感谢巴基斯坦总理所做的解释，因为那使我们彼此得到了谅解，使我们知道这个条约并不妨碍我们为集体和平而进行合作和达成协议。我想巴基斯坦总理不会反对我的这个意见。”

这时，巴里手抚大胡子站了起来，各国代表都把视线转了过去，只见他一脸庄重神情，联想到他前几天在会上的反华讲话，人们都以为他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又要大放厥词。

只见巴里一本正经开口说：“中国总理说的是真话，对上述保证，我欣然确认。”

刹那间，亚非会议大厅里响起春雷般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要替巴基斯坦总理做点解释……”

从此，巴里和周恩来交上了朋友，巴里选派巴著名外交官阿哈默德为驻华大使，周总理 1955 年 5 月 21 日接见他时说：

“在万隆，我曾同巴里总理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友好的。中国不隐讳对美巴、土巴军事协定和马尼拉条约的担心。中国担心的



倒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别国发动战争后把巴基斯坦拖进去。”

阿哈默德着急地分辩说：“巴里总理已经向总理阁下做出口头保证……”

周恩来双臂交叉相抱，坦诚地说：“巴里总理的口头保证我们是相信的。我们两国应该发展友好关系，来阻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对于军事协定，特别是马尼拉条约的担心并没有减少。”

为说服巴基斯坦退出侵略集团，周恩来1956年1月4日在中南海接见阿哈默德，语重心长说：

不论巴基斯坦、印度或是中国，都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灾害，这种灾害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分裂。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总是要分裂东方国家，例如荷兰还占着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葡萄牙还占着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英国还占着香港，美国还占着台湾。西方国家也想尽办法使朝鲜和越南不能统一，又在东南亚拖了三个国家参加马尼拉条约，在中近东组织巴格达集团使阿拉伯国家分裂为二。这一切都说明西方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我们几百年来受这种政策的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完。

阿哈默德听得津津有味，觉得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便请中国帮助把克什米尔划归巴基斯坦所有。

克什米尔面积19万平方公里，1947年印巴分治后归属未定，双方为争



夺它曾发生冲突，1948、1949年联合国先后曾通过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周恩来回答说：

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我们东方国家，应该和平相处才好。克什米尔问题如果根据克什米尔人民的意志，经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不必如此紧张。

当时，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很紧张，巴新任总理苏拉瓦底1956年10月18日应邀访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会见，又亲自出席招待宴会，周恩来与他进行了4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等问题畅所欲言。苏拉瓦底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称赞新中国生气勃勃，气象日新。

周恩来谦逊地说，如果中国有什么地方值得邻国称赞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苏拉瓦底称赞中国是巴基斯坦的榜样，周恩来表示感谢说，巴也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国与国之间，当然总是要寻求友好，但是也要寻求善意的帮助和批评。我们不但高兴听到邻国和友好国家的称赞，同时更需要他们的了解和批评。

苏拉瓦底总理表明心迹道，巴基斯坦没有侵略野心，对中国没有恐惧，两国没有利害冲突，希望同中国友好，愿意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不怕



英美因此而生气！

周恩来身向前倾，耐心地说服巴基斯坦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道：

“民族主义国家想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要求独立的经济发展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对此，我们是赞成的，但是美国并不这样，杜勒斯就公开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参加两个军事条约，我们还是对巴友好，因为中国相信你苏拉瓦底多次与美苏打交道，受尽了大国的欺凌，他见周恩来如此平等待人，深受感动说：“总理阁下，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小国总理竟能与大国总理像朋友一样交谈，以友好谅解的精神交换意见，这才是真朋友！”

为巴国青年画家当模特

1956年12月20日，周恩来应邀对巴进行10天友好访问，他在欢迎宴会上很动感情地说：“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我们两国早在第五世纪就开始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高僧为了寻求知识，法显和玄奘先后来访从你们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文化。早在第六世纪，中国学者们就怀着钦佩和尊敬的心情著文介绍白沙瓦情况。”

周恩来在达卡接受巴方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出席20万人的欢迎会，与巴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中巴关系日趋改善的情况下，巴政府1962年1月向中国送来关于军事条约组织的书面谅解。1963年3月，巴外长布托来华签订《中巴边界协定》，兴致勃勃告诉中国，由于巴的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已经失灵，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会见布托，共同为取得的胜利纵情畅谈，互致庆贺。

1964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访巴，受到首都拉瓦尔品第成千上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天，巴首都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巴政府做出特殊安排，所有学生都走出学校，全体机关停止办公，都到机场欢迎中国总理。

巴总统阿尤布·汗1958年执政后禁止政党活动受到各方面压力，被迫实行介乎军法管制和总统制之间的统治方式，对如何稳定政局颇感费力，在私下会谈中向中国总理求教，周恩来友好地出谋划策道：

“要保证一个国家的独立，第一是要掌握军队，第二是要在政府和党内有个领导核心，第三就是要依靠人民，团结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外国干涉就不怕了！”

阿尤布恍然大悟笑道：“怪不得周总理阁下威望这么高，原因在这里——我们的小伙子想同阁下谈谈，不知阁下有时间吗？”

“有时间，我很愿意同贵国青年见面！”

于是，周恩来愉快地同巴基斯坦文艺界青年见面座谈，称赞巴基斯坦具



有悠久的历史，是人类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巴境内。

突然，周恩来发现一个巴基斯坦青年在纸上飞快地画个不停，就笑着问：“你在画什么？”

“正在给您画像。”

“那好，拿来我看看。”

巴基斯坦青年画家有点儿不好意思，添上几笔才小心翼翼地递了过来，周恩来接过来一看笑了：“不错，还挺像！”

巴基斯坦小伙子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胆子大了起来，灵机一动，又提出要求说：

“我想请您坐在这张沙发上，为您画一张正面的肖像，你同意吗？”

周恩来欣然同意：“那好，我也当一回模特儿！”

巴基斯坦画家高兴万分，面对周恩来飞快地画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和蔼而潇洒的周恩来搬在了画纸上，那小伙子暗想：“不行，还得再画一张，不然没法分！”便希望再画一张，周总理点头同意，刹那间更出色的一张肖像画就，双手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画得如此逼真，掏出笔签上名说：“你画得很好，这张我签上名字，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巴基斯坦青年将此视为珍宝、仔细收藏。

周恩来一行乘飞机来到东巴首府达卡，由布托外长陪同，在达卡附近的希塔拉卡雅河上泛舟游览，河两岸民众倾巢而出，四面八方涌来热烈欢迎，欢呼声震荡沿河两岸，可谓盛况空前。

阿尤布总统风度翩翩，亲自陪同周总理出席记者招待会，征得巴总统的同意，周恩来宣布了令记者极感兴趣的消息：阿尤布总统多次向他说明，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巴不参加侵略战争，阿尤布总统执政以来所参加的许多国际活动，他执行的对华友好政策，证明了他的解释是真诚的，可信的。对周总理的讲话，阿尤布带头鼓掌，走上前与周恩来热烈握手，一时掌声四起，被传为佳话。

印度对巴基斯坦不宣而战

1965年9月6日，印度在美苏支持下，大举入侵巴基斯坦，发动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

9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印度发动侵略战争，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这一扩大侵略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同日下午，周恩来先后接见巴民航主席阿斯加·汗和巴驻华大使罗查，



对巴进行反侵略战争表示坚决支持。

9月9日晚，中国以最强阵容出席朝鲜驻华代办郑风稟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全都露面，不仅是对兄弟国家朝鲜的尊重，也预示着中国将有重大外交举措。

果然，周恩来以凌然正气发表义正词严的演说，立即震动了全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好像印巴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印度的侵略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联合起来利用联合国，一股劲地呼吁不分是非的和平。这是骗不了人的！”

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把自己打扮成“正义力量的化身”，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剥下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画皮说：“印度是侵略者，无论是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中，或者是印巴的全面冲突中，印度都是赤裸裸的侵略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毫不动摇地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权的斗争，严厉谴责印度的侵略行为，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扩大侵略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中外记者见中国采取了几年来少见的外交行动，都引起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头等重要新闻发往全世界。周恩来以更威严的神态，将矛头指向美国：



“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用尽种种手段，压迫巴基斯坦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正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实是清楚的，没有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印度不可能采取这样严重的军事冒险行动！”

在中国总理的严厉谴责下，美国记者也自觉脸上无光，无可奈何低下了头，苏联记者却趾高气扬，幸灾乐祸，周恩来犀利的目光洞察秋毫，又放出重型炮弹：

“在这当中，苏联人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反复说什么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公开鼓励印度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吗？”

当时巴基斯坦面临灭顶之灾，承受着美苏印的巨大压力，出席招待会的巴驻华大使罗查激情满怀，满含热泪同刘少奇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紧紧握手，大声称赞：

“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可靠朋友！”

中国见巴基斯坦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便继续给予巨大支持。9月29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亲自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说：“巴基斯坦是受害者，印度是侵略者，这是事实。最近印度军队继续在拉合尔地区发动进攻。我们不希望事态扩大，我们希望印度方面



有所约束。如果事态扩大，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要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巴基斯坦支持，这是肯定的。”

陈毅向印度扩张主义者发出警告：

“不要仗着美国、苏联的支持，就企图为所欲为，这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希望它有所觉悟。”

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头脑发热，在美苏支持下向巴基斯坦发动进攻后，又利用锡金的保护国地位，派兵越过中锡边境侵入中国境内设置工事，进行骚扰。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 1965 年 9 月 6 日发表严正声明：

“印度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是关系到它的所有邻国的。既然印度政府跨上了侵略巴基斯坦的第一步，它就不能逃脱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中国政府声明还指出，“在中锡边界，印度还盘踞着中国的领土未退”，要求印度撤出入侵的军队，印度却在复照中矢口否认。9 月 16 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政府进行交涉，提出强硬要求：“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 3 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扩张主义者也是欺软怕硬，回想起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教训，只好承认在中国境内设有工事，表示有解决问题的意愿。

中国政府本着有理有节的原则，把3天期限延长到1965年9月22日午夜12时。印度扩张主义者无奈，在9月21日便把中锡边境中国境内的印度军队全部撤走，工事也予以平毁。

印度扩张主义者不甘心失败，又以实现东巴人民的民族愿望和使东巴难民返回家园为借口，1971年11月21日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破坏了南亚次大陆的和平，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不安和震惊。巴驻华大使凯瑟11月24日紧急拜会周恩来，递交叶海亚·汗总统的求援信，周恩来对这几天印度在东巴边境的军事挑衅表示关切。

印度有苏联撑腰，不理中国的严正要求，反而于12月3日向巴发动全面进攻，巴基斯坦再次面临危急存亡险关，一面奋勇反击，一面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但巴基斯坦军事上不是印度的对手，外交上也困难重重，巴基斯坦只得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大声疾呼，仗义执言。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受周恩来之命，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

“中国主张联合国必须做到：（一）严厉谴责印度对巴的侵略，彻底揭露苏联对印度侵略者的可耻支持；（二）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巴政府和人民反击印度侵略的正义斗争；（三）要求印度政府把它的武装部队和它派



遣的武装人员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巴领土,巴政府为进行反击而进入印度领土的武装部队也撤出来;〔四〕在双方武装力量撤出对方领土的基础上,要求印巴双方立即停火;〔五〕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印巴边界各自后撤,脱离接触,为和平解决印巴争端创造条件。”

中国联合广大中小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印巴双方立即停火并把军队撤回本国领土的提案,苏联却动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权,无理予以否决,这激怒了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终于在1971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以104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上述提案,要求双方停火撤军。

印度对此毫不理睬,大军直指东巴首府达卡,苏联又应印度要求,第三次否决要求印巴停火撤军的方案,掩护印军攻下达卡。

12月16日,巴军在东巴向印军投降,中国政府同日发表原则性声明说:“印巴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反侵略、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的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这样做,而且将继续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布托向周恩来求教治国方略

12月20日,布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就任巴基斯坦总统。



布托上任初期困难重重：东巴肢解而威信大损，失掉东巴经济实力顿减。为支持布托度过难关，周总理邀请他访华，布托上任不到一个月便来北京访问。

布托虚心向周恩来求教经济治国方策，中国总理根据巴基斯坦的实际情况，帮布托出主意说：

“如果在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这有好处，例如可以搞些小的钢厂，可以在地方上生产些小农具，这样就不要都由国家来负担了。”

“在过渡时期必须十分谨慎，要不断总结经验。你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首先要使西巴站得住脚，强大起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在国际斗争中要战败的。”

1973年3月27日，周恩来接见布托的特使皮尔扎达时提出建议说：进行改革要有步骤分阶段。如果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进行，打击面太大了，结果把团结面缩小了。这个步骤还是分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有利。不管世界上现在还有多少国家号称“社会主义”，总得分两步走，否则就会出乱子。

布托精明能干、博学多才，在中国大力支持下，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巴基斯坦逐步站稳了脚跟，布托也成为著名政治家。



周恩来发现巴基斯坦这个朋友忠实可靠，又与美中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适合在中美间起桥梁作用。在美国侵越期间，周恩来曾请巴国的阿尤布·汗总统给美国政府“鸿雁传书”，警告美国不得将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和中国。另一位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也曾充当过中美之间的“秘密信使”，巧妙地实施“波罗行动”计划，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会见，导致尼克松访华，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3年10月，巴前任驻美大使希拉利和夫人应邀访华。希拉利是中美秘密接触的经办人之一，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他，深致谢意道：“希拉利先生为中美秘密接触操劳备至，你的保密工作很出色。”

希拉利脸上容光焕发地说：“能为伟大邻邦做一件事，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

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的作用做出总结道：“第一次中美会谈，是巴基斯坦在万隆会议开的头。第二次基辛格和尼克松来华，也是巴基斯坦出了力。在中美关系的缓解方面，巴基斯坦做了大好事，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应邀访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布托，毛泽东和布托紧紧地握手，老态龙钟的病态竟全然消失，代之以和蔼而慈祥的微笑，古铜色的圆脸如同满月，显得那么光亮和健康。



周恩来又偕邓小平与布托会谈。邓小平郑重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超过一个小时，是不是请周总理先谈主要问题？

布托将与周恩来举行为数不多的会谈视为最大的荣幸，请周总理先谈，周恩来虽病势严重，精神却格外抖擞：

“基辛格来华的秘密之行漂亮极了，这是二次大战中美军登陆诺曼底以来第一次成功的保密行动。”

第十二章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

老练的行家

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领导人之一。

敬爱的中国啊，

我的心没有变，

它永远把你怀念……

这首西哈努克亲王作词作曲的歌曲曾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唱一时。

西哈努克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对周恩来有所认识的。

那时，西哈努克对日内瓦会议非常重视，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日内瓦：



一个是由外交部长泰普潘率领的文官代表团，另一个是由高棉皇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涅·刁龙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身为国王的西哈努克不便直接参加辩论，就住在欧洲遥控柬埔寨代表团的的活动，用他的话说是“住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偏僻的地方，通过电话和我的使者们始终保持不断的联系”。

在法国的指使下，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团想给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个下马威，西哈努克也想对周恩来进行试探性接触。

于是，老挝代表冯·萨那尼空一进会场，就指着中国代表团大放厥词：“你们不是好人，也是帝国主义！”

柬埔寨代表也跟上来说对中国代表恶语相加：“中国支持胡志明侵略柬埔寨，也是帝国主义！”

中国代表无端遭到老挝和柬埔寨代表的攻击，都感到很恼火，认为有必要给予迎头痛击，才能维护新中国的尊严。

周恩来急忙挥手制止，认为可能有误会，指示要以博大的政治家胸怀对待邻国的代表，不能上西方别有用心人的当。

周恩来把负责有关问题的王炳南和师哲找来征求意见说：“老挝和柬埔寨人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王炳南和师哲很快友好地请冯·萨那尼空和泰普潘到巴黎市中心花园，观赏法国名花，喝咖啡，谈天说地，气氛相当轻松。



老挝和柬埔寨代表见中国人不像美国人和法国人说得那样青面獠牙，与帝国主义者的欺人嘴脸完全相反，才知道上了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当。周恩来又亲自请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团全体人员吃饭，推心置腹地交谈。

西哈努克由此对中国和周恩来有了好感，指示柬埔寨代表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泰普潘6月20日前往日内瓦万花岭拜会周恩来，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周恩来对柬埔寨代表的积极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亲切地欢迎泰普潘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做客，友好地对他说：

“中国愿意看到柬埔寨成为东南亚新型的国家，像印度、印尼、和缅甸一样，不让西方国家在本国建立威胁别国的军事基地。希望柬埔寨政府对国内的解放运动能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能把这一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做出合理的政治解决。”

21日晚，周恩来首先会见来访的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冯·萨那尼空，表示中国是尽力促成印度支那三国的接近，尊重三国的独立，反对美国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的，然后热情地介绍范文同、泰普潘、冯·萨那尼空三人认识和建立联系，随后请三国代表观看中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打消了印度支那三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巨大障碍，成为印支三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



西哈努克向柬埔寨代表询问对周恩来的印象,泰普潘滔滔不绝地打开话匣子大讲特讲:

“周是个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样把事情讲清楚,怎样去圆满完成他的任务。他说,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国人来说,只要柬埔寨保持独立就够了。不过,别再落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如果你们能够保持独立,我们就支持你们,而且我们就能成为朋友。”

柬埔寨代表团右翼成员桑·萨里不以为然挑拨说:“当然,周恩来毕竟是共产党的代表,因此你得小心点。”

西哈努克一笑置之。他相信泰普潘的详细报告,感到有极大的兴趣,后来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

“周恩来是个老练的行家,他预料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柬埔寨是属于西哈努克的,他邀请了我的代表们在他租赁的日内瓦郊区的宅邸里共进午餐。招待是完美的,烹调是考究的。席间大家开怀畅饮,不断地举杯相互致意。周恩来请狄潘转达他对我的敬意和祝贺。”

西哈努克很快遇到了难题。

那时,苏联和越南都打算牺牲小小的柬埔寨,以换取印度支那的和平与稳定,但西哈努克和宾努首相却主张一切非本国军队都应撤走,越南却不打算从柬埔寨撤走越南军队,苏联支持越南的意见,就与柬埔寨发生了矛



盾。

周恩来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宾努方案有合理之处，反复说服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同意宾努方案中的合理部分，5月27日提出一个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折衷方案，终于促使日内瓦会议达成了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

这样，周恩来很快使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团人员的态度转变过来，把斗争矛头共同指向帝国主义。西哈努克开始对周恩来刮目相看。

“我与周恩来的相识是历史命运的安排”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亲自出马担任团长来到万隆，与周恩来有了直接接触。按照西哈努克的说法是：

“我与周恩来的相识可以说是历史命运的安排。我们初次相遇是在1955年4月于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那次会议上出现了四颗超级明星：东道主苏加诺，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其演讲睿智而又镇定自若；加迈尔·阿布戴尔·纳赛尔，一位热忱勇敢的非洲政治家；再就是周恩来。他比其他三位政治家更富于感召力，他深思熟虑和循循善诱的讲演令人无不为之折服。在我眼中，唯他独具的清醒智慧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

西哈努克感到周恩来是个伟人，可谓“猝然临之而不惊，无幸加之而



不怒”，是个靠得住的朋友，就主动与周恩来接近。他回忆说：

“大会开始后，周恩来是第一个与我接近的人。陪同他的是被称其右臂的陈毅元帅，一位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我们三人一见如故，立刻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谊。我爽快地接受了周恩来共进午餐的邀请，去了周恩来下榻的那幢苏加诺的私人别墅。”

周恩来也很尊敬西哈努克，认为他作为柬埔寨国王，能够在柬埔寨人民武装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毅然做出对他和柬埔寨都有重要影响的决定，进行他所说的“王家独立十字军东征”，到法国、美国、日本、泰国展开外交活动，迫使法国1953年11月9日承认柬埔寨独立，是个具有非凡气概的爱国者。

周恩来让陈毅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主动接近西哈努克，向亲王大力宣传中国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亲自于4月26日宴请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和陈毅陪同西哈努克来到中国代表团的宴会厅，当色香味美的中国菜肴摆在亲王面前的时候，他真觉得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好客的周恩来打开中国著名的茅台酒请亲王品尝中国的佳酿。

喝惯法国酒的西哈努克对中国的烈性酒一下难以适应，但却有极大的兴趣，那种欲喝不能、欲罢不忍的神态，令周恩来和陈毅忍俊不禁。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西哈努克高度赞赏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大会上的讲话，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使柬埔寨这样的小国的主权得到保障，因此柬埔寨对其承认并将切实遵守。

这时，西哈努克对柬埔寨与台湾当局仍然保持领事关系而没有与中国建交，感到有些对不起中国，但周恩来对此一字未提，这使他更为感动。

虽然喝了一些烈性酒，但西哈努克的头脑还十分清醒，为了表达对中国歉意，他主动地向周恩来发出邀请：

“总理阁下，我想请您和陈毅元帅，在今年内对我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不知是否可行？”

周恩来亲切地说明中国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完全取决与西哈努克的考虑，然后慨然答应说：

“谢谢亲王，我和陈毅元帅很乐意到您的国家进行这次访问，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们两国都大有益处。”

周恩来与陈毅交换了一下目光，微微一笑对亲王发出邀请：

“我们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亲王殿下对我国进行一次访问。这次访问，我们认为，安排在我们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比较合适。”

在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小国领导人要到中国进行访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西哈努克像接受这次宴会邀请一样，



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访华邀请，周恩来感到非常高兴。

西哈努克在周恩来面前做出了这个对他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他愉快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必须当心中国人所欣赏的用米酿制的茅台酒。周恩来在私生活上是以严肃刻苦而闻名的，但他又是一位喝了无数茅台酒以后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的很能干的外交家。”

“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毅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西哈努克首次访华

西哈努克不断做出惊人之举：1955 年放弃近 14 年的王位，从国王的宝座上“逊位”，由他的父亲苏拉马里特担任国王，他则组织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主席，出任首相，大力推行和平中立政策，但是却遭到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破坏和阻挠。

西哈努克认定，要保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必须得到周恩来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于是，他不顾美国、英国的阻挠，实现对周恩来做出的诺言访问中国。

1956 年 2 月 14 日，西哈努克率领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到达北京，周



恩来和陈毅对他的到来由衷地高兴，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陪同亲王前往下榻的宾馆，沿途有无数群众向他热情地挥舞鲜花和五颜六色的旗子欢呼。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酒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风度翩翩地致词说：

“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来做侵略基地。在完美的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周恩来的热情讲话使西哈努克脸上泛起红晕，心里非常激动，也感到有愧。

因为在他离开金边之前，英国驻柬埔寨临时代办专门到王宫求见阻止他访华；美国人也暗示威胁，要取消对柬埔寨的所有军事援助，而这又是柬埔寨所急需的，西哈努克考虑再三，发表了这样一个王国政府公报：

“由于柬埔寨的中立地位，不能在使人民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相分裂的冲突中站在任何一方面。这一冲突是构成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至少到中国问题解决以前，柬埔寨应避免考虑任何目的在于外交承认中国的行动。”



周恩来当然看到了这个声明，完全明白西哈努克是在向中国表示，他可以与你握手拥抱，可以同你打交道，但是不在外交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对此，周恩来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仍然热情地与西哈努克共进晚餐，在15日上午的正式会谈中对此只字不提，而对独立不久的柬埔寨推行和平中立政策大加称赞，认为这一政策在东南亚是有影响的，使柬埔寨在亚洲的地位提高了，还指出中国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和技术援助，决不附带任何条件，更不要任何特权，慷慨地表示帮助柬埔寨建设三座大型工厂：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桔井的川龙造纸厂，为柬埔寨打下真正的工业基础，实现在柬埔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柬埔寨人民群众的工业化，西哈努克深受感动。

15日下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前往中南海勤正殿会见毛泽东主席。西哈努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

63岁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他的欢迎之情：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和敬意，西哈努克18日晚来到中南海勤正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



恩来，然后把赠与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戴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签署了中柬联合声明，然后出席毛泽东举办的宴会，庆祝西哈努克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在周恩来大力促进下，中柬同年4月签订了总额为5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6月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提供8亿柬币的物资和商品援助，派专家到柬埔寨进行技术援助，对于当时受到美国压力的柬埔寨是很大很适时的帮助。

消除柬埔寨人对中国的疑虑

“来而不往非礼也”，1956年11月，周恩来应邀访问越南、印度、柬埔寨诸国，22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乘坐飞机到达金边波成东机场，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和桑云首相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一行受到苏拉马里特国王和王后的接见，参观了王宫内的皇家博物馆，当晚出席国王举办的盛大国宴。周恩来致答词，感谢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代表团的令人难忘的盛大欢迎，祝愿中国与柬埔寨两国人民世代代生活在友谊之中。

周恩来与桑云首相进行了友好的会谈，随后在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会



议联席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金边王家医学校、雅亚瓦曼博物馆等文教设施。

接着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坐飞机参观磅湛省橡胶园、橡胶乳加工工厂和暹粒省吴哥古都遗迹。乘车途中，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亲切交谈说：

柬中两国是兄弟国家，在历史上两国已有很久的关系，柬埔寨目前的处境我们很了解。你们所执行的和平、独立和中立政策，非但受到柬埔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而且受到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关系，必然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帮助兄弟国家。

其后，周恩来一行在西哈努克、桑云、宾努等人陪同下，乘船前往渔镇贝昂希腊累访问。途中，针对柬埔寨人对华侨的担心，主动做工作说：

华侨应该同高棉人互相团结，遵守当地法律和制度，尊重当地的风俗和习惯。希望他们尽量加入柬埔寨国籍，为柬埔寨的建设贡献力量。在华侨中间，我们不发展党派组织，因为这样容易引起误会。他们如果要参加，可以回国去参加。已经加入柬埔寨籍的中国人，更不应该参加华侨的同乡会和其他的华侨团体组织。华侨在当地生活，首先应当学会当地的语言，要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好，必须懂得当地的语言。

周恩来的话得到柬埔寨领导人的赞同，他和桑云首相发表联合声明后，



向苏拉马里特国王和王后辞行，前往越南访问。

在此之后，周恩来密切地注视着中柬关系的发展，看到西哈努克对与中国建交仍然有顾虑，就全力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关系，从而在世界上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榜样：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而且可以互相合作。这样，慢慢消除了柬埔寨人对北方巨大邻国的疑虑。

这时，美国开始侵略印度支那，周恩来坚决反对美国支持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上丁省，使柬埔寨感到周恩来和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1958年7月初，柬埔寨政府向中国政府发来电报，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称：

“在金边的台湾领事是法国在政权移交时转给柬埔寨的。这个所谓的领事是法国高级专员派遣的，柬埔寨独立后的正式典礼从未邀请过他。”

周恩来看到外交部送来的这份照会，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马上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两人指示外交部加紧做工作。7月17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提出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18日复函西哈努克同意建交，并表示中国决不吝嗇自己的力量支持柬埔寨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于是双方在1958年7月19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发展建交后的中柬关系，周恩来邀请西哈努克8月15日再次访华。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两人天南海北无



所不谈。

周恩来先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帐篷下与西哈努克亲切交谈，然后又陪同亲王前往北戴河再次会见毛泽东，西哈努克是除了赫鲁晓夫外，能够在一次来访中多次会见毛泽东的人，西哈努克为此感到万分骄傲。

周恩来还带西哈努克参观了中国第一座试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对这种保密性极强的项目的参观，表明中国政府和周恩来对西哈努克极其信任。

1958年，周恩来又根据柬埔寨的实际情况，指示援建了贡布省的乍格雷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马德望省的第二纺织厂。

一支身著素服的外交队伍

1960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访问亚洲诸国，按原计划离开印度前往柬埔寨的时候，突然传来柬埔寨国王驾崩的消息，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都感到十分沉痛，都在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是否还应当如期访问。

周恩来眉头紧锁慎重思考，觉得在西哈努克内有丧父之哀、外有美国压力的情况下，应该如期访问以示支持，便果断地做出访问柬埔寨计划不变



的决定，在印度找裁缝为代表团成员每人赶做了丧服两套。

5月5日上午9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金边机场。当周恩来一身素装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西哈努克亲王、福·波伦首相以及所有的柬埔寨人和外国记者都惊呆了，无不以吃惊的目光射向中国总理。

只见周恩来一身皆白，神情庄重地走下舷梯；陈毅外长身着白衣更显得潇洒严肃，紧跟在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身穿素服从机舱里相随而下：真正是世界上一支独特的外交队伍。

亲王见此情景，激动得眼中流出泪水，一个箭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向西哈努克首先致哀悼之意，说明中国代表团是来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的。

西哈努克身穿黑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西装翻领上绷着一条小小的黑纱。他热泪盈眶地说，感谢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在他最悲痛的时刻，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给了他最真诚、最难忘的胜似兄弟的友情，他和柬埔寨人民都终身难忘，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

“周总理，谢谢你！”

西哈努克告诉中国贵宾，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柬埔寨政府已经决定中止悼念活动，等中国贵宾访问之后再继续进行悼念活动。



周恩来抬头一看，果然见波成东机场歌声阵阵，中柬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喜气洋洋的金边市民手持彩旗、鲜艳的花束站在停机坪前，柬埔寨漂亮的民族服装和人们手中的美丽的鲜花在阳光下灿烂生辉。整个金边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从波成东机场前往周恩来下榻的柬埔寨王宫的路上，周恩来见金边市民高举中柬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大幅半身画像，满含深情地挥舞彩绸花束，舞狮舞龙，锣鼓喧天，高呼欢迎口号，气氛极其热烈，场面非常感人。

在宾馆稍事休息后，周恩来立即前往金边桑园别墅拜会西哈努克亲王，对他表示慰问，恳切地希望他节哀。在取得西哈努克的同意后，中国代表团一行前往王宫银殿，在苏拉马里特先王遗体脚下安放了两个巨大的花篮，举哀祭奠，然后来到国王御座宝殿拜会王后，对她进行慰问，又会见摄政委员会成员。

周恩来一行在西哈努克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访问，乘柬埔寨皇家海军的巡逻舰游览风景秀丽的白马湾、戈公岛和富国岛等地，都受到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在磅湛等地，热情的群众把周恩来包围得水泄不通，纷纷把花环套在周恩来的脖子上，不一会儿，周恩来身上就落满了鲜花，但鲜花仍像飞扬的雪片纷纷降落。

周恩来和陈毅与西哈努克进行了亲切的会谈。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



1955 年他让出柬埔寨王位的时候曾经声明不再当国王，但是现在国王驾崩，作为王国没有国王不行，因此想把柬埔寨的最高领袖改称国家元首，就此征求中国的意见，周恩来和陈毅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周恩来一行又应邀前往被称为“东方四大奇迹”的吴哥一游，逗留于美丽的巴莱湖畔，参观了吴哥城、吴哥寺和女王宫，对其建筑之奇巧别致、雕刻之细腻优美，赞不绝口，连称饱了眼福。

访问柬埔寨的 5 天，正赶上柬埔寨 40 年来最热的天气，周恩来、陈毅挥汗如雨，然而中柬人民的友谊比天气更热，他们以辛勤的汗水促进中柬友谊迅猛发展。

中柬领导人像走亲戚一样来往频繁，西哈努克 1960 年 12 月 15 日再次来华访问。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主要商谈了中国原来援助柬埔寨的四个项目要求增加设备、建设钢铁厂和机械厂需签订具体协议、修建铁路的技术帮助等问题，签订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前往南京、杭州等地参观访问，共同晋谒中山陵，游览明孝陵、玄武湖，泛舟西湖，登上钱塘江上的六和塔，观赏钱塘江大桥和渔舟江景，聚宴楼外楼，结下深厚的友情。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游览途中，就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周恩来就联合国问题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



我们是赞成联合国和支持联合国的，我们在万隆会议上也支持过联合国，因为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有消极的方面，那就是美国控制了多数表决机器，所以我们主张老挝问题应该采取日内瓦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联合国，而是因为美国还能操纵联合国。

西哈努克受到周恩来的启发，在国际上提出了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和许多国家的赞同，最终导致1962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得以胜利召开。中柬两国密切合作，促使老挝问题得到解决。周恩来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时热情地赞扬说：

“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能够开成，要归功于老挝人民的努力，同时也归功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没有他倡议，14国就无法会面，会也开不成，所以我主张一定要等亲王到达并请他主持开幕，这是很合理的。老挝三亲王会面也是不容易的事，最后促进苏黎世会谈成功，这也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努力。”

西哈努克被废黜后

然而，西哈努克亲王与周恩来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美国策动朗诺集团1970年3月18日发动政变废黜了西哈努克。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柬埔寨发动政变的消



息告诉他，而把西哈努克当作包袱推给中国，将其送往北京。

3月18日深夜，周恩来处理完全国各地、各部门报来的急件之后，习惯地打开那个装国际急件的蓝色文件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特急电立刻映入眼帘：

“金边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国民议会废黜。”

周恩来一惊，急忙把外交部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干部请来了解详情，又问近况：“西哈努克本人现在是否确实离开了莫斯科？”

外交部主管干部情况掌握得很好：“根据我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我国大使亲自去机场参加了送行。按预定计划，飞机在伊尔库茨克要作短暂停留，然后直飞北京。预计在明天中午11点钟到达。”

周恩来紧接着问道：“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确知他已经被废黜了？”

得到的回答令人焦虑：“苏联柯西金总理已经把消息告诉亲王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他把消息又传给了柬埔寨驻莫斯科的人员。”

周恩来迅速赶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的这种废黜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

周恩来欣然赞同，拿出自己的意见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准备拟定几个方案，但关键要取决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态度……”



毛泽东随即道出关键之语：“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当西哈努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不仅中国领导人全部出动，而且红地毯，21响礼炮，三军仪仗队，41个国家驻北京使团如此整齐地前来欢迎，这种规格他还是首次经历。

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第一个到舷梯旁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拥抱，两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向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

西哈努克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连声道谢，周恩来大声宣告：

“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然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说完，周恩来让西哈努克亲王依次与中国官员及各国外交官会面握手。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汽车一开动，周恩来就问：“我昨晚与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应声而答：“我准备进行战斗，战斗到底！”

周恩来清瘦的脸上显出欣慰的笑容，周到地交代说：“那么，我们就



全力支援您，但请您再考虑 24 小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前途是漫长而险峻的，会有挫折出现。”

西哈努克略为沉吟后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所有高棉爱国者的想法。他们一定会跟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战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傀儡！”

这时，西哈努克想把他的抵抗政府中心设在北京，但是又担心中国拒绝，中国外交部官员给周恩来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周恩来把手中的铅笔扔到办公桌上微笑着说：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的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礼遇方面，要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外交部同志报告：“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 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



外交部同志领命而去的时候，周恩来又将其叫回吩咐说：“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赶到钓鱼台国宾馆看望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早在门口迎接，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

周恩来真诚地说：“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只要是你们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努力给以保障。”

为营造亲切的气氛，周恩来有意重提1960年他和陈毅访问柬埔寨在哥沙曼王后那里进高棉式早餐的时候，居然把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说他和毛主席商量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他们使用，详细地交代说：

“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责，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车队。至于工作人员嘛，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比如临时的文书，一旦您物色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周恩来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特



别告诉亲王说：“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问题，是你们的内政，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暂时把中国当作您的第二个家吧！”

3月28日，周恩来再次看望西哈努克，告诉他说朝鲜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事业，但是西哈努克忧心忡忡说：

“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谢桑告诉我，苏联现在态度非常谨慎，不少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看苏联的眼色行事。”

周恩来劝说道：“苏联一直是这样，现在不仅对柬埔寨如此，对越南也如此。将来印度支那三国发表声明，苏联将很尴尬，它不得不考虑一下。”

1970年5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城楼，更显得分外雄伟壮丽，周恩来把西哈努克带上来与毛泽东会见。

西哈努克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热烈握手，毛泽东高兴地与亲王第三次见面，一张口就与众不同：

“我宁愿同像你一样的爱国亲王握手。而不愿同自称为‘人民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

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致谢，毛泽东幽默地说西哈努克“有资格当一个共产



党员”，毛泽东、周恩来都劝西哈努克提高勇气，充满信心。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周恩来建议西哈努克发表坚持斗争的讲话，热情地鼓励说：

“亲王向柬埔寨人民的讲话稿，有强大的号召力，相信柬埔寨人民听到亲王的声音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鼓舞，会决心支持亲王直到胜利回国。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

西哈努克激动得热泪盈眶，慷慨激昂地表示：“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要坚持斗争。长期的斗争也好，有很多困难也好，我决不后退！”

周恩来特意用陈毅 1964 年访问柬埔寨的时候写的诗相赠：

勇哉柬埔寨，独立天地间。

复国反法帝，坚心拒美援。

和平树功业，建设战艰难。

声誉日洋溢，人民意志坚。

1970 年 5 月 5 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周恩来当天就前往西哈努克住地，代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向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向该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及其政府在北京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面交由他署名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周恩来激情满怀地宣告：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并从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说着容易做着难，为了使中国驻金边机构和人员顺利地撤回来，周恩来亲自与外交部同志商谈克服柬埔寨政变当局阻挠的方案，从中选出阻力最小的方案：由新华社先发消息，揭露柬埔寨政变当局的罪行，然后再让原柬方驻华使馆人员先走，我方人员后回，从而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克服柬埔寨政变给中国外交带来的不利影响，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周恩来5月中旬先召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接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一项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民族团结政府，同时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请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引起全世界重大反响的声明。

周恩来又专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声明稿，一致认为应该突出毛泽东5月11日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批示照办。

5月19日晚，周恩来再次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受毛泽东的委托告诉西哈努克说：



明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将发表一项声明，支持亲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毛主席的声明很短，他托我把声明拿来给亲王看，征求亲王对这一声明的意见。

周恩来说着，把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法文译本拿给西哈努克亲王看，并进一步做出说明：

“我们还打算在 21 日举行群众大会，先从北京开始，然后在其他城市普遍举行。群众集会将在天安门举行。在大会上，首先宣读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然后请亲王讲话。”

对此，西哈努克完全赞成。

5 月 21 日的天安门广场聚集了 100 多万群众，红旗飘动，口号声欢呼声惊地震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西哈努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西哈努克眼见着排山倒海的人潮和毛泽东声明产生的巨大影响，激动得热泪盈眶。患难见真情啊，毛泽东、周恩来给他以巨大的鼓舞，他感到有了依靠。

一年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秘密访华，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前夕的 12 日会见西哈努克，开门见山地告诉亲王说，中国准备与美国改善关系，基辛格博士已对中国举行了秘密访问，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来华访问。



西哈努克一下惊呆了，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可是，我们的抵抗运动和民族团结政府……”

周恩来对此完全理解，耐心地解释说：

“请亲王放心，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您所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支持。”

西哈努克仍然频频大摇其头，不解地问：

“那么，你怎么可能在同美国谈判的同时，又重申支持我们的斗争呢？”

周恩来对此早有估计，不急不躁地说明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对印度支那的影响：

“我们中国人民与你们印度支那人民将团结一致。美国同我们之间的大问题是台湾，不过在台湾还没有战争，而在印度支那，现在是战火熊熊，你们的人民还在遭受痛苦。只要我们能为消除这种痛苦做出贡献，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工作，西哈努克对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理解，周恩来便利用中美关系的改善推进美国与柬埔寨的关系，问西哈努克是否有兴趣在中国会见美国人。

这自然是西哈努克欢迎的事情：“我当然愿意同美国人谈谈柬埔寨问



题，解决柬埔寨与美国的争端。如果周总理能提供这种机会，我将不胜感激。”

周恩来非常愿意给好邻居帮忙：“我一定会向美国方面转达亲王的意见，促成尼克松或基辛格直接与亲王见面。”

周恩来说到做到，基辛格两次来华、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恩来都主动建议他们会见西哈努克，但均被美国方面找借口拒绝。

1973年4月13日，对周恩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

这一天，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西哈努克结束对柬解放区的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便决定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请邓小平一同作陪，这两件事都很令人振奋。

周恩来为这个有600人参加的宴会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中国的军乐队非常熟练地演奏起西哈努克写的《歌唱你，中国》：啊，敬爱的中国啊，

我的心没有变，

它永远把您怀念！

啊，亲爱的朋友，

我们高棉人民哪，

有了您的支持，



就把忧愁驱散。
您是一个大国，
毫不自私傲慢，
待人谦逊有礼，
不论大小，平等相待。
您捍卫各国人民（的）
自由、独立、平等，
维护人类和平。
啊，柬埔寨人民
是您永恒（的）朋友！

这使西哈努克感到惊喜，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

周恩来看西哈努克那副惊喜的神情，也停止进餐，和着乐曲哼了起来。

不久，敏感的周恩来发现西哈努克情绪消沉，急忙关切地细问根源。

原来，西哈努克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哥沙曼王后长期作为柬埔寨王国君主的象征，在柬埔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又长期担任柬埔寨皇家芭蕾舞剧院院长，为保存和发展柬埔寨古典舞蹈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柬埔寨政变后，哥沙曼王后被软禁在金边，因为思念儿子郁闷成疾。西哈努克得此消息着急万分，但是却束手无策。



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利用中国和他本人的崇高国际影响，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联系，终于有了办法。1973年10月17日，周恩来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的时候，满面春风地告诉他们说：

“告诉亲王一个好消息，尼克松总统同意我们提出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意让法国飞机去金边接哥沙曼王后。”

西哈努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流下两行热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哥沙曼王后终于在1973年11月被接到北京，与西哈努克团聚，王后在中国度过了她一生的最后岁月，亲眼看到1974年柬埔寨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才于4月27日在北京逝世。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忠告柬埔寨

1975年8月26日，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身在305医院会见他一生的最后第二批客人：西哈努克、宾努和乔森潘，满含深情地简要回顾了柬埔寨人民几年来的战斗历程，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说：

你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希望柬埔寨人民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自己的祖国。

当时，周恩来已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由于呼吸不畅，每说几个字就要略作停顿，但是却望着乔森潘，提出真正负责的忠告：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们带来灾难。”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下来，在护士的帮助下吃了几粒药片，擦一把前额的汗珠，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最后，周恩来深切感谢柬埔寨朋友来医院看望他，特别表示因为健康的原因，不能参加西哈努克和宾努两亲王的告别活动，也不能为两亲王和柬埔寨代表团送行了，深感遗憾。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他们的最后一面。



周恩来没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回金边就被软禁于王宫；

乔森潘没有想到，周恩来竟然真的看准了柬埔寨的历史路程；

西哈努克没有想到，四个多月后周恩来溘然长逝，他向波尔布特提出准许他前往北京，向他最忠实的朋友致以最后的敬意，但却没有得到批准而被软禁在皇宫里。

第十三章 民间外交打开局面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在 50 年代，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是民间外交极为活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民间外交，对于已建交的国家来说，可以配合政府外交的进行；对于未建交国家来说，可以帮助推动政府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民间外交给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建立各种民间关系，特别是外贸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并对我进行封锁和禁运，因此，政府间往来不可能进行，民间外交就占有更重要地位。

1951 年 10 月，中国 4 个代表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筹备会议。次年 4 月，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南汉宸、雷



任民率中国代表团与会。

中国代表团出发前，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接触，磋商在亚洲如何发展国际贸易、推行国际合作、巩固亚洲和平问题。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立即表示同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奉周恩来指示在国际经济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美国企图依靠对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封锁、禁运，来达到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转嫁经济危机的可耻目的。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外国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根据中国等国代表的建议，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汉宸、冀朝鼎当选为委员。

会议期间，中国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的工商界人士签订了贸易协议，还同出席会议的日本“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理事长宫腰喜助、中日贸易促进会代表帆足计、绿风会女参议员高良富进行了接触，经周恩来批准，南汉宸邀请三个日本代表访华。三人毅然决定应邀访华，成了首批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

1952年5月15日，杨柳新绿，春色宜人，高良富3人乘伊尔14小型飞机到达北京西苑机场，冀朝鼎等到机场欢迎。冀朝鼎用流利的英语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情，在来新中国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宾主共同住在北京西城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同吃、同住、同活动，“三同式”的家庭味十足的生活使彼此很快熟悉起来。中国厨师做的水晶猪蹄尤为客人所称道，说它妙在既非肉，也非油，味道美极了！

经友好商谈，签订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虽然总金额不过3000万英镑，但双方代表却知道它来之不易，很珍惜这难能可贵的第一次交往，珍惜刚刚建立起来的微细联系通道，大家热烈握手，共祝中日第一次民间贸易成功。

中日民间贸易谈判一炮打响，中国又满怀信心地在北京筹备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中国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联名邀请亚太区域各国和平人士共同发起，筹备会在北京饭店大餐厅隆重举行，正面墙上挂着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和平鸽，各国代表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在热烈友好、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商定“亚太和会”的宗旨、会议时间和邀请的国家、团体及有关事项，日本朋友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三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还决定向日本有关团体发出正式邀请，请他们筹组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亚太和会”的正式大会。



区别“日本朋友”和“日本鬼子”

“亚太和会”筹委会开罢，组织各国代表到湖北参观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湖北老乡听说外宾中竟有“日本鬼子”，当年遭受日寇屠杀的家属怒火满腔，举起石块要狠狠投去，陪同人员忙上前拦阻，劝告说：

“周总理反复强调，日本人民在侵略战争中也是受害者，责任不在他们身上。”

经耐心说服，当地群众未再闹事，但却不敢和住在野外军用帐篷里露营的外国代表接触，高良富女士举起随身携带的“傻瓜照相机”，想为当地群众摄影留念，吓得湖北老乡四散逃避，一个高个妇女尖声叫道：

“小心上了间谍的当，这个照相机不但能照前边，说不定身后的人也能照进去！”

高良富女士听了哭笑不得，经陪同人员好意解释，才表示谅解，工作人员将此事向毛泽东、周恩来做了汇报。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

“要注意教育群众，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分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

为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事民间外交的自觉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周恩来反复告诫中国代表说：



“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新条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国和战后要求和平的日本。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国才有资格和日本谈友好，也只有战后的日本才有资格和中国友好，因为战后的日本已经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它已经失掉了殖民地。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才能真正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周恩来又强调说：“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美国害怕“亚太和平会议”产生巨大影响，千方百计阻止各国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

日本各界人士组成了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大60人的大型代表团，大张旗鼓举行“结团式”准备启程来华，但日本政府却拒绝签证。

困难吓不倒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代表团副团长，“前进座”歌舞伎著名演员中村翫右卫门，代表团副秘书长、工会活动家龟田东伍，不畏艰险，驾一叶小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出港，在海上颠簸漂流数日，九死一生到达中国；一桥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南博经第三国统道来到北京，住在内部招待所。

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到达中国，参加1952年10月2日至13日举行的“亚太和会”大会，一致谴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提出了制止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进行侵略战争的任务，决定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总部设在北京，选举宋庆龄为主席，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等11项文件，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反动政府对来华人员大兴问罪之师，龟田东伍参加完会议后无法回国，只好长驻北京，任“亚太和会”副秘书长。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周恩来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此曾作精辟论述：

“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

周恩来很快找到了推动中日关系的大好机会：遣返日侨。

早在1950年夏天，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出席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议时，遇到了日本红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

李德全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建国后任卫生部长，具有丰富的国际



斗争经验，她知道岛津忠承同日本皇后良子来往密切，因为良子皇后兼任日本红十字社名誉会长，岛津在日本政界有一定影响，便主动与岛津接触。岛津忠承受日本侨民家属委托，非常高兴会见李德全，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告知在华日侨情况。

李德全回国后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又不断向周总理报告日本红十字社的要求，于是，周恩来指示在北京对日广播中发布一条新闻：

在中国约有3万名日本侨民，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生活安定，对于希望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愿予以援助。有关具体问题，日本的适当机关或人民团体可派遣代表，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解决。

日本方面如获至宝，经日中友好协会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系，日本红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组成谈判代表团，于1953年1月访问日本政府拒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以廖承志顾问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进行谈判。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谈判，3月5日签署了联合声明，日本于3月开始派“兴安丸”、“高砂丸”、“白山丸”来华，往返于天津、上海和日本的舞鹤之间，共接走日本侨民4万多人，日方也应中方的要求，把一大批热爱祖国的华侨送回中国。

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大谷莹润法师、东京浅草枣寺的菅原惠庆长老和日中



友好协会全国本部的赤津益造、三浦赖子等友好人士到处奔波，收集起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抓到日本的死难劳工遗骨 3000 多具，分 10 批由“兴安丸”送回故土。

这几件事都是战后急迫的善后问题，通过民间外交得到解决对中日人民都是很大的安慰。此后中日民间交往逐渐活跃，1953 年 9 月 28 日，日本议员首次组团直接来华商议贸易问题，周恩来亲切会见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这是他第一次接见日本人士，提出了中日建交原则和民间往来的方式：

“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只要日本同美国一道敌视中国，继续保持同台湾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不可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

周恩来推动中日民间人士频繁互访

1954 年“十一”国庆节前夕，日本国会议员团赴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访问苏联之后，应邀来我国参观访问。他们当中，有中曾根康弘、樱内义雄、园田直、黑田寿男、西村直已等有影响和实力的著名人物，有几人后来当上了首相。



那时中曾根康弘才30多岁，潇洒干练，与园田直被并称为“青年将校”，热心地同中国各方面人物接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年国庆节前，我国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秘书长彭真的名义，致电日本参众两院议长益谷秀次、河井弥八，邀请日本各党派著名人士佐佐木更三、小川平二、宇都宫德马、铃木茂三郎等组团来华访问。

这两个超党派的议员团有40人之多，包括了各党有实力人士，大大超过了日本国会内一个委员会的力量，来中国参加国庆典礼，对中日关系有很大促进。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两个议员代表团，指出对中国的禁运政策阻碍了中日贸易，双方都表示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努力。

周恩来满怀信心地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根据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并不妨碍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签订民间协议。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和外长签字喝香槟酒，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

周恩来的话说得中日双方人员疑虑顿消，信心倍增，大力促成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当时吉田内阁对此百般阻挠，日本



议员朋友向日本国会提出超党派的“关于邀请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在参众两院都予以通过，把吉田内阁搞得狼狈不堪。

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东京，受到日本全民性的热烈欢迎。李德全在日本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中豪杰，在日本各地广泛流传着她领导妇女慰劳总会和“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抗日的故事，归国日侨更念念不忘她促成日侨归国的“大恩大德”，争相一睹这位新中国女卫生部的风采。

副团长廖承志出生在东京，“少受庭训，长而有成”，在日本生活十几年，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与改进党干事长松村谦三等亲切会谈，以他意志坚决而又饶有风趣的外交手法，为打开中日关系僵局做出了独特贡献，从而使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远远超过了人道主义范围，使中国民间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令人难忘的是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主动与日本代表团团长、经济企画厅长官高崎达之助接触。高崎对周恩来在讲话中未激烈谴责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炸弹的特务所犯的滔天罪行，感到吃惊，暗想这个晰白、清秀的美男子几乎被特务炸死，他不但处之泰然，而且大力倡导“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使万隆会议获得巨大成功。高崎非常钦佩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远见卓识，欣然与周恩来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照顾高崎的困难处境，绝口不提台湾问题，满含深情地回忆他留学日本年代的难忘岁月，滔滔不绝地提议中日两国共同简化汉字，给两国子孙后代留下共同的文化遗产。

高崎如释重负，谈到日美之间有安全条约，日中邦交的恢复不会那么容易时，周恩来深思熟虑，将双手在胸前交叉一放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

高崎达之助听了又吃一惊，绝未想到在日本国内的左翼势力强烈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情况下，尚处于交战状态的中国总理竟能说出大度的话，他感慨万千地说：

“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

当时担任翻译的冈田晃在匆忙中，误把“日本被美国占领”错译成“被美国领导”，参加会见的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刚才经企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

冈田晃有点不好意思，忙向高崎说明了情况，冈田知道中国代表团中许多人懂日语，担心中国人会提意见，正在心情不安之时，周恩来微笑着说话了：

“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



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状态下摆脱出来！”

冈田晃听得瞠目结舌：啊！周恩来竟听懂了日方代表间的日语谈话，但他并没有抓住小辫子不放，而是有意避开敏感问题，巧妙地采用为他人着想的含混用词。冈田晃不禁击掌赞叹：“在这种巧妙的婉转之中，可以窥见周总理对日本未来的正确判断和良苦用心。”

当时，日本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重要目的是通过一项日本提出的和平提案，但由于国际地位太低而无法实现，高崎无奈，只好求助于周恩来，得到中国总理慨然相助。由于中国的支持才通过了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因而事后受到裕仁天皇的称赞，高崎达之助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

不久，以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芳园”，与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画厅长官高崎达之助、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要人会见，开创了民间团体出面请客，政府官员参加，官方接触的先例。代表团与日方签订了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告别宴会上，东京会馆人山人海，到处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园田直也跑来祝贺，彼此同干茅台酒，使民间外交有了新的突破。



郭沫若、王震相继访问日本

1955年11月，前首相片山哲率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访华，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文化协定，丰富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内容。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日本客人。

同年12月，中国副总理、大文豪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日，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想会见郭沫若，又怕得罪美国，私下提出用在公园里散步偶然相遇的方式见面，被郭沫若回绝，鸠山又指派文部大臣清濑一郎出席欢迎宴会，热情致辞说：

“我们内阁的同僚也衷心欢迎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抱歉的是我们未能以国宾规格招待郭沫若先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郭沫若先生不尊重或不信赖，而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内阁正以消除这种障碍为政策，希望下次能够举国一致欢迎中国代表团前来访问！”

郭沫若在日本东京、仙台、京都、大阪等11个地方，同各地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留下许多中日友好佳话。在访问日本旅游胜地箱根时，郭沫若看到那里红叶艳丽，风景如画，不禁把自己比作经霜的红叶，欣然命笔赋诗：

红叶经霜久，依然恋故枝。
开窗聆晓鸟，俯首拾新诗。



郭沫若离开箱根，驱车前往镰仓，为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扫墓。郭老没有忘记，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后，岩波茂雄不怕蒙受“通敌”、“卖国”的罪名，出钱供给郭沫若的夫人郭安娜女士和5个孩子的生活、上学费用，郭老经常教育孩子：“知遇之恩不能舍，哺育之情不能忘。”郭沫若扫墓后又赋诗一首以谢日本友人：

生前未遂识荆愿，逝后空拿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

1955年，中日签订渔业协定，使大批日本渔民能来我国东海、黄海捕鱼，得以维持生计。1956、1957年，我宽大处理并释放了1062名日本战犯，双方文化、体育、经济团体频繁互访，使两国关系有很大发展。

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在周总理鼓励下，组织起“日中友好旧军人会”，1956年率领由将官级旧军官出身者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亲自会见他们，鼓励他们向前看，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还风趣地说：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虽然过去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中国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

1957年，当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在日本各地



考察两个月，受周总理委托买回了一批适合中国使用的农业机械，从北海道引回一些日本稻种，对发展中国农业起了积极作用。

王震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山口县青年农民久仰王震的大名，听说王震留着长长的胡须，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枪法奇准，善于用兵，今日一见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更为钦佩地说：“按我的理解，你起这个名字非同寻常，王者，大王也，胸怀大志，要震动天下，故名王震！”

王震听了，爽朗地放声大笑，也风趣地回答：“你的名字也很了不起，你姓团野。野者，农民也，团结农民，又是可以信赖的大丈夫！”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回击日本当局的反华活动

与此同时，岸信介内阁采取露骨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访问台湾时叫嚷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4月，纵容两名暴徒冲进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撕毁中国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

中国对此提出严重抗议，废除了刚签字不久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访日代表团延期或停止行动，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引起日本朝野极大震动。



1958年6月11日，中国在通知日本不再延长渔业协定期限时，周恩来提出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制造“两个中国”；（三）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为解决日本小企业的困难，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很得人心的“照顾物盗”办法，并在1959年2月12日会见日本朋友时对此解释说：“确实的中小企业困难户，希望得到中国特定物资供应者，经过友好团体人士介绍，我们可予以特别照顾。”

在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下，靠中国原料谋生的日本中小企业才得以避免倒闭命运，经营中国饭菜的餐馆、做糖炒栗子和漆器的企业也照常营业，这些人都成了推进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

为打开中日友好关系，开展新的民间接触，中国邀请社会党委员会长浅沼稻次郎1959年3月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论断，后来成为广泛传颂的“浅沼精神”。

同年10月，前首相石桥湛山、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相继访华，对中日建立半官方关系发挥了重要影响。

1960年8月，周恩来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



照顾。

1962年，松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多次访华，周恩来高瞻远瞩指出：“我们同意，我们两国，首先是两国人民，应该采用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促进两国正常化。”

11月9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简称LT贸易），形成半官方状态，使中日贸易在“民间友好”和“备忘录”两条轨道上同时运行。

60年代初期，周恩来对处理日本的关系曾借用一句成语加以高度概括“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也就是说要既联合又斗争，否则日本就认为我们又软又急，软弱可欺，因而我们一不能软，二不能急，要稳坐钓鱼台。

事情真如周恩来所料，1963年初，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中断5年之久，日本渔业资本家沉不住气了，经高崎达之助斡旋，日本派渔业界长老平冢常次郎率团访华，受到周总理和廖承志的亲切接待，本着互谅互让原则进行渔业合作，又达成了新的渔业协定。

1964年4月，松村谦三给廖承志打电话，要中国尽快派一个兰花代表团去日访问。

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的这个电话，引起廖承杰的极大注意，历历往事涌



上心头：

他不能忘记，松村曾私下接受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郑重拜托：“我（池田）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

他没有忘记，松村谦三 1962 年 9 月访华，周总理举办欢迎会时正是八月中秋佳节，周总理巧用“花好月圆，人寿年丰”的佳句，把热烈气氛推向高潮，松村谦三激动地回答说：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非常高兴和激动，希望日中关系能像中秋明月一样，永远圆满、明亮、光辉，愿在有生之年为打开两国关系而献身！”

廖承志又想到《易经》中有句名言：“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他想到这里拍案而起：“醉翁之意不在酒，松村之意不在兰，莫非老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讲？要快去！听听有何‘同心之言’。”

廖承志迅速请示周总理批准，先派真正的兰花爱好者，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代表团访日，参加日本爱兰协会的活动，观赏日本兰花名家精心培育的兰花，交流植兰经验，在中日兰花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私下里，代表团成员和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宇都宫德马秘密会谈，商讨促使日本政府批准仓敷人造丝公司向中国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问题。在



日本朋友大力帮助下，代表团成员秘密会见日本建设大臣河野一郎、通产省官房长官渡边弥荣司和通商课长谷敷宽，松村谦三也再次会见池田首相，多方面做日本当局的工作，终于从日本进口了维尼龙成套设备。

在中日关系有新发展的情况下，中日友好协会1963年10月3日在北京隆重成立，陈毅副总理和500多位日本友人出席大会，石桥湛山、铃木一雄、宫崎世民和西园寺公一分别代表日本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大会选举郭沫若为名誉会长，廖承志为会长，真可谓人才济济，贤能兼储。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团体隆重举行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郭沫若赋诗道：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
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1964年中法建交对日本形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被迫同意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备忘录贸易常驻代表，互换新闻记者，中日半官方关系已成事实。

在此期间，周恩来亲自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至今仍流传着许多佳话。

当时，大松博文率领的“东洋魔女队”夺得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周恩来抽出时间观看日本排球队练球的全过程，邀请大松博文训练中国女排，为中国女排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总理和日本的1959年乒乓球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松崎君代的友谊更被传为美谈。

周恩来发现，松崎球艺精湛，风度雍容，每输一球，脸上总会闪过一丝微笑，即使在被匈牙利选手淘汰时，也带着笑容退下场去。周恩来出席为日本选手举行的饯行晚宴时，特别表扬她说：“松崎君胜不骄，败不馁，有大将风度，值得中国运动员学习！”

从此，松崎成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好朋友。1961年松崎访华时，周恩来夫妇赠给她两瓶茅台酒，请她带给父母。松崎的父母在四国小镇上开一家小酒店，周总理送礼之事迅速传扬开来，近邻远友纷纷上门观看，哄动一时。

1962年松崎再次访华，与日本乒乓球队队员一起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时，周总理突然问松崎：“那两瓶酒的味道怎么样？”

松崎万万没想到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竟将这件小事记得这么清楚，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慌乱中连声说道：“非常好，非常好！”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笑道：“好，那我再送你一瓶！”

松崎喜出望外，将这瓶茅台酒看作友谊和荣誉的象征。全家人将茅台酒装饰一番，放在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只有至亲好友才能喝上一小盅。这瓶茅台酒一直喝了十几年，到周恩来逝世时还剩下半瓶，全家决定永久保



存下去，表示对周恩来的敬意和怀念。

1964年松崎访华时，周恩来获悉她即将结婚，特地和邓颖超选了两条大红绣花被面，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松崎。此事再次哄动日本，松崎舍不得动用，作为中日人民友谊的象征被永久保存。

第十四章 兄弟至交

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有一个忠厚质朴相交至深的外国领导人，他们有50余年的交情，可谓兄弟至交，他就是胡志明。

相识于20年代塞纳河畔

1921年春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从他所住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匆匆赶往住所附近的巴黎地铁站，去会见极其活跃的越南革命青年领袖阮爱国。

周恩来久闻阮爱国的大名：1917年就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很关心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学生在政治上的成长，亲自介绍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和萧三等人加入法国共产党。

周恩来对阮爱国久仰多日，一见面就为其真诚而老练的风度所吸引；阮爱国也马上喜欢上了比自己小8岁的周恩来的聪敏和独特的魅力，两人从此



结下兄弟之交，经过其后 50 余年的考验而日益增进。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胡志明以巨大的魄力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总起义，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有名的《独立宣言》，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英国支持、美国同意下，起兵进入印支三国，迫使胡志明率领部分兵力撤往靠近中国的越北山区，又派部分武装人员进入老挝和柬埔寨，会同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反法武装开辟“西部战线”，进行长期抗战。

直到此时，周恩来仍然不知道阮爱国就是胡志明，还是到河内视察日军受降情况的国民党政府陆军部长何应钦给周恩来讲明了阮爱国与胡志明的关系。周恩来 1972 年 7 月会见越南总理范文

同的时候大发感慨说：

“何应钦（1945 年）从河内回到重庆，当时我和毛主席在那里同蒋介石谈判。他问我们，你们知道胡志明是谁吗？他就是过去在（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那里工作的阮爱国。这时，我们才知道。”

那时，越南的处境极其艰难，恰如胡志明所说：“当时我们只能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



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一起访问莫斯科

就在胡志明极端困难之时，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欢欣鼓舞，很快从越北丛林秘密来到中国，请求中国予以支援。

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从国际主义原则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出发，公开宣布支持他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在处理与越南的关系的时候，也遇到了搞好中越关系与中法建交的矛盾。

就在此前不久，周恩来接到一个重要信息：法国政府有意与新中国建交，这对中国开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是有好处的，而支持越南必然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周恩来与刘少奇等热情地接待了胡志明，商量的支持越南革命的对策，又通过电报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请示，大家认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与胡志明一起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途中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决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同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特别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胡志明与周恩来一起赶到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同商讨中苏越三国的团结合作问题，斯大林要中国多分担支援越南的责任，周恩来与胡志明



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了。

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后，胡志明绕个弯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在中苏签订条约后兴致很高，便开玩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进入主题：“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胡志明一眼婉拒道：“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说：“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很有感慨地说：“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共同策划奠边府战役

中国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1954年3月上旬致电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指示他们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商量，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



越南打几个漂亮的胜仗？”

周恩来设身处地为越南着想，为胡志明出谋划策。他认为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因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他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今后战局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向胡志明建议说：“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纬 16 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胡志明感到老朋友考虑的极其周到，他完全赞成，愿意到北京再做商谈，周恩来立刻派人去凭祥迎接胡志明。两人密商对策后又先后启程飞往莫斯科，出席有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尽力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

4 月 20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胡志明化名“丁同志”早已先行来此等候多时，周恩来与苏方协调步调之后，又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胡志明就越南问题再做商谈，然后飞往日内瓦。

在日内瓦会议初期，法国拉尼埃政府企图在印支三国重建殖民统治，拒不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更不承认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抗战政



府，不同意越南代表团参加会议，经过中国和苏联代表团的顽强斗争，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率领的越南代表团才于5月4日到日内瓦出席会议。

周恩来认为会场斗争离不开战场形势的支援，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局面要靠战场上的胜利来推动。

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和胡志明策划已久的奠边府战役在激战55天后，于5月7日取得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歼灭法军1.6万人，生俘守军司令卡斯特里准将，改变了整个印度支那战争形势，迫使法国人同意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扰，会议进展缓慢，斗争极其尖锐而复杂。

为打破僵局，周恩来与莫洛托夫、范文同密切合作，经常向胡志明通报情况，听取胡志明的意见，以巧妙的外交艺术分化西方阵营，集中力量打击顽固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只动一个小指头就把拉尼埃轰下了台”。

在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期间，周恩来到广西柳州会见胡志明、武元甲和黄文欢等人，进行8次会谈，协商恢复印支三国和平的方策，他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关键之处：

“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它超过朝鲜问题的国际化范围程度，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所以朝鲜



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

针对越南同志急于取得全国胜利的心情，周恩来耐心地劝说他们胃口不可太大：

“如果我们要求太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局势肯定下来。”

关于划区谈判的地盘，周恩来提出中国的意见：在越南，争取以 16 度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在老挝，要求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

胡志明和武元甲认为周恩来的意见切实可行，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妥协，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由此形成中越“7 月 5 日协议”。

周恩来又飞到北京、莫斯科，与毛泽东、马林科夫交换意见，然后返回日内瓦，耐心地说服范文同接受中越领导人的“7 月 5 日协议”，终于促使日内瓦会议在 7 月 21 日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使越南的北部获得解



放。

提醒胡志明不要过分依靠他人

周恩来和胡志明认为贯彻日内瓦协议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两人经常共同商讨对付美国、法国和南越吴庭艳集团干扰、破坏的方策。1954年10月初,胡志明向周恩来求教如何处理越法双方的经济关系,周恩来提供参考答案说:

“总的原则是遵守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保持独立主权,照顾统一战线,照顾将来统一,并要结合恢复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医治战争创伤通盘考虑。”

作为经济管理的行家,周恩来将中国处理主权与经济关系问题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向胡志明介绍道:

“在收回主权的时候,应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分别轻重、逐步实现的方针……货币发行必须统一,进出口管理、外汇管理以及有关我们整个的经济命脉的方面,必须坚持越方的管理权,而且目前在执行上又必须适当照顾对方企业和商人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的大力帮助下,胡志明的工作开展得极为顺利,不久将越南首都由中越边界地区迁回河内。12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胡志



明、范文同，热烈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认为此举非同寻常，称赞这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

可能是由于中越关系非常密切的缘故，周恩来发现胡志明和越南领导人一度对中国有过于依靠的倾向，甚至连越南向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申请援助，也要由中国代为提出。

周恩来从长远的观点考虑，认为这样做对越南不利，便于1955年1月18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派往越南的罗贵波、韦国清、方毅：

“下列各点请告胡志明和劳动党中央：

（一）对越南的物资及技术援助，不能也不应由中国全包，当然，中国会尽自己的能力来援助越南。

（二）向苏新国家提请援助，毫无疑问地应由越南政府和劳动党自己出面向苏新国家提出。

（三）各国对越南援助，应由越南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估计对方的可能，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和数额，才好进行协商。

（四）为商量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中共中央邀请劳动党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指派一领导同志率领必要干部飞来北京和中共中央面谈。”

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胡志明和越南领导人怎样从事经济建设，



告诉越方来北京之前，请劳动党中央根据农业、交通、工业、贸易、军事、文教等方面的需要，按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大约5年的期限，准备好一个要求援助的计划，包括援助项目、技术和金额。

越方按照周恩来的帮助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胡志明率领越南代表团来华访问。

双方会谈的重点是经济合作问题，周恩来宣布向越南无偿赠送人民币8亿元，帮助越南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胡志明对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提供这么多援助，自然是高兴万分，他与周恩来无话不谈，诚心地征求大外交家的意见说：“法国表示要向越南提供援助，你看如何？”

周恩来感谢胡志明对他的无限信任，但是头脑格外清醒，非常懂得两国的外交关系绝非朋友之间拉家常，微微一笑极有分寸地说：

“这是越南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属于我们两国会谈的范围，可以只作为意见交换。如果法国等要援助越南，即必须根据五项原则办事，已经收回的权益，绝不容许再受任何损害，尚未收回的要有步骤地收回。”

胡志明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愉快地与周恩来签署中越联合公报。他说，由于周恩来的周到安排，他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周恩来首次访问越南

1956年11月18日，河内彩旗飞舞，歌声嘹亮，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越南，这既是中国领导人对胡志明1955年访华的回访，也是周恩来第一次访问早在旅欧时期就成为朋友的老大哥胡志明的祖国。

胡志明把周恩来首次来访视为越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他在执政上遇到了难题，急于和他最为佩服的小兄弟相互商讨。

胡志明领导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虽然进展顺利，但是由于美国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南北越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支援南方斗争开支浩大，越南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不好；同时在越南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国际上美国和法国侵略埃及战争的爆发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也非常关注。对许多问题，胡志明自己也感到困惑，就在11月12日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请求：

“趁周恩来访问河内的机会，我党中央政治局拟请他就下列问题提供意见：1，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展望；2，为实现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工作任务；3，越南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今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任务。”

胡志明认为周恩来的首次访问事关重大，自己早就站在主席府门前的台阶上迎候多时。周恩来的轿车一到，胡志明立刻迎上前去，与他的中国



“兄弟”紧紧握手。

胡志明特意安排在著名的河内巴亭广场举行10万人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热情地发表讲话,赞扬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友好团结的中越人民一定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晚,范文同总理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发表热情的讲话欢迎中国代表团,周恩来谦逊有礼地称赞说,中越两国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国人民始终把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团结,看作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胡志明举行国宴专门招待中国代表团,对周恩来带来中国人民的亲密友谊感到非常高兴,他赞扬30多年来,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越中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善邻关系才得到发展,他满含深情地致词道:

“对我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

周恩来受到胡志明亲情的强烈感染,情不自禁地回忆昔日的难忘岁月:

“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还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30多年来,我从胡主席的经历,看到了越南人民所走过的道路,看到越南人民长期艰苦



奋斗的精神。他的生活永远是如此简单朴素，他的样子、精神和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我们从胡主席和越南人民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

周恩来以热情奔放的谈风把宴会推向高潮：

“在这次访问中，我也看到越南人民像胡主席一样的优良作风。任何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这次没有白来，我们从越南人民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将把它当作高贵的礼物，带回给中国人民。”

胡志明把周恩来请到主席府盛情招待，老兄弟俩同坐一条沙发倾心交谈。胡志明深知周恩来的习惯，特别在沙发前的小圆桌上放了一盆精制而芬芳的鲜花，周恩来果然非常喜欢。两人天南海北地谈笑风生，不时传来愉快的笑声。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参观河内的大学、少年儿童俱乐部、市中心的还剑湖的名胜和市郊的二征庙，特意在征侧和征贰的像前献了花圈，称赞她们抵抗中国汉朝马援征讨的反侵略精神，又在当晚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责波举办的招待会上，极其尊重越南人的民族感情，郑重地发表讲话称：

“我愿意作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则，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大国主义。”



周恩来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孙中山50年前在越南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创办的河内中华中学,他勉励华侨要看到越南人民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华侨既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也要联系侨居国的实际,还应该很好地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

在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根据离开北京前向毛泽东和中央的请示,谈到当时的国际局势、批判斯大林问题、兄弟国家的关系和中越两党和两国关系等问题。胡志明请周恩来对越南南北统一问题发表高见,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参考性意见说:

“南北统一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通过自由普选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政治斗争口号,但不是行动的步骤。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有的越南同志提起越南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就情绪低沉,周恩来用两分法分析说,土地改革的成绩要肯定,有错误是难免的,纠偏不能抛弃正确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

胡志明对越南的赤字财政非常头疼,向治国行家周恩来请教良策,周恩来针对越南财政赤字大导致物价上涨、市场不稳的情况,指出财政问题的关键是增产、发展国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根据胡志明等领导人的要求,周恩来同意中国在越南的财经专家留下继续帮助工作,但是特别强调



中国专家提出的意见只能供越南同志参考,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应该由越南同志自己决定。

其后,胡志明多次来到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谈反对美国侵略印支和双边关系问题。1960年5月9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回访越南,在飞往河内途中碰上恶劣天气,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在宜安机场降落,因为这里是胡志明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路去看看。

当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有了意外收获,别有一番情趣。

胡志明着急异常,忙派黄文欢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到宜安迎接,陪同中国代表团飞抵河内,接到主席府热情招待。

记者拍完照,胡志明就动手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周恩来“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周恩来在外交场合从来服装整齐到胡志明家里就破例随意了。

吃罢饭,周恩来随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抽出一根精制牙签,微笑着递给胡志明用。

胡志明惊喜地接过,感慨万千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了了不起的人!”

周恩来笑着回答道:“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宣告成立，周恩来与在此前后来华访问的胡志明等人会谈后，代表中国政府率先承认。6个月后，胡志明派范文同来华求援，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赞扬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对其表示坚决支持。

1962年夏天，胡志明和阮志清来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一次就提供各种枪支9万支（挺），用以发展游击战争。

随着越南抗美斗争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周恩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坚持斗争所需要的武器和粮食，全部无偿地送上前线，不少海员为运送援越物资而流血牺牲。

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几个城市，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尽快“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

8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北京100万人的声援大会，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声明：



“中国将给予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资支援，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1965年2月初，美国在向越南南方增派地面作战部队的同时，又对北方狂轰滥炸，在越南战争升级的严重时刻，周恩来在地拉那的群众大会上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坚决响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给越南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我们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

两个月后，胡志明派黎笋到北京提出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周恩来与其签订了有关协定，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经周恩来妥善安排共派出中国支援部队30余万人。周恩来为此付出许多心血，经常嘱咐中国援越人员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绝不允许损害越南人民的利益。还指示每件援越物资不得超过30公斤，以方便越南妇女运输。

1965年7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奉胡志明之命来华与周恩来磋商越南经



济发展问题，周恩来对越南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斗争中作出的牺牲深表同情，签署了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的协定，又陪同毛泽东接见了黎清毅，还特别赠送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鼓舞越南领导人把抗美斗争进行到底，他慷慨激昂地朗诵其中的经典之句：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1966年7月，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周恩来当即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宣布：

“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为越南与美国的谈判出谋划策

面对美国玩弄的和谈阴谋，胡志明派范文同1967年4月到北京与周恩来协商应付方略。周恩来引用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俗语，鼓励越南人民走完最后的一段艰难路程，取得彻底胜利。他结合自己与美国和蒋介石谈判的经验，为胡志明和越南领导人出谋划策道：

“战争总是要结束的。政治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进行下去。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加强国际宣



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

范文同极感兴趣地问道：“请问斯大林是否向中国建议不要打过长江？”

这顿时引起周恩来对往事的诸多回忆，他极有分寸地向范文同介绍中苏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说：

“对1949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以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

大概是因为越南即将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非常关心美国人的动向，范文同问：“美国大使态度如何？”

周恩来略带嘲讽意味地说“我们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共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关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共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我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结果美国大使就跑掉了。”

周恩来讲得轻松愉快，面临谈判重任的越南人却听得入了迷，周恩来认为当时最大的危险是苏联领导人的叛卖行径，就揭露其阴谋诡计说：



“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这类事斯大林时期就搞过。1949 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支持蒋介石。那时，苏联打得损失很大，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美战后划分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作为政策就不对了。特别是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震动了苏联，他们急于和蒋介石签订协定，等于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最大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并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

范文同感兴趣地问：“斯大林怎样干涉中国内战？”

周恩来望着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外的浓重春色，回答道：

“当时，斯大林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中共应该同国民党合作，不能发动内战；如果发动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这显然是被原子弹吓倒了。”

范文同感叹像斯大林那样伟大的人物竟然如此，周恩来端起茶杯喝口茶水，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评价：

“我们说斯大林不愧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因为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到莫斯科，斯大林含蓄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45 年 8 月他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是否妨碍了中共解放战争的进行？”

范文同认为斯大林的思想难免对苏联其他领导人产生影响，周恩来对此



表示赞同，结合自己的见闻谈到现在的苏联领导人：

“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酒时说，他老了，他很担心死了之后这些同志会怕帝国主义。现在证明斯大林的这种预见已经实现。”

“斯大林指谁？”

“指在座的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

范文同称赞说，与周恩来总理谈话就像进了一所大学，周恩来总理就是最高明最循循善诱的教授，又讲到他们在南越战场上的做法，有些是根据中国过去提的意见做的，这说明越南和中国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且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将此归功于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英明领导，特别对正在与美国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越南同志大加称赞说：

“你们不但有新的发展，还有创造，后来居上。这是毛主席说的。我曾给你写过这几个字：后来居上。我们已经14年没有打仗了。”

周恩来指着陪同会谈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感慨道：

“我们三个人都老了，我快70岁了，叶剑英同志70岁，陈毅同志67岁了。我们想打仗，时间也不多了。”

叶剑英风趣地插言说：“这是自然规律。”



周恩来笑道：“年龄虽老，雄心还在。南方战争明年不结束，我要到你们那儿去参观。”

叶剑英伸出大拇指高声称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周恩来向范文同解释道：“这是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中引用曹操诗中的一句话。封建时代的人物还有他的壮志，何况我们无产阶级？”

越南与美国开始进行巴黎谈判后，胡志明更器重谈判专家周恩来的意见，1968年5月特派负责谈判的春水部长来北京协商谈判方略，周恩来精辟地分析朝鲜谈判与越南谈判的不同情况说：

“朝鲜谈判时候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半个越南，那是14年前的事了。上一次毛泽东主席向胡志明主席说过，那时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协议签订以后越南南方很多战士撤到了北方。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

周恩来称赞胡志明确实高风亮节，他不怪罪他人，说这样也有好处，经过一个困难阶段，吴庭艳逮捕、禁闭、镇压，差不多20多万人牺牲了，经过这一痛苦的教训，南越人民自觉地起来闹革命，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形势。



接着，周恩来深刻地说明他对朝鲜谈判的评价：

“朝鲜谈判时的情况差不多等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的情况。朝鲜谈判是在战场上进行的，前后差不多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但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谈朝鲜问题时，战争已经停下来，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干，所以朝鲜谈判只搞了个停战协定，任何其他政治协议也未达成。关于撤军问题，他不谈。1958年我们撤军，他也不撤。”

春水恳切地请周恩来对越南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巴黎和谈发表高见，周恩来实际上对越南的谈判方针有意见，但他讲得很有分寸：“这次你们的情况不问，是分步骤地问美国接触谈判，这样也好，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日内瓦会议由于冀边府战役才谈成，定了个17度线。”

周恩来说到这里，抬头望春水一眼，见春水非常认真地在听他的意见，稍加思索，才下决心说：

“我们的态度，可能范文同同志回去已经讲了。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毛泽东同志向范文同同志说过，谈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高姿态。第二点，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破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只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春水对周恩来的意见极其赞成，回国报告了胡志明，使周恩来和中国的



意见在巴黎和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对胡志明的生活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胡志明一到中国，周恩来对胡志明的起居饮食和健康问题就随时详细过问。他知道胡志明特别爱吃粤菜和点心，就请技术高明的广东师傅为胡志明的厨师传授技艺。邓颖超也像亲兄弟媳妇一样照顾老大哥：天冷了，就提醒胡志明添厚的衣服；看胡志明的衣服旧了，叫有关人员给他换新的；见胡志明缺少毛背心，就亲自动手给他织了一件。

为见胡志明最后一面

1968年年初，胡志明来北京治病。有一件事他思考多日，仍然拿不定主意，便于3月19日用中文给周恩来写信说：

“亲爱的恩来同志：今天我奉告你我最关心和最秘密的问题，我很愿往南越一行，看看同胞和战士，同时勉励他们竞赛加油，克服困难，猛烈地和持久地进攻美国强盗及其走狗，争取最大的和彻底的胜利。对这问题，我愿意征求你们的高见和要求你们帮我的忙。”

周恩来最了解老大哥此时此刻的心情，但理智告诉他，胡志明身患重病不可能远行，南越战场大战方酣，极其危险。出于对胡志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周恩来非常遗憾地说不能帮胡志明这个忙。



在越南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日里，周恩来得到胡志明病重的消息，他非常着急地探问病情。胡志明病中更想念他的中国老弟。

1969年2月，周恩来突然接到河内来电，说胡志明主席病情加重，请求尽快派医生前去帮助治疗。

周恩来立刻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两人都非常着急，很快下达命令派出了中国专家组。周恩来时刻把胡志明的健康记在心间，凡是有关胡志明治疗的事情，从选派专家到运送药品和医疗设备，他都亲自过问，出了不少好主意。

1969年7月18日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会见周恩来，转达胡志明的请求：

“胡志明主席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只要周总理同意，他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

周恩来感谢胡志明对中国和自己的信任，但考虑到两国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又担心旅途劳顿会增加病情，便回答：

“我们是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的，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有为难的地方。只能由大夫做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请向胡主席说清楚。”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中国及越南医务人员的悉心医治下，胡志明的病情有



所好转,一天突然提出想请回国休假的中国医生返回时顺便带回两只北京烤鸭。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作出批示:第一,胡主席想吃北京烤鸭,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第二,关于携带烤鸭如何保鲜问题,可请教外贸部同志,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周恩来立刻请人民大会堂最好的厨师赶制出两只烤鸭及相应的薄饼、甜面酱,请冷藏专家采取特殊的保鲜措施然后送去。胡志明吃到新鲜的北京烤鸭,听说这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礼物,更加高兴不已。胡志明突然想起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誕生日,就派人把中国驻越南大使和参赞请来,与他一起品尝烤鸭,并说这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8周年。

胡志明深感周恩来的手足之情,心情格外愉快,饭也吃得特别香。

越南在战争时期药品缺乏,所需药品不少需从中国运去,对此周恩来都有详细安排。总理办公室秘书曾有这样的关照:“总理指示,今后再有要药之事,仍按过去手续办理,即请示中央批准后,从警卫局杨德中处取。”

在胡志明病情较为稳定的时候,周恩来指示可将药品交越南驻华大使馆转送;特别交代药品要四层包装,每包一层加一道火漆;而且要由两人一道送往越南使馆。当时的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得知此情后激动地说:



“周总理对胡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极为感动。请报告周总理，我一定指派最可靠的人员将药品妥善地送到河内。”

胡志明病情加重后，周恩来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以解燃眉之急：指示将药品托中国民航北京至河内国际航班机组的同志负责带到越南转交以应急需。

1969年8月，周恩来增派的两批医务人员来到河内，胡志明十分高兴，立刻给周恩来发电报称：“医生已到，请你报告毛主席，从昨天到今天，我的病情相对稳定。请你们放心。”这是胡志明发给周恩来和中国领导人的最后一封电报。

1969年8月31日，周恩来特别派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教授和外交部官员梁枫，赶赴河内了解胡志明的病情，限他们当晚返回北京汇报，但由于天气的原因，吴阶平9月1日清晨才回到北京。

周恩来立即约见吴阶平和梁枫，听取关于胡志明病情汇报，认为胡志明病情关系重大，再派吴阶平和梁枫率领中国专家赶回河内进行抢救治疗，又向越南驻华大使询问胡志明的病情。

周恩来接到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噩耗，他沉浸在失去老友的悲痛之中，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去吊唁。

9月4日，周恩来在飞往河内途中，突然接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报告，说为长期保留胡志明遗体，正在对遗体进行处理，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国



葬安排，中共代表团不便瞻仰遗容。作为胡志明的老朋友，周恩来的最大愿望就是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这个新情况使他当即决定飞降南宁，经中共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慎重研究，决定仍然照原计划飞往河内。

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一行到达河内机场，受到越南领导人长征和范文同等的迎接，几个老熟人见面都失声痛哭，周恩来含着泪水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周恩来急忙赶往主席府。在主席府会议厅，周恩来沉痛地对越南领导人说：

“我们来的仓促，但还是晚了……31日，我们派吴阶平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品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9月1日晨才回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主席了，但仍然决定再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他们正在路上，不幸胡主席已经去世了。”

越南领导人都知道，周恩来为了给胡志明治病，曾派最高水平的4个医疗组日夜战斗，尽了最大努力，只听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说：

“胡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共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万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



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周恩来环顾主席府会见大厅一周深情地说，“1956 年我首次访问越南，胡主席就是在这个大厅会见我的，可是今天厅在人去了……”

周恩来要讲胡主席和中国、和他的友情，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他深知过多地讲这些，就会引起更多的伤感，就毅然将话题一转，对越南领导人讲了些热情鼓舞的话，重申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到底的决心。

正式的吊唁活动尚未开始，越方专为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设立了临时灵堂，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胡主席遗像前敬献花圈、沉痛地默哀，在吊唁簿上留言。

越南领导人为周恩来的一腔真情所感动，作为特殊情况秘密地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志明的遗容。周恩来总算与他的老大哥见了最后一面，成为外国代表团中唯一见到胡志明遗容的人。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深厚友情，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无论是作为个人的朋友，还是世界著名领导人的交情，都无与伦比，世代代为人传颂。



第十五章 老挝：“中国可以打10分”

老挝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周恩来为支持老挝维护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修建支援战争、造福后代的7条公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化费了无数心血，赢得了老挝人民的敬爱。

殚精竭虑实现老挝停战

老挝人也是在日内瓦会议上领略周恩来的人格和外交魅力的。

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老挝外交部长冯·萨耶尼空一进日内瓦会议的会场，就指着中国代表团大放厥词：“你们不是好人，也是帝国主义！”

中国代表团不少人对无端受此攻击感到极其恼火，周恩来认为老挝代表不把矛头对准美国和法国而与中国为难，肯定是上当受骗，他又深入分析老挝国情，认为王国政府仍然是大多数人心

目中的合法政府，得到世界30多个国家承认，老挝爱国战线1949年建立寮国战斗部队后虽然与法军英勇斗争，但力量仍然很弱，对老挝应该鼓励其中立倾向，团结老挝共同反帝。

周恩来派代表团人员请萨纳尼空到日内瓦花园观赏名花，喝咖啡交朋友，周恩来又请老挝代表团全体成员吃饭，推心置腹地交谈，很快使老挝



代表团的 attitude 有所转变。

周恩来从老挝人民的切身利益考虑，认为必须解决老挝的政治问题，实现老挝的和平中立，因而与苏联、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商量后，提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得到老挝人的信任，使老挝代表团逐渐把矛头指向正在侵略老挝的法国帝国主义，指向法国人背后的罪魁祸首美国帝国主义。

从此，周恩来取得了萨纳尼空的信任。

在6月16日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希望老挝成为中立国家。18日，美国代表罗伯逊发言反对，老挝代表萨纳尼空当即发言明确宣称：

“中国的建议可以作为工作基础，因为它包含了有益的因素，老挝方面没有任何根本反对。”

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亲切会见老挝外交部长萨纳尼空和国防部长谷·高拉冯，将他花费巨大心血解决老挝问题的设想，谈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如果在老挝只设11个军事集结点，太分散，使大家都不能安心，所以我们认为区比点好。在老挝东北两省划定一个集结区，并设混合委员会来处理双方关系、地方关系。选举以后，抵抗运动方面可以参加王国政府，这是一种好的办法。”



“这是分治吗？”

“划分集结区只是临时办法。老挝只有一个王国政府，这并不是分治。”

老挝代表团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又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商谈老挝停战问题，认为法军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数目的范围内留驻在老挝，可以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谈，抵抗部队应该集中在一个地区，应该得到保护。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与老挝王国代表团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使中老友好关系有了新的良好开端。经周恩来与苏联、越南和老挝密切合作，多方工作，日内瓦会议终于通过了印度支那停战的决议，与会国一致承认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打下了中老友谊的基础。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与富马友好会晤，共同为开好亚非会议而奋斗，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富马首相访华

1956年8月20日，富马首相应邀访华到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在中南海紫光阁举办酒会为富马接风，富马强烈表示老挝希望获



得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地位，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富马对中国怀有畏惧心理，一开口就讲老挝是个小国，希望大国总理多加指教。

周恩来认为这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大障碍，必须首先解决，面带微笑诚恳地说：

“老挝从人口来说是很小，但是从土地来说并不小。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受到别国的尊重，尤其是邻国。中国是人口多、地方大的国家，因此更要注意尊重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并求得友好相处。何况我们两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年的来往，而且都受到殖民主义压迫，最近才得到独立。我们不仅有历史的友谊，而且还有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更容易了解。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互相支持，这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富马极其感动，道出肺腑之言：“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取得中立地位。中立，就是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周恩来听到富马能够说心里话，他高兴地笑了，亲切地回忆往事说：

“在日内瓦会议时，我对萨纳尼空外长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过，我们愿意看到印度支那国家，如老挝和柬埔寨能够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像印度、



缅甸、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地位，正如亲王昨天所说的像瑞士的地位，这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富马深受鼓舞，连声称赞：“总理阁下说得太好了！”

周恩来最尊重对方的人格，最善于从对方的发言中寻找共同语言，推动会谈向最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亲王提到，中立，就是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甚至日内瓦协定中所规定的法国军事基地，如老挝政府认为不合适也可废除，我们感到很兴奋。首先我们要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实施，法国的基地是协议允许的。当时我们是担心美国会进来。现在老挝、柬埔寨都没有让美国进来，我们感到很欣慰。”

富马想请求外国援助，但又害怕受制于人，就此提出请教，周恩来微蹙浓眉，稍做思考为客人出谋划策道：

“你们在独立后要恢复战争创伤，要建立独立的经济，就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各国经济贸易的来往和人民之间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但必须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不能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邻国成为富强、独立、统一的国家。”

“美国人说要提供援助，靠得住吗？”



“老挝需要国际的援助，你们应该到各国去访问。中国政府不反对你们到美国去访问，也不反对和美国友好，”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我们也愿意到美国去，但它们不让我们去。”

周恩来又陪同富马会见毛泽东，出席毛泽东举办的盛大欢迎大会，参加北京各界人民欢迎富马访华的大会，观看精彩的歌舞京剧表演，使富马把周恩来当作师长和朋友，把他最头疼的老越关系问题也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设身处地为富马设想道：

“如果说在老挝某些地区，还有越盟分子的话，你完全有理由和范文同总理谈，可以得到解决。”

富马向中国请求援助，周恩来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表示中国很愿意帮助老挝继续进行经济建设，如同我们帮助柬埔寨一样，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富马大喜，愉快地与周恩来发表了联合声

为解决老挝与越南的分歧，周恩来把富马访华的情况向胡志明做了详细通报，说明老挝王国政府已就国内问题取得初步协议，富马强调由于老挝所处的地位，愿意执行和平中立政策，表示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对这种立场表示予以尊重和支持。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胡志明提出建议，认为当时是一个有利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使越老关系正常化，从而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老挝本身



的民主统一问题。

周恩来密切注视着老挝局势的发展，支持1957年11月成立的以富马为首的联合政府，使印支形势逐步好转，但美国大肆扶植老挝亲美势力进行破坏，1958年颠覆富马联合政府，1959年挑起老挝内战，破坏了老挝的独立、中立与和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予以谴责。1961年4月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的时候，周恩来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说：

“如果美国要在老挝打局部战争，那么对美国来说，比起朝鲜战争，将是在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进行的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问题，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老挝国内的和平是有希望的。”

为促进中老关系，周恩来邀请富马首相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4月下旬访华，请他们出席首都欢迎老挝贵宾的万人集会，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谴责美国在老挝成立所谓的“军事援助顾问团”，指出这是美国准备直接参加老挝内战的一个严重步骤，表示中国支持老挝政府的独立、和平与中立政策，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在与老挝贵宾的会谈中，称赞以富马为首的老挝政府所奉行的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和睦、和平中立的政策，符合全体老挝人民的愿望。中国人民积极支持老挝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周恩来和陈毅外长陪同老挝贵



宾到杭州游览，在杭州陪客人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真诚的态度，文雅的谈吐，坚定的反帝立场，取得了两位老挝亲王的信任，双方一致认为召开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由14国参加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唯一途径。

老挝两亲王访华取得丰硕成果，中老决定1961年4月25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级外交使节，两国积极支持西哈努克召开日内瓦会议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

实现老挝三亲王会晤

美国总统肯尼迪对此极为恼火，急忙派总统特使到老挝进行阻挠，迫使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宣布反对召开任何国际会议讨论老挝问题，使得西哈努克5月1日宣布撤回他提出的召开14国日内瓦会议的建议，还决定取消他的日内瓦之行，这就使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面临夭折的危险。

周恩来得此消息，急忙从邯郸赶回北京，与外交部同志急谋对策，审查批准了中国政府《关于老挝停火和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为维护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为老挝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非常理解西哈努克亲王5月1日在万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达的心情，希望他继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努



力。

5月6日，周恩来给正在遭受挫折的西哈努克写信，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道：“某些国家一直在阻挠和破坏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我们不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希望亲王重新考虑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

识大体、顾大局的西哈努克出于对伟大外交家周恩来的无限信任，悲观情绪一扫而光，5月8日给周恩来复信表示感谢，说明他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和目前不参加会议的原因，12日又写信告诉周恩来，他决定将率领柬埔寨代表团为解决老挝问题而奋斗。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柬埔寨和老挝代表团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设宴招待，谴责美国的破坏和挑拨行为使老挝三方面的政治会谈至今未能举行，甚至使西哈努克亲王倡议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遭到威胁，重申中国政府对此予以支持，愿意同具有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真诚愿望的与会国代表团一道，为争取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努力。

周恩来为实现老挝三亲王会晤殚精竭虑，先会见富马首相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又宴请以贵宁·奔舍那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以富米·冯维希为首的老挝爱国战线代表团，揭露美国破坏老挝三方面进行成立联合政府谈判的阴谋，反对美国干涉老挝内政，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冲破美国设置的层层障碍而顺利举行。



周恩来亲自到钓鱼台看望中国代表团人员，代表中共中央同意他们的出征方案，并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你们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灵活运用策略，争取达成协议。他深情地对陈毅说：“陈老总这一回担子很重啊！”

周恩来知道陈毅爱喝豆浆，交代中国代表团带一盘小石磨，到日内瓦给陈毅磨豆浆喝。

周恩来与陈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在日内瓦会议上进行巧妙的斗争，同时在会外做有效的配合。

周恩来1961年7月3日接见由苏黎世回国途经北京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对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晤作出很高评价：

“帝国主义总是要捣乱的。当它们处于劣势时，他们就可能做些让步，达成些协议，争取喘息时间，争取保存力量。”

苏发努冯极受感动说：“周恩来总理对老挝问题有着真诚的了解。”

周恩来动员国际力量，创造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的世界舆论，他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力促柬埔寨为解决老挝问题做出更大贡献：

“老挝问题如此复杂，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关系又很大，应该促其成功才好。希望大家找到共同点，把不同点保留起来使各方都能接受。我们反对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



周恩来看到美国策动老挝右派挑起严重的军事冲突,便把陈毅从日内瓦调回北京协商对策,决定尖锐地揭露老挝右派挑动内战的罪行,支持老挝人民取得南塔之战的巨大胜利,迫使老挝右派在查尔平原参加三亲王会议并达成相应的协议。

在有利的形势下,周恩来请陈毅及时返回日内瓦,促使日内瓦会议于1962年7月23日正式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议定书》,使老挝问题得以和平解决。老挝各方通过谈判,组成了以富马、苏发努冯为正副首相的联合政府。

苏发努冯顿开茅塞

在此前后,中老关系有所发展。周恩来与外交部领导人决定组建中国驻老挝王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由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兼任,派刘春任副团长,主持代表团日常工作;待适当时机担任大使。

何伟和刘春1961年11月14日到达老挝,在查尔平原的丰沙湾团址举行升旗仪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正式成立,然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老挝领导人密切接触,与富马首相建立了良好关系,富马甚至情不自禁地讲起他与自己的法国籍夫人恋爱的故事。

在周恩来和中国的大力支持下,老挝三亲王1961年6月11日达成组织



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当天即致电富马首相表示祝贺，高度评价这一协议具有重大意义，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老挝三亲王达成协议的声明，以朋友真情提醒老挝领导人称：

美国干涉的阴影还在笼罩，老挝人民还要保持高度警惕。

这时，美国竭力撮合老挝右派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拉右派头子文翁和诺萨万到台湾访问，双方达成所谓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

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当即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争取外交主动，抓住6月23日老挝联合政府在万象塔銮庙宣誓就职的时机，通过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向富马首相和贵宁·奔舍那外交大臣递交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的贺电，使中国成为宣布承认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第一个国家。

周恩来的辛勤汗水终于换来成果，富马致电周恩来，感谢中国对他担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的祝贺，同意中老两国互派大使并建立使馆。

美国当局大为惊恐，使出全身解数压老挝右派公布老挝国王的敕令，宣布要向台湾派驻大使，蒋介石也颁布了任命杭立武为台湾“驻老挝大使的总统令”。

为打开僵局，周恩来和陈毅7月3日会见前往日内瓦途中路过北京的苏发努冯，双方围桌而坐亲切交谈，充满了家庭般的温馨气氛，周恩来侃侃而谈：



“日内瓦会议可能拖下去，美国不敢破裂，不想休会，又不想马上达成协议。这与当前局势有联系。局势经常动荡，不利于他们。南朝鲜又发生了政变，张都瑛又倒了，又倒了一个傀儡。”

周恩来的话使苏发努冯深受鼓舞，精神为之一振，又就美国与老挝的关系问题请教，周恩来尖锐地分析道：

“富马首相现在正在巴黎，哈里曼也去了。美国邀请富马首相到美国去，富马首相不去。美国着急了，现在移樽就教，这是因为你们有力量，他们就低头。如果你们力量再壮大，他们就更要向你们打招呼。帝国主义是看力量办事。”

周恩来一番话使苏发努冯顿开茅塞。

“美国人对我们的接待只能打零分”

1962年11月下旬，副首相富米·诺萨万率领老挝代表团出访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中国访问。12月5日，周恩来接见老挝代表团，就向老挝提供贷款援助等问题进行会谈，对老挝新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我还是第一次接见你们的政府代表团。中国人民很高兴，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使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协议，这是中国邻邦的一件好事。”



富米虽然是个右派人物，但是也不得不在周恩来面前承认现实：“日内瓦会议能够很快达成协议，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谨此表示感谢。”

周恩来谦虚地说：“我们只尽了一部分力量，主要是老挝三方的团结，没有三方面在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下组成联合政府，日内瓦会议不可能达成协议。有一方不赞成也搞不成，应该说三方面都尽了力。中国的经验说明，国内团结是主要的。团结才能搞好，不团结就搞不好。”

周恩来友好地告知老挝方面，中国决定向老挝提供长期贷款，帮助老挝建设一些工业项目并提供技术和设备，诺萨万还要求中国援建的风沙里公路，完工后延伸修建到南塔，周恩来答应予以考虑。

1963年2至3月，老挝国王西撒旺·瓦达纳和富马首相出访日内瓦会议各签字国，6至8日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老挝贵宾并举办盛大宴会盛情招待，陪同老挝客人会见毛泽东，出席北京万人欢迎大会。

周恩来与富马首相举行友好的会谈，说明中国尊重老挝的独立、中立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支持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希望老挝国内团结下去，发展起来。国王对周恩来说，中国对他如此尊重使他感到自豪。

老挝代表团一个成员在周恩来面前将双手掌伸直，手指并拢、合十齐唇鞠躬施礼说：“美国人对我们的接待只能打零分，无法与中国同日而



语。”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工作也有不少缺点，请提宝贵意见。”老挝朋友伸出大拇指道：“中国可以打10分！”

其后，美国公然向老挝亲美部队提供大量武器和作战物资，派遣大量的美国顾问和军事人员，1964年4月19日直接指挥右派军队进攻老挝解放区，再次颠覆民族联合政府，并从5月17日起，派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强化了对老挝的侵略战争。

周恩来在与也门等贵宾的会谈中，强烈抗议美国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导致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飞机甚至肆无忌惮地轰炸老挝解放区和在康开中国代表机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任何拖延召开14国会议的做法，只能有利于美国的侵略和干涉，只能使老挝和印度支那的战火进一步扩大。

交口称赞中国筑路大军

面对美国扩大老挝内战的行径，应老挝人民党和老挝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老挝人民捍卫国家独立的正义斗争。

周恩来和陈毅多次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老挝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威胁，如果美国继续派兵侵略老挝，“我们将不能置之不理”，中国绝不会



坐视日内瓦协议被撕毁，让战火烧到自己身边。

1961年4月25日，周恩来和富马签署共同声明宣布，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同意帮助修建风沙里至帕卡的公路。9月11日，周恩来亲笔批示，援助风帕公路“要动用工兵部队”，中国要“包下来，修得快，修得好”。同年12月1日，周恩来审批的中国外交部关于援老工作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在逐步促进老方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援助”的方针。又应苏发努冯和凯山·丰威汉的强烈要求，周恩来决定派能够独当一面的段苏权常驻老挝，调查研究，沟通意见，以便中老领导人迅速决策。

1962年1月13日，周恩来派代表前往老挝王国临时首都康开，与老挝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老挝修筑风帕公路的协定。

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中国援助老挝的两个工程大队共4315人携带大批装备进入老挝，克服气候炎热、群山连绵、森林茂密、河溪纵横的困难，1963年3月15日风帕公路全线竣工，富马首相亲自视察，老挝王国首相府发表公报，称赞中国修筑的公路“质量良好”，向周恩来表示感谢，将其命名为“老中友谊路”。

鉴于美国直接干预老挝的战争迅速升级，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审时度势，认为中国应进一步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下决心把老挝爱国部



队的后勤补给包下来，老挝人民需要多少，中国就帮助多少。

1968年美国强化侵略老挝的战争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8月16日签发的命令，迅速组织起5个支队2万人的筑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老挝，冒雨修筑孟赛至波亭的“老西线”，1969年12月25日胜利竣工，为打败美国对老挝的侵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1年2月，美国在老挝进行的“特种战争”白热化，中国筑路大军急老挝人民所急，不断提高施工效率，4月间建成新西线，又一鼓作气于1972年3月拿下“老东线”，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老挝北部的交通运输状况，有力地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

周恩来为支援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耗费大量心血。他认为老挝北部山区急需公路，经他亲自安排从1962年开始，共派出修路大军11万余人，为老挝修筑7条沥青公路，全长822余公里，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31万元，完成土石方3100多万立方米，如果垒成2米宽、3米高的城墙，可以绕老挝全境一周。

第十六章 锡兰之友

斯里兰卡，原国名锡兰，这个美丽的岛国位于浩瀚的印度洋北部，隔保克海峡与印度遥遥相望。



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一年四季气候宜人，雨水充沛，树木苍翠，风景秀丽，堪称著名的旅游胜地。

周恩来对这个秀丽的岛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20年11月，他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而横渡印度洋的时候，曾到过美丽的科伦坡，对岛国的风光和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陈毅所写的白话诗《过哥伦布》反映了他对锡兰人民的深切同情：

说法的圣地，降魔在铁围墙里，
为甚让千轮万舶，将锡兰的宝物攫去？
……古国覆亡了，只使人深深悲痛，
英国固然残酷，也应怪庙宇无用。

周恩来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取得独立的锡兰人民向中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

充分尊重锡兰人民的意愿

1950年1月7日，周恩来收到锡兰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电报，表示愿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宣布从此结束锡兰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锡兰政府的愿望正合周恩来之意，便于1月9日给锡兰政府复电，欢迎



锡兰派谈判代表前来北京，中国政府将热情接待。

周恩来发现，中国与锡兰建交的道路上仍然存在障碍。

锡兰 1948 年独立后仍然是英联邦的自治领，根据 1947 年“英锡关于外交事务协定”，没有英国政府首肯，锡兰不能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同年 3 月 2 日，周恩来收到锡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斯蒂芬·沈纳亚克通过英国在北京的谈判代表胡阶森转交的一份照会，声称由于锡兰政府缺乏人员，无法派出代表前来北京谈判，也无法考虑短期内在中国设立外交机构，建议暂时委托英国在北京的谈判代表代理锡兰与中国的谈判事务。

对此，周恩来充分尊重锡兰人民的意愿，耐心地促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终于等来了极好的时机。

1951 年和 1952 年锡兰大米歉收，急需购进一批大米，美国却乘人之危，故意压低锡兰出口橡胶的价格，使锡兰的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陷于极端的困境，遂向中国提出以橡胶换大米的要求。

周恩来认为这是发展中国与锡兰关系的极好机会，愿意帮助锡兰解决这个困难，便邀请锡兰政府派人来北京商谈。

于是，锡兰政府派贸易部长森那亚克 1952 年 10 月初来华，签订了中锡贸易协定。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并帮助锡兰政府解决急需大米的困难，周恩来特别指示外贸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



出售，进口锡兰的橡胶则以高于市场价格5~8%购进。

10月4日，周恩来接见森那亚克，说明中锡两国早已承认，现在剩下的就是互换使节，中国政府希望派遣使节，也希望锡兰能派使节来中国常驻北京，因为在中锡之间，并不存在像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问题。周恩来神情凝重地宣称：

“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中国，而另一方面又与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保持联系，并在联合国承认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因此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很难正式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希望先把中国与锡兰两国的外交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也可能组织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去访问锡兰，因为我们两国在经济交流之外，还需要有文化交流。”

周恩来认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文化问题，其政治意义对东南亚必将产生影响，他给毛泽东并朱德、陈云等写信称：

“中锡贸易谈判，已于今日谈妥签字。我们的收获是，锡兰以政府形式担负每年出卖5万吨橡胶给我们以5年的义务，并承认橡胶涨价时，我们亦有权同时提出重议大米价格。锡兰的收获是，我们担负每年出卖27万吨大米以5年为期的义务。”



大雨中发表讲演

就在此时，锡兰杰出政治家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上台执政，邀请世界著名外交家周恩来访问锡兰，这正合周恩来发展中锡关系之意，便于1957年1月31日到达科伦坡，班达拉奈克总理到机场迎接。

两位著名政治家早已互闻大名，今日相见分外高兴。主人先安排客人拜会锡兰总督奥利弗·古涅狄莱克爵士，然后前往锡兰众议院休息室与锡兰参众两院议员亲切会见，参观议会大厅和图书馆，关于中锡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丰富的藏书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共同称赞中锡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往来，近几年友好合作又有很大发展。

班达拉奈克陪同周恩来前往锡兰古都康提访问，应邀出席康提市民的欢迎招待会，周恩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中国高僧法显1500年前历尽千辛万苦到康提访问求学，为中锡悠久的友谊开了先河。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康提的佛牙寺，又在这里的热带植物园亲手种植一颗紫薇，衷心祝愿它年年盛开象征中锡友谊的花朵。

当晚，班达拉奈克请周恩来在锡兰国王的亭阁里过夜，得知这是破例之举，周恩来深深体会到锡兰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科伦坡市政厅举办的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回忆上次



所见的凄惨情景，无限感慨地发表讲话说：

“当我 36 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就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

周恩来首次来访恰逢锡兰独立 9 周年纪念日，锡兰人民在独立广场举行盛大庆祝大会，周恩来应邀在班达拉奈克总理陪同下出席。

锡兰人民再次得见周恩来的动人风采，只见他身穿整洁笔挺的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地坐在主席台上，亲切地向市民致意，便以春雷般的掌声欢迎中国总理讲话。

周恩来风度翩翩走到话筒前，用那特有的动人声音，称赞锡兰这个富饶美丽的岛国是名副其实的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锡兰人民在古代就有了令人钦佩的卓越成就，现在，摆脱了 4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以后，又正在以很大的热情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你们是中国钦佩的朋友……

正当锡兰人民津津有味地倾听周恩来的演说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班达拉奈克急忙让人取来雨伞给周恩来打上。周恩来见锡兰人民在雨中极有兴趣地听他讲话，就彬彬有礼地谢绝锡兰朋友为自己打伞，从容不迫地继续演讲：

“我们满意地看到，锡兰政府和人民执行着维护和平的独立政策。锡兰



总理班达拉奈克和我们举行的会谈取得了十分满意的结果。我们主张促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施，主张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国际争端应该和平解决，支持裁军，主张禁止核子武器，反对成立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所谓‘真空’的理论，反对强权政治。我们相信，这些主张的实现，将能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加强。”

周恩来首次访问锡兰取得丰硕成果，两国总理满意地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坚决遵守万隆会议原则，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谈笑中解决外交难题

中国代表团离开科伦坡前，应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周恩来举办记者招待会，就克什米尔、中美关系和艾森豪威尔主义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一个西方记者抓住最后机会，提出最棘手的问题：

“中国提供的援助果真不附带条件？”

西方记者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很穷，哪里会那么傻，会干赔本的生意？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总理身上，只见他侃侃而谈：

“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提供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建立军事基地和使受援助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



不会受到人民欢迎的。”

西方记者不得不承认：到底是大外交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解决外交难题就在顷刻之间的谈笑之中！

周恩来1957年2月5日结束访问锡兰，两天后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锡友谊日益发展。

就在周恩来积极准备迎接班达拉奈克访华的时候，这位杰出政治家却于1959年9月25日遇刺身受重伤，翌日不治与世长辞。

周恩来得此噩耗极其悲痛，当晚就到锡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班达拉奈克总理，并请锡兰大使向其夫人转达他的深切慰问。

班达拉奈克夫人1960年7月就任总理后，周恩来立即发电表示祝贺，愿意发展中锡两国和与班达拉奈克家族的友好关系。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后，班达拉奈克夫人提议由少数几个友好国家成立一个斡旋委员会，调解中印边界争端，她指示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坦率地回答道：“成立斡旋委员会，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形成一个组织既不利，也不容易。”

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个有主见的人，她把阿联、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加纳领导人请到科伦坡，召开6国会议，周恩来在会前，诚恳地致信说明中国的态度：



“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坚持维护亚非国家的团结。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中印两国和平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印两国之间发生的边境武装冲突，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政府主动地采取了停火和后撤措施，并且开始释放印度被俘的伤病人员。中国采取的主动措施，已经使边境冲突停止下来，使局势有所缓和。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高兴地看到，亚非6个友好国家举行会议，将为促进中印双方重开谈判而进行协商。中国政府衷心地预祝会议成功。”

尽管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在中印边界战争中，总是及时地向锡兰领导人通报战况。1962年11月3日，周恩来接见佩雷拉时告诉他，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两年来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已被清除，其中一部分是被中国打退的，另一部分是印度自己撤退的。对科伦坡六国会议通过的三点建议，周恩来认为不太公允，既没有呼吁印度军队后撤，也没有规定双方在边界的东段和西段脱离接触，但是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宽容大度地致电班达拉奈克夫人并转与会国领导人，邀请6国领导人或其代表访华，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班达拉奈克夫人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派锡兰驻缅甸大使格·斯·佩里斯为特使，先到印度，后到中国，向周恩来转交了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



书。周恩来真诚大度地推动尖锐而复杂的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

“你们总理发起并开成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我们表示钦佩。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促进中印两国直接谈判，达成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中国政府的真诚愿望，说明中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谈判的，中国与缅甸、尼泊尔等国都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

佩里斯被东方外交大师的儒雅风度迷住了，欣然出面证明：“作为锡兰驻缅甸大使，我对此非常了解。科伦坡六国会议推举我国总理为代表前来中国访问，阁下是否欢迎？”

周恩来看到了进一步发展中锡关系的可能，含笑发出令人愉快的邀请：

“我们等候锡兰总理来我国访问已经多年了。我们特别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来访，因为我访问锡兰的时候，你们的总理是已故的班达拉奈克先生。这次你们总理阁下来，我们更欢迎，我们不仅谈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而且还要谈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班达拉奈克夫人听了佩里斯特使的汇报，不禁回想起丈夫在世时周恩来访问锡兰的难忘情景。几次相见，中国总理给她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现在亚洲和世界都有那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周恩来在日内瓦和万隆两个国际会议上展露风采，享有世界级外交家的盛名，与他会见将是莫大的荣



幸……

班达拉奈克夫人百感交集

班达拉奈克夫人欣然于 1962 年的最后一天来华访问，一下飞机，就受到周恩来和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见到老朋友的遗孀，也感到非常高兴，在机场为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位女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陪同客人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愉快的交谈，话题自然集中在班达拉奈克身上。周恩来说班达拉奈克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身材瘦小，带着眼镜，耳边露出两绺厚得出奇的鬓发，说话略带尖音，具有出色的政治家风度，他的一句话至今难忘：

“我觉得仅仅依靠资本主义路线是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我们在经济方面遵循社会主义路线。由于这种形势的反应产生了我们中立主义的概念。我们要同人人交朋友，既要借鉴东方，又要借鉴西方；既借鉴于资本主义，又借鉴于社会主义。”

班达拉奈克夫人见周恩来对丈夫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对丈夫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自然百感交集，一下子缩短了与周恩来的距离。

下午 3 时，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在钓鱼台 18 号楼进行友好的会谈。



客人首先问起中印边界战斗的情况，周恩来坦率地告诉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建立的43个据点已被清除，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全线后撤，中方只在西段的两个河谷地区保留哨所。

班达拉奈克夫人慨叹中印边界问题谈判之难超出想象，周恩来也有同感，坦诚地说：

“我曾是军人，打过仗，但更多的时间是搞谈判。我和蒋介石三次或者合作，或者谈判，谈了十几年，将近20年。有时打，有时谈；和美国马歇尔将军谈过一年；指导过朝鲜战争谈判；参加过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班达拉奈克夫人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和周恩来本人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都是主张和谈的，原来对印度有所偏袒的态度开始改变。

第二天是元旦佳节，周恩来回访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其祝贺新年，亲切问好，接着进行第二次会谈，客人问起中国周围国家的情况。

周恩来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极其尖锐而现实，便坦率地以实相告：中国希望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同亚洲国家友好相处。希望中印友好、维护团结和世界和平。强调亚非国家要团结，要坐下来谈，不要帝国主义插手。

周恩来得知班达拉奈克夫人将与阿联部长会议执行主席萨布里和加纳司法



部长进行调解活动，希望三人到印度活动后再到中国来。

1963年1月2日，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陪同下与其就中印边界等问题进行会谈，在听取他受班达拉奈克夫人委托活动并发表的意见后，严肃地表明中国的立场说：

“看来，亚非六国会议对中印冲突真相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坦率地告诉阁下，在发生中印冲突后，我们的让步可能太多了，引起对方无止境的要求。如果我们当初在冲突发生之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也许中立国家斡旋，会要求双方让步50%对50%。”

然后1月3日举行中国、锡兰和印尼三方会谈，听取亚非六国会议关于调解中印冲突的建议的有关原则之后，周恩来郑重地发表意见说：“尽管亚非六国会议的建议存在部分明确、部分不明确的问题，但是，科伦坡会议及其公报和建议仍然起了积极和有益的作用，这表现在亚非六国会议是把自己放在调解和呼吁的地位，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亚非事务、反对使用武力取得任何领土等6个方面。”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肯定了6个亚非国家的多方奔走辛劳，神色凝重地望望锡兰和印尼朋友，毫不含糊地讲明不同意见：只要求中国后撤20公里而印度不动，这不符合亚非六国会议的精神。

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见周恩来态度如此强硬，担心中印边界冲



突再次发生，在4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答应要做印度的工作，周恩来的态度也稍有缓和：

“中国主动后撤以促使中印直接谈判的声明继续有效，只要印度不采取行动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主动停火和后撤。”

周恩来又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杭州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焦急心情，毛泽东爽朗地笑着感谢锡兰总理为调解中印关系做出的努力，安慰好心的客人说：

“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出了纠纷，需要朋友们帮助解决。”

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到上海，客人提出要拜会世界著名女政治家、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周恩来很快予以引见。两位女政治家相互早就久闻大名，今天首次会见分外高兴，班达拉奈克夫人邀请宋庆龄访问锡兰，宋庆龄邀请周恩来同行，周恩来愉快地答应奉陪，世界外交史上两位女外交家的互访，由于周恩来的大力促成而实现。

周恩来处事细微周到，他记起1963年的1月8日是班达拉奈克诞辰64周年，就亲自安排由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为他举行纪念性的佛教仪式，周恩来亲自陪同锡兰总理参加这一仪式。这大出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意料，面对中国总理为自己的丈夫而举行的庄严而隆重的佛教仪式，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64年2月26日，周恩来结束对亚非欧13国的访问后，不顾长时间远途出访的劳累，实践诺言陪同宋庆龄访问美丽的岛国锡兰，使班达拉奈克夫人喜出望外，率领锡兰各部部长和议员到机场迎接，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

中国代表团首先到中锡友好关系的掘井人班达拉奈克墓前敬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商定合作修建一座大型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作为中锡友谊的见证。

周恩来和宋庆龄、陈毅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多次友好的会谈，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坚信亚非国家如果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进行友好合作，就可能较快地赶上先进国家，至少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工业先进国所用的200多年要短。

班达拉奈克夫人请求中国予以经济援助，周恩来欣然表示同意，说明中国的贷款有低息和无息两种原则。至于偿还的时间，如果到期不能偿清，可以延长时间。

班达拉奈克夫人双手合十致意：“非常感谢！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外汇有困难。我们没有提，但是阁下却主动提出了，我们非常感谢！”

周恩来连连摆手道：“一切援助都是相互的，无需表示感谢。帮助别



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锻炼。加强你们，也就是加强了民族独立运动。”

当天下午，锡兰人民在科伦坡独立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热烈迎中国贵宾访问锡兰。主席台上的三个中国外交家对锡兰人民来说都如雷贯耳：一个是与锡兰人民有广泛接触而极有人缘的周恩来 一个是在亚洲无人不知的孙中山的夫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一个是在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为解决老挝问题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班达拉奈克夫人为能同时欢迎这三个世界著名人物访问锡兰感到骄傲，热情地请周恩来发表讲话。周恩来旧地重游，又面对极其好客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锡兰民众，赞赏班达拉奈克夫人所采取的拒绝载有核武器或核战争装备的船只和飞机进入锡兰领海、港口和机场的主动步骤，称赞这是了不起的正义行动：

“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捣乱，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加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决心。归根到底，建设国家应当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力量……”

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就中印边界冲突的调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既尊重锡兰总理的调解作用，又坚持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充分利用国际力量，推动中印边界冲突向好的方向发展。



班达拉奈克夫人由此再次领略了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看到周恩来体现出的“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中华古老文明的外交传统,对周恩来更为敬佩,愉快地发表联合公报,把中锡关系推向新阶段。

为斯里兰卡少女签名

时光飞逝,转眼进入1970年7月。“文化大革命”时期日夜操劳的周恩来12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华大使古纳瓦德纳。谈话结束的时候,大使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请求,为他的女儿签名留念。

这个请求使周恩来很为难,微蹙剑眉稍加考虑,挥笔在一张纸上签字后,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立了一个戒规,不搞签名,我已经5年时间不给人家签名了。由于阁下这样热情,我非常感动,满足你作为父亲的愿望,但是不能出去说,我也不写日期了。”

于是,古纳瓦德纳得到一张没有日期的写有“周恩来”三个字的签名,他视为无价之宝与女儿珍重收藏,成为中锡友好的例证。

1972年5月22日,锡兰自治领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56岁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再次当选为政府总理。

为发展与老朋友、新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周恩来邀请班达拉奈克夫人6月25日来华访问,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老朋友再次见面,分外热情。



中国给这个小国总理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陪同客人观看中国芭蕾舞——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称赞班达拉奈克夫人是最杰出的娘子军。

6月27日晚,首都体育馆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一头小象,周恩来亲自参加,他宣布中国儿童将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赠送一对白唇鹿,然后观看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而举行的精彩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毛泽东愉快地接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并与她进行了风趣的谈话,鞭挞那些“左派”说:

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了特别友好的会谈。周恩来深知斯里兰卡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片面发展橡胶种植业,形成单一经济,而主要食粮大米却半数依赖外国,受制于人,他便设身处地为斯里兰卡着想,帮助斯里兰卡发展自主经济,为此制定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愉快地出席签字仪式,尽快地予以落实。

为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种植园为主的农业经济,周恩来又决定援建棉纺织



印染厂。对此，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周恩来表示感谢，认为是对她刚组建的新政府的巨大支持。送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沈阳访问后，周恩来连夜赶回北京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再乘飞机赶往东北，陪同客人到大连和上海访问，在上海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斯政府联合公报。

班达拉奈克夫人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两人的最后见面，这时周恩来得了癌症，仍然顽强地工作，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的援建问题，得知中国画家对油画的主题争论不休，就亲自灯下苦思，将其主题确定为“美丽富饶的国土，勤劳勇敢的人民”，帮助解决了设计和施工中的许多问题。

班达拉奈克夫人得知周恩来患病住院，就派她的儿子阿努拉率领一个代表团前来探望。

1975年3月17日，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支撑病体接见阿努拉。阿努拉恭恭敬敬递上母亲的慰问信，对周恩来表示由衷的问候。阿努拉成为周恩来会见的最后一位斯里兰卡朋友。

1976年1月，班达拉奈克夫人惊悉周恩来逝世，沉痛地发表公告说：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世界上一位十分卓越的人士。特别是对发展中的世界，他是一位真诚杰出的朋友。他对殖民统治下的国家解放的赞助，是它们在战胜外国统治的努力中一个巨大的鼓舞源泉。



对他的逝世，我感到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始终如一的真诚朋友。”

第十七章划定珠穆朗玛峰

只有 14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尼泊尔，却是个文明古国，早在 2500 年以前，佛祖释迦牟尼就在这里诞生，佛教就从这个国家发源。1414 公里长的共同边界把中国和尼泊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国虽然大小不同，社会制度各异，但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两国 1955 年 8 月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援助的原则

1956 年 9 月 26 日，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尼泊尔领导人首次访华，周恩来非常重视，陪同毛泽东予以接见，邀请他们参加中国的国庆庆祝活动。

周恩来与阿查里雅进行了愉快的会谈。阿查里雅头戴尼泊尔黑帽，上身穿黑色尼泊尔上装，下身着紧腿白裤，雄心勃勃说要大力发展尼泊尔经济。

周恩来很欣赏阿查里雅的勃勃雄心，表示中国完全赞成和支持尼泊尔发



展经济。同时针对客人的急躁情绪提醒说，在你们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环境下，你们的政策要一步步前进，不能采取激进政策，不然要引起国内外的困难。

针对尼泊尔国内的一些情况，周恩来说善意地劝说阿查里雅，与在北京的尼泊尔共产党谈谈，说服他们团结合作，政策不要太激烈，不然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和党派，这是中国的经验。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对外关系也能搞好。对外也要能团结更多的国家，尤其是邻邦。

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我们真诚地希望看到邻邦的发展，尊重邻邦的独立、主权，这就是“潘查希拉”。

关于对尼泊尔的援助，周恩来说中国将援助尼泊尔 6000 万印度卢比，为期 3 年。援助内容是给一部分印度卢比的现金，提供一部分物资和机器设备。中国这样做，第一，不给美国任何借口或更推动美国对你们也进行无条件的援助，像柬埔寨那样；第二，在援助的过程中证明我们没有别的意图，我们只是为了帮助邻邦繁荣，这样印度也会高兴。

阿查里雅被周恩来的一片真诚感动了，表示完全同意中国的意见，愉快地与周恩来签署了联合声明，签订了《中国尼泊尔经济援助协定》，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



鉴于印度与尼泊尔的特殊关系，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介绍中国对尼泊尔首相提出援助要求的答复是：

第一，中国愿意同尼泊尔发展友好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的友好关系上。

第二，中国愿意帮助亚非各国，特别是邻国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原则上也愿意应尼泊尔的要求提供一些援助，援助将在下列情况下提供：（一）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二）不派人到尼泊尔去；（三）可以给一些物资和现金。

周恩来特别强调，给些什么，完全看尼泊尔的需要。提供后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现金的用途我们绝不过问。

尼泊尔君臣心悦诚服

尼泊尔政府早就邀请周恩来前去访问，但却一再推迟。1956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明他的尼泊尔之行再不能拖延了：

“（由于1957年1月7日要去苏联访问）如果在一月初访问尼泊尔，则感到时间过于仓促，只能访问一两天，这样就不能按照原来商定的时间进行访问。我觉得这样办很不妥，对尼泊尔政府也不礼貌。所以我想宁可把我的访问推迟到1月底，以便能够按照原来商定的时间在尼泊尔做四五天的



访问。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友好的邻邦，是会谅解我们的困难的。对于这个改动，希望尼方谅解。潘大使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关系，不要引起误会。”

1957年1月25日，周恩来首次访问尼泊尔到达加德满都，立刻被这里的独特风光所吸引，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肥沃河谷之中，在葱郁的林木中露出座座寺庙，因而被称为寺庙之城。

阿查里雅首相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两人再次见面分外亲热，亲切会谈后拜访马亨德拉国王，尼泊尔大会党领袖柯依拉腊在拜会中说，双方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尼泊尔方面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取消封建制度和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向中国学习。

阿查里雅明知尼泊尔内部对此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他很想就此征求著名外交家周恩来的意见，没有想到柯依拉腊在马亨德拉国王面前提出了这个问题，担心周恩来万一说出不合适的话惹得国王不高兴。周恩来说：

“就中国的经验看，封建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一定将为进步的制度所代替，但是改革的具体步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某一封建制度的某些事和人，在一定条件下起着积极作用，也是应该加以估计的。”

马亨德拉国王对周恩来的得体宏论极为赞赏，阿查里雅对周恩来的外交艺术更加佩服，陪同中国客人兴致勃勃地参观加德满都的一所孤儿院，周



恩来非常喜爱天真活泼的儿童,捐赠5万尼泊尔卢比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接着参观一所佛教徒寄宿学校和佛教寺院,对加德满都的寺庙之城的称呼有了亲身的体会。

中国代表团来访的消息霎时间传遍加德满都,好客的尼泊尔人民都想一睹周恩来的动人风采,因此前来参加欢迎大会的人特别踊跃。

周恩来见加德满都大检阅场人头攒动,旗帜如林,动情地发表讲话说,在历史上,尼泊尔曾经是中国的学者和匠师寻求知识和技术的地方;同样,中国的文化也曾经给过尼泊尔以影响。在今天,我们两国之间在建设事业中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也一定能够促进我们各自的国家的进步。

周恩来动情的话语,赢得了尼泊尔人民热烈的掌声。

尼泊尔执政的人民党主席米斯拉久闻周恩来的大名,愉快地与周恩来会见,就亚非团结问题向中国总理请教,周恩来客气地发表意见说:

“亚非团结的中心是这个地区的民族独立国家,如何在和平、反战、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主张之上团结起来,我们亚非国家的斗争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各国要团结,一方面要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周恩来怀着深深的敬意访问尼泊尔的古老城市拉提土尔,参观300年前沙阿王朝建筑的拉提土尔国王的宫殿,称赞尼泊尔的建筑,与尼泊尔的古



老文化一样光辉灿烂。

正当周恩来津津有味地欣赏尼泊尔的古老文化和拉提士尔的美丽景色的时候，得到马亨德拉国王即将前往尼泊尔东部进行视察的消息，他立即中断参观前往加德满都的土迪克尔广场，参加欢送仪式。马亨德拉国王没有想到一个大国总理竟然中断访问赶来为自己的普通出巡送行，称赞周恩来确实是尼泊尔人民的朋友，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山雄鹰。

阿查里雅首相陪同周恩来到尼泊尔被称为“虔诚之城”的名城巴克塔普尔城访问，参观了当地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遗迹，然后在尼泊尔广播电台发表对尼泊尔人民的告别词 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尼泊尔人民的忠实的朋友。我们两国人民不但是被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联结在一起的，而且也是被我们支持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进行友好合作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的。在走向这个共同目标的道路上，我们永远需要互相帮助，也永远需要同一切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合作。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印度、尼泊尔和中国三个国家的合作，不仅可以使这个地区的和平得到保证，而且可以对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此前后，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尼边界问题。因为中尼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自古以来从未划定，双方虽有传统习惯线，但双方对某些边界段落的管辖问题，仍然存有争议，长此以往难免产生误



会，应该设法尽快解决。

1959年10月，尼泊尔乡村发展大臣吉里博士访华会见周恩来的时候，两人从中印边界冲突谈到中尼边界的处理方法问题，周恩来谈了他的想法：

关于中尼边界问题，两国边界未正式划定过，但两国间有一条习惯线。我们愿意表明，在边界未正式划定前，我们同意双方维持这一习惯线，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同时为表示友好，在亚洲树立范例，如尼政府同意，我们也愿立即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且经过勘测，划定边界。

在周恩来的大力促成下，尼泊尔新任首相柯伊拉腊1960年3月11日来华访问。

周恩来认为具体解决中尼边界问题是需要时间的，中国首先提出三个原则：一是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肯定现状；二是对个别争议，做个别调整；三是希望这次能够解决争议，技术问题交联合委员会处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主题是边界问题。

柯伊拉腊对此三个原则表示同意，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他的建议：这次可签订一个边界协定，以后再签定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证两国友好。我们要互相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以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论留下，也要互相做这样的保证。



柯伊拉腊对此完全同意，出乎他的意料，周恩来又郑重地告诉他：“如果有西藏叛乱分子越境，由尼泊尔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权处理。可以根据国内法律和国际习惯将他们扣留，容许避难，或者送他们回来。”

这正是柯伊拉腊极其担心而又难于启齿的问题，没有想到周恩来这样善解人意，提出如此严以责己的处理方法，真是平等待人的典范。

周恩来与柯伊拉腊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发生分歧，周恩来以非凡的智慧提出既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的方案：

“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说这个峰属于尼泊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

对周恩来提出的解决方案，柯伊拉腊深表赞成，并希望中国周恩来爽朗地表示赞成说，阁下需要提出一个项目，我们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要求任何特权。如果你们派人来学技术，我们欢迎。中国的援助不可能支付现款，因为我们的外汇有限，可以提供一部分货物，由你们出售取得现金。

在3月21日举行的国务院第97次会议上，周恩来汇报中尼边界的谈判的今昔对比说：



“18 世纪末，我国同尼泊尔曾划过边界，当时划的方法非常粗疏，也没有条约。现在的划界原则，主要以现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根据双方的地图和双方实际管辖的地区进行划界。对珠穆朗玛峰的争议，可做悬案，以后继续解决。我们要树立友谊的边界，提议双方在边界本侧 20 公里地区内，除保持行政人员和民警外，不再派武装人员巡逻，尼方同意。整个协定的精神是平等、友好的，和中缅边界协定相仿。”

当天，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做中尼边界协定和经济援助协定问题的说明报告，获得批准后愉快地与柯伊拉腊首相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于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尼政府联合公报迅速传遍全世界：

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尼两国在相互关系中，一贯忠实地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于保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和亲密友谊的深切愿望，中国政府建议两国缔结一项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同意，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期间，讨论和签订这一条约。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同意在三年期间向尼泊尔政府提供总值一亿印度卢比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无偿援助。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合作，两国政府同意在北京和加德满都互设大使馆。

一个月后的 4 月 26 日，周恩来应邀访问尼泊尔到达加德满都，受到柯



伊拉腊首相和所有尼泊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加德满都放假一天，市民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市民大会欢迎周恩来前来作客。

27日，周恩来在柯伊拉腊陪同下，乘飞机前往加德满都西北约90公里的旅游胜地博克拉，登山欣赏优美的风景，一起仰望高耸云天的座座山峰，只见珠穆朗玛峰在群峰之上的云端露出独特的雄姿，然后缓缓向后移动，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另外的一片云霞之中。

柯伊拉腊迟疑许久说：“尼泊尔人对埃佛勒斯巍峨峰（珠穆朗玛峰）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

周恩来完全明白，中尼边界线争议较大的地区是珠穆朗玛峰，双方在地图上的划法不同，中国应该做友好合理的解决，柯伊拉腊的目的是提出把边界线划在珠穆朗玛峰顶，北面的山坡归中国，南面的山坡属于尼泊尔。

周恩来抓住时机道，“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一定设法使中尼两国人民都满意。”

28日晚，周恩来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有的记者说，中国要对珠穆朗玛峰提出领土要求，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谣言，中国从未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



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周恩来说关于在两国地图上的不同划法,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柯伊拉腊首相之时,认为我们可以按照尼泊尔的划法,把边界划在山峰上。这就是说,峰的北半部属于中国,峰的南半部属于尼泊尔。自从毛泽东主席同柯伊拉腊首相谈话以后,我国政府一直采取这个态度。我们表示接受把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尼边界线上的划法。

1960年4月28日晚11时,周恩来和柯伊拉腊在中国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29日早晨动身回国,柯伊拉腊首相等尼泊尔领导人到机场热情欢送。

面对小国的误解不急不躁

在两国间出现问题时,周恩来绝不以强凌弱,而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将坏事变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好事。

1960年6月28日一队尼泊尔人马误入中国边境,中国剿匪部队误认为是西藏叛乱分子,开枪射击打死一人,俘虏10人。柯伊拉腊首相写信提出交涉,周恩来很快复信说:

这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中国境内,中国部队并未进入尼泊尔国土。中方对此表示歉意,对不幸的死者表



示哀悼。中国政府已经指示当地的部队立即追究这一事件的责任，请尼方领回人员和一具尸体及物品，中国政府并且愿意接受尼泊尔方面关于赔偿的要求。鉴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为了在中尼边境避免再次引起误会，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10公里的地区内进剿西藏叛乱分子。一俟剿匪任务结束，中国部队将立即撤离边界本侧20公里的地区。

柯伊拉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又来信指责中国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向尼泊尔境内的墨古地方的村民射击。周恩来认真调查后耐心地予以解释，答应尼泊尔方面提出的赔偿5万卢比的要求，并在完成剿匪任务后撤出了中国部队，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中尼边界协定签订后，很快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进行边界线的划界工作，1961年2月9日，周恩来接见并设午宴招待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首席代表帕·巴·卡特里少将为团长的尼泊尔代表团，发表讲话说：

去年中缅缔结了边界协定，今年中尼又有可能缔结边界条约。中国希望在今后几年内能够同其他具有同样愿望的国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同样的条约。这样，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就能够普遍地推广到中国 and 它的周围邻国之间，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尼友好关系并签订中



尼边界条约。

卡特里 10 日举行答谢招待会，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对尼泊尔的经济计划获得成功，中国政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称赞中尼双方一直按照万隆精神处理两国边界问题。

1961 年的金秋，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邀请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 12 周年的庆祝活动，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愉快的会见。

周恩来与马亨德拉国王就中尼边界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会谈。周恩来主张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既要照顾到尼泊尔人民的感情，也要照顾到中国西藏地方的人民的感情，因此，在边界条约中要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措词。

马亨德拉国王出于对周恩来伟大人格和外交魅力的极大信任，毫无顾虑地提出“边界通过峰顶”“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的主张，周恩来表示同意，还决定帮助尼泊尔修建从加德满都直达西藏的公路。

10 月 5 日，马亨德拉国王欣然与刘少奇主席签署了两国边界条约，周恩来与马亨德拉国王热烈地握手祝贺，称赞这是睦邻友好的典范，它规定中尼边界线通过珠穆朗玛峰，任何人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要经中国政府批准，应该通知尼泊尔政府；任何人从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要经尼泊尔政府批准，应该通知中国政府。在珠峰上，中尼两国政府任何一方如要



设立服务于和平目的科学探测站，须经中尼两国政府事先达成协议。

周恩来与尼泊尔朋友举杯祝贺，祝贺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正式划定两国边界，打下了两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第十八章“丝绸之路”上的友谊之花

阿富汗是帕米尔高原西南的友好邻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中心地带，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周恩来对这个高原小国的外交倾注了大量心血，使两国友谊大展异彩，两国之间只有友谊和鲜花，从来没有战争和冲突的遗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局面尚未打开的困难岁月里，阿富汗政府就于1950年1月12日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就对这个高原之国充满了敬意，很快复电欢迎阿富汗承认新中国的决定，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周恩来感到遗憾的是，阿富汗政府在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仍然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投弃权票，使两国关系没有很快进一步发展。周恩来对此持理解态度，认为这个小国有它的困难，应该耐心等待。

事情不久就有了转机。1953年查希尔国王亲自掌权后，执行对中国友



好的政策，周恩来顺水推舟，1955 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相貌奇特的查希尔国王

应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的邀请，周恩来1957年1月17日到达首都喀布尔，开始对阿富汗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在机场受到达乌德首相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稍事休息就前往王宫拜访查希尔国王。

王宫位于喀布尔的市中心。这是一座庞大的19世纪建筑，四周高墙围成一个高大的深院。王宫门口有身材高大的帕坦族哨兵把守，这些哨兵头戴德国式钢盔，手持步枪，肩负背包，给人以威严之感。

当时太阳正缓缓西沉，御苑内到处鲜花盛开，芳香扑鼻，所有的花木都沉浸在一片粉红色的晚霞之中。来往奔忙的仆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穿着整齐的服装，戴着喀拉式的帽子，阿富汗官员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蒙兀儿皇帝时代的遗风。

周恩来被仆从引入国王的书房，只见30多岁的查希尔国王相貌奇特，与众不同：身材高大，又黑又瘦，身穿双排钮扣的蓝色服装，花条衬衫。更使人惊奇的是国王的脸：褐色面孔，大胡子，尖秃顶，畸形的鼻子，奇怪的微笑。

出乎周恩来预料，查希尔国王虽然相貌奇特，但是对人却极其和善，



希望得到友好国家的援助，但绝不出让任何主权。周恩来对国王顿生敬慕之心，称赞查希尔国王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

周恩来一行前往喀布尔四十柱宫出席达乌德首相举行的宴会，参观喀布尔博物馆，出于中国根治黄河水害的需要，又特意南行80公里考察索罗比水电站工程，虚心地向在阿富汗的西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水坝的含沙量和洪水量等情况，取根治水库淤塞之经。

周恩来与达乌德首相等领导人进行了三次友好的会谈，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取得广泛的共识。

达乌德尽情而充分地阐述阿富汗奉行的传统的和平中立政策，表达出努力促进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

周恩来非常理解达乌德和阿富汗领导人的心情，友好地表示，中国政府 and 人民完全支持阿富汗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钦佩阿富汗人民过去和今天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的坚决态度，赞赏阿富汗人民在国内和平建设中作出的巨大努力。

周恩来风度翩翩地对世界上存在三种类型国家的现状做了深刻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都应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互相对立，但并非不可以彼此相约，各守边界，互不挑衅，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社会主义国



家不干涉他国内政，但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是我们不允许的。

对于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向达乌德首相说明：

“民族主义国家普遍爱好和平，拥护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都应该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不侵犯他们的自由和自主，在经济上同这些国家平等互利，实行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合作，在防务方面建立集体安全，不搞军事集团，这样，各国之间就能真正和平共处，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签订中阿边界条约

10月23日，达乌德首相回访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毛泽东亲切接见达乌德，介绍他与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出席北京各界人民8000人举行的欢迎大会，观看首都文艺界演出的精彩歌舞和京剧，欣赏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剧芭蕾舞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吉赛尔》。悠久的历史纽带，相同的斗争经历，热情周到的接待，使达乌德首相有宾至如归之感。



周恩来与达乌德进行了三次友好的会谈。周恩来提出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为和平而努力。他希望在联合国内外造成舆论，使反对裁军的人和继续试验核武器的人受到压力，使问题达成协议，这对和平有好处。我们认为全世界都需要道义的力量，而道义力量来自许多小国，特别是亚非国家，新兴的国家。

其后，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深入发展，两国领导人像走亲戚一样来往不断。

1959年9月5日，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来华访问，周恩来与陈毅到机场迎接，他们在几次访问中已结下深厚的交情，因此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

那时，密云水库已胜利拦洪，纳伊姆对这个亚洲闻名的水利工程向往已久，提出要去参观，周恩来欣然陪同前往。

纳伊姆对他的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愉快地举行告别宴会，周恩来的致辞赢得了阵阵掌声，纳伊姆带着周恩来的至理名言返回阿富汗：

“我们亚非各国只要高举万隆会议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就能够互相友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影响。”

为推进中阿关系，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受周恩来总理之命1960年8月访问阿富汗，在喀布尔签订了中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鉴于中国与阿富汗两国的关系日益友好，阿富汗政府1962年12月向中国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周恩来和陈毅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从1963年6月开始谈判。

周恩来对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早已进行过深入研究，两国边界长约100公里，双方都承认尚未定界，需要谈判解决。周恩来非常清楚，中阿边界问题本身比较简单，但又因这一边界位于帕米尔南部，与历史上的帕米尔问题密切相关，也牵连到中苏边界问题，因而有复杂的一面，必须慎重行事。

周恩来与陈毅及外交部官员多方研究，考虑到中国与阿富汗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与中国友好的邻邦小国，因而应该按照双方的实际管辖情况划界，但声明这样做绝不涉及中苏边界问题。

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下，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谈判从1963年6月开始，经过友好协商于8月1日达成协议，邀请阿富汗内务大臣卡尤姆博士率领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中阿边界条约代表团来北京共襄大事。

11月20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热闹非凡，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设宴欢迎阿富汗代表团，周恩来因有重要活动未能出席，但陈毅的致辞经他反复推敲，反映出周恩来睦邻外交的光辉思想：

“在我国的西南边疆上，中国和缅甸之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中国



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存在着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在中阿边界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又将出现一条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中国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

1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卡尤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对即将签订的中阿边界条约给予极高的评价，特别询问了阿富汗对水库淤泥的处理办法，还微笑着说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与阿富汗1965年3月在喀布尔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阿富汗提供10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承担了水利灌溉工程和纺织厂等6个成套项目和青金石雕刻、试种茶等5个技术合作项目。1972年应阿富汗的要求，中国无偿援建250张病床的医院一座，价值500万元人民币。



第十九章 金日成的眼泪

真挚友情在隆隆的炮声中形成

朝鲜，是周恩来访问最多的国家，中朝友谊用鲜血所凝成。

金日成比周恩来小 14 岁，两人患难之交，生死与共。

早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烽火年代里，周恩来就久闻朝鲜抗日英雄金日成的大名，感谢他在中国东北组织朝鲜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浴血奋战，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久传来喜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48 年 9 月 9 日诞生，金日成担任首相。一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周恩来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金日成立即指示朝鲜外务相致电周恩来，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欣然同意，很快派出中国外交官到朝鲜建立大使馆。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急切地请求中国出兵。周恩来最理解金日成的心情，但考虑到要和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国大军较量，新中国在废墟上刚刚诞生，马上出兵朝鲜的确有不少困难，但从大局出发，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周恩来在 8 月 25 日政务院会议上慷慨陈词：

朝鲜民族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血肉关系，朝鲜人民帮助过中国人民。现在朝鲜人民正抵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这是替亚洲



人民打头阵、当先锋。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

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金日成的英明指挥下，中朝军队连续奋战，一举收复朝鲜首都平壤。毛泽东接到胜利捷报诗兴大发，挥毫和了柳亚子一首《浣溪沙》，正好周恩来前来汇报最新战况，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指着桌上龙飞凤舞的诗稿说：

“刚好朝鲜前线传来捷报，有了兴致，便和柳亚子一首，今天给你恩来献个丑，请斧正。”

周恩来极感兴趣地拿过来吟道：

颜触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周恩来连声称赞说：“妙啊，‘正和前线捷音联’，好！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主席对抗美援朝前线捷音频传的喜悦心情。‘而今一扫纪新元’，‘妙香山上战旗妍’这些佳句，也是对前方将士的巨大鼓舞。”

金日成提起美国总统杜鲁门威胁要对中朝使用原子弹，特意询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看法。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被吓住，金日成放心多了，又问起斯大林的态度，周恩来深



有感慨说：

“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所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惨壮烈，他流泪了，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谈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等问题，紧急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的下属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从此，中朝两国军队开始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1951年1月28日，金日成再次秘密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两人紧急协商迫在眉睫的中朝两军作战与后勤供应运输等重大问题。

在组织落实的复杂过程中，周恩来日以继夜地超负荷工作而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前往大连休养。

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提出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后，38岁的金日成对杜鲁门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6月3日急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协商对策，未见到周恩来，他与毛泽东讨论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金日成急



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周恩来的病情，托人表示对老大哥的问候。

周恩来在大连休养期间，时刻惦记着朝鲜战和问题，未等痊愈就赶回北京，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为毛泽东起草与斯大林、金日成协商关于朝鲜谈判的策略文稿。

酒逢知己千杯少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往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朝鲜问题与斯大林进行协商。苏联领导人对朝鲜战争非常关心，有的人对美国和“联合国军”怀有恐惧心理，竟然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极其有害的看法说：

“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这正是斯大林最为关心的问题，自从中国单独向朝鲜出兵，特别是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之后，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因而欣然赞同周恩来的看法：

“毛主席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美、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我们对美国应该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



为了使苏联直接了解朝鲜战场和谈判的情况,更好地解决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援助问题,以便协调行动和斗争方针,周恩来认为应该请志愿军司令员、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莫斯科,因为是他指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仅仅经五次战役,就打得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低头求和,由他出面与斯大林谈朝鲜战争和苏联提供武器问题,岂不更好?于是周恩来建议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商,斯大林完全赞成,欣然接受周恩来的意见。

9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和周恩来马上予以会见,称赞他们打得好,又设宴慰劳。

斯大林非常欣赏彭德怀的指挥才能,他忽然端着一大杯白酒走到彭德怀面前,让彭德怀斟满一大杯白酒与他干杯,这可急坏了金日成,因为金日成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白酒,自己又不好出面阻拦,驳斯大林的面子非同小可,便把求援的目光投向周恩来。

周恩来非常了解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相信他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便示意金日成不要多虑。中国代表团著名翻译师哲最了解彭德怀的身体状况,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酒,就提醒彭德怀不要勉强过饮。

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知道彭德怀有酒量,示意师哲不要干涉。

彭德怀果然不负周恩来所望,豪爽地与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



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好像在寻找彭大将军战胜美国佬的秘密，邀请彭德怀到一旁纵情欢谈，请他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转达苏联人民的问候和祝贺，周恩来和金日成都皆大欢喜。

1952年9月4日，斯大林把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请到他的家里，协商朝鲜问题的战争和谈判大计，殷勤地请中朝领导人喝酒，斯大林遇到周恩来这样善饮的知己尽兴而喝，周恩来和金日成也不示弱，频频干杯，热闹异常，一连喝了4个小时。

尽欢而开怀畅饮，每个人都有了醉意，金日成主动搀扶兄长周恩来要走，周恩来认为金日成是国家元首，反过来推金日成先行，两人推让良久，周恩来拗不过金日成，只好举步前行。彭德怀明白周恩来的意图，上前推金日成跟上周恩来，自己走在最后，三国领导人融洽无间。

9月12日，斯大林再次把中朝领导人请到他的家里欢聚，商谈朝鲜问题的战和大计，从中国和朝鲜民族的由来，到三国的良好明天，无所不谈。

诚如周恩来预料，彭德怀的这次莫斯科之行，促使中苏朝三方关于朝鲜战争和苏联提供军事装备的谈判顺利成功。这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又一大成功。

中苏朝三国的密切合作，终于以鲜血生命和勇敢智慧迫使美国在朝鲜停



战协定上签字。为协商停战后的中朝关系，金日成率领朝鲜代表团1953年11月12日来华访问。

周恩来的话极为解渴

金日成此次来华主要是想得到中国的经济援助，这对刚刚接过旧中国破烂摊子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无疑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给少了，不解决问题；要多给，手头实在太紧，曾使周恩来一度感到非常为难。

13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切接见金日成和朝鲜代表团全体成员，又设盛大国宴热情招待，他满面春风致辞说：

“中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向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现在，中朝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将尽力支持和援助渴望恢复国家统一、渴望和平进步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并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

周恩来与金日成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会谈。周恩来提出两国除了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外，还可以签订一个不对外公布的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



送给朝鲜政府。策二，决定在今后4年内再无偿地赠送朝鲜政府8亿元人民币。

周恩来还推心置腹地对金日成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企业的布局，要适应国内原料条件，保证国内供应平衡，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这样才能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不然，投了资会冻结资金和积压物资的。在经济发展时期，要搞工业，但如将恢复重点先放在农业和副业上，会有利些，容易些，并且见效快些，同时也有利于工农联盟。

金日成觉得极为解渴，确有顿开茅塞之感，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早在考虑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他约见周恩来和金日成开怀畅谈。三位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竞相发表对世界形势和中朝关系的真知灼见，谈笑风生，乐趣无穷，从18日晚9时开始，不知不觉交谈6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兴趣盎然。

在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中朝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等7个协定，对朝鲜新提供8亿人民币的援助。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已付出巨大牺牲，自己也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再对朝鲜提供这样巨大的援助是否必要？周恩来针对这一情况，于11月26日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上解释说：

这次中朝政府谈判，签订了协议，表明中国将继续帮助朝鲜。这件事，



在政府机关和全中国人民中，也许会引起疑问：我们正在建设初期，同样需要钱，为什么还要帮助朝鲜这么大？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朝中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利益。

周恩来满怀深情指出，在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付出的代价更大。停战后，必须巩固朝鲜已得的胜利，恢复朝鲜战争创伤，这是和平阵营的共同责任。中朝两国继续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世界的和平有重大意义。

金日成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1955年获知中国东北电力紧张，金日成立即暂停国内照明用电，紧急将电输往东北，聊解东北的燃眉之急。

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58年2月14日，一架银灰色飞机自北京机场腾空而起，穿云破雾向东北方向飞去，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首次访问朝鲜。

周恩来感到肩头的任务很重，有人担心金日成在美军赖在南朝鲜不走的情况下撤退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否真的想得通，也有人担心志愿军将士转不过马上撤走的弯子，不愿留下自己的大量武器装备而与朝鲜人民产生新的矛盾……

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朝鲜，这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朝鲜半岛更具有



深远的影响，因而在机场受到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和人民的盛大欢迎，他们挥动花束和彩绸，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金日成与周恩来紧紧拥抱，以最热情的语言欢呼周恩来的到来：

“欢迎您，周恩来总理！”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年儿童跑上前来，向中国贵宾敬献鲜花，乐队高奏中朝国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周恩来中国代表团在金日成陪同下，乘敞篷汽车前往国宾馆沿途10余里的道路两旁，往昔的战争废墟早已被高楼大厦所代替，4万朝鲜人民身穿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欢声雷动，平壤人民都想一睹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风采，纷纷而出夹道迎接，欢呼声响彻云霄。

当天下午，周恩来前往朝鲜内阁大楼拜会金日成、崔庸健等领导人。

金日成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卫国战争的无私支援，对中国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永世难忘，将世代牢记心间。

周恩来热情地称赞朝鲜是社会主义在远东的前哨，说明保卫三八线决不仅仅是保卫朝鲜和中国的问题，赞扬朝鲜人民为此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中国人民才有了7年多和平建设的时间，因此应该首先感谢朝鲜人民。从革命历史上说，朝鲜人民给予中国反抗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支援，更值得中国人民纪念和感谢。



周恩来一番话说得金日成激动万分，认为周总理充分表达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友之情，这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

周恩来风度翩翩道：“我们志愿军在朝鲜打扰你们，受到朝鲜人民、党、政府和朝鲜人民军的支持和关怀。”

金日成急忙摆手说：“受到援助的是我们。我们从不认为志愿军打扰了我们。我们也没有看见志愿军有什么缺点，也没有人想去发现志愿军的缺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亲如兄弟的。朝鲜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志愿军的援助，保证了长期斗争的胜利。”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诚恳地征求朝鲜领导人对中国和志愿军的意见，特别以比喻的方式说：“我们是兄弟之邦，大的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十个手指头总有一两个手指是有毛病的。”

金日成对周恩来严以律己的精神极其感动，由衷地表示：中国对朝鲜的帮助真是太大了，朝鲜人民永世难忘，周恩来也称赞金日成等朝鲜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志愿军反抗侵略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从革命历史上说，朝鲜人民先参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金首相、崔（庸健）委员长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参加过。朝鲜人民给予中国反抗侵略的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支援，更值得中国人民纪念和感谢。”



当晚，朝鲜政府在平壤国立艺术剧院举行欢迎中国代表团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发表重要演说，宣称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通过协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因此郑重宣告：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同朝鲜政府协商。同时，我们坚决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有关国家同时响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的建议，把自己的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远东局势的和缓创造有利条件。”

2月15日下午，在朝鲜内阁大厦举行的参加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正式会谈上，周恩来说明中国分三批撤退志愿军，在1958年撤完。在志愿军的声明中可以说明撤退后需要时再来，再加上人民和舆论要求撤军。朝鲜的问题，应由内部对等谈判解决，别的国家不能干涉。

1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在金日成陪同下，前往英雄城市元山访问，宾主共同登上元山峰顶，察看工事遗迹，纵谈1950年圣诞节志愿军在这里与美军激战，一举歼灭美国王牌第八军和海军陆战第一师的伟大胜利，真是大长中朝人民的志气！

16日晚，周恩来一行冒着严冬的积雪前往志愿军总部，金日成担心路途艰险，亲自陪同护送前往，送到之后又于深夜赶回平壤。



2月17日是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一大早就纷纷扬扬普降瑞雪，给秀丽的朝鲜三千里江山披上一层银装。每逢佳节倍思亲，周恩来更加思念为抗美援朝牺牲的烈士们，便前往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上两条长长的挽联：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周恩来和陈毅在毛岸英烈士墓前良久默哀，代表毛泽东为他扫墓，嘱咐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在陵园多种果树美化环境，用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陈毅外长赋诗《乘雪瞻拜志愿军烈士陵园》寄托情怀：

烈士陵园座座坟，漫天大雪祭忠魂。

助人自助保家园，万世千秋拜典型。

周恩来亲切接见志愿军将领，就撤出志愿军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讲明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明决策，特别联系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和东欧国家的驻扎情况，说明长久驻扎会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难免发生种种矛盾，从受欢迎的解放者，变为令人讨厌的占领者，就不是国际主义了。

周恩来出席志愿军举行的欢迎大会，代表党中央和政府对志愿军表示亲切的慰问，介绍他们极其关心的国内建设情况，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和现代武器，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军事专家，回去以后更好地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他满怀激情勉励志愿军将士说：

“你们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国以后要永远做最可爱的人！”



当晚，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出席志愿军总部举行的春节晚会和舞会，带头唱起《抗日出征歌》，又亲自指挥全体与会人员放声高歌，志愿军将士和文工团员们激动万分，一边引亢高歌，一边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高高举起，一起欢呼跳舞，将欢乐的气氛推向最高潮，度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夜晚。

2月19日，周恩来与金日成经过会谈，发表了中朝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但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周恩来应邀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说这次中朝领导人的会谈不但会使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助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如果拒绝从朝鲜撤退全部外国军队，它将永远不能摆脱分裂朝鲜的责任。

接着，金日成陪同周恩来访问朝鲜平安南道顺安郡上杨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阿妈妮向周恩来控诉美国侵略者杀害她儿子的罪行，紧紧地拉着中国总理的手说：“志愿军是我的恩人，对我有救命的恩情。”

金日成画龙点睛说：“老太太的话，表达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周恩来深受感动，摇着阿妈妮的手真挚地说：“您说的话很好，我非



常感谢您！若说恩情，朝中两国互有恩情，因为我们援助了你们，而你们也保卫了我们。若说感谢，朝中两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人民军和志愿军。他们并肩作战，共同保卫了两国人民的安宁。老太太，老同志，祝您身体健康！祝您为祖国服务的伟大志愿，能够顺利地完成！”

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接见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捷克和波兰军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两国同志听说志愿军要撤走，产生了不安定情绪。周恩来请波兰和捷克同志留下来继续工作，希望他们积极地推动瑞士和瑞典军官也留在委员会里，以便继续为和平而奋斗。

捷克和波兰同志请周恩来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周恩来坦率地提出希望说：

“志愿军撤退后，最主要的是在军事分界线附近不要出现由南朝鲜策动的骚动，并且防止南朝鲜发动军事挑衅，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对军事分界线地区很好地视察和管理好。”

2月21日清晨，周恩来很早就去拜会金日成并共进早餐，然后金日成把周恩来送到平壤火车站，金日成为周恩来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周恩来满含深情发表告别词：

“我们这次在朝鲜的友好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将在我们今后的日子里留下极为愉快的回忆……我们就要同你们分手了，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



友情而来，现在又将载着朝鲜人民的友情而去！”

“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为庆祝新中国建国10年大庆，金日成率领朝鲜代表团1959年9月26日到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金日成是北京新火车站落成后迎接的第一批客人。

1961年7月10日，金日成访问苏联签订《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来华访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

金日成此次访华主要是磋商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当时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维持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中朝之间虽然存在传统友谊，但从长远考虑以法律的形式缔结一个永久性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是极为必要的，更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周恩来早就与朝鲜方面进行磋商，到此时这一条约已经酝酿成熟。周恩来11日来到钓鱼台国宾馆与金日成再次协商，他坦诚地说：“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

周恩来考虑到随着该条约签订可能带来的一些小问题，主动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热情地表明中国政府的友好态度说：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朝鲜人去鸭绿江中一个小岛上拉砂子，我们的



边防部队干涉不准拉，我们已批评了他们。别说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金日成听了非常感动，他明白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比金子还珍贵，愉快地与周恩来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朝鲜驻华大使馆为金日成访华成功举行宴会庆祝，周恩来应邀出席，高度评价这个条约具有重大意义，认为它以法律的形式把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对于全面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共同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休养，金日成提出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便陪同金日成前往杭州去见毛泽东，三个人进行了融洽的交谈。

金日成提到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风趣口吻说：“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洲；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金日成大受鼓舞，将话题转到国际局势方面，说起中朝人民不怕美国侵略者，毛泽东幽默地频出妙言：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周恩来和金日成谈到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毛泽东以少见的耐心和豁达



说出特别耐人寻味和开心的话：

“让我们二十世纪再等它个 40 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 年之后，我就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毛泽东侧过头去看看 63 岁的周恩来，意思是说我毛泽东比周恩来大 5 岁，今年 68 岁，40 年后 100 多岁，最年轻的金日成也得 90 多岁，多有意思啊！

周恩来笑得特别开心：“我也会见马克思了。”

三人乐得哈哈大笑。

1962 年 10 月 11 日，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第二次访问朝鲜。当时，尼赫鲁多次派人向朝鲜领导人歪曲中印边界冲突情况，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使金日成一时真假莫辨，因此，周恩来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金日成介绍中印边界情况：

“为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61 年我和陈总去印度和尼赫鲁会谈，证明他们没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回来后我们就建议，为了避免双方人员的冲突，各自从当时的巡逻线上撤退 20 公里搞一个缓冲区。以后，我们撤了，但印度方面没有撤。这样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问题。今年，台湾海峡有些紧张、中苏关系不好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就配合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印边界闹事。”



金日成对中印边界犬牙交错的情况表示忧虑，询问中国的态度，周恩来双手曲抱坦然相告：“我们的方针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进攻我，我击退你，我不出击。”

金日成称赞中国的高姿态做法，又询问中国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态度，周恩来介绍它是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但大度地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承认，也不超过，我们打算和他们谈判。”

周恩来说明通过和平谈判和直接对话的方式友好地解决中印两国的边界争端，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周边国界有目共睹。金日成对此有切身体会，相信周恩来讲的是事实。

周恩来和金日成都认为中朝边界条约应该成为模范条约，12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朝鲜边界条约》上签字，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率领中朝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人在苏联及时沟通意见，交换对苏联新领导人的看法，然后一起回到北京再次交谈访问苏联的观感，对苏联新政权的看法取得一致意见。

1970年4月5日，周恩来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朝鲜到达鲜花盛开的平壤，在机场受到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和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天下午，周恩来前往平壤内阁大楼拜会金日成，一见面就真诚地道歉



说：

“本来应该早点来，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10月2日，就同崔委员长说了要来，当时崔委员长说首相同志欢迎我访问朝鲜。11月、12月、1月、2月、3月，可不是半年了嘛！”

金日成见周恩来认真地掰着手指计算时间，道歉的态度是那么诚恳，急忙为周恩来开脱责任风趣地道：

“不要紧，虽然晚了一点，可是时候很好。来早了天气冷，欢迎群众还要受冻。”

金日成对周恩来此次来访特别高兴，因为这标志着正式结束了双方因为苏联等因素造成的两国不自然状况，他有意强调说：

“我们两国之间的不自然关系，从那时（崔庸健1969年10月访华）起，就消除了。我们的人民也感到高兴。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成的战友嘛！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听说周恩来同志要来，我们就等，等待总理来访。我们清楚总理同志很忙，这次来，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感谢总理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周恩来大度地说：“双方领导人直接接触，问题都谈清楚，就好解决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大局，看大方向的。”

毕竟是中朝兄弟容易沟通，金日成欣然赞同：“对，我们也认为，我



们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晚，金日成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摆出最富于朝鲜特色的狗肉宴招待中国嘉宾。周恩来可谓走遍全世界的著名外交家，见多识广，但对金日成的狗肉宴也感到新奇，只见从冷盘到炒、煮的热菜全是狗肉，无论是色泽还是造型，都十分精美。

周恩来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友好会谈，就国际局势和亚洲地区形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交换意见，取得广泛的共识，还出席朝方举办的各种欢迎活动，然后发表公报，满载中朝友谊乘飞机回国。

1971年7月9至11日，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商定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成为惊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周恩来15日飞往朝鲜向金日成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及对形势的估计。

1972年2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3月7日飞往平壤，向金日成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朝鲜，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可能是意识到与金日成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多次私下会谈，就许多问题倾心而谈，9日才依依惜别。两个月后就发现患有可怕的癌症，已不适于长途奔波。

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并改善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多年推行民间外交的结果，因而表示欢



迎。

金日成看到田中角荣在积极准备访华的同时,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有所松动,便对中日改善关系表示欢迎,还指示朝鲜驻华大使转告周恩来,希望8月20日以后来华进行内部访问,与周恩来当面商量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并请求会见毛泽东。

周恩来当晚就写信请示毛泽东,并建议作出如下安排,“金首相来京,拟住钓鱼台18号楼,专机拟在西郊机场降落”,毛泽东见信后当即作出批示:“可以。”

8月22日,金日成来到西郊机场,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两人进行了多次友好的会谈,周恩来应金日成的要求,就国际统一战线、朝鲜、日本、美苏及联合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介绍了他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经验。在谈到外交政策和策略的时候,周恩来介绍自己的体会说:

“外交上争取同上层来往,目标是为了人民。同上层来往,又寄希望于人民。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人民运动服从自己的外交政策;二是搞包办代替,强加于人。上层活动必须有原则性,但不排除灵活性。我党几十年上层统战工作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决裂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只斗争不联合;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有的错误,即只联合不斗争。”



金日成听了很受启发，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经验尤其感到兴趣盎然：“中国同日本搞好关系，对朝方也有帮助。”

周恩来欣然同意金日成的这一看法，表示要借中日关系推进日朝关系：“田中和大平来时，我要同他们谈朝鲜问题，促使日本同朝鲜来往。”

金日成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

1975年4月中旬，金日成再次访华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谈后提出要到305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

已进入生命垂危阶段的周恩来听说老朋友金日成要来探望，非常高兴，但因久病卧床，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特别难办的是双脚肿胀得像馒头一般，根本穿不上皮鞋，特别找了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仔细打扮一番，才于19日会见金日成。

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走进305医院的客厅，周恩来高兴地迎上前去与金日成亲切地握手，清瘦苍白的脸上露出多时不见的笑容。金日成久久握着周恩来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与他心心相印的中国开国总理，见周恩来往昔英俊潇洒的仪态消失大半，心情很沉重。

周恩来乐观、开朗地与金日成交谈，他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金日成也渐渐露出笑容，与周恩来开心地谈了起来，好像又回到往昔



的难忘岁月，但看到周恩来削瘦苍白的脸庞和瘦弱的身体，看到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神情忧愁，说话很少，他的心情就格外沉重起来。

这是金日成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他衷心祝愿老朋友早日康复，仍然活跃在中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

1976年1月8日，金日成正准备做眼科手术，突然听到周恩来去世的噩耗，他悲痛欲绝，立即通知医生取消手术：

“做眼睛手术不能流泪，但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流泪……”

第二十章 台海危机

中国与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的两次重大较量之后，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展开新一轮较量。

炮击金门

在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崭露头角，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本想利用有所缓和的远东局势，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国能够作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大国跻身与世界强国之林。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人对在前两次较量中处于下风极不服气，但鉴于世界形势的变化，新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不得不被迫改变策略，不敢再次公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是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蛮横地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长期霸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令周恩来气愤的是 1953 年 9 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集团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公然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挥，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协定中的防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大陈岛等岛屿，并在台北设立“协调参谋部”，由美国主持，加强控制。

这自然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严重注意，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54 年 7 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周恩来立即组织落实。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 27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容许别国干涉。

2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11 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上，严厉谴责美国“正在加紧指使和援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



沿海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然后郑重地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宣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允许美国侵占，也不允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国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敢于侵犯我国主权和破坏我国领土完整，敢于干涉我国内政，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

12日，周恩来在有关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指出解放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说：

“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因此，我们要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他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他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接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一方



面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请英国做美国的工作，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弦更张，采取明智的态度，特别指出台湾是一个容易牵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希望英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慎重行事。

美国帝国主义不顾中国的警告，更以武力相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嚷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然宣布要以美国第七舰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率领美国海军6艘军舰侵入大陈岛一带海面，公然出动飞机160多架次在大陈岛海面上空活动，猖狂到了极点！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的同时，为了与政治上的攻势相配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4年9月3日奉命炮击金门。

霎时间，福建前线万炮齐轰，惩罚侵略与罪恶的炮弹烧红了天空，纷纷落向金门，美国和国民党的军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两名美国顾问当场毙命。

周恩来密切注视着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进展情况，发现我们的惩罚性炮击打了十几天，美国方面竟然仍不知内情，误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夺取金门、马祖，甚至进攻台湾，美国一些军方人士建议美国当局向金门紧急增兵，并动员美国海空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袭击中国大陆的重要港口和机



场。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样进攻中国大陆风险太大，未敢轻举妄动，力主放弃金门、马祖，但蒋介石坚决不干，从而使美蒋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

围绕台湾海峡的外交大戏

周恩来十分注意围绕炮击金门，开展巧妙的外交活动。他亲自主持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说明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

周恩来特别强调围绕台湾海峡危机唱好外交大戏，说明“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要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之目的。

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向全世界指明“美国参加签订的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肯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庄严的国际协议，决不容许美国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周恩来以中国人的浩然正气，发出严正的警告：

“一切想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以及台湾‘中立化’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的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10月10日，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身份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列举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控诉美国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要求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促使安理会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并责令美国自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其全部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人员，周恩来巧妙的外交语言颇能打动人心：

“（美国的侵略行为）不仅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的内政，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且是增加远东的战争威胁，紧张国际的局势。”

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围绕台湾海峡局势展开极其活跃的外交活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非凡的外交才能，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周恩来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10月19至20日来中国访问，陪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出席印度驻



华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华举办的招待会，观看精彩的歌剧和京剧晚会，请毛泽东亲自为尼赫鲁举行欢迎宴会，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

周恩来与尼赫鲁进行了友好会谈，称赞尼赫鲁积极倡导的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尼赫鲁头戴白帽，身穿印度传统的赭色粗纺外套，讲起他访问美国的观感，说他曾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白宫宴会上坐在一起，杜鲁门对他极为尊重；说他与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有接触，在大银行家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围桌而坐的都是有几十万万美元的大款，一个个口出狂言，他听了直打颤，认为美国人过于浮夸，“不文明”，因而尼赫鲁他说非常讨厌美国人……

周恩来让客人畅所欲言，与尼赫鲁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说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于台湾海峡进行骚扰性、破坏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提出我们的正当主张，这就是不允许破坏我们的海上交通，切断我们的对外贸易，不能容许搞台湾“中立化”和“国际共管”等阴谋活动。

尼赫鲁问中国打算怎么办？他认为非常棘手，周恩来不以为然，将手一挥坚定地说：

“我们是有准备的，不允许侵犯！我们对台湾采取行动是内政问题，而美国采取行动是干涉我国内政。如果美军从台湾撤走，问题的症结就解决



了。”

尼赫鲁摇摇头，叹口气，问周恩来能不能把对金门的炮击停下来，周恩来身向前倾，耐心地解释说：

“如果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停下来，就等于承认现状，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

接着，周恩来堂堂正正地向当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解释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台湾问题的合理立场说：

第一，中国对外交往的政策是国际和平与合作，它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只要这些国家有同样的愿望；

第二，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欺侮，如果有人要挑衅和欺侮，我们一定抵抗；

第三，我们决不主动挑衅，我们无意挑起世界大战。我们一方面要解放台湾，收复沿海岛屿；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会特别注意。

打怕了杜勒斯，吓坏了赫鲁晓夫

中国炮击金门的隆隆炮声惊动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急忙跑到中国询问究竟，是否真的要解放台湾。

周恩来以实相告，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10月15日指示苏联代表向联



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的责任的提案，谴责并要求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但被美国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予以否决。

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采取声东击西之计，趁美蒋把注意力集中在金门、马祖之时，突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浙江沿海岛屿，1954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轰炸大陈岛，并出动年轻的中国海军舰艇，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驱逐舰于浙东海面，使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的铁拳打痛了美蒋，美国一意孤行，不顾周恩来的一再警告，1954年12月2日与蒋介石集团非法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毛泽东与周恩来认真研究这个条约，认为它反映出美国想搞“划峡而治”的企图，对是否负责保卫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因而决定采取外交与军事相互配合的方针，以军事斗争击退美国的军事挑衅，以外交斗争揭穿美蒋条约的本质，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12月5日，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会谈的时候，解释中国的对台政策说：

解放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但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前提条件，一定要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中立化台湾、



台湾独立、国民投票都是行不通的。

12月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指出这个条约与维护世界和平毫无共同之处：

“美国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战争挑衅，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面对美国的疯狂挑衅，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通过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显示中国人民与美国侵略者的斗争意志和决心。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采取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海陆空军密切配合的作战行动，1955年1月18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到两个小时就一举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迫使美国撤走了它的舰队。因为大陈岛已处于解放军的炮火有效射程之内。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招棋高明之极，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不摸虚实，惊恐不安，急谋对策，公然在台湾海峡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并在联合国玩弄停火阴谋。艾森豪威尔1月19日紧急呼吁通过联合国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



击退美国的军事讹诈和外交图谋

1月24晚，周恩来兴致勃勃与毛泽东密商，接着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发表举世瞩目的《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要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方面策动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他人干涉！”

周恩来的这一声明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使美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极其恼火，亦于1月24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干涉台湾海峡局势，甚至有权向中国沿海出兵，并很快获得美国参众两院的授权。

周恩来看到，美国在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利用一些国家害怕战争的心理在外交上玩弄“停火”诡计，促使新西兰1月28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和干涉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

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当日拜见周恩来通报这一情况，周恩来问及英国的态度，杜维廉说英国支持新西兰的提案。



周恩来不急不躁地讲起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故事：1938年10月，在法西斯德国和屈服于希特勒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的压力下，贝奈斯总统被迫接受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及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结果不但导致捷克的灭亡，而且给整个欧洲带来灭顶之灾。

周恩来盯着杜维廉，理直气壮地指出这样的事实：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从来没有引起紧张局势，然后怀着强烈的义愤质问道：

“为什么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会引起紧张局势呢？这紧张不是从中国来的，而是从美国来的。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联合国或者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

周恩来联系捷克总统贝奈斯的历史悲剧，以巧妙灵活的外交艺术，将英国和新西兰与罪魁祸首美国区别开来，以争取对中国最为有利的结果：

“如果新西兰政府的提案是属于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如果是过问美国对中国的侵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贝奈斯政府。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就应该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而不是希望中国让步。”

当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很大，西方不少人觉得中国无法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抗衡。周恩来殚精竭虑制定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灵活的策



略：

“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我们的策略是：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与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什么台湾中立化和托管的办法。”

“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解放台湾的斗争，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也是长期的。对此，我们应该做全面的估计，从各方面来配合进行，来承担这个历史上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国领土的任务。”

为了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美国指使它操纵的联合国秘书长马舍尔德和安理会主席贝朗德，邀请中国参加安理会关于新西兰关于台湾问题提案的讨论。

周恩来 1955 年 2 月 3 日拒绝与会，斩钉截铁地复电答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讨论苏联的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能同



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哈马舍尔德碰了一鼻子灰，又按照美国人的旨意，委托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向中国政府进行解释。魏斯特朗2月5日拜见周恩来，转达哈马舍尔德的口信，说新西兰的建议只是一个开端，“把问题用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以便不会从一开始就迫使双方把他们的立场冻结起来，从而使必要的外交活动成为不可能”。

周恩来首先对魏斯特朗表示感谢，然后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国人的阴谋，说明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真正努力，中国总是给予支持的，但是，新西兰的提案却是要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那就是把被中国和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放在对等的地位，来谈判停火，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表示：

“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那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把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就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参加关于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而且联合国也无权过问。”

富于正义感的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把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外交家的宏论视为他终身难忘的事情，对美国人的可鄙行为嗤之以鼻。



周恩来送走魏斯特朗，2月6日又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听取他介绍尼赫鲁总理对于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然后尖锐地揭穿美国人的圈套说：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赖嘉文与周恩来多次见面，比较熟悉，就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拒绝与美国人直接谈判？

这是周恩来思考已久的问题，正好借次机会打出一张好牌，争取把狡猾的美国人从后台赶到前台，于是游刃有余地回答道：

“中国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判，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但是，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现在是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如果世界各国要缓和这个紧张局势，就应该去劝美国；中国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这个紧张局势问题。”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的军事打击和外交斗争之下，美国的军事讹诈和外交图谋均告失败，因而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败下阵来，被迫于1955年2月5日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中国人民解放军2月13日进占大陈岛及其外围的渔山列岛和披山列岛，不仅有力地重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而且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对大陆进行捣乱破坏的据点，再



次击退了美国的军事威胁。

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新的对台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这个讲话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标志着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这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周恩来7月30日进一步宣告，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与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

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7月13日代表中国政府回文表示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

至此，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解除。

1956年，周恩来又进一步提出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他7月16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时候，发表轰动性的讲话说：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爱国是一家，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协商，只要政权统一，其他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鲜花盛开的明媚春光里，于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当向苏联贵宾介绍原国民党将军卫立煌的时候，周恩来特意说：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在座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立即引起各方的注意，认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及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然而，美国和台湾当局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和平倡议不但不积极响应，反而制造紧张局势：1957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面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958年5月，美国在台湾成立统一的“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指挥台湾当局将其三分之一的地面部队配置于外岛，并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的骚扰活动。

恰在此时，美国以“保卫黎巴嫩”为名，1958年7月15日公然在黎巴嫩登陆，干涉黎巴嫩人民反对亲美的夏蒙政权的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紧急磋商，为了严惩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嚣张气焰，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也为了配合中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给蒋介石集团以惩罚性打击。

8月23日，福建前线突然万炮齐鸣，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增兵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舰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鱼雷快艇和炮兵各显神通，首战告捷，击沉击伤台湾军舰各一艘。霎时间，金门岛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许多阵地被摧毁，国民党军队伤亡600余人。

金门的炮声震动了世界，不仅在军事上收到了奇袭的效果，而且在政治上也达到了预定的目的。福建前线突如其来的炮声打乱了美国的阵脚，紧急向台湾地区调动6艘航空母舰、130艘作战舰只、500架飞机、8800名作战部队。

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称，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金门、马祖，那就是“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威胁”。

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协防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美国领导人纷纷叫嚷，要阻挠中国解放金门、马祖。

对于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行为，中国政府坚决予以



反击。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杜勒斯似乎要钻进金门和马祖的绞索，这样反而使中国处于主动状态，便于采取有力措施。

9月3日晚，周恩来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应这个兄弟国家的大使的要求，谈到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说，台湾地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另一部分是台湾和澎湖列岛。两部分之间隔着公海，美国军队占领的是第二部分，美国军舰在公海巡逻。我们有权收复所有两个部分的岛屿，这是中国的内政。现在我们炮轰的是第一部分。

潘切夫斯基极感兴趣地问，台湾海峡局势到底紧张到什么程度？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幽默地回答道，现在美国在公海喊叫，蒋介石在台湾喊叫。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紧张。

潘切夫斯基不解地问，美国人要干什么？

周恩来轻蔑地说，美国就是利用紧张局势吓唬人。我们愿意和缓，但是我们也不怕紧张。紧张一些，可以使我们加紧生产、工作、学习，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

潘切夫斯基对周恩来应付美国人这么有信心感到吃惊，对周恩来的话，他还未全信，但感到中国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戏，越唱越有看头，中国人对付美国人有的是办法……



周恩来9月4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上空。

与此同时，继续炮击金门，以便在实战中进一步检验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再相机采取对中国有利的措施。

9月6日，针对杜勒斯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的猖狂声明，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再次向全世界宣告：

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且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美国最近的威胁是对六亿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地中存在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

周恩来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办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把中国的盟友赫鲁晓夫吓出一身冷汗，他指示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9月5日深夜会见周恩来，说明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局势极其担心，可否能够派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问题的态度，欢迎葛罗米柯访华。

周恩来与葛罗米柯打过多次交道，两人在日内瓦会议等多种场合进行过



多次合作，对这位世界上担任外交部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非常尊敬。葛罗米柯9月6日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其会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葛罗米柯详细介绍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国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策略和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

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估计美国不会采取大的引起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

葛罗米柯如释重负，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国方面的立场和措施，周恩来也对苏联《真理报》的三篇支持中国的文章表示感谢。

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汇报，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给中国以必要的支持，9月7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强调中国不是孤立的，有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的时候随时可以援助它，要美国慎重行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后果的步骤。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这封信很感兴趣，9月7日特意给周恩来写信作出这样的建议和安排：

“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致艾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



出一个意见书交葛罗米柯外长研究一次，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接到毛泽东的建议信后，周恩来很快约邓小平和张闻天等人研究落实。

这时，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来大陆采访，周恩来接见了这位文史学家、记者，围绕台湾海峡局势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周恩来认为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指出金门、马祖的蒋介石的军队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门、马祖的驻军占国民党军队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我们不在乎，对蒋介石有作用，可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第三条是美国逼蒋军撤退，这条路是很不光彩的。

曹聚仁不断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沟通关系，传递消息，他离开大陆前，于9月10日再次会见周恩来，愿意为改善两岸关系出力。

周恩来与毛泽东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走出一着妙棋：请曹聚仁11日返回香港之后，以最快的办法转告台湾方面，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我们准备以7天的期限，准其在此期间由台湾舰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舰只开炮。

周恩来特别交代说，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可以告诉台方，



应该胆量大点。学学西哈努克的做法，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9月7日，美国军舰不顾中国人民的警告，公然为蒋介石集团派到金门的船队护航，引起周恩来的极大义愤，他仔细研究总参谋长黄克诚9月7日19时写给毛泽东的信：

今日福建前线在料罗湾发现有美军舰，另有蒋军军舰4艘，敌我双方均未开炮。6日24时，曾电令福建前线指挥部，选择有利目标于8日或迟一二日还击落4、5、6三天向我的炮击。鉴于美舰在金门附近活动，拟暂停止，是否妥当，请批示。

毛泽东9月8日在黄克诚的信上批示：“请总理处理。”

周恩来与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人商议之后，命令解放军炮兵轰击9月8日再次驶近金门的美蒋混合舰队中的国民党军舰。

9月13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战况报告再次向周恩来和黄克诚作出指示：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特别对料罗湾3海里以内，“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华沙谈判，三四天或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

周恩来发现经过20天的炮击，金门岛上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已被切断，



蒋介石频频要求美军护航，美国只得与台湾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进行护航，周恩来仔细研究围绕台湾海峡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针对美国的行动，作出如下安排：

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在联大演说的声明；

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

三、将中国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驻华代办和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

四、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中国，向他解释美国所谓停火的阴谋，说明中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力，这些不容美国干涉；

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从合肥给周恩来写信大加称赞说：“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很高兴，即照办。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然形态。”

周恩来分别接见印度、缅甸、锡兰和柬埔寨驻华大使宣传中国的对台政策，取得广泛的国际同情。9月22日致信毛泽东请示沿海军事斗争的方针：



“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轰炸更不适宜，因为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轰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如落轰炸大陆，而我只炸金门，反而示弱，所见对否，请示！”

在这种情况下，对美蒋联合舰队打与不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事关重大，周恩来的分析甚合毛泽东之意，他当日即给周恩来回复：

“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这时候，美国眼见武力威胁没有奏效，而在金门、马祖与中国开战又势必把美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便狡猾地玩弄阴谋，从“战争边缘政策”转为“脱身”政策，散布从金门、马祖撤退的舆论，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杜勒斯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放出试探气球。

杜勒斯的这个讲话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因为杜勒斯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后，批评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行动，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



“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

周恩来更注意到，当有记者问杜勒斯，如果中共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有所改变的时候，杜勒斯这样说：

“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施展妙计拖住美国

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之后，10月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周恩来发言谈他的看法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列岛。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得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展开热烈的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底，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

周恩来和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这个大胆设想都心悦诚服，赞成让台湾军队继续留在金门、马祖，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个设想将使美国处于被动状态，中美会谈以继续进行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说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事情果然如周恩来所料，对中国友好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准备在10月6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项议案，呼吁中国停止炮击金门、马祖，以便克服停火这个困难问题，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10月4日会见周恩来总理，征求中国的意见。

周恩来对印度朋友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是坦率地提出中国的原则性意见：如果友好国家支持我们，就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办事，承认台湾、沿海岛屿是中国的领土，美军应该撤出台湾地区，这就是和平解决的途



径。

周恩来刚送走印度驻华大使，印尼驻华大使又登门拜访，提出要与印度等8个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上述议案，周恩来耐心地肯定这样的创议是好意，但是问题很复杂，亚非国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难于通过一项共同的声明，最好还是不要搞这种共同声明。如果声明中提到停火，这有利于美国，我们反对。如果声明中既批评美国，又批评中国，是非不明，反而不好，我们也不赞成。

周恩来主张印度等8国提案应该说明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美国制造的，因此要消除紧张，必须讲明中国的原则态度。那么，一些追随美国的国家是不会赞成的。与其不能通过这种公正的声明，不如亚非国家不发表什么共同声明。

印度和印尼等国朋友都对周恩来的说服心悦诚服，调整了他们在联合国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上摆脱了许多人帮倒忙而造成的被动处境。

毛泽东和周恩来取得外交主动后，决定进一步采取重大步骤，10月6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1时起，我们停止炮击7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郑重宣告：

“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



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

中国的这一举动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炮击金门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为主，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在海峡两岸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这是传达政治信息的有效方式。

周恩来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灵活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杜勒斯陷入困境之中，为摆脱困境 10 月 7 日倒打一耙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 6 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的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的和平。对这个声明做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他们又要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杜勒斯这个外交手腕颇蒙蔽了一些人，为揭穿杜勒斯的真面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慎重研究之后，10 月 13 日发布命令，对金门的炮击再停两周，对杜勒斯之流发出严重警告：

“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美国人想在我们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作停火，令人忍俊不禁！”



为对付杜勒斯，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天与神秘人物曹聚仁谈话，走出一妙棋。

毛泽东再次郑重地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

曹聚仁瞠目结舌，对此很不理解：这样的好事为什么竟然被拒之门外？

周恩来善解人意，微笑着解释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曹聚仁这才恍然大悟，敬佩毛泽东与周恩来果然名不虚传，给“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都安排了合理的归宿，手段比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流要高明得多。

休谈停火，走为上策

为宣传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部署，周恩来把《人民日报》的同志请来，研究社论《休谈停火，走为上计》的写法，批驳美国要求在金门、马祖停火的谬论，辛辣地讽刺说：



“中美之间根本没有战争，停火从何而来？”

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转交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9月27日和10月4日两封来信的复信，就围绕台湾海峡的国际局势再次热烈地交谈。

安东诺夫说他从外电报导中得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要到台湾活动，询问周恩来对此有何见解。

周恩来告诉苏联朋友，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到台湾是想压蒋介石减少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军队甚至完全撤退，也就是想以金马换取台澎，并永远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办法我们不赞成，蒋介石也不赞成。

安东诺夫对此感到纳闷儿：这是为什么？

周恩来望一眼窗外金秋盛开的串红，微笑着风趣地给苏联客人解释中国对台湾政策所包含的深刻辩证法：

我们不赞成是因为不能让美国因此换得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我们的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仍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我们把台、澎、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那就总有一天会回来。



为向全党全国进行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教育，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中央关于当前对美斗争形势的通知》，指出彭德怀10月6日的文告和10月13日的命令，截然划清了国际和国内两类问题的界限，彻底粉碎了美国的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扩大并加深了美蒋矛盾，满怀信心地宣称：

“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纸老虎本质，测验出它目前还不敢冒大战的危险。美国从金门、马祖脱身，为的是永占台、澎，便于进行‘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坚持台、澎、金、马必须全面解放，反对美国用金、马祖换台、澎的阴谋。”

周恩来在通知中特别强调解放台、澎、金、马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指出我们当前的斗争任务和目的：

“我们现在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美蒋矛盾，并且利用落不肯撤出金、马，来拖住美国。我们宁可使台、澎、金、马多留在蒋手上一个时期，决不能让美国拿去。”

美国人陷入台湾海峡危机之中非常被动，为摆脱被动局面，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跑到台湾，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企图以海峡两岸事实上已经“停火”为借口，要求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为给他们壮胆，下令美军出动护航。



面对美国的新挑衅活动，周恩来10月20日指示国防部紧急制定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周恩来亲自向毛泽东请示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3时广播。在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

毛泽东对周恩来安排得如此周密甚为满意，当日即做批示：“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在杜勒斯访问台湾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认为美蒋在唱“双簧戏”，被毛泽东批评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

周恩来10月21日约《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列举杜勒斯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充分论证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发一篇社论，



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中美关系大发宏论说：

这次杜勒斯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来。过去一个多月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政治局常委们都认为毛泽东的见解高明，一致赞成。周恩来还提出，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这正合毛泽东之意，便将手一挥说：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美蒋关系的新发展，周恩来10月25日批发了毛泽东以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船只，但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



从此，炮击金门变成了纯粹的政治仗，10月31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致他和陈毅、黄克诚的信件，毛泽东指示说：

“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表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做出部署后，11月2日又接到毛泽东的秘书通过电话传达的毛泽东的新指示：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体会毛泽东这一指示主要从中美两国关系着眼，意在政治上影响美国大选，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亲自起草广播稿《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与有关同志研究后最后定稿如下：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这一次炮击，打得猛烈、漂亮，军事和外交巧妙结合，打掉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打出了中国政府对台湾军



民的殷切关怀。

其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下，金门炮击不但双日不打，就是单日打炮，也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台湾军队回炮，也同样只打海滩，后来又发展到每逢年节，对金门停止炮击三天。

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使海峡两岸领导人实际上形成默契，共同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炮击成为中、美、台三方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堪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

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愤怒声讨下，美国被迫于1958年12月10日宣布自台湾海峡地区撤出美国的部分海、空军。

至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告一段落。

第二十一章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两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巧用大使级会谈的方法保持接触，借此交换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因而两国虽然对立森严，却又相互了解彼此的观点，出现了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拖而不断的奇观，堪为周恩来外交的一大创举。

1954年4月，风光秀丽的“旅游者圣地”日内瓦。

这座被称为“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的世界名城，再次担负起历



史重任，寻求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闻名遐迩的三大外交家周恩来、杜勒斯和莫洛托夫聚会于国联大厦，立刻引起世界外交界的广泛注意：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周恩来，态度蛮横、性格乖戾的杜勒斯，斗志旺盛、“不”字著称的莫洛托夫，都是当代外交史上的佼佼者，世界各国人民都对他们寄予莫大的期盼，希望他们为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发挥聪明才智，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身患癌症而又根本不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杜勒斯，在手握真理的周恩来、莫洛托夫的联合凌厉攻势下，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打道回华盛顿对美国代表团进行遥控。

初登国际外交舞台的周恩来，一边竭尽全力使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一边为打开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而殚精竭虑。

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通道

5月19日，周恩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和有关资料，这时代表团成员宦乡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急切地向周恩来报告：“总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

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改善他与杜勒斯之间的僵硬关系问题，他自信手中握有王牌，不用去向美国人低声下气地祈求，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问：



“哦，是宦乡呀，什么事这么着急？”

“总理，是这样的。今天，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对我说，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作一个中美之间的中介人。”

周恩来认为这倒是一个新情况，立即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在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急需具有高深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他们对新中国来说是多么地宝贵呀，应该尽快把这些国宝请回来。

周恩来见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寻找打开中美关系的途径，就指示宦乡说：

“我们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这个问题你需要留心一下，看美国方面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美方再试探，可以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另外，可根据美方的态度，确定在什么地方举行谈判，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杜威廉没有得到宦乡的答复，又把中国代表团翻译浦寿昌请到巴黎僻静处的一家小酒店里，殷勤地说：“今天我请客！”

杜威廉仅以少量火腿和饮料招待：“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美国想通过我



来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

“为什么？”

“因为敝国受托于美国，照管美国的在华利益。”

“好，我马上转达。”

浦寿昌回来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还不满地说：“英国人太小气了，就请我吃这么点儿东西！”

周恩来连连摆手，不以为然说：“不，不能这么看，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简单热情，不讲排场，一切为了工作！”

与此同时，杜勒斯又指示美国外交官通过苏联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籍侨民，并承认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

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指示宦乡回答杜维廉说，如果美国政府有意商谈这类问题，中国政府从不拒绝进行商谈。

为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通道，周恩来又让浦寿昌客气地告诉杜维廉说：

“现在中美代表团都在日内瓦，完全可以直接接触，没有必要让第三者插手。当然，对英国朋友的热情斡旋，中国万分感谢！”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 1954 年 5 月 26 日发表谈话，要求美国遣返被无理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有意暗示中国



愿意就被扣留人员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美国同意直接谈判

6月3日，周恩来在日内瓦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情况称：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也阐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美国人。

经周恩来批准，中国谈判代表王炳南经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介绍，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6月1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

15日中美双方拟将再次接触，我方的商谈方针是：（一）主动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二）“拟指出美国强迫扣留我留学生，既违犯国际法又不合人道主义，要求立即恢复他们自由离美返回祖国的权利”。（三）关于整个侨民和留学生问题的做法：（1）准许被扣美国人与家属通信。（2）将已死亡三人的消息告诉美方。（3）宣布被扣留的美空军人员罪状。（4）如果美国改善对我留学生之待遇，准许他们回国，届时看情况，我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



犯罪被监禁的美侨驱逐出境，此点拟相机行事，目前尚不宜采取行动。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做出让步，同意允许因犯罪而被扣留在美国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其家属通信，也可以邮寄小包裹；对于犯罪的美国人将按罪量刑，表现好的可以减刑或提前予以释放，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中国留美人员。

随后，在6月21日和7月16日，中美双方继续就留学生和侨民问题进行商谈。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9月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方继续要求美方尊重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虽然毫无进展，但却意味深长，杜勒斯也不愿关上这扇好不容易打开的大门，周恩来更有意留一条门缝，以便在适当时机与美国接触，对美国进行观察，与其进行斗争，它便成了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沟通双方意见的重要渠道。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协议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对中国在外交上的节节胜利心怀不满，不仅拒绝中国在中美会谈中的正当要求，反而在1954年8月3日公然宣布，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8日成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2月2日与台湾当



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从三个方向对中国发动侵略攻势，中美会谈只得暂告中断。

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应该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1月18日一举解放一江山岛，2月3日又解放大陈岛，向世界各国表明了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又表示要与中国接触，周恩来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走出一步好棋。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这个声明激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纷纷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领导人响应周恩来的声明，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

为摆脱困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提出“停火”的要求。

5月9日，杜维廉前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转告英国外相麦克米伦的口信说，伦敦以很大的兴趣和希望对待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不知中国是否有任何口信要英国转告美国？英国不愿失



掉能起作用的机会。

回答道：

“对此问题，我们研究后再做答复。我们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

杜维廉大吃一惊，急忙问道：“为什么？”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目光炯炯：“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停火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国共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两种谈判显然有联系，但是必须分开。我们对这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采取主动来争取！”

杜维廉似有所悟，急切地问：“你们同美国谈什么呢？”

周恩来回答：“我们同美国谈的不是停火，而是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5月26日，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进一步阐明了中国与美国谈判问题的看法，他说：

“中美谈判的主题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至于谈判的方



式，我们现在没有最后意见，我们同意并支持苏联建议召开十国会议，但也可以开比十国或多或少的会议；中美还可以直接谈判，由别的国家从旁赞助；台湾当局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地建议同台湾当局直接谈判。”

杜维廉与周恩来多次见面，比较熟悉了，就大着胆子说：“总理阁下，我个人认为最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知道西方不少人有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极其耐心地向杜维廉详细介绍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说：

有两种方式来解放台湾，一种是和平方式，另一种是战争方式，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就要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因此，有两种性质的谈判，即中美之间的国际性谈判和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之间的内政性的谈判；这两种谈判，我们都争取，它们可以平行地或者先后地进行，它们彼此间虽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手中自有王牌

为了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杜勒斯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纪念会上对中国横加攻击，然后又请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斡旋中美会谈。



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7月7日会见周恩来，转达了杜勒斯的要求，周恩来义愤地回答说：

“情况是复杂的，我们释放了4个美国飞行员之后，美国政府却攻击中国，这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是不调和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各方面来研究美国的动向。”

这时，美国国内在被中国扣押的人员问题上闹得更凶，美国当局受到巨大压力，只得搞了个致中国政府的文件口信，请英国转交。

英国为更好地斡旋中美会谈，任命神通广大的欧念儒为新的英国驻华代办。

诚如周恩来所料，美国政府不得不于7月13日通过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递交委任书的时候，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美国的口信说，为了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周恩来怀着自信的微笑表示：中国对于美国政府的建议的答复，将通过英国代办处转致美国政府。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于7月15日再次接见欧念儒，向他递交中国政府由



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公报草稿。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政府的回文,对中美日内瓦会谈提出严肃的评价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做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

周恩来深刻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在中国政府的回文中郑重地告诉美国方面:

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应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当天下午,周恩来与欧念儒的会见尚未结束,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又紧急求见,周恩来赶快送走欧念儒,又马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赖嘉文,对印度在中美会谈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亲切地说:



现在可以提出一点，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就是关于中美在日内瓦的接触，只是美国的一个姿态，一些重要问题要经过印度、苏联和英国三国从中斡旋，特别是梅农先生的斡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美谈判，解决关键问题，也就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长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短的时期。

先声夺人之举

1955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关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谈判的新闻公报，立刻引起世界各国共同的广泛注意。为更顺利地推进中美会谈，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为表示中国方面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周恩来决定采取先声夺人之举。

7月31日，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

7月31日晚，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请他转告印度政府：



中国早就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 11 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经是适当的时机，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这样也将便于梅农先生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即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得到回国的自由。必须声明，这个行动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我们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我们是按照中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当然，这也是尼赫鲁总理、梅农先生和吴努总理努力的结果。

赖嘉文兴致勃勃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变化，周恩来前一天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也很灵活，他认为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前途光明的征兆。

周恩来说明“鉴于目前美国的态度已经比较和缓”，因此他昨天在人大的发言也是适应这种和缓气氛的，但是美国现在还仅仅限于表示，希望告诉美国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响应。这样，日内瓦会谈就会取得积极的结果。他还特意对赖嘉文说：

“现在，美国希望日内瓦会谈能够为外长级的谈判开辟道路，我们以很大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日内瓦会谈应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为中美外长坐下来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做准备工作。”

中国释放 11 名美国间谍的消息立刻轰动世界，各国记者情绪激动地热烈称赞中国和周恩来旗开得胜，被称为“记者之家”的日内瓦酒吧顿时喧闹



开来，一个美国记者惊讶地大发感慨道：“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双方就程序性问题达成协议后，美国很快就在遣返侨民问题上耍赖了。

原来，中国首先点名要求允许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约翰逊知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科技精英，就大脑袋一摇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王炳南暗暗称赞周恩来总理神机妙算，将及时转来的钱学森来信当场拿出，约翰逊才无话可说，但又一根接一根抽烟耍赖死拖。

为打开僵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加强与美国谈判代表的私下接触。王炳南便邀请约翰逊在日内瓦僻静的山间别墅吃饭，观看中国京剧团在日内瓦的精彩演出，还通知美国方面，中国对12名在华美国人的复查工作已经结束，可以获准出境。

8月18日，周恩来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在中美大使级第七次会谈中，从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和所做的发言看，美方是准备妥协的。协议修正案基本上对我有利，实质上承认我对旅美华侨管辖权的文字，在协议公布后，将是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大打击。因



此拟以美方提出的协议修正案为基础，做若干修改后，争取达成协议。

在此前后，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缅甸总理吴努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牵线搭桥，周恩来认为朋友的帮助很重要，8月28日发电指示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拜会吴努总理，感谢他为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所做的努力，并介绍如下情况：

目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争执环绕着两个问题 一是在华美侨的回国问题，二是中国委托印度协助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中国政府从未限制在华美侨回国。六年来已有 1500 多名美侨（其中有不少是犯法又获得减刑的）回国。87 名美侨中，凡是申请回国者，只要他们没有未了案件或者案件已经结束，都可以回国。有些美侨如果将来提出申请，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美国在中国的侨民人数不多，根据我们的政策，他们的问题显然是容易得到解决的。

中国侨民在美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美国承认过去曾经限制中国侨民归国，现在，我们有实际的事例可以证明，限制并没有取消，只是改换了方式而已。美国无法反对中国委托印度来协助中国侨民回国，但是，美国仍然在协议草案的文字上制造纠葛，使双方不能对分别委任第三国协助本国侨民回国的办法达成协议。

经周恩来调动国内外各种力量共同作美国的工作，终于使中美大使级会



谈在 1955 年 9 月 10 日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协助中国和美国平民返回本国。

这是 15 年来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周恩来在 50 年代末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讨论台湾问题，主张举行周恩来与杜勒斯的直接会谈，但美国毫无诚意，遂使中美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印度、印尼、缅甸等国纷纷出面，愿意调解中美关系。

尼赫鲁总理多次派出老资格外交家梅农访华，向周恩来建议中国与美国谈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时候，最好按照苏联的意见，采取召开十国会议的方式。

几天后，尼赫鲁总理又指示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会见周恩来，转达尼赫鲁总理的意见，周恩来在表示感谢后，阐述中国的原则立场道：

“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谈了 7 个多月，对第二项议程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说，实际可行的途径就是举行中美外长会谈，因为两国大使不能



解决这样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政府的方针是继续目前的会谈而不解决问题，一直拖过选举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会谈会上，将公开揭穿美国的阴谋，指出美国这种企图是不能使会谈达成协议的，我们绝不会同意！”

借助舆论推动僵局

1956年5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印尼记者工会副主席、泗水邮报总编辑阿齐兹，重点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

阿齐兹不解地问：“中美关系很怪，又紧张，又谈判，真不好理解！”

周恩来认为阿齐兹提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极有详细加以解释的必要，就耐心地生动地介绍中国的原则立场：

“是啊，台湾海峡仍然有风波，连杜勒斯也说这些地方无和平，一方面存在着紧张，同时中美又在日内瓦进行谈判，这是一种很复杂和很有趣味的情况。”

阿齐兹最善于提出最尖锐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和中国谈判？”

这正合周恩来之意，借这个机会侃侃而谈：“你问得有道理。一方面美国要在台湾制造紧张，威胁中国，霸占台湾，而且更重要的是威胁在美国控制下的国家，防止他们摆脱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世界人民（包



括美国人民)担心战争扩大,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日内瓦跟中国谈判。”

“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想使人相信中美正在谈判,战争打不起来,和平有希望。”

阿齐兹将头摇得拨榔鼓一般:“真的吗?”

周恩来深刻地分析道:“但是真正和下来,美国侵略集团又不甘心,因为那样它就不能紧张世界,霸占基地,倾销军火、商品。

因此在日内瓦真正达成协议,美国又不愿意。这就产生这种奇异现象,台湾紧张,日内瓦谈判,又紧张又谈判的矛盾情况存在,说明美国好战集团的动摇、被动。”

阿齐兹回国后大力宣传周恩来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张,引起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强烈兴趣,很快来到北京帮忙,周恩来望着这位留着一字髭又主动请缨的朋友说:

“我非常感谢贵国的善意,并接受你们的建议,我们赞成召开十国会议,但要附加一个条件,即蒋介石不得参加!”

“好,贵国还有什么条件?”

“为了给中美直接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也同意采取对等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但美国也应该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



涉！”

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理阿里，提议与美国签订为期50年甚至100年的和平条约，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周恩来的和平攻势下，美国更加被动，国务卿杜勒斯气恼地叫嚷，不惜在台湾地区打原子战争，挥舞原子弹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周恩来从容镇定发起新的反击，1956年8月宣布中国单方面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向美国15个重要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中国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这犹如春天的第一声惊雷举世震惊，杜勒斯认为这是他与周恩来意志的尖锐较量，硬着头皮按兵不动，引起美国新闻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几个美国记者不顾杜勒斯的禁令，冒着风险来到中国。

周恩来1957年9月7日接见以华伦·麦肯纳为团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热情地致词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41位，你们做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的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

美国青年见到举世闻名的外交家周恩来，都兴奋异常，有个美国青年问



周恩来是否允许美国记者来中国访问，周恩来热情地回答说：“关于记者问题，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也就是有来有往，我们去年有这样的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然后，我们相信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同等回答，也就是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而且美国记者也不允许来中国。”

美国政府的顽固态度引起美国青年的强烈愤怒，周恩来借此机会揭穿美国当局的狡猾而霸道的做法说：

“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虽然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而且肯定地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换取情报，并且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做死了，做绝了。因此，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能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

一个美国青年不解地问：“既然知道如果用武力把台湾拿下来，就会引起一场普遍战争，我想问一下总理，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声明不使用武力？”

周恩来是善于巧妙运用修辞手法的外交家，在说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之后，假设一种情况说：



“你可以想一想，假使有一个国家拿武力占据了美国的火奴鲁鲁（檀香山），然后跟美国朋友说，你收复火奴鲁鲁不许使用武力，假使你使用武力，就要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民会有怎样的感觉呢？中国如何能够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中，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答应美国说中国在台湾不使用武力？”

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当局极其被动。为摆脱被动局面，便在台湾海峡和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为严惩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对金门进行猛烈炮击，封锁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受到沉重打击，觉得脖子上套上了绞索，勒得喘不过气来，为在绞索上涂些肥皂水，急于想摸中国的底，便指派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代表，同意将谈判地点由日内瓦移到华沙。

1958年9月15日，中断9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一开始，周恩来就向王炳南秘授锦囊妙计：

“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9日）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



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比姆按照杜勒斯的指示行事，王炳南也依周恩来之计而行，很快取得主动地位。

对其后的会谈策略，周恩来也早已胸有成竹，9月17日他向毛泽东请示：

关于中美会谈，估计美方在第二次会议上仍然会在停火问题上与我方继续纠缠。为针对这一极大可能，我方拟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反建议，并说明这是解除对和平威胁的迫切前提。关于停火和撤军的斗争，估计会进行几个回合。在三四次会议后，可看出美方究竟有无意思要蒋军从沿海岛屿撤走，同时联大是否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也可判明，到时看情况再考虑我方提案是否公布。

第二天，周恩来又与陈云、彭真等深入研究，制定了金门炮击与中美会谈密切配合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措施，一并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称赞“极好，有了主动了”，当即批示照办，还打破常规表扬道：



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9月21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听取印度政府的意见，对印度在外交上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揭露美国人的阴谋道：

“美国更发展了在中美日内瓦会谈时的侵略政策，美国在华沙的提案野心勃勃，得寸进尺，名义上要求停火，实际是玩火，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期待通过和平谈判同蒋介石解决台湾问题。蒋军经常骚扰沿海大陆，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忍受。”

周恩来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增援就是为了准备战争。美国以增兵来压我们接受它们的提案，不接受它就打。我们的态度是你打我不怕，我准备打，但我们首先争取和平谈判解决。我们要消除紧张，消除挑衅和威胁，就要解决根本问题——美国必须从台湾地区撤兵。

当天，周恩来又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就缅甸领导人在停火问题上的疑虑进行耐心的解释说：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提出的停火，不是在台湾海峡地区，而是在这个沿海岛屿，是想扩大侵略，不但要我们承认其占领台湾、澎湖合法化，还要承认美国对沿海岛屿的侵略合法化，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再容忍它们的武装力量在台湾地区，要它们撤走。”



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告诉吴努总理，你们的代表也在联合国，杜勒斯说的是鬼话，决不能听他。

周恩来当天还接见锡兰驻华大使和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副团长，揭露杜勒斯搞的停火阴谋，说明中国是压不倒、吓不倒的。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能抵抗！

为摆脱困难处境，杜勒斯煞费苦心想出“脱身之计”，9月30日放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说蒋介石的军队撤出金门、马祖。

为了粉碎美国想使台湾和大陆在地理观念上分离的政治阴谋，周恩来在当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予以彻底揭露：

“这一切说明，美国不是在认真地谈判，而是一再挑起事件，扩大对我国的侵略。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关键，决不是美国所耍弄的‘停火’把戏，而是美国必须立即停止玩火。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揭露美国想搞停火的阴谋。

他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

在沿海岛屿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所谓“停火”。



正本清源的办法就是美国撤退它的军队。美国想造成严重局势，然后利用这种局势欺骗世界舆论来要求停火，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受骗，也不会被吓倒，相反地，中国人民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更好地动员起来，全国人民更会意志昂扬。

周恩来请印度驻华大使向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致谢，感谢他在联合国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进行的努力，感谢他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但请告诉梅农不要着急，美国现在蛮横无理，等他也感到很孤立的时候，它们可能会转个弯。

有的人看中美华沙会谈进行得极其艰难，主张干脆予以结束，周恩来不以为然，他认为中美会谈继续进行下去，对中国最为有利，因为它可以拖住美国人，可以避免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说清楚，免得它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继续举行。

1962年，周恩来交给王炳南一项艰巨任务：设法让美国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炳南便邀请美国谈判代表卡伯特见面聊天，严肃地指出蒋介石正在图谋反攻大陆，强烈地发出警告，迫使卡伯特说出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话。



王炳南迅速地将此情况报告周恩来,对党中央调整福建前线的战略部署起了很大作用。

此后,中美大使级谈判继续举行,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共举行136次,虽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成为中美两国交换对世界重大问题看法的场所,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方便,堪为周恩来外交的一大创举!

第二十二章 调处苏波匈矛盾

苏联坦克开进华沙和布达佩斯

1957年1月7日,苏联首都莫斯科,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皑皑白雪覆盖大地,一片银装世界。

今天的莫斯科机场却热闹异常,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罗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全班人马一齐出动,地欢迎最重要的客人的到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格罗提渥总理也到机场欢迎。

驻莫斯科记者发现,赫鲁晓夫神色之庄重,苏联领导人欢迎规模之大,在苏联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纳闷,什么样的客人竟然能够使一向



骄横跋扈的赫鲁晓夫如此毕恭毕敬呢？

不一时，一架“图—104”飞机自远处呼啸而至，平稳地降落在莫斯科机场。

早就在此等候多时的赫鲁晓夫急忙迎上前去，与从飞机上从容而下的周恩来热烈拥抱，用最热情的语言欢迎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风度翩翩地把随同他来访的副总理贺龙和中联部长王稼祥等介绍给赫鲁晓夫，也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

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谦恭地对待周恩来呢？

因为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玩儿不转了，只得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出来为他帮忙解围。

原来，由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为之哗然，引起混乱。

这种混乱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6月，波兰政局发生剧变，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共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使用武力镇压发生流血悲剧，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被关押过几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共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同时匈牙利也发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无法控制局势被迫下台。从布达佩斯开始的动乱向全国蔓延。



赫鲁晓夫对这种混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派米高扬 1956 年 9 月再次来华，借出席中国共产党“八大”之机，向中国党挥舞指挥棒。

米高扬在向中共八大致贺词时，大搞大国沙文主义，认为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经验取得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对此持不同意见，米高扬粗暴地予以训斥。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对苏共坦率地提出批评，赫鲁晓夫却一意孤行丑化斯大林，结果为帝国主义利用掀起反共风潮，导致波匈事件发生，1956 年 10 月苏联坦克开进华沙和布达佩斯进行镇压，举世震惊。

赫鲁晓夫发现他的声誉和地位在苏联和东欧都一落千丈，只得再次请求中国出面帮助他收拾局面。1956 年 11 月，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中国发出邀请，请周恩来访问苏联为他做些工作。

这时，东欧国家领导人均把目光投向周恩来，纷纷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够访问波兰和匈牙利，运用中国的巨大影响平息波匈事件。匈牙利领导人的邀请极其迫切：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一天，也是对他们的莫大支持。

为维护苏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经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决定让正在访问亚洲国家的周恩来改道前往莫斯科，先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

周恩来临行前向毛泽东告别的时候，毛泽东特别交代说，只要苏联共产



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满怀信心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在从机场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汽车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热情异常，以最高规格招待中国代表团，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1月8日，周恩来先后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然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谈，双方就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交换意见。

周恩来极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镇压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互相支持，同时阐明毛泽东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战略方针。

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的话表示原则同意。

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商定，邀请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副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和明尼赫·费伦茨来莫斯科，共同研究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方策。周恩来随后发电指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要他和卡达尔和明尼赫同来莫斯



科。

当天下午，苏联政府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中国代表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首先致词，热情赞颂中苏友谊，祝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及国际共运中占有重要地位。

周恩来当时尚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还基本是思想问题，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因而在致答词的时候，有意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曾经经历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长期过程。

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经常在思想上教育自己的干部，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且保持警惕，力求少犯错误，避免重犯错误。我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说明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机会，对我们进行破坏，因此，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强调：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当天，周恩来与格罗提渥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会



谈，在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发表会谈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就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交换了意见，表示坚决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

1月9日凌晨，周恩来将与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及有关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汇报说：

许多兄弟国家驻苏联使节和苏联领导人纷纷向中国表示祝贺，称赞中国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苏联三个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对此却只字不提，而且当与他们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时候，都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事情。

因而周恩来认为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苏共某些领导同志表现为功利主义思想。

在接着举行的中苏代表团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力量和团结，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武装力量，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其次是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随时警惕和防备战争，但不是主动出击。

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的意见基本表示同意，但只赞成中国从朝鲜撤兵，至于苏联从民主德国撤军，要看条件和时机。

当天下午，周恩来应邀参观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大学，在礼堂受到学校教



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莫斯科大学授予周恩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周恩来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

在文化科学领域,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列宁曾多次告诉我们要善于吸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善于区别哪些是真正有益的,哪些是带有毒素的。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

当晚,周恩来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的新年枞树晚会,愉快地与苏联奥林匹克运动员见面,他赞扬苏联运动员拥有众多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祝贺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巨大胜利,还充满自信地说10年以后,中国运动员也会取得巨大成就,愿中苏运动员一道前进。

在1月10日举行的中苏代表团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赫鲁晓夫最喜欢听以苏联为首的话,眉开眼笑地说:

“感谢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希望中国同志能继续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我们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周恩来郑重地表明中国的态度说:



“维护各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工作。”

赫鲁晓夫介绍了波兰的情况后，请周恩来帮助解决苏联与波兰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

周恩来回答说，苏共采取的用一切力量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阐明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在党内，要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坏的倾向；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兄弟党自己；经济上主要自力更生。如不转变，就很危险。

赫鲁晓夫在匈牙利问题上更挠头，他请周恩来去匈牙利做些工作，以缓和苏匈关系，周恩来从大局着眼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马上去电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全来莫斯科，卡达尔不敢怠慢，忙带领全班人马动身。但由于气象原因不能降落，只得掉转机头飞回布拉格。卡达尔和众人一商量，觉得没有必要都去莫斯科，于是决定由卡达尔和外交部长马罗山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与到达莫斯科的卡达尔和马罗山立即进行会谈。听取卡达尔就匈牙利国内和党内的情况所做的介绍后，指出无论镇压反革命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应当强调党的领导、思想动员和发动群众。



周恩来劝说匈牙利领导人与苏联搞好关系，还说赫鲁晓夫建议中国代表团访问匈牙利，中国代表团决定访匈一天。卡达尔十分高兴，认为哪怕只去两个小时，作用也不可低估，重要的不是访问时间的长短，而是周恩来总理访匈这一事实本身。

1月10日晚上，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同时访问匈牙利做调解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很快得到回电认为那样做时机尚未成熟，指示周恩来单独前往。

于是，中苏匈三国发表联合会谈公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驳斥西方的造谣颠覆活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赫鲁晓夫殷勤地在克里姆林宫为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举办送行宴会，周恩来谆谆告诫赫鲁晓夫，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的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对此，赫鲁晓夫内心连声冷笑，但却陪着笑脸。

1月11日上午，周恩来与卡达尔、马罗山进行第二次会谈，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如何对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问题，为他们出谋划策，然后互道后会有期，就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到机场送行。



波兰之行恰逢其时

在华沙机场，周恩来一行受到哥穆尔卡等人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深知，在1956年6月的波兹南事件发生以后，波兰国内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波兰党和政府千方百计扭转局面，防止国内局势向坏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对政府仍然存在着不满情绪，对苏联的严重对立情绪也未消除。这种情况使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同其他几个政党在1月20日开始的议会竞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而在华沙机场发表讲话说：

“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变本加厉的时候，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当天中午，周恩来拜会哥穆尔卡、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鼓励他们在严重困难面前挺直腰杆迎接挑战，接着出席波兰政府的欢迎招待会，发表讲话

“波兰人民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集体安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人民特别感谢波兰在中国维护自己主权的斗争中所给予的一贯支持。”

中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周恩来首先请哥穆尔卡介绍



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及苏联干预的情况。哥穆尔卡认为波兰党的主要缺点，是在通过各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及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准备不够，他热情地向周恩来称赞说：

“中国报纸最近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你们谈到了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斯大林的估计，是对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贡献。各国党都应在这方面继续做出努力。《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很多问题上对我们党都有帮助，如矛盾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教条主义及修正主义、对外应该保持团结等。”

周恩来谦恭地表示感谢，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他结合中国的切身体会阐述苏联的作用说：

“苏联在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这个错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起来，只属第二位。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摸索道路，多少都会犯些错误。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应该承认苏联的领导，并帮助它，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好。”

当天深夜，哥穆尔卡邀请周恩来到他的住所作客，两人就波兰目前局势问题推心置腹地交谈。周恩来说从历史看，苏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但是学习别国的经验要与本国的情况结合起来，他实事求是地分析道：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切都好。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可通过相互往来，增进相互的信任和团结，求同存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对抗性的冲突，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强求一致。目前敌人正在利用民主化和党过去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党内主要危险可能是右倾。”

周恩来向哥穆尔卡建议要注意团结多数，挽救犯错误的同志，特别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哥穆尔卡欣然表示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月12日上午，周恩来一行参观华沙的泽兰汽车工厂，接着与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首先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介绍了访问南亚的一些情况。然后根据哥穆尔卡介绍的情况，对波兰党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想法，供他们参考。

周恩来认为波兰党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在八中全会以前就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中国党对此表示支持。纠正错误不能一概否定过去的成绩，建议波兰党考虑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中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让各种思想都毫无限制地在社会上流传，要估计到最坏的情况。

1月12日下午，华沙各界人民3000多人在文化宫会议大厅举行欢迎中国代表团大会，周恩来应邀出席，有意做波兰人民的工作：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二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揭发了过去在波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是这些错误和倾向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过去 12 年内，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

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医治了战争创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绩。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掌握政权的阶级都犯过不少的错误，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才能认真地为着人民的利益来揭发并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比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优越得不可比拟的地方。”

在当天进行的中波会谈中，哥穆尔卡就举借外债问题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周恩来说明向西方国家借款，原则上是许可的，在某一时期可以争取，但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他满怀信心地说：

如党领导运用得好，会得到好处。我们对外是争取和平共处，但不能示弱。示弱则帝国主义不仅不给帮助，反会与人为难。

周恩来深入分析波兰局势，认为必须大力对波兰人民做工作，来到波兰后，为了支持处于极其困难中的波兰党和政府，周恩来除访问华沙外，还到古都克拉科夫、钢铁制造业中心诺瓦胡塔、西部工业基地弗罗茨瓦夫和波兰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罗兹等地访问。

在所到之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与波兰各阶层人士接触，真诚地赞扬波



兰人民十多年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为医治战争创伤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波兰党为纠正错误所做的坚毅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波兰人民:

我们共同事业的繁荣和进步,总是要受到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仇视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我们必须加强团结,加强国内人民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

1月15日晚,根据毛泽东来电要支持波党领导的精神,周恩来与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单独谈话。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后,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提醒的许多问题,说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

周恩来此次波兰之行可谓恰逢其时,波兰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他们最信任的中国和著名外交家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一扫因为帝国主义破坏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干扰带来的忧伤悲观情绪,信心百倍地迎接挑战,在中波两国政府代表团联合公报上向全世界宣告:

帝国主义集团没有放弃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波兰人民,必将在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克服目前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中波联合公报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帝国主义颠覆波兰的阴谋遭



到沉重打击，帝国主义者极不甘心，千方百计破坏中波关系，在接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离间反击道：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党的互相接触，两国人民的互相来往，可以加强我们的互相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要加强合作。

波兰领导人觉得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帮了波兰的忙，他们觉得周恩来访问波兰的时间太短了，舍不得周恩来离去。周恩来也对波兰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华沙机场发表充满依依惜别深情的谈话说：

“我们毫不怀疑，坚定地团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周围的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暂时困难，把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

访匈一日

1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对匈牙利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

周恩来与卡达尔可算是老相识了，卡达尔曾经率领匈牙利劳动党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周恩来曾接见匈牙利代表团，与卡达尔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前几天在莫斯科，两人倾心交谈，初步对这次访问进行了安排。当时，周恩来就对卡达尔说：



“我这次访问的时间短促，只有16日这一天，恐怕到匈牙利后也不不过在形式上与各方面见见面而已。你们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们祝贺你们。中国党、政府和毛泽东同志都为你们的胜利高兴。”

卡达尔激动地表示感谢说：“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访问匈牙利是很好，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希望周恩来同志在公开场合对匈牙利的问题讲几句话，不一定很长，也是个鼓舞。”

1月16日上午周恩来一到匈牙利，就在布达佩斯机场发表讲话说：

“匈牙利人民遇到了暂时的曲折和困难，但是经过最近的斗争，匈牙利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一次重大的锻炼。在匈牙利最近经历的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帝国主义者企图从匈牙利打开一个缺口，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以达到他们各个击破的阴谋。我们坚信，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党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中国人民将给你们以坚定的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

当天下午4时，周恩来前往建筑工人大厦，出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积极分子大会。这是1956年10月事件以来匈牙利党中央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卡达尔和1500余人参加。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在访问波兰期间就亲自动手准备发言稿，直到开会前还在仔细推敲和修改。那天，他拿着这份改得密密麻麻、来不及打印的讲话稿登上讲台，首先对匈牙利事件进行全面的分析。他严肃地发表谈话说：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过去的领导者所犯错误的不满，要求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匈牙利在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周恩来更尖锐地指出，匈牙利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他热情洋溢地表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说：

“在匈牙利人民医治创伤，完成各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时候，可以指望得到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除原来向匈牙利答应提供的3000万卢布的经济援助外，再贷款一亿卢布外汇，另给一亿卢布物资，如果还有困难，中国将继续提供援助。

针对匈牙利人民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消极情绪，周恩来怀着对匈牙利人民



的深深敬爱尊重之情，引导人们从积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

“匈牙利人民击退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进攻的胜利，不仅对匈牙利人民，而且对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运动，都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经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人类，都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匈牙利人民心头的乌云为之一扫，霎时间掌声雷动，但在内心深处，还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愤愤不平。周恩来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大局出发，巧妙地解开这个扣子：

“过去匈牙利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帝国主义利用了这种情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在关系上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却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各国相互关系方面的一切问题，只要按照正确的原则，是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的。”

周恩来豪情满怀地宣称：“世界肯定地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即使可能一时猖獗，但阻止不了历史的必然进程！”

当天晚上，两国领导人继续会谈，周恩来着重说明：

“已向波兰同志说明了波兰发生的事和匈牙利事件性质不同，这是首先需要分清的；没有苏军出兵，匈牙利必定落入西方的范围内。匈牙利现在



处在需要强调专政的时期，艾森豪威尔说不想为匈牙利问题打仗，这不等于不从内部颠覆。”

为了让周恩来继续访问南亚时澄清匈牙利事件的真相，卡达尔说明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

卡达尔告诉周恩来：尼赫鲁说苏联有 1000 辆坦克在匈出动，这个说法不正确。驻匈苏军有坦克卫队，但大部分未投入战斗，主要用于封锁西部边境，防止帝国主义侵犯。关于伤亡人数，说死了 5000 人，这个数字夸大了。据最近可靠材料，死亡 1700 至 2000 人，伤 1300 人。匈逃亡国外的难民有 13.5 万人，其中 2.4 万人是因害怕暴徒屠杀而逃的犹太人。尼赫鲁说有 15 万难民，这个数字也太大了。说卡达尔政府只敢在政府大楼的楼上办公，楼下全是坦克，也是谣言，匈牙利政府的成员们一开始就参加了无数次积极分子会议。

周恩来特别善解人意，耐心地听完介绍后亲切地说：“到南亚后，我要说明这些事实，还可能遇到尼赫鲁总理，我要把你们讲的情况告诉他。有些人希望匈牙利政权改变性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周恩来与卡达尔在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17 日发表举世瞩目的中匈两国代表团联合声明，郑重地宣告：

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局势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帝国主义反动



势力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对过去的领导者的严重错误的正当不满,进行了他们策划已久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成就的反革命颠覆活动。两国政府代表团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要问题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保障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事业、争取持久和平的可靠保证。

短暂的访问就要结束了,卡达尔等匈牙利领导人到布达佩斯机场送行,周恩来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发表告别演说:

“匈牙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对于我们曾经受尽剥削制度的痛苦而坚决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来说,一时的挫折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

赫鲁晓夫跳了起来

17日中午,周恩来一行返回莫斯科,在机场受到米高扬和谢皮洛夫的欢迎。

下午,莫斯科各界劳动人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和中国人民友好群众大会,周恩来应邀出席,然后举行中苏领导人第四次会谈。

周恩来简单地介绍了他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赫鲁晓夫特别热情地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还将印发50万册单行本。”

出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周恩来真诚地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但赫鲁晓夫跳了起来，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当即严肃地批评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又转换话题发动进攻：“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明白这是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便平静地反驳说：“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道：“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回答说：“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



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又建议除发表中苏政府会谈声明外，再用党的名义发表一个公报。

周恩来答复说要研究一下，因为要考虑代表的身份和发表公报的内容。

当天晚上，周恩来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为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举行的宴会。他在宴会上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亲切地交谈，建议中南两国继续支持埃及和纳赛尔。

周恩来一天连续访问匈牙利和苏联两国虽然十分紧张劳累，但看到匈牙利领导人十分满意，对苏联的访问也基本达到预期的目的，心情十分愉快，18日凌晨向毛泽东电告他与哥穆尔卡和卡达尔会谈的情况：

“正像主席所估计的，波兰领导上是正确的，领导与群众是有联系的。布达佩斯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些，领导同志很坚决，很团结。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的都是少数，中间态度的占多数。”

18日上午，周恩来怀着崇敬的心情，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谒列宁、斯大林的陵墓，恭恭敬敬地献上花圈，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苏代表团的第五次会谈中，周恩来围绕斯大林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



激烈争论，批评赫鲁晓夫兵临华沙，实行威胁，是以武力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说明波匈事件性质不同。严肃指出与斯大林长期共事的苏共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有一定责任。

经周恩来奋力斗争，赫鲁晓夫被迫做出一些让步，中苏联合声明得以发表，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和侵略民族独立国家的同时，从未放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进行颠覆活动的企图。双方重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最可靠保证。

第二十三章 不当卫星国

顶天立地的外交家

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这样向赫鲁晓夫介绍说：

“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听后也很钦佩地称赞道：“周恩来是世界闻名的大外交家。”

随着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交锋日趋尖锐而复杂。

斗过几个回合之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关于周恩来的评价更有了切身体会。赫鲁晓夫办理与中国的交涉的时候，有时就绕过他极为头疼的周恩来。

1958年4月18日，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中国与苏联共建一座长波电台，所需费用大部分由苏联负担。

对于这个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几经协商，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让彭德怀6月12日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说明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碰了个软钉子，很不甘心，又命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由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

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中国主要领导人连续协商两天，然后召见尤金提出质问，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拍案而起：

“大使先生，你这样讲是不行的，这个必须弄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



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恨又怕，只得硬着头皮于1958年7月31日来到北京。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虽然阳光灿烂，仪仗队步伐整齐，口号响亮，但却没有万众欢腾的欢迎场面，主人避免与赫鲁晓夫拥抱，仅神态拘谨地握手寒暄。

毛泽东、周恩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4次艰难的会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强烈质问下，赫鲁晓夫推托说长波电台问题是苏联国防部提出的，并未经过苏共中央的讨论；关于建立共同潜艇部队问题，赫鲁晓夫硬说尤金没有准确地传达他的意见，因而造成了误会。

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据理严厉驳斥，会谈处于僵持之中。

中苏会谈的僵持局面，引起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的深思，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对同是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和伏罗希罗夫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呢？

费德林何许人也？他在中国工作十几年，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般工作人员一直到文化参赞，亲眼目睹从国民党政权到新中国的巨大转变，在解放后的中苏关系中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特别是费德林曾以翻译的身份参加过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见及中苏



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1959年4月15日又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访华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各界10万人大会上，周恩来亲自到会场门口迎接，毛泽东亲自领导全场群众高呼“苏联中国团结万岁”的口号。周恩来又陪同伏罗希罗夫到杭州和广州等地访问，在广州的告别宴会使苏联客人终身难忘。

费德林说周恩来的晚宴简直是真正的宫宴，烹制讲究，色香味美，周恩来的介绍更暖人心房：“亲爱的来宾们，我来对这些菜肴做点介绍，因为广东菜有它的特点。”

厨师端上一盆藕和百合，周恩来微微一笑，解释说这是“团结和谐的象征，因为藕和百合都离不开水”。

“明白了，”伏罗希罗夫津津有味地品尝，与周恩来举杯一饮而尽。

厨师端上各种海鲜后，周恩来又彬彬有礼地介绍：“这是用海参做的名菜，广东人把它当作滋补药疗食品，能够强身补气……”

苏联客人更感兴趣地品尝，气氛极其热烈。

不一会儿，周恩来又掀起一个高潮：“现在请大家尝尝广东的蛇肉。不过，苏联朋友中假如有哪位不喜欢或不习惯的话，不要勉强。蛇肉虽然很能补养，但中国人也不是人人都喜欢吃的。另外，一定要注意适量。”



伏罗希罗夫装作等不及的样子，开玩笑道：“说那么多干吗？！我们可不是胆小鬼呀！”

周恩来亲自掌勺：“那么，大家把碗准备好，我来给每人分一份。”

周恩来说着，熟练地把蛇羹分盛在每个苏联客人的碗里，然后宾主在一片谈笑声中愉快地进餐。

伏罗希罗夫觉得特别好吃，不客气地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周恩来同志，可以再来一碗吗？当然，再来一点点。”

周恩来有些犹豫，怕77岁的苏联元帅身体吃不消，便笑着发出劝告：“我很高兴，不过，这种菜一人一份就够量，因为这是一种凉性食品，吃多了恐怕……”

伏罗希罗夫拿出元帅的大无畏精神继续冲杀：“不用吓唬我们啦，我倒要试试看，再来一份，能把我……”

周恩来见伏罗希罗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扭头告诉翻译费德林但请他不要翻译：

中国人决不是小气不给，而是怕苏联贵宾逞一时之勇，产生不好的效果。他请费德林一定想办法别让伏罗希罗夫再来第三碗，否则老元帅消化不了会带来严重后果。

费德林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极力劝阻，但是伏罗希罗夫十分固执，对费德



林发火说：“你自己不吃，还要挡着别人，真是岂有此理！”

周恩来摇摇头，从为苏联贵宾的身体健康着想，谨慎地吩咐侍者把蛇羹撤走，送上中和性的食品和绿茶，才将此小小的风波平息下去……

费德林在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中，对周恩来极为崇拜，他在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中，这样写周恩来：

为什么有些人让你眷恋，有些人却令人敬而远之？为什么有些人使你倾慕、佩服、强烈地吸引着你？为什么你对周围许多人都漠然视之而唯独对某个人情有所钟？有的人，哪怕你只见过他一次，便立刻心向神往，不由自主地去注意他，并对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在我的经历中，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同他相识于40年代，在中国的四川省。从此，他便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忘不了……

费德林觉得周恩来虽然没有魁梧的身材，也不穿奇特的服装，更不哗众取宠搞一鸣惊人的举动，但他认为周恩来是个顶天立地的外交家：

周恩来将百年来中国外交的丰富经验与现代辩证法集于一身。此外，他还有一种个人魅力，善于使谈话对方——哪怕与他观点不同，甚至是他的敌手，也对他产生好感。他的处事原则是尊重别人，哪怕对方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政治争论中他总是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立场、观点和信念，这样就能迅速达到“真理的殿堂”。



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既掌握中国传统，又理解当代欧洲人的心态。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那就是坚定的信念。难怪在中国，人们称他兼有雄师与狐狸的品德。

正因为如此，费德林相信周恩来能够扭转中苏关系的困难局面。

果然，周恩来运用他娴熟的外交艺术，设法缓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紧张气氛。

在宴会上，周恩来举起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提议：“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古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好啊，干杯！”

费德林发现，除赫鲁晓夫一人还在生气，对周恩来的提议弃权外，在场的所有的中苏官员都举杯一饮而尽，气氛融洽了许多。

毛泽东向周恩来投去赞许的目光，手指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向苏联客人发出挑战：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毛泽东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是要与



赫鲁晓夫缓和气氛，但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不趁势下台阶，还在那里生闷气，布尔加宁看赫鲁晓夫太没有外交风度，站出来吃了根辣椒露出狼狈之态，才使气氛好转。

毛泽东又谈笑风生讲起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适时插话说：“我们那时把手头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经过4次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赫鲁晓夫看斗不过中国人，只得放老实一些。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见好即收，适可而止给苏联人一些面子，发表了《毛泽东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把赫鲁晓夫打发走了。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不久，就听到中国在8月23日开始轰击金门的消息。他一听就火了，马上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北京兴师问罪。

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地说明这并不是就要解放台湾，如果打出乱子自己负责，不拖苏联人下水。

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汇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9月初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打着支援中国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旗号，提出苏联派出一支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部队来中国，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赫鲁晓夫得意洋洋，自以为打着援助中国的旗号手段高明，把一个重大



外交难题放在了周恩来面前，看你怎么办？！

周恩来接到刘晓的报告，对赫鲁晓夫的狡猾欺诈行径极其愤怒，但要处理得极为得体又不留后遗症则相当不容易。

他反复思考，想到中国也在搞自己的轰炸机，何不将计就计要赫鲁晓夫提供一些技术资料呢？于是周恩来命人给赫鲁晓夫回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一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一16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和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帮助。

赫鲁晓夫收到周恩来的来电，暗暗称赞周恩来果然高明，自己设计的一个圈套，竟然被周恩来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但又冷笑连声，施展坑蒙拐骗伎俩，10月30日给周恩来拍来一封复电：

“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一16飞机的技术资料和样机。1958年11月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提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一16飞机。可以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



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的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周恩来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竟然堕落到大骗子的地步，中国付给苏联8200万卢布，只得到37%的技术资料，而且还是残缺不全的早已被苏联淘汰的东西，以此8200万卢布的“学费”，赢得了对赫鲁晓夫本质的进一步认识，赫鲁晓夫在中国更臭不可闻了。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计，更加踌躇满志玩弄花样，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

周恩来对此感到奇怪，他认为正在谋求霸权地位的赫鲁晓夫是在玩弄阴谋，马上报告毛泽东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决定予以反对。

1959年1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进行会谈，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说：

在现在的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敌人，让他们搞我们。



苏斯洛夫解释说，苏联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提法已不能反映客观的事态，因而害多利少，答应将向苏共中央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

1月25日，中苏两党代表团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明，苏共中央考虑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后，已对苏共中央报告中“为首”的部分做了修改，词句有些改变。

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地批评中国的对日政策弹性不够，把贸易与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不适当的。周恩来主动向苏联方面介绍日本的有关情况，说明中国对日本情况的分析估计和出发点，特别强调说：

“中日之间有‘两个中国’的问题，同苏日关系不同，不能让日本政府脚踏两只船，欺骗日本人民。我们对日关系还要冷一冷。”

1月28日，周恩来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当代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全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

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是能够制止的。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战争狂人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有可能狗急跳墙，乞灵于战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2月7日，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签订了中苏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规定双



方在1959年至1967年期间，在中国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由苏联供应的设备设计和各种技术援助的总值共50亿卢布左右。中国方面将根据中苏现行贸易协定，向苏联供应商品。

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给中国一点甜头，使中国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见中国并不向苏联低头，就在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宁可被粉碎也不屈服

8月27日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后，赫鲁晓夫不顾周恩来和中国的多次解释和劝阻，竟然指使塔斯社9月9日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周恩来气愤地与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的苏斯洛夫提出交涉，批评苏联推行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他特别指出：

“说帝国主义之间的离心倾向很大，一方面想缓和，另一方面又要搞挑衅，这是个矛盾。帝国主义总是想搞垮和平中立国家的，手段是搞军事政变和暗杀。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总是要依靠各国内部势力的，这样才能搞起军事政变和暗杀活动。”

周恩来没有想到苏联派出以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



庆祝活动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也来到北京，大肆贩卖“戴维营精神”，在谈及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时候，有意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不明智，是把尼赫鲁推向西方，周恩来怒不可遏地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赫鲁晓夫蛮不讲理地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用不可辩驳的逻辑反击道：“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哑口无言，自知理亏，无可奈何改变话题说：“毛泽东同志1957年派周恩来去处理波匈事件，他却在莫斯科无端教训我。”

周恩来据理驳斥道：“我们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你当时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犯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挥动胖胖的拳头捶在沙发扶手上大叫：“我没有



说！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见此人如此赖账，辛辣地讥讽说：“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这时，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站起来证明说：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同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与你谈话时，还有卡冈洛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的确说了那些话。”

李越然还将当时谈话的场景，参加人以及每人的讲话复述了一遍。

这下子，赫鲁晓夫给镇住了，红着脸尴尬地为自己开脱说：

“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说中国炮击金门没有与苏联打招呼，陈毅、周恩来和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驳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恼羞成怒，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一气之下没有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国庆节活动，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阅兵式的时候，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要撤回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苏联专家，公然向中国施加威胁。

赫鲁晓夫觉得与中国决裂的时机还不成熟，又玩弄缓兵之计指示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 1959 年 11 月 11 日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说：

请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赫鲁晓夫这次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所进行



的会谈情况，说明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

周恩来暗想，赫鲁晓夫真是一条变色龙，不知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但无论怎么说，赫鲁晓夫已经在转弯子，我们也要以礼相待，就采取灵活态度说：

“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中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

说到这里，周恩来将话锋一转，严肃地阐明中国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态度说：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的主张是，我们虽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现在还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一条分界线，在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以前，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退 20 公里，西部边界也根据双方现存的传统习惯线，也就是实际控制的地方，作为一条分界线，双方部队各退 20 公里。我们是尽量想用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最近印度的态度不好，这是有其国内和国际原因的。”

赫鲁晓夫完全明白，周恩来这里说的“国际原因”是何所指，他连声



冷笑，照样支持尼赫鲁反华。周恩来1959年12月10日接见准备回国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转告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

苏联对尼赫鲁无原则地让步，只会使他向右转。申述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样无助于局势的缓和。

契尔沃年科同意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但狡辩说从赫鲁晓夫的讲话还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周恩来也不与他多所纠缠。

其后，周恩来发现苏联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越来越袒护印度，就于1960年1月19日再次接见契尔沃年科，讲明：

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这方面。印方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如果苏联领导人访问和印度的时候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的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

周恩来从中苏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告诫苏联对于印尼的排华言论，应该给予回击，否则不利于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接到契尔沃年科转达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19日的警告，就施展骗术，让契尔沃年科22日会见外交部长陈毅，请陈毅转告周恩来和中共中



央：

“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我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中国同志的担心使我们感到有些惊讶。”

周恩来和陈毅都不相信赫鲁晓夫的鬼话，更对苏联的所谓“严守中立”的提法感到气愤，于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严肃地提出交涉说：

中国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感到惊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

周恩来和陈毅都尖锐地批评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

契尔沃年科极力辩解说：“苏联是想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

陈毅声如洪钟批驳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周恩来和陈毅打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他大发雷霆训斥契尔沃年科不会办事，让中国人抓住了“中立”一词的小辫子，要他向中国承认错误。



契尔沃年科无奈，只得于1月27日拜会周恩来和陈毅，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指示的时候用语的错误。

周恩来知道这又是赫鲁晓夫搞的小把戏，毫不客气地揭穿说：“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天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建议大使将几次谈话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1月30日再次会见契尔沃年科，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同时说明中苏分歧在当时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应该妨碍两党的团结。

1960年6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诬蔑中国共产党人是“疯子”，“要发动战争”，“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参加会议的彭真以大无畏精神表示，“宁可被粉碎也不屈服”！

苏联很快采取一系列步骤，进一步对中国施加经济、军事和政治压力。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协议。

周恩来对此义愤填膺，协助毛泽东展开斗争。

8月1日，周恩来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指出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



议上散发给兄弟党的文件有很多不符合事实。他雄辩地指出：

我们主张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和侵略政策，这符合《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应成为我们的共同准绳，应成为目前斗争的宪章。我们希望 11 月莫斯科会议能根据《莫斯科宣言》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这样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请大使将我们的愿望转告哥穆尔卡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

周恩来对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苏联专家义愤填膺，但对奉命归国的苏联专家仍然以礼相待，8 月 16 日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周恩来彬彬有礼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苏联专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回国表示惜别，他满含深情地致辞说：

“如果觉得我们工作上有何缺点，请告诉各单位领导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谊。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许多苏联专家十分懂得他们突然撤走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但中国总理竟然对他们毫无任何怨恨之情，反而仍然那样真诚，他们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周恩来总理，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面对中国与苏联的深刻分歧，周恩来想了很多很多，8 月 25 日接见他



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特朗的时候，对中苏关系有这样的分析：

中苏两党和两国以及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重要的，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目前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一些争执，这些争执都是原则性的，是对马列主义原则的不同看法；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两党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的轨道。错误的理论和原则必须加以限制和纠正，必须把

它拉回到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正确的方向上来。这种工作是要做的，并有重要的意义。

1960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时，增加了下述重要指示：

“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

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

1961年10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0月19日，周恩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并发表重要讲话：

“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

周恩来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对这一做法很不赞成。为了表达中国的原则立场，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1月27日拜谒列宁和斯大林墓并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赫然以大字书写：

“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

这显然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态度迥然有别，因此他们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此举甚为不悦。

赫鲁晓夫公然攻击应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代表团对此坚决反对。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赫鲁晓夫以此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国际共运中的内部争论公诸于世，开创了一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国共产党的恶劣先例。周恩来严正指出：

“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



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有助于团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赫鲁晓夫不但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而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在一次会谈中，他指责说：“当我们在 20 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捍卫和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就是反对我们党。”

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言论，周恩来只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进行反驳，他认为，批评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反斯大林，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没有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故意贬低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周恩来与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和金日成多次交换意见，强调要处理好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循三条原则：第一，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第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第三，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

1月22日，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会谈，



他费尽唇舌，双方仍然处于对立的境地。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竟然煽动一些代表团人员，对周恩来的发言妄加指责，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甚至含沙射影诬蔑毛泽东，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以示抗议。在北京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迎接。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

1962年是个多事之年，正值中国面临暂时经济困难、美蒋不断骚扰大陆的时候，苏联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一边，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周恩来极其忧虑，为不当苏联的卫星国，6月间下令关闭了苏联驻新疆的所有领事馆。

同年8月，周恩来接到苏联政府的通知，苏联已同意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出的就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进行谈判的建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9月、10月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郑重地警告苏联政府：

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表中国承担义务。

然而，苏联不顾中国的劝告和警告，1963年7月25日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周恩来在7月31日和8月15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



声明,反对苏联以此条约剥夺中国人民采取措施抵抗美帝国主义核威胁的权利。

周恩来有一句颇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的名言:“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周恩来投入巨大精力领导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事业,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开花结果,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西部那片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正好成为赫鲁晓夫下台的“送瘟神礼炮”。

当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的时候,愉快地宣布了这两条大快人心的事情。

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风趣地说:“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

周恩来谈笑风生说:“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向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认为赫鲁晓夫下台和苏联领导人的变化,必然对世界形势和中苏关系产生影响,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中国应该采取的态度。

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苏联驻华大使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尽管情况还不太清楚，但赫鲁晓夫的下台，对扭转中苏关系的恶化趋势可能还是一个机会。

10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指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贺电，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

经周恩来亲自主持修改并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的贺电立刻震动全球：

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由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不寻常的莫斯科之行对苏共新领导的“战略侦察”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党关系的状况，周恩来与余湛等人说：

“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发出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



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得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关系改善途径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恩来接受任务之后马上行动起来,日以继夜地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中共的这个重大决定和倡议告诉他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分别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

考虑到苏联已与阿尔巴尼亚断绝党和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极其耐心地阐明中国的意图,说明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是件好事,是起积极作用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每个兄弟国家及对世界都有影响,无论中国代表团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各国对此都表示赞成。

10月31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契尔沃年科,听取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意见。

契尔沃年科彬彬有礼说:“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就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



是结论’。”

11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上做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他极有分寸地分析说：

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与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

11月5日，周恩来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的欢迎，他抱着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与柯西金热情地握手问候。

柯西金将中国客人安排在列宁山苏联政府的的别墅里。

这是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小花园，周恩来曾经在这里住过，也算是旧地重游吧。

晚饭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花园中散步，众人只见庭园景物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有人随口朗诵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著名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有个中国外交官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他们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频频点头说，还是“周郎”好。

11月6日，周恩来为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深思熟虑后在缎带上霍然题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

周恩来首先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询问讲话内容，周恩来说明主要是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结果被勃列日涅夫摇摇头找了个借口婉拒。

周恩来又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人寒暄后，柯西金说自己刚担负重任，向周恩来请教治国经验，周恩来谦逊地说：

“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

11月7日上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冒着严寒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典礼，他身着哔叽中山装，外套一件灰色呢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

11月7日晚，苏联新领导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



待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周恩来与苏联新领导交谈后，想与聚在一起的苏联元帅们打招呼，他与不少苏联元帅是老熟人。

这时，马利诺夫斯基迎面走过来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堂堂苏联元帅竟然在这样庄严的场合如此大放厥词，立即顶了回去：“你胡说什么？”

周恩来说罢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却毫不知趣，像发了疯似地追着周恩来胡言乱语：“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这时，周恩来和他的翻译已经走远，没有听见这些胡说八道，但被另一位中国翻译听见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他，又不知趣地跑到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跟前，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被贺龙正颜厉色顶回，亦遭到崔可夫元帅的批评：“我们并不这样看！”

马利诺夫斯基别有用心的煽动引起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强烈愤怒，立即在周恩来率领下离开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以示抗议。

回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周恩来详细地听取了代表团人员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前后经过，一致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



这充分反映了苏联新领导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态度,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公开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必须严肃对待。

11月8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苏联新领导,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

稍事寒暄之后,周恩来严肃地就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当面侮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公然煽动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一事,强烈要求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人见事态严重,声称他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委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词严辞予以驳斥,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

周恩来指出,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急忙表态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赶快表示，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

周恩来结合西方对此事的反应指出：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 8 日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把大事化小，急忙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断然表示，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列日涅夫无可奈何说，那当然，那当然。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一再向苏共新领导表示，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但勃列日涅夫等人一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11 月 9 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又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急忙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



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

周恩来认为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对中共进行了那么多攻击，而对中国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今天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执意不谈，而提出公开论战问题显然别有用心。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开僵局？周恩来苦苦思索。

他决心试探以转换议题的方法打开一个缺口，用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作为寻找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的试金石，看与他们有无商量的余地，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急忙分辩道：“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周恩来不慌不忙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

这是苏联新领导的命根子，勃列日涅夫固执地拒绝：“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

周恩来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



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开始露出蛮横之态：“召开这个会议是我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据理反驳道：“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勃列日涅夫摆出大国领导人的架子，企图把中国共产党给苏共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反驳说：

“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嘛。”

勃列日涅夫被驳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周恩来诚恳地说明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关系，一步一步地前进，中国有理由要求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还特别指出：

“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



周恩来还告诉苏联新领导人，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无论周恩来怎么劝勃列日涅夫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7月30日下的命令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就是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

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告诉周恩来：“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周恩来对苏联新领导的怀疑终于得到证实，米高扬的话最后证明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就是要中国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人指挥棒转的团结，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当即表明中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说：

“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米高扬见周恩来态度这样严厉，急忙为自己辩解说：“我讲的是思想分歧，但我们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做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



周恩来问道：“那你们与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区别？”

勃列日涅夫等人相视无言。

周恩来及时地与罗马尼亚、波兰和越南等代表团领导交换意见，认为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苏共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周恩来又与中国代表团人员仔细研究中苏谈判形势，得出明确的结论：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周恩来还与中国代表团同志讨论了能否与苏联新领导人发表一个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明的问题，他认为苏联在这方面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对赫鲁晓夫和中苏关系问题至今也无像样的表示，发表这样的声明只会给苏联新领导人增加招摇撞骗的资本，达不到真正联合反帝之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利用，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因此，一致同意不搞此事。

11月11日，周恩来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



扬等人进行第二次会谈，勃列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争论的问题，周恩来断然拒绝道：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

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质问中国代表团对苏共中央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周恩来威严地指出在苏共新领导人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于是对苏共中央的意见做出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在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之后，又以灵活的态度，真诚地做出进一步努力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千方百计为他们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遭到了周恩来的坚决驳斥。周恩来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恩来所料，无非是身体呀、健康啊等原因，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



互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的。

最后，周恩来又诚恳地提出建议，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乘专机回国，柯西金到机场送行。

周恩来与柯西金同乘一辆轿车，柯西金搭讪着打破沉默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略含嘲讽意味地问：“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辞，似有难言之隐，周恩来适可而止，也不再追问。

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外交出访，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艺术，揭开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推翻赫鲁晓夫之后为自己披上的虚假面纱，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捍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尊严。

虽然由于苏联新领导人的顽固态度显然与中国的愿望相去甚远，缓和中苏关系的机会遗憾地失去了，但毛泽东却给予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率领中国所有领导人和北京各界群众代表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一



行访苏归来，毛泽东与周恩来亲切握手，两人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柯西金“路过”北京

1965年2月5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途中路过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热情招待，两天进行了4次会谈。

周恩来首先从容易有共同语言的反帝斗争谈起，指出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撤走，另一种是扩大战争。

柯西金急忙询问哪种可能性较大？周恩来分析：

“前一种可能性小。我们随时准备应战，他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帝挑起战争，我们准备好了。美国懂得朝鲜战争的后果如何。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没有把苏联拉进去。如果美帝在印度支那要扩大战争侵犯中国，我们要回答，但不会把它扩大到全世界。”

柯西金是对周恩来比较了解的苏联领导人，他十分明白周恩来这些话具有一箭双雕之效：既表明对美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严正立场，又向柯西金暗示，苏联不要对中国轻举妄动！因此主动向周恩来表态说：

“我了解中国情况，相信中国对军事行动是谨慎的。”

周恩来向苏联发出警告后，又就苏联外交部长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指桑



骂槐、影射中国的不友好行为提出交涉，严厉地质问说：

“葛罗米柯这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说，有些人要冒险，企图把别人拖入战争，是指谁？”

柯西金十分明白葛罗米柯和赫鲁晓夫一样骂中国是“好斗的公鸡”，但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急忙慌乱地掩饰道：“这不是指中国。”

周恩来发出警告后也不强人所难，而从中苏两国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能够得到最好效果的建议说：

“面临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5 周年，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都在报纸上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

柯西金想到自己总不能白经过北京一次，这样做对苏联也有好处，就表示赞成。

周恩来看已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又提出一项建议：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对此，柯西金表示赞成。

周恩来见柯西金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就力争达成一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协议，于是相继提出建议：

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做个结束；

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计划，过去几年执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执



行得好一点；我们要派一些留学生去，希望得到你们的回答。当然，如果你们也提出要派留学生来，我们应该相应地满足你们的要求；双方的旅行协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执行。

对这后四项建议，柯西金也表示赞成。

周恩来对柯西金这次的表现比较满意，约定柯西金从越南返回的时候再次进行会谈。

2月10日柯西金从河内回国的时候再次路过北京，周恩来同意接见苏联代表团再次进行接触性会谈。11日凌晨，周恩来想到今后的中苏关系，给毛泽东写信：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客观事物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接见柯西金，认为“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毛泽东完全同意。

11日，周恩来陪同柯西金会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高兴万分，认为自己在中國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抽烟。

柯西金谢谢说：“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然了一支烟，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说：“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幽默地解释说：“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恩来在上次与苏联代表团的会谈中，知道柯西金的两位将军随员抽烟，就在旁边凑了一句：“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噢，我还有朋友啊？”

接着，毛泽东陡然将话题一转：“攻击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来呀？”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在说反话，巧妙地用幽默方式引柯西金说出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柯西金果然中计，但是马上发觉说走了嘴，刚露了个话头，很快又把球踢了回来：“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在赫鲁晓夫问题上做天下奇文：“他身体不好？我们不



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继续幽默地在赫鲁晓夫问题上大发感慨：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啊，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说：“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来想他这一着，准叫毛泽东无法还口，没有想到反而被毛泽东顺势“将上一军”：“叫他来一下嘛！”

周恩来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大胆的设想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把球轻轻踢给毛泽东：“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豪气地顺水推舟道：“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是个宝贝啊！”

柯西金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可做不了勃列日涅夫的主，又无处可退了，只好胡乱搪塞说：“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指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跟周恩来同志谈过，很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就笑嘻嘻地问：“谈过了吗？”

周恩来适时出来回答道：“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周恩来发现柯西金有一定之规，任凭毛泽东和自己怎么“将军”，也



不肯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再露任何口风，只得转换话题，不料两人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又很快争论起来。

毛泽东笑着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柯西金急忙解嘲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则一语双关地询问道：“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头故做谦虚之态：“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来问道：“噢，无法实现？”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话谈结束后，柯西金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盛大宴会，答谢周恩来对他的热情招待。

1965年1月11日下午1时半，柯西金离开北京回国的时候，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两人再次同乘一辆小轿车，周恩来发表临别赠言说：



“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终究能够了解对方的想法。不求一次了解一切，多次交换以后，总会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令周恩来遗憾的是苏联新领导仍然要中国做苏联的卫星国，依然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仍然在1965年3月召开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国际共运中的分裂会议，终于使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

第二十四章 中英外交风云

在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与英国的关系极为奇特。

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最早，但在很长时间里却又处于半建交状态。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的闪光之点，既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严肃原则性，又闪烁着巧妙智慧的光芒。

没有先例的建交谈判

早在1949年3月，周恩来就得到一条重要消息，英国有意承认新中国。

1949年7月2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宣告：“英国政府将不试图干涉中国选择它的政府，但是中国曾经承诺了的某些国际义务



必须遵守。”

新中国成立后，贝文又于同年10月3日和7日两次提到英国是否承认中国，决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英国的态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遵守旧中国政府已承诺的国际义务。

周恩来还得知英国外交部10月10日命令它派驻广州的外交人员，不再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粤东胜利进军的形势下，英国当局召开“英国——中国会议”讨论英国对华外交，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发电祝贺，说明“中国人民欢迎加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

1949年12月25日，在周恩来欢送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前一天，他接到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正式通知：

1950年1月6日，将是英国承认中国的日子。

大英帝国在西方列强的侵华史上，可谓历史最久。1842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由此开始。100多年来，英国从中国劫掠走大量财富，40年代末见形势不妙，从中国抽走了不少资金，但是仍然有10亿美元之巨的资产留在中国。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实力大为削弱，看到美国势力被赶出大陆，形成一个巨大的贸易空白，在华拥有巨大投资的垄断集团为保



住自己的利益，就敦促英国政府与中国建交。英国有识之士认为中英建交后，既可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又可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中介和调解人的作用，有助于保住英国在东南亚和香港的巨大利益。

这种种因素导致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和英联邦内部的分歧，做出惊人之举承认新中国。

贝文的来电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愿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互换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派胡阶森为临时代办，并声明撤销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

周恩来认为打开中英关系，有利于开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便于1月9日复电贝文，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英国建交，并接受胡阶森作为英国代表来北京谈判建交事宜。

贝文很快给周恩来复电，对中国提出要进行建交谈判表示不能理解，声称当一国政府承认另一国政府的时候，外交关系事实上就已开始。两国间任何一国在相互关系上进行谈判，通常是在建交之后，而不是在建交之前进行，强调这种为建交而进行的谈判是没有先例的。

周恩来复电告诉英国方面，中国方面鉴于国民党还盘踞着台湾，一些国家仍然支持它，更有一些国家借此制造“两个中国”，因此中国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建交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



不承认国民党政权承诺的各种义务。新中国在与一个国家建交前，坚持双方应派代表就建交的程序问题进行谈判，在对方明确、澄清对国民党集团的态度后，才能商谈建交日期和互换使节。“只有一个中国”，这是新中国坚定不移的建交原则。

英国政府虽然对周恩来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表示不可理解，但是也认为不能阻止一国政府在和另一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提出问题，因而派胡阶森来北京进行建交前的谈判。

1950年3月2日，中英建交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

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提出，中英建交必须首先解决英国政府与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英国要表明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立场，即英国要对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投弃权票做出解释，英国政府还必须对于在英国、英国其他属国及香港的国民党各种机构和中国国家财产问题做出明确表示。

3月17日，胡阶森送来英国政府的答复，周恩来和外交部官员仔细阅读。

周恩来认为英国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态度暧昧，含混不清，说英国之所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是因为这个问题当时不可能获得多数通过。



周恩来认为英国对第二个问题是乱找借口,说什么对中国在英国管辖地区的财产问题,因为英国已承认中国,所以中国有权处置这些财产;如果财产仍然在他人手中并拒绝交出而引起纠纷,行政当局又不能解决时,则需由中国政府诉诸法院。

不能容忍的是英国在“诉诸法院”的借口下,非法掠夺中国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中国财产,更恶劣的是非法倒卖两航财产。

原来,两航公司全体员工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宣布起义驾驶12架飞机回来后,留在香港的财产还有4000万美元,周恩来总理两次发表声明,指出它属于中国财产,港英当局必须负完全的责任。台湾当局则宣布将其出售给美国人陈纳德,港英当局无视周恩来总理的声明,由其法院宣布“管制”并受理诉讼。

周恩来指示中国民航局长发表声明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港英当局最高法院1950年2月23日做出两航财产归中国所有的判决,但港英当局又在美国的压力下,阻挠两航公司的飞机返回大陆,结果有5架被国民党特务炸毁。

周恩来指示中国谈判代表尖锐地批评英国政府,未能以实际行动表明它确实与国民党集团完全断绝关系,未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产权及财产处理权予以充分尊重,1950年5月8日要求英国政府对中英建交的两大



问题再进一步予以澄清。

5月11日，英国政府置中国政府的意见于不顾，非法扣押两航空公司飞机71架，周恩来17日指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致函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提出严正交涉：

“这不仅是表示英国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财产毫不尊重，而且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

考虑到这些情况，周恩来5月22日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英建交谈判经过发表谈话，要求英国政府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继续予以澄清。

然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24日却于英国下院说声明英国承认中国是一件“不惬意的决定”，大放厥词说：

“我们不愿做这件事……我认为，现在每个人都为此感到后悔，这已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周恩来对此极为遗憾，认为这充分表明，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建交，以维护英国的利益，并对中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美国的压力下，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敌视，又不断对新中国有不友好的举动，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合理的建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英国派出军队参加侵略朝鲜的战争，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中英外交问题搁浅，中英关系趋向正常化又面临难



关，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才获得转机。

与英国外相艾登寻求共同语言

周恩来得知杜勒斯蛮横地指责艾登对中国态度软弱，搞得艾登很恼火，就请莫洛托夫在 1954 年 5 月初把艾登邀到苏联的别墅赴宴。

艾登是个性格开朗且有绅士风度的著名外交家，与周恩来初次见面就风趣地指着沙发上的菠萝说：“苏联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会心地朝周恩来一笑道：“但是中国有，中国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

艾登早就对古老的中国有神秘感，他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可惜我没有去过中国。”

莫洛托夫趁热打铁给艾登和周恩来架桥说：“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艾登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讲起他与中国的关系，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周恩来：

“但愿如此。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与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门，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写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周恩来对此表示感谢，饶有风趣地讲起他与哈门的交往，使艾登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的气氛融洽了许多。

艾登今天是有事而来，他受人之托向中国和苏联外交部长提出要求道：“你们两位，或者你们两位之中的任何一位，可否劝劝胡志明，让法国的伤兵从越南撤走？”

周恩来为促成印支问题的全面解决，说明奠边府伤兵的撤退问题，最好交由交战双方谈判解决。因为在朝鲜停战前，交战双方即曾直接商谈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已邀请了5国，而奇怪的是对双方有关国家的邀请却尚未定，由此可见有人在阻挠印支双方参加谈判。

莫洛托夫和周恩来劝艾登利用英国与美国有共同语言的有利条件，劝说美国人不要太僵硬，太冲动。

艾登摆出英国标准的绅士风度两手一摊苦笑着说：“有一个剧作家曾经说，英国与美国之间，除了语言共同之外别无共同之处。”

周恩来尖锐地道出问题的本质：

“美国丧失中国之后，它不甘心，因此就威胁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相反，美国人民却被弄得神经紧张。”

艾登以大英帝国的外交大臣自居，不肯在周恩来面前居于下风，振振有辞地坚持他的观点，为他的美国盟友辩解道：



“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看法，他们曾经对蒋介石热烈支持，英国对于蒋介石就从来不是很热心。美国人又认为他们在中国做了许多善意的事，我指的是支持蒋介石以外的事，如传教、救济等等，而美国人认为现在中国人是以怨报德。”

周恩来双肩一抱据理驳斥说：“问题的中心正是美国帮助蒋介石压迫和屠杀中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对美国满意？”

艾登才华横溢又富有应变能力，巧妙地转移话题说：“实际上，英国在中国的损失要比美国大的多，但是美国人总强调在中国作过善事，中国不要以怨报德，这种心理上的感觉是在起作用的。”

周恩来微微一笑驳斥说：“英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干的大量的坏事，算起历史账来，英国并没有损失。”

坦率的谈话使中英外长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彼此都肃然起敬。接着谈到中英关系，双方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

艾登认真地提出问题道：“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

周恩来反驳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艾登振振有辞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有人在伦敦。”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英国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便当即表示考虑艾登希望中国也派相应人员来伦敦的问题。

5月14日,艾登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万花岭拜访周恩来,两人就恢复印支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取得大国地位是应该的,这是客观存在。

此后,中英外长频繁接触,差不多每周一次。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与英国工党领袖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接触。5月30日会见这两人,就改善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恰当地提出要求说:

“中国不期望英国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美国控制着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但是,英国可以把与美国的不同意见向世界表明,从而也可以影响美国。”

威尔逊和布朗要求发展中英贸易,周恩来欣然表示同意说,中英贸易应该按照两国的需要两国人民的利益来进行。关于中国在英国建立贸易机构的问题,中国将加以考虑。

在此前后,周恩来指示负责对外贸易问题的雷任民多找关系,与同在日



内瓦的威尔逊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争取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

1954年6月1日，艾登宴请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艾登，中国同意将像英国派谈判代表到北京那样，中国也将派谈判代表去伦敦，艾登立即带着这个好消息返回伦敦促进中英关系，周恩来发电向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发展中英关系的建议称：

威尔逊、罗布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了推进中英关系，建议我们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6月16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再次拜访艾登，就中英关系的发展进行磋商，还郑重地对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态度发出劝告：

“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表现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上，希望英国不要像美国一样缺乏和解精神。”

6月17日，是中英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和英国双方同时发表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公报。

中英公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周恩来非常看重中英互换代办一事,认为这不但是标志着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也是中国建交史上的一大创举。

1954年8月中旬,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周恩来将其视为中英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待。

早在6月9日,周恩来就批评《人民日报》把5月26日的电讯稿,6月2日才发表在四版四栏,是不够显著而且也太迟缓了,严厉地提出批评说:

“艾决定访问我国的消息引起世界注目,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应很大。一般认为,艾的访华是得到了丘吉尔和艾登的同意的,因而这标志着英美矛盾的表面化。为了配合外交斗争,我

党报应表示重视。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报道如何刊登的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

为了接待好英国工党代表团,周恩来8月12日亲自召集有关部门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做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讲解接待这个代表团的重大意义,认为我们应该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搞好接待工作,对推进中英关



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且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他说：

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是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的。英国工党虽然是反对党，但他来访实际上是得到英国外交部支持的。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我们同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周恩来深刻地阐述“求同而不求异”的重要外交思想：

“我们和英国是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就是求同而不求异。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在这三点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

“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我们要讲求实际，目的是为了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

8月15日，周恩来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讲明台湾是一个容易激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希望英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



志，然后将话题转向中英关系问题说：

为了改善中英关系，中国已答应艾登外相派一个中国代表到英国去，这是目前采取的第一步。只要英国在联合国投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赞成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中英就可以互换大使。这是我们对于中英互换大使的唯一条件。对于过去的事情加以澄清以后，就有助于双方的关系在将来的发展，经过这种解释而增进的友谊，更为可贵。

8月24日晚，周恩来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为艾德礼访华举行的宴会，强调要求同存异，第二天又致信就要离境的英国朋友，称赞双方的会谈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合作，感谢他们对中国所表示的好意和友谊。

然而，英国却追随美国的侵略政策，胡说1954年12月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应该欢迎的事情”，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批驳。

1955年1月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会见周恩来，转达英国外务大臣艾登的口信，艾登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在政协的报告中关于“英国的态度在日内瓦会议后有所改变”的论述，对“中国报纸指责英国政府不守信义”表示不满，杜维廉强词夺理说：

“刚才转达的艾登的口信，其中心要点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英国的态度不是支持一方和敌视另一方，



而是真诚地以实际情况为根据的。”

看英国如何“劝架”

周恩来稍加思索批驳道：“关于英国的态度是否不敌视任何一方的问题，可以看看事实，过去的事实证明是相反的，举例来说，卡祺亚先生对宦乡先生说，不要去论问题的是非，要承认事实。这句话代表了英国政府态度中的可疑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地方。……”

卡祺亚是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宦乡是中国驻英国代办，卡祺亚对宦乡的谈话明显地反映了英国政府偏袒美国和国民党集团的态度，杜维廉极力为卡祺亚辩解说：

“关于卡祺亚对宦乡的谈话，似乎有一些误解。英国政府并不是要中国政府不论问题的是非，而是建议按实际情况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每一方对是非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英国的建议却证明了它是不敌视任何一方的。英国所做的积极建议是要求双方的约制

针对杜维廉的狡辩，周恩来不像他那样在概念上兜圈子，陷在推磨式的反复争论的泥潭中，而随手举了个生活中的例子，生动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拳，第三个人出来劝架，他不劝第一个人放下拳头，却要求第二个人不还手。这如何能说是要求双方制约？”



在这里，周恩来形象地以“第一个人”比作美国和国民党集团，用“第二个人”比作中国，“第三个人”英国出来劝架，却不劝美国和国民党集团停止进攻和侵略，反而责骂被侵犯者中国，硬说这是“要求双方制约”，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但是杜维廉却装出极其委屈的样子说：

“第三个人出来劝架，结果常常是自己挨打。”

周恩来一眼看穿了杜维廉的鬼把戏，辛辣地讽刺说：“现在不是第三个人挨打，是第三个人不去劝第一个人住手，反而责骂第二个被打的人。”

周恩来用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来源，英国追随美国的侵略政策，改变了艾登外务大臣的正确主张：

“艾登外交大臣在伦敦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曾经建议签订亚洲的洛迦诺公约，这是有利于集体和平的……但是等到我第二次到日内瓦以后，艾登外交大臣告诉我，英国已经不再主张缔结亚洲的洛迦诺公约了，因为美国反对。日内瓦会议以后，英国同美国一起搞马尼拉条约，这是我们反对的。英国不坚持我们已经表示赞成的建议，却跟着美国来制造分裂。现在，马尼拉条约的签字国又要在曼谷开会，加深分裂。这如何能说是为和缓紧张局势而努力呢？”

《洛迦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等7国代表在瑞士城市洛迦诺通过的一系列条约的总称，规定各签约国相



互保证德法、德比的边界不受侵犯，被希特勒上台后宣布废止。后来艾登建议签订《亚洲洛迦诺公约》，显然有利于亚洲和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英国的态度也完全改变，周恩来借此说明美国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英国跟着美国跑也很不光彩。

《马尼拉条约》是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的策动下，由美、英、法等国在马尼拉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专门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批评英国取消原来提出的缔结《亚洲洛迦诺公约》的建议，而与美国一起签订《马尼拉条约》，岂不说明英国不仅正“跟着美国来制造分裂”，而且还反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吗？

周恩来用辩证的观点分析杜维廉的谬论，认为他有两个矛盾之处，最明显的是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矛盾，于是用英国自相矛盾的事实驳斥道：

“台湾已经归还中国，是属于中国的。这是铁的事实，怎么可以怀疑？但是，英国政府的代表在议会中却表示怀疑，英国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都承认台湾应该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在台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因此，台湾已经归还了中国。怎么说台湾的法律地位还需要研究？”

周恩来说到这里，目光炯炯盯着杜维廉，义正词严地质问说：



“杜维廉先生在北京已经很久，一定会了解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有多大的伤害。英国政府简直已经不是采取一个朋友的态度了！”

“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得更厉害的，是英国政府称赞美蒋条约，指责中国解放台湾。英国一方面说，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去解放台湾，就会引致战争，另一方面，又要中国容忍蒋介石在美国保护下所进行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比这更坏的，是英国外交次官纳丁在美国公开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将同联合国一起行动。甚至连美国舆论都不赞成这句话。这是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

杜维廉急忙辩解说纳丁年轻不懂事，已被英国政府召回，但是英国政府是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周恩来严肃地驳斥道：

“英国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不对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美国侵占台湾，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我们的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又劫夺来我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的商船在内，但是英国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

周恩来充分地揭露出英国政府的自相矛盾之处后，巧妙地采取类比和假设相结合的方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道：



“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这行不行呢？”

这番雄辩端正了国际视听，使杜维廉口服心服，两人交上了朋友。

1955年1月28日，杜维廉再次拜会周恩来，转告作为英联邦成员之一的新西兰当日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讨论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发生“敌对”行动问题。

周恩来当即询问英国政府的态度，杜维廉说英国对此表示支持，宣称英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停止实际战斗，从而避免大战的危险”。

周恩来对英国这一立场表示气愤和遗憾，严肃地给予严正的驳斥说：

“新西兰的建议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新西兰建议的讨论。”

2月23日至25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举行会议，周恩来25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提交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指出曼谷会议“同维护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友好合作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请艾登对美国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以中国为敌对目标的行为，给予严正注意。



艾登提议中英外长在香港或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会谈,周恩来以艾登追随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为由予以拒绝。

2月28日,艾登命杜维廉向周恩来转达他的口信:如果中国政府保证不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使用武力,英国愿意促成中美接触,愿意就此与周恩来进行会谈。

周恩来断然拒绝说,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艾登的意见不仅不能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

然而,周恩来也不把大门关死,说明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的干涉,从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如果艾登愿意讨论如何创造这些必要条件的话,周恩来欢迎艾登来北京会晤。

同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前,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港英当局不认真追查放置炸弹的凶手,反而拖延时间,纵使罪犯逃走,受到周恩来的严厉谴责。

1955年5月9日,杜维廉求见周恩来,转达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的口信,伦敦以极大的兴趣和希望对待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声明,愿意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挥作用。



5月26日，周恩来约见杜维廉，表明了中国对中美之间进行谈判的看法，谈判的方式可以协商解决。

经英国的斡旋，中美大使级谈判终于在1955年开始举行。

1956年10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九龙暴乱后，周恩来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指出暴乱事件是由台湾特务分子利用辛亥革命纪念日的机会，在流氓分子集中的地区挑衅搞起来的，绝不是香港英国当局所说是“左翼和右翼运动成员间的两个派系的斗争”，他严厉地谴责英国政府说：

“香港的英国当局事前未予防止，事情发生后又袖手旁观，致使事情闹大。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保留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不能不要求英国政府答复：香港当局究竟如何负责地来制止这种暴乱？”

面对中国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欧念儒16日将这些措施向周恩来简要通报后，周恩来回答说：

“香港当局逮捕了一些人，局势已经平静了一些，但是祸根没有铲除。祸根就是潜伏在香港和九龙的国民党特务，他们还会进行破坏活动，葛洪量总督返港后的声明和香港当局今天的新闻公报，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斗而引起坏人趁火打劫的结果，我们不同意这两个声



明。”

周恩来看到英国许多企业家对中国的广大市场极其感兴趣,便积极吸引英国资本家把目光转向中国,促使“金鹅”下蛋,以突破禁运,终于使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1957年5月30日宣布把对华贸易限制放宽到与苏联相等的程度,给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接着,周恩来巧妙地使中英关系从经济贸易方面向政治外交方面发展,他1958年1月8日接见英国路透社总编辑柯尔等人的时候,批评英国倾向于跟着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毫不含糊地指出: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英国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承认中国,这样两国就可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做不到,可以采取弃权办法,保持现有的关系,如果承认中国而又制造“两个中国”,这是对中国人民最不友好的。

1月1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谈到中英关系,说明中国政府应该有正式代表驻在香港,英国愿意与我们做买卖,很好,我们也愿意,但英国还搞禁运,没有道理。周恩来指责英国一面承认新中国,一面倾向于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开路。周恩来通情达理地说:

“英国在亚洲有很多关系和利益,如果同新中国关系好,对它没有损失,只有好处。我们并不要看到英国完全退出亚洲,它的合理的利益可经



谈判来保存。”

1月31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营救过孙中山的英国医生康德黎的孙子凯尼斯·康德黎，对他祖父当年营救孙中山表示感谢。在谈到中英关系的时候，指责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他殷切的希望说：

“中英贸易有前途，但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希望你回国后向贵国议员转达我的看法。”

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做报告的时候，更尖锐地指出，英国与台湾当局的暗中往来已大大加强，英国已成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主要鼓吹者，他敦促英国当局改变态度说：

“中国愿意同英国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但不会默认或者容忍英国制造‘两个中国’，如果英国不改变对待中国的态度，中英关系将会受到影响。”

蒙哥马利两次访华

由于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两面态度，中英关系在50年代没有进一步发展。进入60年代后，英国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维护英国的利益，便让中国人民尊重的蒙哥马利元帅1960年5月来华访问，



做中英外交关系是否可以升级的探询。

周恩来暗暗称赞蒙哥马利宝刀不老，明白他这一着把自己置于两难之地：退则自己否定自己，进则说明西方对东方的恐惧是有根据的。蒙氏进退都稳操胜券。他指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先接见并宴请这位英国元帅，加之陈毅有元帅头衔，便于同蒙哥马利交谈。

1960年5月25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应蒙哥马利要与他进行单独会谈的要求，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接见他，热情地握手致意：“元帅阁下，欢迎你来到中国。”

蒙哥马利上前握着周恩来的手，衷心地表达敬意：“总理阁下，我在英国听我的老朋友艾登先生讲过关于你的不少故事。”

周恩来想起在日内瓦的难忘岁月，自然地交谈起来：“艾登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见到他的。”

在正式的交谈中，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100年。中国要在经济方面、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100年，因为100年以后西方国家又前进了。

蒙哥马利作为军人，很快把话题转移到战争问题上说，我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混了很久，我看到了东西方之间麻烦的发展。有一些人认为东西方之间的问题，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我不同意这种哲学。



蒙哥马利大发感慨说，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好像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麻烦之一在于西方世界认为东方集团会进攻他们，而东方集团认为西方集团会进攻他们。实际上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图，这是我的看法。可是我不能够使美国所领导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东方集团不愿意战争。

周恩来为遇到可以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对手感到格外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你的话我一半赞成，一半有不同的看法。你说东方集团——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向外进攻的意图，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你说西方集团不打算发动进攻，这就不完全是如此了。拿英国和法国来说，它们不愿意挑起一个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它们进行局部战争，这是不利于和缓局势的。”

周恩来稍做停顿，友好地望蒙哥马利一眼，着意强调说：

“至于美国的情况就更不同了。它们经常派高空侦察机到社会主义各国上空侦察和拍照。不久以前，我们也打下一架，一些外国记者包括英国记者都看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最近以来，经常有美国的飞机在中缅和中印边境高空飞行，并深入到我国西藏、青海空降特务、无线电台。这些我们都捕获了。这完全是侵犯，超出了一般的间谍活动。”

周恩来满怀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向英国客人指出问题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人心安定？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在南朝鲜、南越、日本也都建立了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如果在他们的威胁下表现软弱，那么，战争贩子就可能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蒙哥马利是一个极其关心国际问题的军事家，周恩来的精辟分析引起他的强烈兴趣。周恩来发表结论说：

“因此，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的世界局势是，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是没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较大，但我们对突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放松警惕。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不肯放松制造紧张局势。元帅阁下，你对我的上述意见有什么看法？”

蒙哥马利以英国绅士的标准风度将双肩一耸，两手一摊说：“不幸的是，刚才你所说的，大部分我不得不同意。我个人认为要取消相互之间的猜疑，应该从取消对别的国家的军事占领开始，让大家回到他们的本国。”

周恩来从善如流，欣然表示：“我同意。”

蒙哥马利为自己的观点得到周恩来的赞同感到鼓舞，发表准备已久的看法说：

“中国当前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以便从事经济建设，但是，50



年以后，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大而又有很多人口的伟大国家之后，它想干些什么呢？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我与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是非常熟悉的，我要告诉他们，我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和我同中国领袖们的谈话。”

蒙哥马利强调自己的地位之后，这才讲出他认为最重要的话：

“他们相信我所说的中国需要和平，但他们会问：中国的最终

目的是什么？西方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如果我能够把一个满意的回答带给西方世界的话，那会有很大的帮助。”

周恩来明白蒙哥马利的潜台词是，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后，会不会对外进行扩张侵略？他认为这种想法具有典型性，有必要予以澄清，便满面笑容说：

“阁下这个问题提得很坦率，说到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很愿意谈一谈。”

蒙哥马利高兴万分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同你单独会谈的原因。”

周恩来友好地指出：“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加快建设是最迫切的任务，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

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基本政策不容许我们向外扩张进行侵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进行侵略扩张，就背



弃了社会主义。我可以负责地对你说，不仅我们这一代不会向外扩张侵略，我们还要教育下一代也不要这样做。可能西方国家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坚定立场说清楚。”

蒙哥马利追问道：“中国的最终命运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

周恩来随口而答：“我们将来的前途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它还是一个理想。”

蒙哥马利又问：“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强加于人？”

周恩来终于弄清蒙哥马利的疑问是由“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的宣传引起，便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

“是的，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强加于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主要是以国内为对象，以我们自己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为对象，一切依靠自己，当然也不排斥有些东西要与别的国家互通有无，进行友好平等的交换。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损人利己，也不容许侵犯人家的主权、领土来扩大我们的利益。这样搞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侵略。”

蒙哥马利颇有自知之明地说：“像英国一样？”

周恩来很欣赏这位英国元帅的坦诚，客气地回答：“英国和以前不同，要改。我们总是欢迎任何国家改正过去的错误。”



“我们已经改了。”蒙哥马利颇为自负。

“你们改得还不够。”

周恩来举出英国首相艾登因为参加发动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而被迫辞职的例子，蒙哥马利无话可说。

周恩来见好即收转换话题，说明中国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它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以反问的方式强调：

“和平共处不能是一方面侵略，另一方面被侵略，这样怎么和平得了？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即一切外国军队撤回各自的领土，大家搞好各自国内的事。”

蒙哥马利对此极其赞成，饶有兴味地从另一角度发动“突然袭击”：“你是否不相信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

周恩来暗暗称赞蒙哥马利宝刀不老，明白他这一着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退则自己否定自己；进则说明西方对东方的恐惧是有根据的，蒙哥马利进退都稳操胜券。周恩来微微一笑说：

“战争不可避免是一种想法。因为只要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的根源继续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也继续存在。另一种想法是如果搞得好，如果做出努



力，可以阻止战争。这是两种可能性，我们把这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

蒙哥马利见自己精心设计的制胜之策，被周恩来轻轻化解，他巧妙地设下的“暗礁”，被周恩来举重若轻绕过，便对周恩来心服口服地说：

“我回到欧洲后愿意告诉西方世界，他们用不着害怕中国，因为中国曾饱受外国侵略的痛苦，它不会将侵略强加于人。中国的最终使命是作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周恩来对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态度变化自然表示欢迎，还友好地提出建议说：

“你可以向他们这样说，当然还要讲一下我们的政策，不然，你就没有根据了。我们的政策为西方人所不了解，而且常常被一些西方记者所曲解、挑拨。”

蒙哥马利开始将周恩来当作朋友看待了，以元帅的豪爽告诉中国总理：

“我想，西方世界对中国有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纠正。我回到欧洲后马上把这种观念纠正过来。我要说我喜欢新中国甚于旧中国。西方说，新中国的人民抑郁不欢，我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很高兴，对每个人都友好。我这样说，是不会受美国欢迎的，但我不介意。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会谈。

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蒙哥马利建议改善中美关系。他认为美国是西方的“领袖”，中国是亚洲大国，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解决争端，建立友好关系，认为这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是非常重要的。

周恩来指出中美交恶的责任在美国，因为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根子在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美国在太平洋东边，我们在太平洋西边。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华盛顿的政府不是美国政府，而美国常说我们的政府不是中国政府。敌视是美国开始的。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也敌视它。我们敌视和反对的，是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它侵占台湾。我们没有跑到火奴鲁鲁和加利福尼亚海岸去。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正如阁下所说的，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先在日内瓦、以后在华沙进行的中美谈判中，我们都作了努力。我们曾经建议，中国与美国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应该坐下来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海峡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这是很友好的建议，但是美国不干。

蒙哥马利了解到事情的复杂性，有些悲观。

周恩来明察秋毫，巧妙地给蒙哥马利一线希望：

“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



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平等的谈判。一方面同蒋介石讨论台湾如何回归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从台湾撤军。”

蒙哥马利果然兴趣大增，与周恩来讨论改善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种种可能性，他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总理认识蒋介石吗？”

周恩来开心地笑了起来：“不但认识，而且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们曾经两次合作过。我认识他已有36年了。”

蒙哥马利大吃一惊，听周恩来详细讲解中国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情况，才恍然大悟，于是，他提出更坦率的问题：“总理认为蒋介石的前途怎么样？你们会不会砍掉他的脑袋？”

周恩来笑着阐明我们的统战政策：“谁砍他的脑袋？如果他愿意把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但不会砍掉他的脑袋，而且还会给他一定的荣誉和地位。尽管他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中国人民可以不咎既往。”

73岁的西方老元帅对此无法理解，周恩来使用事实来说明。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特意把一位前国民党将军介绍给蒙哥马利：“这位是杜聿明将军，他同陈毅作过战。”

陈毅走上前与杜聿明亲切地握手，微笑着告诉蒙哥马利：“他是我的对



手。”

蒙哥马利饶有兴趣地问：“政治上的对手？”

陈毅说：“军事上的对手。我们在1948年打了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很凶啊！”

蒙哥马利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们谁战胜谁了？”

杜聿明指着陈毅回答：“他获胜了。”

蒙哥马利向杜聿明问明了双方交战的兵力，大为感叹：“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不应该打败仗啊！”

杜聿明指着陈毅，幽默地揭开谜底：“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有200万，我的人都跑到他那儿去了。”

众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蒙哥马利这才相信周恩来关于不砍蒋介石头的话。

5天的中国之行时间真是太短了，蒙哥马利因为有急事必须赶回英国。依依分别的时候，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如果贵国允许的话，我想再来一次，而且准备呆久一些。”

周恩来表示欢迎：“元帅阁下，中国的大门对你随时都是敞开的。你为什么这么忙啊，这次本来可以多呆几天嘛！”

蒙哥马利对周恩来的盛情深表感谢，接受周恩来的建议，1961年9月



初再次来到北京，周恩来应其要求，派李达上将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到当时还未对西方开放的包头、太原等地做“突然袭击”性的访问，并明确指示：

“要放手让蒙哥马利去看，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后去做结论，从本质上了解中国。”

周恩来对蒙哥马利一行的动向颇为关注，他们9月20日返回北京后，立刻听取陪同人员熊向晖的汇报，得知熊向晖与蒙哥马利在看电影《穆桂英挂帅》后进行过有关妇女当元帅的辩论，严肃地批评说：

“你讲的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军事领袖，能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奔波，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难道还不懂得求同存异？你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为采取补救措施，周恩来忙问：“蒙哥马利最喜欢看什么节目？”

“杂技，特别是口技。”

“他看了《抢椅子》没有？”

周恩来立即查看招待蒙哥马利的文艺演出节目单，发现安排有《木兰从军》，马上决定以《抢椅子》代之，颇有感慨地说：



“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蒙哥马利还以为我们是9月21、22日，周恩来与蒙哥马利进行了两次轻松愉快的交谈，周恩来称赞蒙哥马利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抓住了关键：

这三项基本原则互相关联，可以分别实行，也可以同时实行。第一，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现在只能是两个德国。第三，更为关键的，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回本国领土。

蒙哥马利最后试探中英外交关系升级的问题，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中英关系的障碍是英国造成的，英国追随美国，不赞成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同时还保留在台湾淡水的领事机构，实质上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决不答应。

蒙哥马利两次访华，促进了英国上层对中国的了解，但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由于英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对新中国的偏见，中英关系仍然徘徊不前。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1962年9月，英国政府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问英国，不久又通知中国方面要无限期推迟。

对此，中国驻英国代办熊向晖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三点建议：向英国政府



提出抗议；主动宣布取消卢的访问；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批准，要其联系中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研究考虑。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问英国成功。当年秋天熊向晖回国后周恩来告诉他，要看全局，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卢绪章访英，这就有区别，先要抓住这一点。当时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照原计划邀请卢绪章访英，不好向印度交代。

周恩来说，英国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英国予以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呢？

在十年动乱中，1967年8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发出指示才得以平息。

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促使中英关系发生转折，他1971年得到报告，英国政府愿意改变它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态度，重新考虑英国在台湾的领事馆问题，希望中英就两国外交关系升级问题举行会谈。

3月2日，周恩来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在谈到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时候，极其坦率地说：

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



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周恩来的坦诚态度使谭森极为满意，他认为中英关系由代办升级为大使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此，周恩来说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说：

障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设有领事馆，英国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

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国一致？

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

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中英谈判一度陷于僵局。

1971年基辛格访华并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后，英国在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才发生变化，中英新一轮谈判1972年2至3月初再次举行。3月13日，中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予以公布，从即日起，双方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第二十五章 中法建交

“周恩来不让我辞职”

在日内瓦会议上，法国拉尼埃政府追随美国的侵略政策，起了很坏的作用。法国外长皮埃尔是个酒鬼，个子小但酒量颇大，气焰十分嚣张，给日内瓦会议造成极大障碍。

为打开僵局，周恩来首先协助胡志明组织奠边府战役消灭了法国侵略军的主力，又在外交上抨击拉尼埃的僵硬好战政策，支持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促使拉尼埃政府倒台。法国和西方舆论尖锐地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周恩来只动了一下小指头，就把顽固追随美国在恢复印支和平问题上采取拖延政策的拉尼埃轰下了台。

周恩来立即与苏联、越南代表团协商对法国新政府的态度，一致认为法国方面担心法军在雨季的处境更加危险，又无力向越南增派援兵，而美国近期不可能大规模干涉，英国原来就反对法国参加越南战争，这些因素将迫使法国新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

1954年6月16日周恩来请艾登向法方传话，说明印支问题和平解决对法国和英国也是有利的，希望法英两国不要像美国那样缺乏和解精神。

6月20日，周恩来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萨瓦利，就建立法



中友好关系和恢复印支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传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说：

中法人民应当友好，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同情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与各国和平相处，我们是抱着和解精神来日内瓦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的。法越双方应该负责任来迅速求得和平……如果追随别国奉行冒险政策和扩大战争的政策，法国的荣誉只会受到损害。

22日，周恩来在瑞士的伯尔尼与法国新总理兼外交部长孟戴斯—弗朗斯首次会晤，客气地询问法国新政府关于实现印支停战的方案，然后主动地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说：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条件。

孟戴斯—弗朗斯久闻周恩来的大名，又有在7月20日前实现印支和平的诺言，愿意考虑中国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法国和英国在解决印支问题上有重要作用，就设法支持法英对抗美国。

周恩来获悉杜勒斯特意从美国赶到欧洲，压新上台的孟戴斯—弗朗斯跟



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就抢在杜勒斯之前于7月13日会见他。

在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之前，周恩来先与苏联和越南代表召开会议，他提出建议说，为了使孟戴斯—弗朗斯在回巴黎同杜勒斯会谈前有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稳妥把握，便于他坚持原有立场，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美国的过分要求，同意在越南16度线划分集结区的方案，在他口气有松动时就应提出，原提老挝集结区的方案，亦应表示缩小。苏联和越南代表对此表示同意。

在与苏联和越南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首先向法国新总理揭露杜勒斯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真面目说：

“美国已在尽力破坏日内瓦会议。现在，各国外长都回日内瓦来了，而杜勒斯不来，我们对这种态度是不能满意的。杜勒斯现在到了巴黎，却不来日内瓦，我们对此感到奇怪。美国人不遵守协议，反说别人不遵守协议。其实，世界上最不遵守协议的就是美国人。”

接着，周恩来指出法越双方共同点较多，互做妥协就可以取得圆满解决。

孟戴斯—弗朗斯辩解说，法国撤出的是经济、政治、人口都很重要的地区，因此仍然坚持18度划线。

周恩来耐心地说明越南方面也有很大困难，劝法国在原有立场上再前进



一步，越南是愿意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双方互做让步，就能达成协议。

通过几次接触，孟戴斯—弗朗斯对周恩来比较信任了，在杜勒斯7月13日把他和艾登召回巴黎施加压力的时候，就软中带硬地顶了杜勒斯，法国和英国都造了美国的反，为维护本国的利益，法国和英国的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发展，与周恩来、莫洛托夫相互配合，促使日内瓦会议21日达成了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

出乎周恩来预料，在最后关头又出现了有趣的插曲。

印支三国代表对法国侵略者有气，商量好成心给孟戴斯—弗朗斯脸上抹黑，20日晚不肯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非要拖到21日清晨，从而使孟戴斯—弗朗斯要在20日达成协议的许愿不能实现，逼他下台。

孟戴斯—弗朗斯急坏了，赶忙去请周恩来帮忙解围，不巧周恩来不在，又去找莫洛托夫，直到东方发白，印支三国代表才肯签字，法国人虚惊一场。

孟戴斯—弗朗斯兴致勃勃向周恩来登门致谢，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以法国人特有的幽默问道：“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您看我是否应该辞职？”

周恩来笑道：“主要的事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孟戴斯—弗朗斯爽朗地就坡下驴：“您和我们总统的意见一样，他今早在电话中告诉我不应该辞职。等我在法国议会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时候，我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让我辞职。”

世界上最好的两首国歌

周恩来1955年11月1日会见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的时候，说明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存在着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它们承认新中国，割断了同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恢复新中国的席位，它们和中国互派大使或公使，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

第二种是英国和荷兰，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集团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在联合国却支持蒋介石集团，它们和中国只有半外交关系，只是互派代办驻在对方首都。

第三种是法国和比利时，它们只承认蒋介石集团，和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当时，中法关系不但比不上与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的北欧国家，而且落后在建立半外交关系的英国和荷兰后面。针对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周恩来不急不躁，对法国议员代表团成员说：



“因此，中法、中比关系只能在人民中先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法、比政府承认蒋介石，而人民同新中国来往。但时机成熟了，法、比政府也会承认新中国的。我们只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人民选择哪一个政府我们就承认哪一个政府。……现在法国政府却承认蒋介石，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

周恩来从当时中法关系的客观实际出发，体谅法国政府和议会的困难，在表示理解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说：

“为了将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中国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也应当承认一个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这对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

周恩来这种通情达理的态度使法国客人深受感动，称赞周恩来的建议实事求是，富有人情味，为中法关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法方乐于接受。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中法关系的建议：

两国人民要多来往，特别是政治活动家要多来往，法国议会派代表团来中国，我们希望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派代表团到法国去。此外，可



以增加文化、科学方面的来往，贸易方面可增进民间的贸易来往，甚至可以签订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往频繁起来就好。

最后，周恩来指出形势在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意味深长地预言中法关系的光明前途：

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我们和平相处。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

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接见法国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罗希洛为团长的法国经济代表团的时候，巧妙地做工作说：

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也希望彼此往来，互通有无。工业化不妨碍贸易，而是要增加贸易，这也是欢迎诸位来中国的道理。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我们是要去学习，对于法国的经济、文化、技术都愿意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周恩来对法国悠久的文化艺术极为钦佩，两个月后又接见应邀访华的法国文化代表团，指示陪同接见的中央广播事业团负责人梅益，中国要放些法国音乐、歌曲，不要使法国的《马赛曲》都不容易听见。他大力称赞说：



“法国人有和平、博爱、自由的传统。中法两国人民的接近，有利于东方和西方的接近。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增进。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这两个国歌都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

富尔访华与周恩来商谈中法建交事宜

1957年5月末6月初，法国前总理富尔偕夫人来华访问，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予以接见，并与他多次交谈，详细地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发展中法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

富尔回国后，多次向他的好朋友戴高乐讲述访华的观感，说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做了一些研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径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明确地告诉戴高乐：

“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戴高乐1958年重新执政后，法国外交出现了令人关注的现象：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在美国和苏联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



约上签字，毅然决然地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对于美国的侵略政策不满，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1962年法国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扫除了一个大的障碍。

1962年8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向周恩来报告，他接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一封电报说，为推行抗美独立战略，法国总统戴高乐授权前总理富尔访问中国谈建交问题。富尔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他希望对外宣称他此次中国之行纯属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

要不要接受富尔的访华要求，一时在中国外交界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当时法国与台湾尚未断绝外交关系，根本谈不到建交问题。

周恩来认为自动送上门的客人不能拒之门外，他亲自召集外交部和有关部门人员会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说：

“首先要看到，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周恩来论述中法建交对世界格局的重要影响说：

“中苏分裂和美苏争夺中的暂时性勾结使中美苏关系发生重大位移。法国感到中国同它的距离接近了，需要借中国的力量增强它同美国斗争的地位；法国经济困难重重，戴高乐威信下降，反对派势力抬头，戴高乐决



心利用中苏分裂，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缓解内部的矛盾。”

于是，富尔 1963 年 10 月 22 日到达深秋的北京，周恩来先安排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等到机场热情欢迎和接待，又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与其进行初步会谈，了解法国方面的主要见解。

周恩来 23 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富尔进行第一次会谈。

富尔仔细打量几年不见仍然精神焕发的周恩来，客气地称赞道：“已经 6 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总理到过巴黎吗？”

一句话勾起周恩来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难忘岁月的回忆，大为感慨说：“是的，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

富尔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富尔以杰出外交家的远见卓识说，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他来中国，代表法国元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着重强调自己的使命，郑重地把戴高乐一封亲笔信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怀着崇高敬意，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称赞特别是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他幽默地说：

“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



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富尔运用娴熟的外交艺术，说明法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势对法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他又认为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他提出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恩来对富尔玩弄含糊战术不太满意，直截了当地提出关键问题：

“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富尔明白周恩来是问法国是否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的问题，便爽快地回答：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美国和苏联的意见，自己可以做出决定，但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周恩来适时讲明中国的原则态度：法国必须割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不能像英国和荷兰那样拖泥带水。

在台湾问题上，富尔态度含糊，虽然讲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但又说这是个微妙问题，法国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会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一切关系。

周恩来对富尔所讲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很失望，认为这使会谈变得



非常困难，但他没有用生硬的态度，激烈的言辞，而是采取谈心和交换看法的方式，提出尖锐的问题说：

“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之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

“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就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 100 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这里，周恩来做了两个假设，一个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只动一个小指头”就被轰下台的前法国总理皮杜尔，一个是与中国进行过很好合作的孟戴斯—弗朗斯。周恩来说明中国绝不会因为与这两个人都有过关系，就承认他们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成立的流亡政权，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

“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在周恩来严正而又合情合理的态度面前，富尔的口气不得不软了下来，变换方式提出中法建交后法国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周恩来举出英国的例子，当即斩钉截铁地拒绝：“这不可能。”

富尔承认法国13年前不承认新中国是个错误，但又说法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

周恩来见双方的观点都已摆明，便适时提议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

在又做一番深入研究和准备之后，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25日在西花厅与富尔进行第二次会谈。

富尔1955年曾任法国总理，曾周旋于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具有丰富的外交折冲樽俎经验，为表示他的诚意，主动提出中法建交的三个方案，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富尔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第一个方案，无条件承认，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周恩来认为这个方案的实质在于法方试图避开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对法国最有利的方式，用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因而明确表示，由于富尔没有回答如何处理法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所以中国政府难于考虑。

富尔介绍他的第二个方案是有条件承认，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



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周恩来认为它虽然给法国留下了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也较为合理，但要法国驱蒋尚有困难，因此不便采取。

富尔又拿出他的第三个方案延期承认，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马上说明第三方案只是提提而已，根本无意采取。他又对三个方案加以解释，说明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他将是不愉快的。

面对富尔的矛盾态度，周恩来不急不躁，不是把难题抛给对方，由法国方面单独去寻求答案，而是真正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共同寻找解决难题的途径。他以商量的语气说：

“为了使双方的愿望有更明确的基础，我提出三个问题向阁下解释：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将军是否也这样认为？”

富尔吞吞吐吐说：“戴高乐将军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周恩来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脸上的笑容消失，毫不含糊地严肃质



问：“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台湾地位未定？”

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久经外交沙场的富尔推托说，戴高乐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周恩来打破富尔的推托之计，追问会谈使者本人：“你的看法如何？”

富尔运用他最拿手的含糊战术与周恩来周旋：

“作为戴高乐将军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明确地表示意见，因为我没有得到指示，但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戴高乐将军不管这一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的本质：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将军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

富尔这才明白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不得不放弃对他人非常有效的含糊战术，回答周恩来提出的难以逾越的问题：“不是戴高乐将军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会意地望陪同他接见的陈毅一眼，设法把谈判向前推进一步，向富尔提出新的问题：



“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在周恩来的凌厉攻势面前，富尔只得承认：“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周恩来微笑点头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来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

富尔竭力强调他只是戴高乐将军的使者，又对他的观点详细地加以解释：

“戴高乐将军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了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民主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将军。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

周恩来当然明白富尔的使者地位，但必须使戴高乐将军对台湾问题有清楚的了解，便以理解的口气重申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说：

“了解你的立场，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



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将军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富尔觉得周恩来讲得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表示赞成。

周恩来看富尔的态度比较友好，也做适当让步：“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想些办法如何摆脱，这可以研究。”

作为回报富尔也露些口风：

“戴高乐将军说目前法国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周恩来强调中国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希望把我们的态度转告戴高乐将军。

当晚，周恩来设晚宴招待富尔夫妇，席间循循善诱道：“我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第二两点是肯定下来了，第三点是接近了。这点如果解决



得好，可使第二点更加肯定。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第二点。”

宾主满怀诚意热烈交谈中法建交的种种方式，周恩来联系柬埔寨承认中国的情况后发富尔说：“西哈努克亲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眨眨大眼若有所思说：“这是一个先例。”

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因此，要事先达成默契，确实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为了使双方都有充足的考虑时间，周恩来让外交部安排富尔到山西大同等地参观访问，指示各地热情接待。

周恩来反复思考后于10月31日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话，报告他与富尔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也在慎重考虑中法建交问题，他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人11月1日飞沪面商。

当天下午5时，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与富尔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有一定准备的会谈。

周恩来满面春风地说明中国政府认真地研究了富尔提出的三个建交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关系的积极愿望，他提出一个新的



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

正处于苦苦思索的富尔对此极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愿闻其详。

周恩来说明，他这个过度性的积极而有步骤的建交方案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之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根据迈出前两步后出现的三种情况分别处理。

富尔认为中国充满诚意已让出一步，法国也应该让一步，但对中国要求法方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面有难色。

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法国可以接受的良策：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认为这不是大问题，点头承诺说：当然。

周恩来周密地排除可能遇到的障碍：“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法国外交



部请客，台湾的代表请不请？”

富尔佩服周恩来处事周到，富有远见，便笑着回答：“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有可能好多人可怜他，法国外交部的人认识他，有人会请他吃饭。”

周恩来认为只要原则定了，方法可以灵活掌握，但为慎重起见，便留有余地答复富尔说：“还得与党和政府说一说，到上海再回答你。”

周恩来告诉富尔，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他将陪同客人到上海去见毛泽东。

11月1日上午，周恩来和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当晚9时，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和平饭店与富尔继续会谈。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并与其他领导人研究之后，根据中法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第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第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宣布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公开行动，是由于中法双方根据富尔先生转达



的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宣读完中国的建交方案，笑问法国客人：“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富尔心悦诚服地回答，“我是受委托来的，没有权利答复，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周恩来对此表示理解，并对富尔的此次中国之行给予极高的评价：

“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富尔见周恩来这样信任他，对他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感动地说：

“我完全同意，要中国做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的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将军同意，只要实行就行了。如



果他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

富尔说到这里，双肩一耸，两手一扬，来了个标准的法兰西幽默，对周恩来说：

“我相信戴高乐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周恩来含笑把事情推向更加完美的境界：“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

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富尔感谢周恩来对他寄予这样高的期望：“我将尽力而为。”

当晚，周恩来陪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富尔，谈笑风生，亲如一家。

周恩来告诉富尔一个好消息：“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

富尔早就等待着这一天，认为这是对他的最高礼遇。

周恩来又愉快地告诉富尔：“明天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



富尔不解地问：“两位市长？都是谁？”

“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一位是现任市长柯庆施。”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

富尔法国式的幽默语言逗得宾主哈哈大笑。

11月2日凌晨，中国外交官把中法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11时，周恩来与富尔在和平饭店对其进行最后的敲定。

当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富尔。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谈笑风生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

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兴趣，但因为周恩来、陈毅和戴高乐、富尔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西方记者搞不到确实消息，中法建交就更带有神秘色彩，因此在两个月后的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非洲的



时候，法国记者一直追到非洲。

12月20日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记者抓住机会向周恩来提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兴奋地回答道：

“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热情的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周恩来的答记者问更吊起了法国记者的胃口，他们纷纷找陈毅刺探消息，陈毅乐于帮忙，设法让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在开罗单独采访了周恩来，又使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赛兰在摩加迪沙采访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告诉法国人：

“中法建交无疑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一个的重要事件。”

正如周恩来所说，在瑞士举行的中法建交谈判顺利进展。双方原定用互换照会的方式建交，后来法国觉得这样给人以有求于中国的印象，提出改为发表联合公报的方法。周恩来考虑到中法建交的重大影响，便同意法国的要求。

中法终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根据中法双方的事先协议，周恩来指示中国外交部



发表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中国驻法临时代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达法国，揭开了中法关系的新篇章。

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重大突破

中法建交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戴高乐都注意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使中法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周恩来亲自指导组织以杜近芳为主要演员的京剧艺术团、以人民代表夏菊花为主要演员的杂技艺术团、参加巴黎博览会的中国展览馆等大型活动，都曾在法国轰动一时，掀起一阵阵“中国热”。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极其敬重，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邀请戴高乐访华。



戴高乐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样崇敬万分，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法国，戴高乐一直希望能到中国访问，他经常称赞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度，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非常器重的老部下马纳克就任法国驻华大使，上任前，戴高乐交给他促成中法领导人互访的重大使命。1970年3月再次予以重申。

马纳克很快见到周恩来，转达戴高乐邀请周恩来访问法国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表示感谢，再三考虑之后对马纳克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1970年7月10日，周恩来接见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政府代表团，13日陪同毛泽东予以接见，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话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戴高乐身上。参加接见的马纳克向戴高乐报告说：

“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崇敬。”

10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喜气洋洋地告诉法国客人，因为中国核爆炸成功，北京通往欧洲的飞机暂停，所以留你们一天，请他转达对戴高乐访华的邀请。



周恩来请他最信任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10月20日找到戴高乐的亲信、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转达周恩来的口信：

“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去访问中国，政府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中国等待着将军。”

韩素音作为周恩来的秘密使者，还特别郑重地请吕夫转告戴高乐说：

“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总理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以他的名义邀请将军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最钦佩的，就是戴高乐将军拒绝在强权面前屈服以及他维护国家独立的意志，但在直接向将军发出邀请之前，转告领导人想确知将军能否接受。你能否把这个消息告诉将军，并把他的答复告诉我？我立即向北京转达。”

令人遗憾的是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不幸于1970年11月9日逝世。

毛泽东和周恩来极为震惊，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蓬皮杜总统发去唁电，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1972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就东南亚局势、欧洲及裁军问题、双边关系等交换意见。他亲切地说：



“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首先承认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大国主义。法国人民是一个有古老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民族。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这是法国人民感到自豪的。”

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这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到宾馆。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盛大欢迎会，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说：

“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都爱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都不允许世界上有哪个超级大国来控制、干涉或侵犯我们，都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周恩来陪同远方而来的客人会见毛泽东，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晚会结束时，周恩来指示把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改为《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大为不满，攻击“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周恩来与蓬皮杜进行了三次会谈，蓬皮杜越谈兴趣越浓。



蓬皮杜极感兴趣地询问举世闻名的神秘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吸引读者的奥秘，周恩来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现在世界上的报刊舆论，可以说绝大多数还是西方的宣传占优势。虽然我们的报纸很少转载这样的舆论，但我们出版内部刊物《参考消息》，数量很大，不是几十万份，而是几百万份。毛主席说还太少，照他的意见，几千万份才好。”

蓬皮杜对此极为羡慕，周恩来却遗憾地告诉他尊贵的客人，主要是因为缺少纸张，制版也有困难，但决心克服困难使其有个大的发展，他信心十足地说：

“这个目的总要实现才好。就是说，不要让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人民不知道。这样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我们承认思想是没有国界的。马克思主义出在德国，而且还是在西德。现代哲学也出自德国。政治经济学出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出自法国。这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革命，确实到本国人民需要时才会发生，而且只有本国人民自己起来，通过其革命实践、奋斗，找出的道路才是可靠的。现在世界上所谓的革命也复杂得很。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要很冷静地分析每个国家的情况，不要随便发表主张。”



蓬皮杜反应极其敏捷，又提出革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

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主张的革命与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矛盾。这五项原则同总统先生提倡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有点接近。我们说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说，有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

蓬皮杜称赞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恩来冷静地说，有人讲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既是又不完全是。从面积大、人口多这一点看，这算是个大国；但从经济发展、经济实力来讲，却差得很远。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看，我们要小得多，不能和你们比，你们现在10倍于我们。因此，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说我们是“潜在力量”，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是有发展前途的。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纪时，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蓬皮杜对周恩来如此谦虚感触颇深，相信中国一定会很快强大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中国强大了，要特别警惕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目空一切，骄傲自满。不仅现在要警惕，将来要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后代。

14日，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乘专列火车前往山西大同参观访问，一路畅谈他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难忘岁月，纵论中法关系和世界形势，两人结



下深厚的友情。

15日，周恩来陪同蓬皮杜前往大同市西北五州山南麓的云岗石窟参观。只见这里有北魏时期的53个洞穴，造像5.1万余尊，最大的高达17米，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堪称中华文化瑰宝，蓬皮杜大开眼界，赞不绝口。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乘专机从大同飞往杭州。16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乘游艇观赏西湖的美丽景色，游览花港公园、三潭印月和花圃。

17日，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乘飞机到达上海，一起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上海的美丽风光，然后冒雨到机场为蓬皮杜总统送行。

令周恩来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和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实现应邀访问有特殊感情的法国的愿望，因此对邓小平副总理1975年5月访问法国极其重视，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大国，在病中念念不忘此事，请邓小平带去对伟大的法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